張太雷文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張太雷文集



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向为革命牺牲的
张太雷同志致
敬

陈云 一九七九、六、十一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弘扬举义

革命先烈

传文传世

以教后人

孔秀璋 九五 十.十三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人民週刊

第二十三期

一九二六年五月

人民週刊

第十一期

一九二六年五月

五四紀念告廣東學生

論文

政府出師與人民的自由

廖仲愷——國民黨的左派模範

一九二六年张太雷主编的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

列宁与中国青年

太雷

列宁同着俄国革命把中国青年革命的觉悟惊醒了！五四运动里的中国青年工人当然人人都知道列宁是他们阶级的唯一领导者。

就是中国的青年学生，当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先师孔子的时刻，他们正找着了列宁做他们思想上的指导者。近来在北京大学——北京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投票推举世界上的最大人物，结果是列宁当选。这亦就表示列宁在中国学生中的威望，而中国学生在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列宁死了，但是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活着！

一九二四年一月，张太雷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悼念列宁文章的手迹。

张太雷关于青年团工作通信的手迹。

目　　录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为了使各位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我打算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正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但是，我的时间太有限了。所以我想只就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来谈一谈。

日本帝国主义决不单是一个对远东说来应该予以解决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而且它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对苏联来说，日本依然会成为一种经常不断的威胁力量。并且，将会阻挡远东各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可是，问题还不止于此。第一次大战以来，日本和英美一样，已经成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正象帝国主义的日本现在在华北所干的那样，一旦中国全境都为帝国主义所统治，那么，日本政府就不仅可以随意掠夺和使用中国最丰

---

* 此件有多种文本。俄文本为：«Бюллетени III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1921г., июнь-июль), 23, с.494—495.［Речь Чжан Тай-Лэя］；英译载于X.J. Eudin and R.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1927)，1957，p 144。本稿系根据日译本译出。译自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劲草书房1970年版，第I集第52—53页。译稿已参照英文本作了核阅。（丁则勤译　马斌校）——编者

富的资源和最好的劳动力，而且还会利用这些资源和劳动力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这对世界革命将会成为严重的障碍！因此，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到那时，我们才能打倒世界资本主义；到那时，世界革命才能完成它的事业！

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各位对于中国的发展如能更进一步予以注意，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的其他各种革命力量，也会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各位以巨大的援助。目前，中国正面临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极需活动的时机。现在，青年学生们正在起来造反，他们反对中国旧的社会结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处在歧路上。因此，我们如果援助他们，他们就会前来追随我们。我们要把这些力量引向正确的道路，不能推给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自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来，中国的工人也开始觉醒。小规模的罢工在中国不断发生。我们必须把这些正在成长的运动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不能让他们受黄色工会的影响。一旦到达这种地步，为了得到他们的赞同，还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游民无产阶级占了中国居民的大部分。他们虽然还没有产生阶级意识，但是他们是革命的。如果能使他们参加到党的行列中来，一定会使我们的事业获得很大的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在红军的队伍中，参加对高尔察克、邓尼金的斗争，这就证明他们已经成长为优秀的战士。然而只要我们不去注意他们，他们也会成为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人。而且，可能会被资本家利用来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就象被俄、法帝国主义者雇佣于挖堑壕，被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利用于对“满洲”、山东进行警察的

监视那样。

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呢？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世界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原载《Protokoll des III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1921，pp1018—1020（德文本《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记录》，1921年，第1018—1020页）

署名：CHANG-TAI-LAI(China)

外国统治下的商人政府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美国公使休门在上海总商会演说劝中国商人应当干预政治，应该自己出来建设一个强固的政府。香港南华报记者在五月十八日报上亦劝告广东商人应独自造成一种势力，并劝他们发展广州的商团军。英美两国现在都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商人政府出来。中国的商人能出来打倒军阀建设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在历史说来是更进步的，只要真倾向民主主义，真能革命。但是我们所希望的民主主义政府是一个独立不受外国势力的政府。决不是英美所希望我们所有的商人政府。因为他们几年的试验，觉得中国军阀还靠不住，不能完全行使他们的命令，他们于是想找中国的商人，他们一定能更比军阀服从一点，因为他们本来是洋行买办，外国人的雇佣者。这样一个完全受外国统治的商人政府一定比现在的军阀政府还要坏，中国人民将愈受外国的掠夺。英美这样的企图是中国一切爱国的人们应当反对的。

原载《向导》第28期
署名：春木

为废止棉花出口禁令告中国实业家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上年棉贵纱贱，国内纺纱业，极为恐慌，厂商为保存自己生存起见，呈请政府禁棉出洋，当由北京政府照准施行。后来外交团援据条约所保障之土货购买输出权利，累次对北京政府抗议禁止棉花出洋，近日北京政府已由国务会议通过废止棉花出口议案。这个议案当然是不利于中国纺纱业，是中国实业家所要反对的。

中国实业家从这件事上可以明白外国资本家和你们自己的利益是相反的。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为什么要变成帝国主义国要征服殖民地——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在本国已无发展余地，所以要得着殖民地来销售他们的工业出品的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殖民地的原料来供他们的工业。因此资本主义国对殖民地非强迫着决不肯让殖民地实业发展，决不肯让殖民地原料出口有限制。我们中国虽不是一完全殖民地，亦就相差无几。对于外货的进口和原料的输出都须受外人的管理。这种棉花出口的禁止是保护中国幼稚纺纱业所需要的，而外国资本家决不能允许这个，因为这是直接反对他们的利益，一方面他们需要贱的棉花供给他们的工厂，一方面怕中国纱厂得了贱的原料可以在中国市场

上面和他们的纱竞争。

所以在经济地位上中国幼稚的实业家（完全和中国商人不同），一定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而成为中国国民运动的一分子，中国的独立和中国实业家的利益是不能分的。中国的实业，倘若没有独立的政府争得对于出入口货有绝对的主权，来保护他的发展，是无从存在。这种北京政府只能保护外国而不能保护中国人民，非推倒不可。中国的实业家，你们应当知道你们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使命。你们更应当知道：中国的解放独立非得最大多数劳动平民的参与，决不能成功；不是现在北京政府能保护实业，而是平民革命政府。

原载《向导》第28期
署名：春木

奉直战争和日本与英美的利益冲突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新银行团三千万垫款是英美想帮助曹吴打败奉张，推倒日本在华特殊势力，日本有鉴于此，所以借口于怕有助长内乱之嫌，反对这个借款。于是现在英美想法用完全英美没有日本关系的克利斯浦银行来借款给曹吴政府以抵制日本。借款未成功，曹吴不敢对奉张开战，所以奉直战争延宕至今，未能实现。这奉直战争酝酿之中，反映出日本与英美的这种利益冲突。中国的所以不统一就因为列强的对华利益不统一，各要扶助一派以植自己的势力；而列强的利益终无统一之时，所以中国亦无统一之日。只有第三方面，就是中国平民自己起来把两种势力——军阀和列强——都推倒，方才能有统一。

原载《向导》第28期
署名：春木

充满威吓的世界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英国在星加坡建设军港，日美闻之当然都有戒惧，所以日本报纸都说这是“对日本挑战”（五月二十五日香港南华报）。五月二十八日香港南华报载美国海军总长邓璧的演说亦是有鉴于此。丹培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威吓的世界”，我们不能不防卫自己，在军备限制协约范围内我国应增添巡洋舰，飞机……

现在美国人自己亦不能不说破华盛顿会议的无用。在此种“充满了威吓的世界”，还是大家积极备战罢。崇拜美国因而迷信美国人所召集的华盛顿会议和所创造的国际联盟的人们，不要再替你们的主人圆诳了。

原载《向导》第28期
署名：大雷

临城案件*和兵工政策

（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社会上一般眼光浅见不到事实的底奥的人们，常常不知治本而主张治标，提倡废娼裁兵，想借道德的制裁或法律的强制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不知废娼裁兵决不是如他们想的一样，是一个道德问题或法律问题；都是个经济问题，是一个很简单的饭碗问题。倘若否认这一点，这两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的。上海已实行废娼，但是公娼减少的速度还没有私娼增加的快，这是一个很显明的事实，证明单是法律决计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经济问题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东西。现在临城案件又是一个证明，证明裁兵问题如果不当他一个经济问题来解决，是永远不会解决的。中国无智识的新闻记者只知道大惊小怪的代外国强盗宣传，不知道研究这案件的缘由，去警告中国人。

临城土匪大半是裁掉的新安武军，我们可以看见，只知裁兵而不去解决经济问题，兵就会变为匪的。本来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同是一个失业者；当兵当匪，同是为一个饭碗问题。这个失

* 临城案件，是指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在山东临城以南发生的土匪劫车事件。由于被掳去的百余旅客中有外国人二十余名，帝国主义便乘机要挟，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扬言要出兵干涉。当时，直系军阀曹锟急于当总统，顺从地答应了帝国主义的各项要求。为救出外国人，北京政府不惜与土匪谈判，使用巨额赎金，答应收编土匪队伍等。这一案件，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编者

业问题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什么裁兵什么剿匪都没有用的，除非把中国的兵匪完全杀掉，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中国这个失业问题是欧洲资本制度的势力所造成的。资本制度在欧美把旧有手工业和农业经济打倒，把做手工业的人和农民都吸收到资本制度的大工厂大企业里去了，因为在欧美是有资本制度的大工厂，而后手工业才被摧残。资本制度和中国就不同，中国资本制度并未以自力发达，却有欧美的资本制度从外面侵入把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打破；同时制造外货的工厂都在国外，国内借外货而发展的仅仅是极可怜的交通机关，投机性的商业金融业。所以因此受殃的人们大多数不能进资本制度的工厂谋生活。因为没有地方谋生，于是才当匪当兵，兵匪是现在中国失业人的唯一职业，你夺他当兵的饭碗，他就捧匪的饭碗，这是无从禁起的。所以裁兵是不能解决这个失业问题的。新安武军裁掉了会变临城的土匪，吴佩孚的兵裁掉了会变洛阳的土匪，那末京汉路又要倒霉了。

所以要裁兵而使其不变为土匪，只有裁掉之后能代他们找一个饭碗，他们才不会去当土匪，于是就令人联想到所谓兵工政策。但化兵为工的政策不是在武人割据争雄的现状之下可以实行的，也不是少数资本家借着为民谋生的名义设几个小工厂容纳裁下的兵就可以实行的。兵工政策一定是要推倒军阀之后，国家来办才能够成功。国家创办大规模的实业才能够解决中国这个失业问题。能代国家来创办大规模的实业的政府一定不是现在这种腐败政府，一定要中国劳动平民的革命实力才能创造此种政府，并且是能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独立政府，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政府，关税财政等都受外人支配，中国国家创办实

业是不可能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不是此地所能说完的。

总而言之，临城案件掳几个外国人不算什么事，他们用武力来干涉亦不算什么，我们受他们的武力干涉也不止一次了，本来就天天在他们干涉之下，所以不算什么，用不了大惊小怪。对于中国有心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怎样能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怎样能推倒军阀实行兵工政策，怎样能建设强固的平民的政府，怎样能推倒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创造一个独立的中国。

原载《向导》第 27 期

署名：春木

星加坡建筑军港——“给各国一个榜样”

（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香港南华报载巴黎时报对于英国星加坡设港的一段话：“巴黎时报说：英国在星加坡建筑军港给各国一个榜样，教导我们，第一，须准备时机到来给以打击，第二，纸上担保常是不够用的。又说：英国在太平洋上的准备，只是防备他的朋友，叫我们明白法国必须在来因河上采防御手段”。

中国人听了这一番话也可以明白了：第一，一切国际联盟和华府会议等虚文的无用已由参加这些会议的帝国主义的法国自己说出（巴黎时报在法国如伦敦泰晤时报在英国有同样的势力，这两报代表两国的帝国主义）。华府会议想调和的就是英日美在太平洋上的利益，其结果只是英国在星加坡筑军港防御“友邦”的日美，日美的各自准备亦如英国。第二，各国都起首争夺军事要害的地点预备未来的世界大战，英国在星加坡筑军港，“给各国一个榜样”，尤其是日本美国。三国此后军备竞争将愈烈，战争的重心必在太平洋而受祸的必是中国。第三，法国人说英国在星加坡设港还不过防备他的朋友，我们占据德国来因河域是防御我们的仇敌，是格外应该了。我们可以看见无论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他的行为都是一样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帝国主

义的利益。法国占领来因河和英国在星加坡设港是为同一样的目的。中国人亦要知道日本强迫我们承受他的条件和美国强迫我们受他的教育是同一样为侵掠中国。

原载《向导》第 27 期

署名：大雷

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国民党应当是国民的党，是领导国民群众的政党；所以他的职务应是组织国民群众，在国民群众宣传，鼓起国民的精神。国民党和国民群众须有一种密切的关系；无论何时国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国民党应立刻就去帮助他们的奋斗，去指导他们走正当的道路。要在国民的心中有国民党是能代表他们，能代他们利益奋斗的观念。这样一个国民党方能算为一个真正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准成功无疑的。土耳其的国民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

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的奋斗一无所成，因为他完全和国民断绝关系，而只知道和军人政客交际。无怪乎国民不愿认国民党为他们的党，实际上国民党没有做他对于国民应做的事情，没有和国民接近，没有尽一点鼓起国民精神的责任。我们不能说国民党的分子没有参加近年来的各种国民运动，并且的确国民党人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亦很尽了一份力量。但是个人的行动和党的行动是大有差别的。例如上海六月三日这次国民大会，有许多国民党的人物参加在内，但是国民党的面目没有拿出来。据说国民党有意在国民群众运动中不把旗子树起来，因为恐怕国民党的旗子树起来了反把群众吓跑了。这种

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日日和国民接触，使他们渐渐相熟，知道国民党是他们的党，是为他们奋斗的党，于是国民党才会得国民的拥护。如果大家不相接近，愈离愈远，那末国民党将变成无国民的政党。国民党的现状就快要到这个地位了，这是国民党里的稍明白的分子都能觉察到的。国民现在所以怕国民党的名字，因为国民党一直所采的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等的无甚差别，固然在主义上面自然大有不同。如果国民党能把以前错误的政策改过来，注意于国民群众运动，注意于国民的宣传，国民非特如现时的怕惧国民党将欢迎之不暇。所以国民党不应当如旧礼教的女子怕抛头露面而不见国民群众，应在各种国民群众运动中高树国民党的旗子接近国民，指导国民，鼓起国民精神。这才是真正国民的党，这个国民党一定能如土耳其的国民党能达到同样的成功。

原载《向导》第 29 期
署名：春木

民国主权在人民的一点表示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人人都承认：现在中国的主权都落在列强手里和军阀官僚手里，中国人民可以说没有一点份了。但是事实有不然：袁世凯想做皇帝非弄些“公民”来劝进不敢；段祺瑞恨国会自己不敢出头打国会非请些“公民”来不可；现在曹锟张绍曾要赶走黎元洪又要用乞丐组织公民团来围总统府。袁世凯段祺瑞那时的威权不可说不大，今日曹锟的威权亦是人所共知；但是非请出几位乞丐的公民来表示他们的意思是人民的意思，不敢有所举动。唉！这就算民国主权在人民的一点表示！

原载《向导》第29期
署名：春木

日本人民对于日俄关系投票的结果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日俄关系已惹起日本全国的注意：日本一个大报中外商报，因为要确定日本人民对于此问题的意见，在报上登了好些问答由公众投票；其结果绝少赞成日本政府以前所采对俄政策。赞成立即承认苏俄政府的占大多数。对于占据萨哈连问题还是等了俄国有了满足的赔偿后，还是立即退还，舆论是赞成立即退还。于是又问日本还是对俄单独行动，还是和列强共同行动。回答赞成日本单独行动的远多于赞成共同行动的。主张完全承认苏俄政府并立即恢复外交商业关系的比主张先结商业条约然后再有政治的承认亦更多。日本中外商报在日本商人阶级中最有智识和最有势力分子销路最广，所以这报上的这些意见是有价值的。虽然日本政府现在还没有正式和苏俄代表越飞开谈判，日本人民已愿意和苏俄携手。

日本人民能明白自己的利益；英国自从鲁易乔治下台后守旧党执政以来，日和美国接近，英美在太平洋上的结合是对抗日本的，是危害日本的利益的，因此日本不得不找一个帮手，现在只有俄国是日本唯一的帮手；并且日俄结合后日本可得着西比利亚的市场；明了这个日本人民要求单独承认苏俄。

中国的智识阶级虽然对于俄国可说是表同情的，但是中国工商阶级的表示都是反对中俄有亲密关系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不知道中俄密切关系是和反抗列强和建设中国独立有重大关系的，而中国的独立是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或者是因为受了英美帝国主义者的闷香把心蒙闭了，因此不能了解自己的利益，不然如何会这样呢？

原载《向导》第29期
署名：大雷

法西塞党*的破裂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罗马六月一日电：法西塞党前党员，密塞利议员因为在议会中批评法西塞派的几种现象并请莫索里尼设法回复到平常宪法的方法，在街上被三四人殴打受重伤。这件最近惊人的事变可表示出法西塞党内部的冲突，法西塞义勇军内的一位青年军官因与这件惹起大众愤怒的事有关系被捕，司法总长宣言采严重手段务使犯法者受法律之审判。密塞利演说还有一种影响就是农业部司长哥基尼辞职，他庆贺密塞利的演说。莫索里尼允准了他的辞职。

意大利法西塞党本来是一班复杂分子所组织的，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所以实际上纯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他起初成立是一班失业的军官，一班小资产阶级在战后觉得自己在社会没有立足地了，于是组织起来采法西塞的这种爱国主义和野蛮方法，以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得着社会地位。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压迫劳动者因此极力的纵容他们，极力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在野的压迫劳动者还不够，所以假之以国家机关。这就是法西塞

* 法西塞党，即指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它建于一九二一年，头目为墨索里尼。一九二一年十月，该党发动政变，在意大利建立了独裁统治，血腥地镇压劳动人民，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编者

党成功的缘故。虽然法西塞党执政后否认一切资产阶级的宪法权利，并且对于他的党纲有许多不满意，资产阶级容忍着，因为他们知道法西塞党的热血会慢慢冷下去，会渐渐服从资产阶级的法律。在实际上法西塞党现在完全屈服在意大利资产阶级之下。他执政后所采的政策如解散防止因战赢利而设的检查契约委员会，减少奢侈品的征税，废除公立学校的国家助款，限止失业利益的权利，增加官俸，征收工资税，废除遗产税等等，都是使人民社会损失以增加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法西塞党内的一班小资产阶级除掉能得到一官半职者以外多不能满意于这种政策。并且近来有废除强迫租赁条例之事，使小资产阶级失掉住屋的保障，因此本来拥护法西塞党的亦大觉失望。法西塞党把以前拥护他的邓南遮的团体和皇家卫队解散了。后者的解散遂引起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今年正月一日的反叛。法西塞党的内部因此早就起了冲突了。法西塞党既已尽了对于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义务，把意大利无产阶级暂时压下去了，所以现时意大利资产阶级对于法西塞党里一派的“不法行为”已不能容忍，现在要强迫他们服从资产阶级的法律了。实际上呢，是法西塞党内一派大资产阶级容忍不了一派小资产阶级的胡闹，因而开始“整顿”。现在工人阶级已经压得不能动弹，自然用不着这班胡闹东西，再胡闹要闹到资产阶级自己头上来了！法西塞党将来或者只有低头服从命令，成为一个很适意于纯粹大资产阶级专制政党。

原载《向导》第29期
署名：大雷

国民党目前之两种责任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国民党应是一个对外谋得民族独立对内建设人民政府的政党。他的责任是觉醒国民的爱国精神，领导群众做政治的奋斗。在行使他的这种责任的时候，他就得着机会发展他自身，他自身日益发展就使中国的独立和人民政府的实现时期日益接近。这是个个国民党党员应当明白的；非特是要明白并且是要督促国民党实行的。

现在目前就有两件事是国民党的责任，要党员督促党去做。

第一件是长沙日本惨杀中国同胞。这是一件何等侮辱中国人民的事！一个代表国民的党能袖手旁观默默无闻吗！北京上海等处已有表示反抗的运动。这是一个极好的题目来做国民运动的宣传；这件事可以鼓起国民的爱国精神。领导和提倡这种反对日本的运动和宣传国民革命，不应是散漫的国民大会的而应是有政治组织的国民党的责任。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广东国民党，应当出来提倡，出来指导这种运动。至于那种因为某个国民党党员做了省长或盐运使的庆祝游行，尽可不必，因为我们不是来提倡做官主义的。一种为提起人民爱国精神的反对日本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实在有提倡的必要。

第二件是北京政局的变化。不要脸的菩萨已被叫化子赶走

天津道，而保定的猴子还没敢坐金銮殿；被开差的张内阁还没有回任，靠洋人的外交系正在用力钻谋；猪仔国会被五花六色的金钱弄得七零八乱无从行使职权；美国上帝的儿子和清朝皇上的家奴，率领着军警在京城横行。① 人民对此应是何等伤心！代表国民的党能忍视不言吗！上海总商会联合会对此已发表长文之宣言和国民自决的办法；各团体亦有同样的表示。国民党应当起来应人民的要求代人民说话，国民党应当起来领导国民争夺政权；不应当被人民遗弃在后面跟着走，失掉自己的领导地位，放弃领导就是放弃自己的责任；国民运动如若走迷了道路，国民党应负这种错误的责任。

国民党诸君！现在国民受了国内国外的压迫已是愤怒填胸，他们彷徨迷途，不知所措，他们正等着你们的呼声，他们正希望你们的领导。你们应当放大眼光，放开喉咙，注视中国全体，唤醒一般人民；领着他们向正确的路上走，向国民革命的路上走。

（注）在写完这篇论文的时候听说孙中山先生将有对于时局的宣言，我们希望他这篇宣言是以国民党首领的地位对国民所发表的，而不是以政府首领的名义对军阀官僚所发表的宣言。

原载《向导》第30期
署名：春木

① 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军阀曹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嗾使其党羽，驱逐了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黎元洪被逐逃到天津；曹锟则对国会议员进行各种形式的利诱和威逼，准备贿选自己当大总统。文中“不要脸的菩萨”指黎元洪，“叫化子”指曹锟党羽，“保定的猴子”指曹锟，“被开差的张内阁”指张绍曾内阁，“美国上帝的儿子和清朝皇上的家奴”亦系指直系军阀曹锟。——编者

英国对中国的好意!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路透社六月十五日伦敦电：泰晤时报在一篇《中国之混乱》的评论中说：现在这显明的不可解决的唯一救济就是扩充中国雇用熟练外国人的制度，这制度以前有可赞的成绩。最有用先从警察做起。一个由外国官统率的警察队定能增加政府的行政权和保卫商旅不致遭如山东这样的横祸。

外国铁路管理权亦须扩大，扩大到行政上面和财政上面，如此铁路上的一笔大进款不致不到中国国库。

我们应该感谢英国人的好意!

外国租界上的警察官已有极好的成绩，中国人已经聆教过了，不敢再劳。上海乐志华一类的虐待华人案都是外国警官干的。中国的警官决不敢这样无法无天。

这种外国管理关税，管理铁路就是无形的外国共管中国财政。关税的外国管理已足使外人能左右中国的内政，何况铁路是国家的命脉，倘管理权再扩大而完全属之外人，中国的经济生命就将完全在外人之手了。

土匪的军阀固然不好，强盗的列强尤其可怕。让我们人民自己处置自己的事罢!

原载《向导》第30期
署名：大雷

乞丐嘴里的上海社会资本主义化

（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

中国原来重士，所谓士为四民之首，就是现在一般社会心理仍是推尊士官；所以平时社交恭贺的语词中尚有"生个儿子中状元"的话。可是现在各大商埠受了外国的影响，非特资本制度在那里发展，并那里社会的心理亦就资本主义化了。你在夜间在上海马路走，常常可以遇见乞丐来恭维你，他不说你"生个儿子中状元"，他说"先生，生个儿子做刚八度（洋行买办）"。乞丐这种话是要讨你好的，当然是要迎合对方面的心理；可见上海社会的心理已都是做刚八度的心理，上海社会的心理已早资本主义化了；在上海资本主义的人与人中间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已战胜了中国旧宗法社会的关系。上海乞丐如果遇着了一位初来上海的老先生，说"你生个儿子做刚八度"，这位老先生听了一定是勃然大怒，曰："世风日下"，乞丐要不着钱，还要倒霉。

原载《前锋》创刊号
署名：春木

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

（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

欧战后意大利一班退伍的军官，受了段农迪阿（D'annunzio）的爱国行动的激刺，组织了一个小小团体，叫做法西斯党，专以屠杀罢工工人为事，不法横行，政府无敢干涉，这样的猖獗有了两年，至去年底居然用武力取得意大利的政权，法西斯党的领袖莫索里尼（Mussolini）现在俨然是意大利的专制君主。意大利这次政变惹起世界的注意，资产阶级的新闻都推尊他是一个光荣的革命。不论他是否是一个革命，他这种反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政治行动有研究其性质的必要。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俄国的鲍尔希维主义都不是意国或俄国一国的产物，而是大战的结果，是世界变动中一部分的表现。

欧洲大战本来是欧洲资本阶级想毁灭生产力的一部来维持将涨破的资本制度之企图，不知其结果殊出他们意料之外，大战延长太久把欧洲生产力毁坏了大半，摇动了资本制度的基础。

欧洲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恢复欧洲资本制度，他们恢复的方法只有一方面加力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方面加力剥削西欧本国的劳工。于是我们看见战后对待殖民地的近东远东的列强会议和对待西欧劳工的工资减少和时间增加。只有使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冻饿死亡才能维持资本制度的生存，资产阶级

只要他能保存他的统治权，遂不顾惜全人类和世界的文明。但是西欧劳工受欧洲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得几许觉悟，不能忍受资产阶级此种加倍的剥削来维持将要崩溃的资本制度，因此时有革命和罢工运动发生。资产阶级知道在此种状况之下要恢复他们的制度，决非"德谟克拉西"的方法所能解决，所以决定采残酷和威吓的手段来屈服劳动阶级，使他们死心塌地的担负恢复资本制度的损失。这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进攻的形式就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重大原由。因为一班大战中失望的小资产阶级以为这种法西斯主义可以增高他们的地位，而一方面又因为大资产阶级想利用他们压迫反叛的劳工，于是给以种种的援助，甚至给以国家的机关，法西斯党遂以成形。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用残酷和威吓的手段来强迫减低劳动阶级的生活程度，并使劳动阶级丧失奋争改善地位的意志，并且对外主张帝国主义战争，以此可使将亡的资本制度有恢复的机会。法西斯党即资产阶级为要实现法西斯主义，而雇用或援助一班失业的小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的组织。意大利莫索里尼的政策，完全是为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牺牲全社会的政策(例如废除遗产税，增加工资税，取消公立学校的国家助款等)，又以证明法西斯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无疑。

所以照上面的解释，法西斯名字虽是意大利的产物而法西斯主义是国际的产物。所以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特别发达，那是因为意大利战后特殊的情形（参看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瞿秋白君的现代劳资之战争与革命)，除掉意大利之外几乎资本主义发达的各国都有法西斯组织：德国的奥葛希团(Orgesch)，匈牙利的白卫军(White guard)，美国有三K党(Ku Klux Klan)等。

这些团体起初成立时与意大利法西斯党并不相关，但是他们的性质确与他党完全相同，专以摧残工人为事，并且现在有渐渐趋于联合之势。所以他们不能如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权力这样发展，因为各有其故：如德国奥葛希不能发展，因为他遭法国的疾视，法国怕德国有一个象莫索里尼的政府；如美国则资产阶级政府压制劳工有余力，无需乎法外的帮助；况且德美都有强大的劳动改良派可以阻止工人的崛起。如果德美等国的资产阶级为需要的时候，他们国内的法西斯团体亦能和意大利的同样发达。

法西斯主义颇有推广全世界之势，日本，中国亦有法西斯党的足迹，法西斯行为亦日益加厉，前三四月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共产党和工人一万左右。“恐怖对于过去时代的和他的经济重要在进化中已日见消沉的阶级，是一个有力量的武器。但是恐怖决不能压倒一个没有他不能生产的阶级”。法西斯主义是国际资本主义的一种恐怖主义，决不能压倒世界的劳动阶级，使他不起来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或者反使劳动阶级的运动更加激烈。

原载《前锋》创刊号
署名：太雷

近代印度概况

（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

印度近来的国民运动已惹起世界的注意。要研究印度的国民运动一定须先明白近代印度的政治经济的情形。况且印度和中国同是东方亚洲大民族，同是被压迫的民族，所差异的不过是统治印度的只有英国一国而宰制中国的有许多国。所以研究印度的状况和其运动对于中国必有多少贡献。这一篇不过做以后要介绍的一个短小序言。

近代的印度——受英国统治以来的印度可分三个时期：一，印度封建制度的破坏；二，英国商业资本的侵掠；三，近时印度实业的发达。

一，印度封建制度的破坏。印度在英国征服以前完全是封建制度。印度封建制度没有象欧洲封建制度受自国资本制度猛烈的打击（资产阶级革命）而骤然崩坏的；他是和平的逐渐破坏的。自从十八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到了印度，印度的政权渐次移转到东印度公司的手里；印度的封建制度就受了第一次的打击。土地所有权自英国占领印度后即授之英国政府。英国商业资本的权力遂在印度渐次伸长。然而在这个时期中印度封建制度虽然日衰一日，还能保全他的生存。及到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发生塞扑兵变 Sepoy Mutiny，失权的封建诸侯最后奋斗失败

之后，印度的封建制度已破坏无余。所余的只封建躯壳而已。印度本土 Native India（除掉英国印度 British India）还有七十个国，各有元首，这些元首只是英国政府的保护人，靠着英国政府而生存。英政府驻扎在这些国的公使有无上的威权。并且代表本地商人，地主，实业家的议会主持内政。名义上这班元首还领有他们各自所属的土地，而实际一无权力，更说不上他们还是印度社会经济的骨干。

二，英国商业资本的侵掠。自从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反叛之后，印度的统治权从东印度公司转授英政府；于是使印度直接受商业资本的侵掠。照历史上说，封建制度崩溃后即有资本制度代之以兴；而在印度则不然。因在欧洲是资本制度的新制度产生后封建制度遂破坏而让位，在印度则封建制之崩溃不是因为新制度的产生而是英国资本制度在英国发达的结果。印度的经济自然发展被英国资产阶级资本侵掠所阻止而自己遂包办侵略印度。如是无本国的资本制度发生印度的资产阶级亦无自发生。一班旧官僚及稍有资本的商人们平时积聚了些资本只能投之于土地，英政府为行政便利起见亦代为提倡，因此发生一种地主阶级。英政府为统治印度的原故不得不用印度人做下级行政雇员。于是开设学校造就人材，自是印度的知识阶级发达了很快。医生，律师等自由职业亦都是印度人了。这班智识阶级的收入都不差，所积聚除掉买土地，没有他种方法。一千八百六十年后英国商业资本侵掠日益加厉，造成了一班代英国制造物找市场和搜集印度生货供英国工业之用的介媒物——印度商人，英国侵掠愈甚，这班商人的营业愈好，获利愈多。他们所积蓄的资本想经营实业，而经营实业是英国政府所禁止的，因英国资产

阶级要叫印度做供给他们工业原料和销他们制造品的市场，可以专利剥削印度全体人民。以上之印度地主和已成地主的智识阶级亦不满意于土地的投资而想投资于实业，可以得着更多利润。于是乎在一千八百八十二年遂有印度国民会议的组织。这会议的领袖都是些富商，大地主，律师，医生等。他们的目的就是叫英政府让步，使印度的资产阶级能有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印度国民运动最先的变动。一九〇五年印度资产阶级用排斥外货反抗英国资本主义。因为抵制英货的结果印度工业日渐发达。一九〇九年莫莱明笃改革案Morley Minto Reforss通过了，给印度大资产阶级政府里面的地位。因为印度地主阶级的奋争，一九一一年英国政府只好取消朋加尔分界案Partitiong Bengal。自是印度资产阶级已不能满意于政治的让步，而争经济的让步。在大战以前他们已经有经济的权力去和英政府开战了。

在十九世纪初有印度人民百分之二十五是手工业者。自英国商品侵入印度使印度手工业受极大的打击。起初不过是大城池的手工业遇着机器出品的竞争破坏了，乡村的手工业仍然存在。后来铁路发达起来，英国商品一直侵入印度内地乡村，乡村的手工业亦就崩溃了。在欧洲手工业崩溃后的一班失业者都被吸收到近世工厂里去，而在印度则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只可归田耕种，因为破坏他们职业的工厂在英国而不在印度。但是没有这许多田容纳这许多失业者，并且这些靠工资生活的农民不能得到长期的雇佣，一年之中最多不过两个月的雇佣，要以两月的工资来供一年之用，其苦可知。一九一一年的统计这样靠工资生活的农民有四千二百万。

印度小农亦受了英国商业资本的侵掠的大打击。农产品的价格，不以其供给人民的能力来决定，而以其对于近世工业的原料有用与否来决定。印度农民所生产的已不是为自己生活之用而是为别地机器的需用。印度的农业，不管它如何退步，已经是社会化了，土地的生产力和土地工作人已拉入资本制度圈里。然而印度农民只受资本制度的侵掠而不能照普通情形增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并使生产方法改革。再加以兵灾饥荒，小农渐渐失掉他们的土地！印度的土地遂都集中在大地主之手。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六年有五万亩田从小农转到投资土地的手里。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有十二万亩卖了的，三十万亩抵押的。一九一一年调查有二千三百万佃户，每户平均计算只种八亩田，百分之七十五的出产要付租，还有放款人等的勒索，所余者不足养活全家。因为印度农民全体状况如此，所以近年农民运动十分猛烈，已成为国民运动的重要分子。

三，近时印度实业的发达。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在印度起了大变化。英国工业因为战争都用做制造军用品，又因德国潜艇活动和军事需用英国运输船只大减，英国工业品不能供给印度的市场，于是印度工业以无帝国资本竞争而迅速发展。英国鉴于印度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失业群众的不安，又正需要印度人民援助英国作战，所以不得不改变他素来所采的商业侵略，禁止印度工业发达的政策，大战方起的时候就允许战后印度自治。一九一六年允许印度征收百分之三又五的棉货进口税以保护印度主要工业，这是英国对于印度资产阶级极大的经济让步，所以印度资产阶级在大战争中停止反对英国的政治活动，并募兵捐款极力援助英政府。

大战的影响和英政府让步的结果使印度的工业狂奔猛进。一九一七年印度已能出产够完全供给他的纺织工业的纱线和棉织物的半数。到一九二〇年棉织工厂比一九一四年增加百分之三百八十六。此外如苎麻工业比一九一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五百六十三，铜铁矿增加了百分之二百〇七，面粉厂增加了百分之四百〇六。今日印度的工业资本比战前已增加了二十倍。这是英政府对于印度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大让步。政治上的让步就是孟德谦谟福改革案的通过。这改革案的内容重要的如引用两院制，增加印度议员额数，扩充省议会及其权力，地方行政权大半交给本地资产阶级。

英政府所以对印度资产阶级让步，是因为印度群众的革命运动强迫英政府不得不对于和自己阶级利益相近的印度资产阶级让步。但是英政府对于印度资产阶级愈让步，他愈逼进，现在因势力尚弱不能不和帝国资本调和，等到自己力量充足的时候，必定和英国资本争掠夺印度的专利。印度资产阶级现在已能团结成一阶级并且明白他的历史使命。但是没有印度群众的合力，印度资产阶级决不能推倒英国帝国主义，他们明白这个，所以他们欢迎印度群众加入代表他们阶级利益的国民会议。

印度大战后工业发达这样迅速，印度近世无产阶级的数量亦随之而长。据近来的调查，印度近世无产阶级已有九百万，三倍于战前。乡村的一班失业者都跑到城市里找工厂工作做，从前散漫的群众现在收集到工人的队伍里面来了。印度各别的殖民地上的无产阶级因为在两重剥削之下常比欧美无产阶级更苦。印度劳工从二十世纪初年到现在工资只增加了一倍，而生活程度在近四年来反增加了三倍。非熟练工人因为失业找工作

的人多，容易失掉工作，因为生活常不能安定。在这种状况之下印度无产阶级容易得阶级觉悟，所以近年来的罢工已是蠭行全国。罢工的结果使他们组织强固的工会。资产阶级的国民运动者看了工人的力量不小，所以许多加入工人想号召他们。以前印度工业不发达的时候，阶级的利益还分不清，现在工业的发达阶级利益的冲突亦就随之而发达。英国帝国主义者剥削自然是工人首先要去掉的。但是印度资产阶级的剥削亦是他们所非去不可的。现时印度运动对于印度无产阶级是为印度民族和自己阶级奋斗。

印度工业的发达虽然吸收了许多农村的失业者，但是同时工业的发展把尚存的手工业打倒了不少，所以农村间失业仍未稍减。英国对印度的工业政策已经改变了，对于印度农业亦想改变政策，想引用机器为大规模的耕种。这种大规模的耕种一定要打破小农耕种，并且机器耕种省掉人工不少；这样不知又要多少农作人离开他们的田地而变为失业的游民，将更增加农民运动的剧烈。

总而言之：现在印度社会力的猛烈发展已到了非把英国帝国主义束缚打破不可的时期。印度资产阶级已经有了觉悟，来领导国民运动完成他在历史上的使命。印度的农民和新兴的无产阶级亦起来反对那阻止印度经济的发展使他们受苦的英国帝国主义。这就是印度所以有近年以来的剧烈的国民运动和英国在印度的威权日益摇动的缘故。

原载《前锋》创刊号
署名：太雷

华府条约的效力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

华府条约所想解决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远东问题，一个是海军限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互相依附的。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梦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永远使他们互相冲突，不能使他们减少军备。在表面上看来，华府条约是渐次被列强承认了的，应该我们可以希望各国海军军备有限制。然而实际上，重舰虽受限制，轻舰则日增不已。据报告日本的巡洋舰增加最快，其总数超过英美两国所有的总数。美国海军总长邓璧亦提倡美国应增加轻舰和飞艇等，并谓此与华府条约无冲突。英国在星加坡和香港增设军港。

现在法国众议院在批准华府条约时所发表的意见又如下：

七日巴黎电：众议院今日以四六□票对一〇六票批准华会海军条约。此案审查会报告员称，华会比例不利于法国，但法国所需者为轻舰，而非大舰队，此约有效时期有限，国会宜投票批准之，以表示法国和平意旨云。白里安氏谓此约乃友好的协约国间之协定，但若时局变化，法国可恢复其完全自由云。普恩赉以此解释为然，谓并不承认此约为对于法国海上军队之最后限制云。海军大将古柏拉特氏谓重舰与轻舰两相比较，重舰并不占优势，此约无损于法国主权，法国于必要时，可设法规避此计

划云。

从这上面我们尤其可以看明白：各国批准华府条约不过是想遮掩耳目，并不是大家有意限制军备以免除将来第二次大战。若他们这种明白的规避华府条约而增添轻舰，再看法国白里安氏的言论：若时局变化法国可恢复其完全自由，普恩赉并以此解释为然。

华府会议本来是一种骗局！华府条约是一种骗人的东西。现在列强借口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拿出这骗人的东西出来恐吓我们，想再敲一点竹杠，国人应不受其愚，因为华府条约本来是遮掩耳目而没有效的东西。

原载《向导》第33期
署名：大雷

上海大中华纱厂停业给我们的两个教训

（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

上海聂云台开办的大中华纱厂近来因亏本而“暂时”宣告停业，亏本的原因是因为棉贵而纱贱。中国的棉贵而纱贱的状态自然是因为受了国际的影响；国际资本家方面极力的收买中国棉花以供他们本国工厂之用，一方面把他们大工厂出产的贱纱卖到中国来，如此形成中国现在这种棉贵纱贱的状态。国际这种影响本可用保护政策来防止的，但是中国被外国政治的压迫不能采取这种政策。以前中国厂主曾请求政府禁止棉花出口以维持中国纱业，但是北京公使团一纸公文给中国政府说这禁令违条约，中国政府，立刻就答应把这禁令取消了。总而言之，没有独立的中国，不能自由订定关税，中国实业的发展是梦想，将来继大中华纱厂而关门的一定是很多。

中国实业家常想用剥削工人的手段来减少生产费使能与外货竞争（近来上海丝厂对女工加工减资就是一个例），但是现在中国工人的工资已经无可再低了。你们要他们做工，至少要给他们肚里吃饱。况且这样来减少生产费决不足以使中国货能与外货竞争！中国的实业家呵！只有团结全国人民来争得了中国的独立才有你们发展的机会呵！这是我们得着的第一个教训。

第二个教训就是；这班实业家如穆藕初聂云台等开办工厂常以办慈善事业自命，但是到了营业不能生利的时候，他们就会拿他们的慈善事业停闭了，工厂里工人因此而失业不能回复他们的旧业的，他们就不顾了——这是什么慈善事业？为他们个人的利益而已！中国的劳动者呵！快快自己奋斗，决不要信他们的甜言蜜语。

原载《向导》第34期
署名：春木

顾维钧就外长职和中国国际地位

（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

直系赶走黎元洪其目的就是要捧曹锟出来做总统；但是现在办大选的声浪骤然和缓下去了，难道因为反对派的声势浩大所以直系就软下去了，这恐未必。赶走黎元洪直系方面已酝酿好久是有筹画有准备的行动，至于事后的反对当然是预料所到，况且一不做二不休，既破了面，遭了骂，本来又不要脸，还有什么干不下去的吗？直系对于大选问题所以这样迟迟进行就是因为办大选和大选后所需之款项问题，没有五千万的借款袁世凯亦不敢有所作为，何况曹锟呢？直系这笔款项来源自然只有靠外债和内债，外债是要借重外国，内债是要借重本国银行。直系看见做官热的顾维钧能邀外国公使的宠而王克敏在中国银行界有些势力，所以设各种方法请他们出就外交财政两职。可见要他们出就外交财政两职就是要替直系筹款，直系倘若没有这笔款是不能冒率拥曹锟做总统的，如果顾王出就这两职这是为直系出力，这是很显明的。

王克敏的势力是在各地中国银行，现在各地中国银行均反对其就财长，王克敏因此至今还没有敢就财长；而顾维钧居然于本月二十三日就了外交总长之职。他明知他的就职是不对的而

要遭人反对的，所以他在他就职的通电里说明他就职的理由：

> “然一觇国外之空气、则共管干涉之说、时闻于耳内、环顾国事之现象、则土崩瓦解之祸、直悬于目前、夙夜以思、不遑寝处、而国会贤俊、内阁寅僚、复谬采虚声、强加重负、劝驾之使、联翩而来、推毂之书、络绎以至、徘徊考虑、进退俱难、英伦之使节非遥、先人之敝庐犹在、非不能洁身以见志、避地以鸣高、顾维钧念个人名誉之损失、私不足以敌国家地位之公、政治生命之牺牲小、不足以敌时局安宁之大、熟权利害势难两全、既懔顾亭林匹夫有责之言、更深郑子产侨将压焉之惧、谨于七月二十三日、暂就外交总长署职、敬悬数义、奉以周旋、行使约法赋予之职权、维持国际现有之地位、”

素来景仰顾维钧的人们看见了这篇话一定要说：我原知道少川决不是贪官的人，他就外长的目的完全是为维持中国国际的地位。

顾维钧做官的心热，甘心帮直系，国人知道骂他，无庸说了。然而他欲以能说洋话能奉承外国的资格来维持中国国际地位这一层，国人亦应不受今日所谓外交系的一班东西所欺骗。田桐二十七日辟顾维钧就职通电中有几句话把外交系骂得很痛快：“数年以来。国人认熟解洋语。善着洋服。惯食洋餐之人。为外交系。如陆征祥颜惠庆顾维钧诸人。皆其选也。夫外交家者主观的也。非客观的也。外交家之所由来。即爱国男儿精神之所勃露者也。以上三者为构成洋奴之要素。不能谓为构成外交家之要素。摹仿外人之声音笑貌。仰其鼻息。体贴入微者。未有能知国家大事者。洋奴之技。西崽之才。正与外交相悖谬。”

国人常常以为顾维钧等能在国际联盟会议或华府会议作很美的演说，受外国人的嘉奖：居然这样年轻的中国人在各国老练的外交家前不害羞能说这样好的英国语，真是中国少年的人材，为中国光荣。但是试问顾维钧受外国人的称赞于国民有何利益。在国际联盟会议，在华府会议，顾维钧受人审判而已。这种会议上的荣耀只能博黄女士的恋爱而决不应得中国国人的赞美。弱国无外交固只能听人裁判，但是要知道这种会议的参加是羞耻而不是荣耀，要知这种裁判是外国要侵害于中国而不是赐恩于中国。如果有相反的意见这个不是糊涂定是洋奴。顾维钧这班东西居然竟有此种思想，并且尤极力在国内宣传，不免有一班虚荣心重的人和受英美教育毒的人们受他们这种丧失民族性的鼓惑。

自从华府会议之后，列强中尤其是英美要积极图谋中国，觉着顾维钧等是他们顶好的工具，而顾维钧等自己亦以为他们有了后援，于是都蜂拥到国内政治舞台里来，国内的军阀官僚亦因为有借重于外国的必要，所以替他们结把兄弟，给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卖国的外交多因之成立，成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间的仲卖人，可以称之谓“国家买办”。

顾维钧这次上台，名为维持中国国际地位，实则降低中国地位，使中国成列强的附庸国。观其就职后对外国记者演说：“中国目下在推移时代，不可不得各国之同情，如前此发生之牺牲外人事件，殊为遗憾，然不可因此而谓中国国民变迁为排外思想也，余对于外人之保护，与政府一同努力，又谓共和政府，在亚细亚为最初之试立，故有过失，亦在所不免也云云，”可以见他的谄媚辱国的态度。

排外的思想在各国都认为应该的；日本美国的排外不可谓不强，谁能过问，只有殖民地是被统治国，所以禁止排外。如果中国是独立国，那末所谓中国的外交总长不应代表中国人民向外人宣言“中国并没有发生排外思想，请你们不要动气。”顾氏的所谓维持中国在国际的地位，恐怕是维持国际在中国的地位罢！

顾氏不就外长职，金佛郎案即使在北京猪仔国会里通过了亦无人交涉，克利斯溥借款亦无人进行。有顾氏就职了，这两件对于国内军阀国外列强都有利的事就能成功了，顾氏对于他们两方面真可算功狗了，而不知何以对国民呢？

顾氏是以怕列强共管而出山救中国的，恐怕将来他还要做列强共管中国的委托人呢！

原载《向导》第 34 期
署名：春木

太平洋上英日美的海军竞争

（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

美国总统哈定氏前年召集华府会议想限制各国（尤其是英日美）海军的竞争，使他们自己中间有一种条约的限制。我们知道国际间条约的效力，只能存其于对那一国有利益的时候或被实力强迫承认的时候；当今美英日帝国主义的利益正在冲突的时候，他们正在互相猜忌的时候，条约的效力实不能限制他们的海军竞争。所以华府条约只是一种官面文章，并不能有实际上的效力，英日美中间在太平洋上的海军竞争依然存在。

同一召集华府会议的哈定氏，本月①二十七日在西雅图新闻俱乐部演说，谓非致各国尽抛弃武力后美国不得不维持头等海军。在现状之下各国抛弃武力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美国必争海军的领袖。哈定这次是从阿拉斯加回来。他到阿拉斯加的目的是为视察建筑美国军港，因阿拉斯加离日本甚近，如果美国海军能在其地设有军港则日本海军不敢离日本海而南下，这是美国控制日本的最好方法。

英国亦以日本海军的可怕，决定在星加坡建筑军港，这事报

① 指七月。——编者

纸上传载已久，上星期英国下议院已通过海军部建筑星加坡海军港之一千万金镑预算。

日本方面当然亦有相对的发展。日本在一九二〇及一九二一年间已早在布宁群岛及琉球群岛之某某诸岛筑成炮台。近来日本“输送轻舰”的迅速增加尤令人惊骇。

原载《向导》第 34 期

署名：太雷

列宁底死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底唯一领袖，俄国政府底首领，震动世界的大伟人，列宁死了！无论列宁底仇敌和党徒，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能不承认他底伟大，在人类历史上更没有过第二个人比他得到更多的群众底拥护，对于世界的现在和将来的影响也不能比他更大。他底死对于世界底无产阶级是无限的悲哀，因为他们失掉了他们底唯一的指导者；对于世界底资产阶级是无限的高兴，以为他们底仇敌苏俄就此可以倒了，他们阶级底命运就此可以转机了。因此，世界底无产阶级尤其是俄国底无产阶级必定是格外地团结合力以继续他们底工作，不致因他们底领袖死亡而失败；而世界底资产阶级政府，尤其是一班瞎眼的外交家一定是极端主张进攻苏俄，以为可操胜券。东方被封建的军阀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对于这位世界革命领袖底死，不知作何感想？如果中国人民懂得他们民族底救援只有靠中国底革命，中国底革命是与世界革命有连带的关系，而世界革命底成功必定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底合力，那么，中国人民对于列宁底死亦应是无限的悲哀，因为他们失掉一位领导世界革命，就是领导他们革命的领袖，而更须努力于革命的事业，以补偿他们领袖死了对于革命的损失。

当一月二十二日正在追悼一九〇五年俄国工人运动中牺牲的工人,忽然传出列宁已于二十一日下午七时与世永别,不能亲自看见他底工作底完全实现——世界革命底成功!列宁自从去年重病以来已将一年,到去年冬已渐次健康,已能读报纸,并在乡间能作两小时久之打猎运动,人人正盼望他马上就可好起来做工作,不料一月二十一日五时许忽然脑病大发,历一小时许即殒命,实在是五年来脑筋工作太多,据说他日常工作十六小时,他底工作又是说、写、计划等的重大工作,能支持六年之久已算侥幸极了。

俄国底工人农民当列宁病的时候,在每次集会上总必须问主席:列宁底病势如何?当主席回答他们说列宁能看报等话,登时欢呼鸣掌;今天骤然听见列宁病没,没有一个不眼含泪而直视,心惊如大石沉海。当嘉利宁在全俄苏维埃大会报告时,老年的劳工代表都高声大哭,真是如丧考妣。本来俄国共产党内现时对于党底经济政策和党底组织有激烈的讨论,但是一听见他们领袖底死,立刻党里派员到处召集党员演说:列宁死后领袖没有那个个人能代替他底地位,所以只有大家消除意见极力合作;党员全体底意见对于这话都是一致赞成,并表示要更坚固的团结更努力的奋斗。只有资产阶级底个人主义者,他们只知道个人能造成社会和历史,当然是以为俄国全靠列宁,列宁死后俄国底共产党一定崩溃而劳农政府亦就快倒。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和他死后对于俄国底极大损失,都是大家所承认而确信的,不过因他死而苏俄就倒台,是决没有的一会事,因为俄国底无产阶级已有政治的觉悟和组织,俄国共产党已有它三十五年的奋斗历史和它底最著名的组织和训练,列宁病了前后已有一年多

不问政事，党事，国事一切都能照样进行，并且苏俄日强一日，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事实的证明，俄国决不因列宁死而有所变动。

二十三日，列宁底棺木从他死的地方，一个离开莫斯科四十俄里的农村，用火车载到莫京萨拉托夫斯基车站。到时十二时许，到站接的有国际共产党各国代表（内中如德国老共产党赤得金氏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白朗特鸾氏都到），俄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俄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余各团体，各工厂，各学校底代表。火车刚到站时，军乐奏哀悼乐，接者都脱帽致敬。棺木由嘉利宁，布哈林等人亲自抬出火车站。当时头上大雪纷纷，鸟雀无声，只似乎听见接者底心底哀音。出车站后棺木在前，送者随行，走过的街道，两旁军警排列，阻止拦入行列，然而屡见老幼争相冲入重围，冀得随送。街中澈静，两旁观者无数，然而一声不闻。街旁房屋壁上列宁底像和红黑布密密地挂起，男女老幼都臂绕红黑布，以示哀悼。各团手中所持红心黑边旗子中写："列宁死了！但是他底工作存在！""列宁死了，但是他在世界农民和工人底心目中是永远活着"！"我们底领袖死了！我们应格外地团结和努力！"读了他们这些标语，我们就可以看见俄国劳农对于列宁的拥戴和他们将来的奋斗。列宁底死，不使俄国底工人农民失望而能使他们更加努力。三点多时棺木到了职工联合会会所，就停在它底大堂上：列宁底棺木尚未盖合，露出头面，这两天个个人都可以去瞻仰一下，观者甚众，拥挤不堪。本月二十六日出殡，那时必是莫斯科三百万人民至少三分之二出发送殡的。

原载 1924 年 2 月 19 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泰雷

列宁与中国青年

（一九二四年一月）

列宁同着俄国革命把中国青年革命的觉悟惊醒了！在运动里的中国青年工人当然人人都知道列宁是他们阶级的唯一领导者。

就是中国的青年学生，当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先师孔子的时刻，他们正找着了列宁做他们思想上的指导者。无怪乎在北京大学——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投票谁是世界上的最大人物，结果是列宁当选。这亦就表示列宁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而中国学生在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列宁死了！但是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活着！

转载自《中国青年》1958年第10期
署名：太雷

为莫斯科《工人日报》写的几句话*

（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觉悟，中国工人从一九二一年起就庆祝五一节，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和集会。今年五一节将有追悼列宁逝世的示威游行，并且要宣誓用全部精力来继续列宁所开始的事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世界无产阶级。

转载自《苏中友好》1958年第16期

* 此标题系根据《苏中友好》一九五八年第十六期《张太雷谈列宁》一文作者的回忆所加。——编者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的学生*

（一九二四年七月）

一

智识阶级，因为他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并且因为统治阶级需要他做压迫他阶级的工具，他很有钻到统治阶级里去的机会——所以常常是一个反革命的。不过青年学生，他是青年，总比较富有革命性一点，其中往往有少数参加革命运动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在历史上青年学生尽力于无产阶级运动之先例很多；俄国的学生在俄国的农民和工人中很做了一些宣传和组织的功夫。而尤其是殖民地上的青年学生，格外地趋向于革命。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殖民地上的小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掠已渐次贫困，以致青年学生在学校里读书常觉得经济的压迫；而一方面又因为本国的经济不发展，青年学生对于他们将来卒业后的社会地位不由得不起恐慌——有这些原由足使殖民地上的学生渐趋于革命的道路。不过，不管他是殖民地的学生或是资本主义国的学生——终归是智识阶级，

* 这篇文章不久后还曾略作删改，以《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为题，发表在《中国青年》一九二五年第六十二期上。——编者

这阶级终是摇动的，如果有机会去依附统治阶级，他们就立刻揭下了他们的革命面具。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学生，和中国五四运动后的学生领袖；或因达到了他们自身的目的而满足，或因防卫自身优越地位，而甘做反革命运动。这是个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所应当记住的。

证之各国先例，在无产阶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青年学生常常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他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去唤醒他们起来奋斗和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中国无产阶级运动正在起头，并且中国农民的觉悟还等于零，所以能够得到一班中国智识阶级来做“往民间去”的运动，如俄国智识阶级以前做的一样，对于中国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大有补益。因此缘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生中有尽力吸收他们来替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服务之责任。

二

凡成为一个革命党，必是能脱离一切旧的因袭的社会观念。所以我们在学生中第一步的宣传功夫，就是要扫除学生的旧社会观念。这种功夫在五四学生运动中曾经做了一点，但是可惜这种功夫只做了一点，没有能普遍，就终止了；在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对旧社会思想的攻击几乎完全停顿，一切新出版物都换了战斗的方面。因此，如果我们要使学生革命化，必须重做一番新功夫。尤其在现时，有一班提倡东方文化者，他们将成一种青年脱离旧思想的更厉害的障碍。我们要攻击他们这种东方精神文明和西方物质文明的对峙区别，我们应指出“精神”没有独立的

可能，而是跟着物质的，应指出世界的文化是整个的，虽然东方的主义现时同西方的不同，然而西方的是更进步的而东方的文化是一天一天的进步，要赶上西方的渐趋于世界文化的一致前进；则保守这种东方文化，阻止东方文化的这种进步的趋向，乃是反革命的。我们要给中国青年学生一种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使他们知道世界是整个的是进步的。

有一班青年他们能脱离中国的旧思想，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扫除他们固有的个人主义的根性，仍旧不能走到革命的一方面来，虽然他们有革命的热忱，然事与愿违，常常做的是反革命的事业。我们应当指出社会的改革和人类的进化是靠人们集合的努力，个人的行动非但是无济于事并且往往有相反的结果，以免青年脱离了旧思想又走入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脱离旧思想的学生，更容易走到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我们应当说明这种自由主义的虚伪和现时他在欧美各国的破产而更在中国没有立足的可能。基督教的宣传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是最危险的东西。虽然在以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做过了一点反基督教宣传功夫而给他一种打击，中国青年学生仍旧有许多受他的影响。只有继续的有系统的宣传，指出教会帝国主义侵掠的背景和基督教现在在欧美的破产，才能打破他在中国青年中的势力。

只有把青年的一切旧思想和迷信打破了，才能把我们的主义灌注给他们，使他们到革命的旗子下来。我们在每一种攻击之中，我们须给青年学生明白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使不致无所适从。只有以各种他们能见得到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义，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们的主义。我们应当证明给他们看：达到人类的自由和世界的和平只有推倒世界资本主义，和建设

无产阶级专政之世界的社会革命这一条路，而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亦就靠在这唯一的世界社会革命。所以中国青年学生的责任，就在集合在指导世界革命的第三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之下，来做唤醒和组织中国的劳动民众以助成世界的革命，和达到中国完全解放的目的。

我们对于学生的宣传，不仅是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并要利用学生团体各种出版物来发表我们的意见；而且不仅是用文字来宣传，并须利用一切讨论会，演讲会和一切学生的集会来做我们的宣传。我们宣传最容易收效的时机，就在学生对学校反抗的时候，和他们其他一切革命的政治运动的时候。一因为事实是放在他们的面前，容易把我们的主义来证明给他们看，又因为在那时学生的革命精神特别表露，所以容易接受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宣传。

三

现今中国目前的政治运动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运动；所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极力领导中国学生参加这运动的必要。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和现时各殖民地上的国民运动，看见：贫困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常常积极地参加这种运动，并且他们亦是这运动所不可少的分子；他们并且是常居领导这种运动的地位。关于这种运动的必要，我们在学生界中已经稍许做了一点宣传功夫并且已得到一般有革命性学生参加这运动。不过我们还只做了第一步的功夫，留下我们所要做的还多着呢！

我们领导他们做国民运动，要使他们知道没有农民工人的

参加，国民运动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有指示给他们怎样到农民和工人中间去宣传和组织的责任。近工业区域的学生应设立劳动补习学校以帮助失学的成年工人和青年工人。一切游艺会，体育运动会和政治讨论，学生应邀请工人参加以增长他们的政治兴趣和建立学生和工人间的团结。工人罢工时学生能代找外面的声援和实际募款帮助罢工者将使相互间的关系亲密，因此在国民运动中可得合同进行的可能。暑假中学生组织乡间的旅行应到农民中用戏剧演说等做一种唤醒他们的功夫。对于农村间的运动，我们尤当注重于初级师范的学生，他们大半是将来的农村小学的教师；所以他们在农民中很有接近的机会，尤其是他们对于青年农民的影响。

要学生做国民运动，首先还是要学生自己有群众的组织。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学生会的群众据说有六十万；虽然没有好的组织，总算是有群众。而自从五四以后的学生会就毫无群众可言（除掉一二处以外）。所以现在最紧的问题，就是如何能把学生会实在能组织在群众的基础上。学生的组织并须注意到各内地的中小学校，这是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

学生会常常只能在一种运动时有此群众参加，而等到这运动过后即失了实际的存在，而成为一种空壳的团体，一切活动亦都停止了。原由固然很多，而其中最要的就是学生会没有一种事业，使他引起学生群众的兴趣来参加。

学生会报是一种对于学生的宣传品，更是一种团结学生的工具。除掉政治的批评和关于思想理论的文章之外，尤应注重于学生日常的生活，如此才能引起学生对于会报的兴趣。并应极力鼓励和引诱学生在会报发表意见，这是领导学生参加学生

会活动的最好步骤。

学生会应时常举行演讲大会。演讲会一定要有事前极好预备，讲题应择选能惹起学生兴趣和切实际的并在演讲完后听讲者得自由发问。演讲会完后，并应布置一点操。

学生会应把体育运动事业当作自己的工作。普通这种工作的领导都在教会的青年会手中，这是一件最可担心的事；不知中国多少青年因此而受教会的影响。

俱乐部，音乐会，戏剧团等等都是引诱学生集合到学生会来的妙法。

以上都是对于如何能使学生集合于学生会中而参加他的活动；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同志应注意并极力提倡。

我们知道如果学生会没有群众，他不能有力量地参加国民运动，并且在学生中的宣传亦就难于收效，因为学生会是对于学生最接近，而且是最有机会宣传学生的机关。

四

当现时资本主义到了他的末期的时候，当他猛烈地趋向于崩溃的时候，非特一方面在殖民地上和新被征服的中欧各国使一般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无产阶级化，并且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发达的各国，包括英美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亦渐次摇动，呈一种不安分的现象——这都是资本主义的狂妄的极端集中的结果。这种智识阶级的渐次无产阶级化，因而趋于革命的道路上来之现象，已经惹起世界革命运动的指导者，第三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的注意。因为即使不能使这般无产阶级化的智识阶级

来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亦至少可以使他不到反革命旗子之下去。这亦可以知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除掉他的基本工作——青年工人和农民中的工作——之外，更有注意于学生运动的必要。

原载《少年国际》第1期

署名：Chantaly

列宁与义和团

（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

在一九〇〇年借口于义和团事件而实行侵掠中国的列强中，要算俄皇的俄国最厉害；俄国得赔款独多，并欲强占东三省全土。待俄皇政府倒后，苏俄政府成立以来，他在一九一九年以后累次单独宣言放弃辛丑条约上俄国所得的特权。这种在俄国方面的剧烈变更，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旧俄皇政府的性质与苏俄政府的完全相反，因之而他们对华的政策亦绝对不相同。

俄皇政府是一个代表俄国贵族，地主，商人，实业家的利益之政府，他的政策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口号是“大俄罗斯”。在他压迫之下不知有多少小民族。当俄皇屡次想在欧洲波罗的海或地中海求一出口而终被英国等所阻止，不得逞其志，因此有向东方发展的计划，想设立“黄色俄罗斯”。在辛丑以前虽已占领海参威，然不能厌其欲，义和团事件因此给俄皇政府建立“黄色俄罗斯”的一个好机会。

苏俄政府的性质则完全不同，他是代表俄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各小民族的政府，他的政策是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来推倒帝国主义来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自苏俄政府成立以来，短期的历史已证明他解放国内的弱小民族，曾援土

耳其建设独立政府，曾放弃他在波斯的权利。宣言放弃辛丑条约，亦是苏俄政府照他的主义上的必然政策。

要知道苏俄所奉的主义就是列宁的主义。列宁主义Lininism中最重要成份之一，就是对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列宁这种主张并不是到他做了苏俄人民委员会之后而是在二十多年前即是这样主张，当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发生时，列宁在火星报第一期上做了一篇论“中国之战”，他分析帝国主义和暴露俄皇的阴谋。

各国政府，俄国政府同样，宣传中国义和团的野蛮，说他们是仇视白种和西欧的“文明”，想因此可以得到人民的帮助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

列宁回答说：“中国人民并不仇恨欧洲的人民，他们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反对，然而他们确仇恨欧洲的资本家，和为资本家用的欧洲的政府。他们到中国去只为求利，他们用了他们所矜夸的文明去欺骗，去抢掠和压迫，他们同他开战，强迫他承认输入使中国人民愚蠢的鸦片之权（一八五六英法联军），他们用传教遮掩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些人们除掉仇恨之外还有什么呢”？

中国人有许多象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口吻一样说义和团事件是野蛮的排外，仇视西欧文明因此是不对的，看了列宁的话亦可稍明白了。

列宁又说：“他们‘帝国主义者’并不公开地动手瓜分，而象夜间的偷贼，他们抢掠中国象掘坟墓一样，但是如果假尸要想抗拒的时候，他们又象野兽一样对着他，把树林亦烧了，屠杀没有武装的人民”。列宁这种描写真把当时帝国主义国对中国的形态完全表露出来了。可惜在我们中国的凤毛麟角的外交史上只

看见把惨杀少数教士描写得十二分惨酷，而于八国联军屠杀没有武装的人民就几句话轻轻放过；真是一件可耻之事。

列宁并披露俄皇这种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唤起群众来反对这种政策。他说："这种政策"只有益于一部分同中国行商的资本家，有益于一部分为亚洲市场生产货物的厂主，有益于一部分从紧急军事的定货而获得厚利的店铺。俄皇政府牺牲全人民为这班少数资本家和高尚的欺骗者。

他用极明白的口号来唤起民众反对这种政策，他说："起来用全力反对那些人们，他们想制造成民族的仇恨；并因此想从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真正仇敌的注意转移过来，这是一切有阶级的觉悟的工人所要注意的。俄国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个万恶的政策，这政策将完成人民的毁灭，使他的做奴隶更确定和他的痛苦更大。俄皇政府不仅奴隶我们自己的人民，并且他利用他们来奴隶别的人民"。

列宁对于帝国主义和被人压迫民族的这种见解在二十年前既已成熟，到二十年以后在他的领导之下居然实行，这就是苏俄之所以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之殖民地的良友而列宁之所以成为民族解放的记号。

原载《向导》第81期
署名：大雷

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世界政治经济之观察及其现在之策略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一、经济状况

第五次大会对于第三次大会所作关于世界经济状况之分析认为仍旧是正确：世界资本主义已在一个长期的恐慌的时期中日渐崩溃而不能恢复原状，在这几年以来已证明是实。不过资本主义崩溃的日期没有我们在第三次大会时所希望的那样快就是了。

在这两三年来资产阶级在许多国内进攻无产阶级已得着胜利；强迫无产阶级承受八小时以上的工作和工资的减少；在有几国里资本主义似乎已能暂时团结他自己。因此一班社会民主党就以为资本主义又到了稳固的时期，回复到他的常态。其实不然。在有几国里所谓之工业的兴盛完全是靠邻国工业的衰落，已不似战前一样资本主义有他的国际兴盛，兴盛一时跟了又衰落一时。

社会民主党说：中欧经济的稳固能恢复时，世界资本主义就会回复常态。就是这个条件不能满足所以资本主义亦不能回复

常态。德国工业衰落,法国等邻国工业可以有兴盛希望,但是德国因此又不能赔偿债务而国内革命潮流更高，如欲让德国振兴自己的工业,法国势必遭殃,工厂就须停闭。再加以中欧各小国在战前本是工业品消费国而现在已足以自己供给自己并设有保护关税，因此中欧大工业国的市场又减削。中欧的金融亦证明中欧经济的不稳固。德,奥,波兰的纸币完全跌落,又恢复了,又要跌落了。法郎亦大跌落。世界的现金已有一半以上在美国并且现在现金仍继续流往美国。没有现金，欧洲的金币制是不能恢复的。

英国的经济全靠他的工业品之出口；而现在他的主要出口工业,如纺织业机器之恐慌特甚。

失业人数据政府的报告亦在一百万以上。欧美失业工人现在总在七百万以上；有时这国的失业人数减少而那国失业人数又增加,而于总数没有变动;因此这种失业者已不是所谓工业的后备军而是长期的失业队伍。

一方面欧洲的经济的恐慌这样厉害，他方面在美国自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经济的兴盛日高一日。这兴盛完全限于美国,特别是因为恢复在欧战时所疏忽的房屋建筑和铁道,需要一批材料。美国在此时期出品完全销于自国的商场,出口很少。然而美国这种兴盛并没有能对于欧洲资本制度有所援助。美国自从四月以后已呈现一种工业的大恐慌又要临头之现象。

资本主义范围以外之苏俄的经济之现今的稳固亦给资本主义一个打击。

在这个恐慌期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全世界的农业的恐慌。农业生产品对工业品的价格大大跌落；农民已无力付田

租，赋税，和债务利息，因此大队的离开他们的田园。这种现象在美国为最甚，美国百分之四十农民受破产的恐慌。这种农产品价格低落并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食料消耗之缩小和工业品价格之提高。战后人口又已增多于战前而耕种的土地则反减少。欧洲平民因失业或工资减少而减少其食料。一方面托拉司阻止工业品价格的减少使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相距日远。这种状况使无数农民投到革命一方面来。

资产阶级的进攻使劳动状况愈形低落，而阶级斗争的形式亦更形剧烈。工资已大减：德国比在一九二三年又减低了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美国实在工资只及战前百分之七十五，在法国生活程度的增高比工资的增高要多得多，在德，奥，匈等国工资只及战前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

范尔加结束他的报告说："几乎在全世界可观察到一个普遍的农业恐慌。在美国激烈的工业恐慌又正开始了。在各个欧洲国里，这恐慌只因邻国的损失而减少。同时阶级冲突的厉害，已非相对地而是绝对地，又已起始——这是劳动阶级状况之普遍的退步之表现。"

在这种资本主义之长期的恐慌时期中革命的主观的原素应占重要的地位。只要无产阶级的组织扩大，有取政权的大志，和战斗的预备，共产党的强大，不难打倒资本主义完成无产阶级革命。

二、政治状况

这种资本制度的长期恐慌在政治范围内比在经济范围内更

看得明了，因为政治范围是一个比较更有感觉的风雨表。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新的政治状况中。在第四次大会时我们已经预料到这种“德谟克拉西的和平主义的”形势，在第四次大会的议决上我们说：“国际政治状况的特性在现在这一刻是法西斯主义，军法戒严，和反劳动阶级之白祸的潮势汹涌。然而并不能说绝无在最近将来在极重要国内公然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将代之以‘德谟克拉西——和平主义的’时期之可能”。现在居然这种时期到了。在英国有一个工党政府；法国有左派联合的政府而社会民主党事实上是政府的一部分；在丹麦亦有一个工党政府；在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亦有执政的希望；至于在波兰，乞克斯拉夫亦都将有新的变化；在美国前有所谓第三党运动的开始。更有各国的承认苏俄。专家委员会报告的接受。这些都表明这德谟克拉西——和平主义的时期。这个非特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并在我们比较软弱的同志中，很容易生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德谟克拉西得着胜了。

其实大谬不然，资产阶级不过换了一种方法；强硬压迫的手段换了一种柔软压迫的手段。“专家报告”完全是压迫德国工人阶级的，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称之曰和平主义和德谟克拉西的胜利。我们要反对专家报告，专家报告的实行完全是一件乌托邦。愈是他们势要藏匿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相互间的冲突，愈表显他们中间的冲突的厉害。专家报告将来不过是一卷废纸而已。对于这种和平时期的错误观念，从法国左派联合政府的行为就可打破。法国社会主义者投票赞成鲁尔的占据，他们并会通过爱里瓦的预算。爱里瓦政府枪毙工人的时期将不远。

在英，法，奥，比利时，都有社会党执政府；社会党说反对战

争的，那末他们为什么不解除武装呢？他们非特不解除武装并且还主张增加武装。这就表示：新的一批战争快要来，所谓和平的时期不能久。

虽然现在叫做和平时期，而政权在各重要资本主义的欧洲国内发生问题。政府的倾倒之恐慌没有比在这时期中更厉害的。这表示资产阶级统治的不稳固。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以前的旧方法来统治。于是他们不得不找一种圆滑的方法，因此英国就有工党政府，法国就有左派联合中之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已变为资产阶级的第三党了。资产阶级一时用工党政府一时又用法西斯主义，一时又回到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党是资产阶级的右手，社会民主党是左手。这就是国际的新形势。就是表现资产阶级地位的不稳固。这就是共产党策略的钥匙。

三、策　　略

甲、创造群众党的问题

资产阶级所以能在大战后未被推倒，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许多国内没有能组织革命和领导群众作战的共产党。因为缺乏这种主要的条件使资本主义得稍延残喘。在资本制度的恐慌已成无望的时候组织无产阶级的队伍和共产党在这历史的时代中为最重要之问题。

第三次大会所提出之“到群众去”的口号仍旧有效。各国党还没有多大实在的成绩，所有的成绩仍是初步的。如果我们不努力进行获得群众，则我们非特不向前进，并会向后退走了。

第五次大会认第三第四次大会关于获得大多数无产阶级的

意见，为正确。“要得着在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中的共产党的影响，要引导这阶级的最有力的部分到战斗中”。左派以为非得到总计上的大多数，非得到工人的百分之九十九方可以革命行动之可言，是完全错误，就是左派的意见，以为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恐慌性的少数之党和以为共产党未得到大多数之时亦可领导群众作战，这是不懂得“到群众去”这重要的口号，亦是不对的。

建设群众党的条件：第一，党的组织应该以工厂小组为基础。这个不只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共产党如果在工厂内不能有坚固的基础而每个大产业不能成为共产党的堡垒，决不能领导无产阶级中最重要的部分来战胜资产阶级。第二，在工会内组织共产党支部，努力征服工会。第三，对于农民须有正确的政策。自大战以后，非特是在农业国和半农业国内，就是在工业国内，农业恐慌扩大，以致农民易于承受共产党的革命思想。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得到一部分农民并使一部分守中立，决不能得着胜利。必须着手实际的与农民联合，如派革命的工人到农村去宣传。第四，对于民族问题的正确政策。大战后又增加了许多被压迫民族。在欧洲各小国和殖民地上尽积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之材料。如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问题之政策是获得群众和预备胜利的革命之重要政策之一部分。第五，发展工厂委员会的运动。这种新式的工人组织可以造成真正革命的工会和留下将来工人代表的苏维埃之基础。

乙、联合战线策略和工农政府

当各国共产党还是只占少数，当社会民主党还有极大的劳

动群众，当资产阶级的进攻还是一套一套的来，当无产阶级还在不能召集足够组织防御战争的时候，联合战线的策略还是正确和重要。联合战线的策略近被右派所误解为与社会民主党结政治上的同盟和各工党的组织上的联合，就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结政治上的联合。而共产国际所懂得对于联合战线的策略是与社会民主党之反革命的领袖作战，要解放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于欺卖劳动阶级者之势力之下。联合战线策略只是一种革命的煽动和集合无产阶级的方法，如果解释为与社会民主党有政治上的联合就是机会主义。而一方面右派亦不懂得联合战线的策略。他们不愿意实行这政策或以为只可用经济的战斗而不可用于政治的战斗。这种都是违反建设群众党的意义。他们最危险的错误就在工会问题上。他们不愿意在反动的工会内活动而欲退出另行组织。共产国际极力阻止他们计划实现，如果实现我们成为群众党的可能就要断绝。布尔希维主义是由攻击右派，中间派并且反对左的倾向而成立的。

联合战线的应用应以在下联合为原则而以在上联合为例外。共产国际绝对反对纯粹的在上联合。在决定其应用方法时必须注意某国的特殊状况，然而总须注重在下的联合，以集合群众，以联合工厂中的共产党工人，社会民主党工人和不党派工人在共产党领袖之下。

工农政府是联合战线策略中之一。工农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别名，只因其对于群众容易懂。右派解释为在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躯壳中的一个各派工党和农党的联合政府是完全错误。工农政府须有以下的条件可以成立：（一）解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的武装。（二）武装工人阶级。（三）一切税款应由

资本家负担。这种工农政府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别名，是工人所懂得并所要求的，但是这政府决不是社会民主党所愿加入的并是他所反对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共产党就能披露社会民主党的面具而得到一班社会民主党内工人的同情，引导他们加入革命的战线。

丙、部分要求

部分要求是共产国际策略中之一。改良派以部分要求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而共产党提出部分要求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所以共产党关于一部分要求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提出的部分要求必须对于实际生活有影响，就是说：所得工人大群众的赞助。（二）这些要求是在革命发展的线上。（三）这些要求一定与最后目的有关联；从各个要求扩大到普遍的要求，这普遍的要求就可引起社会革命。

丁、党的布尔希维变化和世界共产党的建设

共产国际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使各国支部布尔希维主义化。布尔希维克党的特点如下：（一）党必定确实是一个群众的党，如果党是不公开的亦须能与工人群众有密切的联络。（二）他一定运用如意的能力，就是说，他的策略不可死守家法而必须能运用他来对付敌人。（三）他必须是一个真正革命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党，不折不挠的向目的地前进，努力奔向战胜资产阶级之

门。(四)他必须是一个集中的党,禁止一切内部的派别、不同倾向和特别组织。

只有共产国际的各支部已能布尔希维主义化了，共产国际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的布尔希维克党，浸润于列宁主义的思想。

原载《团刊》第10期
署名:太雷

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少年国际在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一年）时在东方还没成立正式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少年国际第一次讨论东方殖民地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决议案是解析帝国主义之压迫殖民地和其影响于殖民地的青年，并定下设立共产主义或革命的青年团之原则。前年第三次大会时，在中国，高丽，土耳其，日本，蒙古，已有正式共产主义或革命的青年团成立，但是刚刚成立在组织上有多少缺点，至于政治的活动还说不上，所以这次大会的议决案专注重于各国青年团之组织问题。经过了一年半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问题。第一，这些已经成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怎样发展他自己和对于青年群众的势力。第二，青年团怎样援助国民革命。

在殖民地中如高丽，波斯，阿富汗处完全是农业经济，如中国，印度，爪哇那里只有幼稚的无产阶级和其组织的存在而国民革命仍是主要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政治经济客观条件之下，在殖民地上有大群众的国民革命性的青年。殖民地上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要在革命青年群众中有影响势力而能领导他们做青年运动，必把这班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并且在这种青年团

体中共产主义青年团易与青年群众接触做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因此可以得着机会，吸收其中革命分子到自己团体中而发展自己的团体。

现在在殖民地上国民运动很高，一方面共产主义青年团已发展到能有政治活动了；所以他与国民运动的关系是目前紧要的问题。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援助国民革命，这是在第二次大会议决案上已经决定，不过至于如何拥护这革命是没有规定。青年团是要跟从共产党参加国民运动，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青年团应该如何具体的来拥护这革命，是应当回答的问题。青年团应该把国民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这是这次大会的回答。

为了要领导革命的青年群众来做青年运动，为了要发展自己的组织，为了要组织国民革命的青年来实际的拥护国民革命运动，少年国际这次大会议决在殖民地上的共产主义青年应组织一种国民革命性的青年群众的团体。

这种团体在各殖民地所取形式因政治经济状况之不同而各异。如在高丽蒙古等处，工业完全落后，这种团体取纯粹国民革命的形式。如在印度中国工业较发达，无产阶级已自身的存在，这种团体一定被阶级性占优势。

这种团体的组织是要从下而上的。先在各地组织青年工人，农民，学生，伙友等之小单位组织如俱乐部，会社等，或连络组织了的地方组织；等已有若干地方组织，到了认为有联合之时机已至，就把他们联合成一个大组织，使青年运动得以集中而有统系。

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这群众团体的责任是，(一) 把他组织起来；(二) 在其中领导他。这种群众团体的工作是共产主义青

年团大部分之工作。

这种团体在外表是有政治上的完全独立。不过暗中完全是受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指导，而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受共产党的政治指导，所以关于政治活动上完全是统一的，受共产党的指导。在国民运动中这团体应拥护国民革命的党而使国民运动统一；当共产党与国民革命党意志一致时，国民革命党与这种青年团决不至发生冲突。而如果共产党与国民革命党有冲突时这种青年团体与国民革命党冲突亦是必要，而此时已不是国民运动统一问题而是要国民革命党应该采取革命政策的问题。

这种团体的工作：在政治上他是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之统治，在经济方面是为被压迫的劳动青年做改善其经济状况之要求；在教育方面要求普及义务教育和自己对于劳苦青年给一种政治的和自然科学教育；他要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他要做反对征服国的宗教宣传；他要做青年妇女运动。

少年国际见到殖民地上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国民运动和在这种国民革命性的团体内活动，有极大的危险，有使其丧失无产阶级性的危险。所以在这同一议决案上极力提醒这种危险，并且再三指示防止这种危险之必要。要防止这种危险只有广大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团内的共产主义教育，才能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本身发展而共青团员亦不会堕落于阶级合作的错误中。

少年国际这次对于殖民地上运动之议决是他对于殖民地上青年运动详细研究的结果，是要解答如何发展殖民地上的青年运动和如何实际拥护国民运动的问题。

原载《团刊》第10期
署名：大雷

帝国主义计划中之共管中国的方式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要以英美为领袖；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机关，主要的是字林西报和大陆报；读了这两种报的主张就可知道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在所主张的是什么和所反对的是什么。

在这两种报近来的时评中极力提倡军阀商人的和平会议，以建设一联邦政府。这种主张当然不是出于这两报自己而是听命于他们资本主义政府。就如俄国罗斯坦所宣布：吾人现信美国已放弃开放门户政策，决计在华划分利益区域。伦敦九日电已证实这话，说：每日电闻报（政府党机关报）宣称，某有力方面现在正努力提议，邀集中国战争各派势力开和平会议，解决中国内政上的困难，并为中国建设一“不集权的联邦政府”。于是唐绍仪的联邦政府的主张大受帝国主义的欢迎，字林西报大登广告特为介绍。这种帝国主义者所主张的中国联邦政府就是实行瓜分中国的别名。你看大陆报十七日评论开首第一句就说：从现今的观察，在这次战争终结之后，中国就将预备实行“道威斯计划”或类似的计划。道威斯计划对于德国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共同管理德国。现在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亦将用同一样的计划。

就如每日电闻所说：此次计划希冀成一十分稳固的政府，俾银行团得以投资改造中国。所谓投资改造中国者就是共管中国经济。因为各帝国主义国都希望自己独霸中国，同时却又反对任何他一国独占剥削中国之权，其结果遂有这种共同剥削的计划。然而实际上讲起来，如果这种计划实行，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膨胀，因为将来共同侵掠中国各国须靠美国的资本。在现在国际政治上英法日等都因经济势力薄弱的原故，只好屈服于美国资本势力之下；在德国如此，在中国亦是如此。

帝国主义所主张的联邦政府就是军阀商人混合的政府，而能完全听命于帝国主义的指挥。字林西报在本月十三日“行会与督军”一篇评论上说：“如果行会能使他们行使他们旧有权利，我们相信督军们一定能欢迎他们要求联合和协助之提议”。前受香港政府的委托而运动和平会议的何东先生因失败而游历欧洲，在英伦与帝国主义政府接洽，现在已首途回国；将来他所演的是什么把戏现在都可以预知了。英国在广东所弄的阴谋，把商团与陈炯明和范石生等结合以推倒革命政府，而建设模范的军阀商人的反革命政府，不久要试验于全中国。

在前年主张联邦政府潮流最盛的时候我们就极力反对，以为：这种主张足以减弱抵抗外力的力量和最适合外人瓜分的计划；只有集中国民革命的势力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才是真正自救之道。现在事实又已证明：帝国主义之欢迎唐绍仪的联邦政府主张，完全是在采取之为共管中国的方式。

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空气在中国日甚一日，外国帝国主义闻之不寒而栗。于是在报上大骂为过激派的主张。帝国主义的报纸所以如此责备凡反对帝国主义的都是过

激派，就是要恐吓这班本来胆小而革命性软弱的先生们，和鼓吹他们的政府来干涉中国。这次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共产党，可以说完全是受了这个暗示。

大陆报、字林西报现在几乎每天都要骂一点过激主义，不是说北京九七国耻日所发的传单是过激派的，就是说：广东政府实行共产主义。为什么他们这样怕法？当然他们不曾想中国的过激派现在马上就会实现劳农政府，他们所怕的就是过激派对于救中国的政策是正对病症，他们运动的对象就是在推倒帝国主义。

如果中国的一般群众能懂得外国帝国主义所反对的就是中国的利益，所主张的就是中国的祸害，我们就应当依照共产党对于救中国的意见，集中在国民革命的旗子之下，无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其走狗中国军阀之定期战乱与屠杀，并反对他们借此次江浙战争来实现之共管阴谋（以和平会议产出联省政府），努力打倒一切军阀与一切帝国主义！

原载《向导》第 83 期
署名：大雷

罗素与字林西报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罗素在新导报上说："中国军阀——是一切纯洁的中国人民所鄙弃的——他们中间的互争给列强以干涉中国政治和勒索割让以作援助的报酬之借口"（见九月十九日大陆报上所载十七日伦敦路通电）。

罗素既不是过激派更不是排外的中国人，是贵英国的人民，他嘴里说出来的英国对华政策，看英国帝国主义者还有什么话说。然而英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报纸字林西报，凭他素来造谣的本领，在九月二十日的时评中强词夺理的批驳罗素的这段话。

"他（指罗素）说：'一切纯洁的中国人鄙弃军阀'，固然军阀中间有极坏的分子，但是照罗素那样说，非特是诽谤一班应受尊敬的人们并且不是事实。没有一个中国人鄙弃卢永祥和齐燮元，张作霖和吴佩孚，他们亦不应受这样的鄙弃，虽然在政治主张上多有反对他们的。罗素说：军阀给列强以干涉中国政治和勒索割让以作援助的报酬之借口。这话是有意要激起中国的最劣部分来反对外人。至今没有人能指出干涉中国这次战争的任何表示：美国政府明白表示他们不干涉；日本绝对反对干涉；英国宣告没有干涉之事；我们一定不信他人会采不同的政策。至于勒索割让以作援助的报酬这话，我们要求罗素举出自民国成立

以来一个这样的例”。

军阀没有一个不是压迫杀害人民的，没有一个不是与外国帝国主义者结合卖国的，张作霖，吴佩孚，卢永祥，齐燮元都是万恶的军阀中之尤者，而字林报记者赞美他们为应受中国人民的尊敬而没有一个人鄙弃他们的。这话中国人民听了恐怕要嗤之以鼻。若说外国帝国主义者如该报记者没有不表同情于张，吴，卢，齐等军阀，因为他们为帝国主义者服务，尚不失为一句实话。只要看这次张、吴、卢、齐为帝国主义利益和自己势力而起的江浙战争，直奉战争，受影响的区域中人民所受怎样的痛苦，就可以知道人民是怎样的痛恨他们，誓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岂特是鄙弃而已。字林报记者岂有不知道的，只是为帝国主义自身利益计，不得不推崇这班军阀，要使中国人亦尊敬他们即可尊敬他们的主人帝国主义者。

字林报记者驳罗素所说军阀给列强以干涉中国政治之借口，说：至今没有人能指出干涉中国这次战争的任何表示。本报上已在前两期上屡次指出外国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的表示。华盛顿九月五日电，伦敦九日电（见向导八十二期江浙战争与帝国主义）都证明这种干涉的表示。日本大坂日日新闻对干涉问题的意见说：美国是能实行干涉的唯一国家，美国或能约英国来在同一干涉的计划上合作。如果美国和英国决定干涉，日本政府应当决然与他们共同行动。日本国民报说：“在吴佩孚后面暗藏着某一强权，须记着，北京外交部是为袒美倾向的顾维钧博士所主持……在这样情况之下，日本政府，一方面虽然采不干涉政策，须细观察事情的发展和阻止他人干涉”。这话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说的当然是这样，日本何尝现在不在那里帮助张作霖军火

和财政。英，美，日，法，现时财政上军械上援助奉，直，江，浙，是一种暗地里的干涉中国内政。将来战争中或战争后列强召集和平会议，为中国建设不集中的联邦政府等计划就是公开的干涉中国。这种干涉恐怕一定要实现，因为上次伦敦会议英美法日已有决定。更可以大陆报的言论来证明他：列强在这次战争终结之后如何行动尚不明了，但是实行建设行动的机会已经放在面前，这是不用说了。

字林报记者要罗素举勒索以作援助的报酬之实例。这例多得很，我们可以代罗素举，民国以来真是举不胜举。最近的大家还没有忘掉的，各国借江浙战争为名，要求推广上海租界，要求苏齐浙卢对于由战争所生的损害负赔偿。中国每次战争都有各国的借款和军械的供给，其报酬就是某某铁路的抵押及其他割让，如奉张承认日本在满洲有三千年之租借权，齐燮元承认美国在沪建筑无线电台，外舰借口战争在中国内河之横冲直撞……

总之，帝国主义的明中暗间的干涉中国内政，酝酿内争以图自利，这些事实中国人民已经应当早已了然，固不待罗素来说；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最大多数人民还不明了事实的真相，最可怜的是一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宣传的中国人，糊涂昏聩，只以为外国人的是真话，他们应该读一读罗素的话，再看一看字林报记者的强辩，也或者可以明白一点了罢。

原载《向导》第84期

署名：大雷

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之意义

（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

辛亥革命既被大家承认为一种革命运动，所以我们对之有估量其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之价值和意义之必要。在这样估量其价值和明白其意义之前必先对于中国国民革命有一个明了的观念。

什么是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中国民众对于外国帝国主义之经济的和政治的剥削之反抗运动，其目的在推倒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和其走狗——本国的军阀，而建设一个合于民众利益的独立政府。中国的国民革命已不是如十八九世纪中欧洲各国的国民革命，是本国资产阶级对于本国封建阶级之一种革命运动，而是中国的一般被压迫的民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因为以前欧洲的国民革命之对象是本国的封建阶级而现在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之对象，如各殖民地一样，是外国帝国主义而不单是本国的军阀，本国的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你们看那一个军阀没有外国帝国主义能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要打倒军阀是要间接打倒其背后之主人翁——外国帝国主义。

而且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是建设独立的人民政府之一个先决

条件。如果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不推倒，在政治上面是永远帮助军阀或买办阶级组织卖国政府，在经济上面是握住中国经济生命，经济生命被握住永无成立独立政府之可能。所以中国国民之最要职务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而估量中国某种革命运动在国民革命上的价值和意义全由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进攻的程度如何而定。

中国自从义和团起事——这是最有国民革命精神的运动以来，非特是中国之实际政局是完全屈服于外国帝国主义，而就是在革命党的思想上亦然如此。同盟会与康梁派的一切争论不过是对于内政应用革命的改造还是应用和平的改良之争议，而对于与外国帝国主义友善的关系则无异议，他们两派的主张同是一种不排外的自强运动，其相差其实无几。

在同盟会领导下之辛亥革命，当然亦不会含有一点排外的意义，所以在辛亥革命刚起的时候就再三向外国帝国主义宣言：革命政府将如何尊重列强条约上的利益和保护外人在华的生命和财产之安全，将如何担保外人之通商和开发实业的自由。中国的一种革命运动，照上面的意义说来，如果没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进攻而反示好于帝国主义，那就完全失掉国民革命的意义了。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革命运动。不管其手段是用武力的是把清朝推倒了，不能说其在国民革命上有重大的意义。

辛亥革命所有的一点意义就是用激烈的手段推倒清朝。然而后来南京政府与袁世凯的调和就是这点意义都把他减杀了。

有人说："辛亥革命是要先建设强大中国然后再对付外国帝国主义。"其实，你要建设强大的中国之第一步，就要遇见外国帝国主义的阻碍。在辛亥革命时英国公使朱尔典和银行团大借款

援助袁世凯推倒南方政府；现在英国政府之阴谋倾倒广州政府；外国帝国主义援助中国反动势力压迫革命势力的例子已是举不胜举。所以你要先理内政再行对外，完全是一种梦想。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不能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第一，他没有把外国帝国主义当作革命的对象，而是一种纯粹的对内的民治主义的革命，第二，就是这样亦没有能保持完全革命的态度而倾向调和。

原载《向导》第86期
署名：大雷

扩张租界与商业资产阶级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帝国主义侵掠弱小民族最初的一步，免不了要用一种武力征服的形式，使弱小民族的民众屈服于帝国主义淫威之下，及其既屈服之后，其第二步就是用柔软的示好政策，对于弱小民族做丧失其国民性的宣传，使其自动地欢迎其统治。中国已经经过了帝国主义第一步的侵掠形式，现在正在帝国主义之第二步的侵掠形式中；不但是著名狡猾的英美对华用示好的政策，就是最横暴的日本亦有以庚子赔款在华办教育，优待中国的留日学生，提倡东方文化等的把戏。他们这后一种的侵掠方式对于中国是最厉害的政策，要使中国的民众洋奴化甘心受他们的统治。他们这种政策在中国已经收效不小了；中国人请求外国帝国主义保护的表示已经是很普通的现象，可惜这种洋奴化的现象还只限于中国的买办式的商人阶级和欧美化的学者和官僚，还未能及于中国的民众。然而中国民众如果不能及早觉悟，起来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示好政策，和少数洋奴的卖国，那末中国恐不免要做印度朝鲜第二，将蒙受更大的压迫而使中国的振兴更形艰难。

这次上海闸北华商请求租界当局维持华界秩序和大陆报对此事之社论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宣传和受其宣传的中国商人阶

级的卖国心理。

大陆报这篇社论是帝国主义的示好政策之一幅很好的写真，所以完全抄录如下：

“据报告，有闸北拥有财产之华人一团于上星期间向领事团中之一员建议，若发生严重扰乱时，令工部局巡捕当局赞助维持华界之秩序，此项举动，立即引起中外当局在‘大上海’所包括全部区域内协力合作之全部问题，数年前领事团曾提议将闸北区域划入上海本部，而中国当局拒而不听，因此数年来成一相持之局，双方利益，皆受其妨碍，今者此间发生战事，拥有财产之华人，乃觉悟彼等之利益，与外国人拥有财产者之利益初无二致，假使彼等得有保护，与租界内拥产华人外人所享之保护相同，则受惠无穷，外人在闸北置有重要产业者甚多，因此而愈觉闸北现在情形之可笑，盖外人拥产者，皆知情形严重时，领团必将下令设法保护租界外之外人产业，同时华人所有之产业则无人保护，而一听乱兵之抢劫蹂躏也，假使华界情形益趋恶劣，中国总商会未必不请领事团予以保护，而领事团深知沪郊苟遭危害，极易延及租界，则对于中国总商会之请求，断然将注意之，或谓除非拥产华人表同意于将闸北划入租界，租界当局将拒绝考虑此种请求，但关于此点，现尚无切实消息，总之，关于此问题之要点，为租界方面之种种问题与华界方面之种种问题，其中有不少相同之原素，今两方已切实觉悟此种关系矣，若目下危局所与之教训，转瞬又置之脑后，则诚为不幸之事，无论为警政火政自来水公共卫生建筑道路取缔交通以及其他种种问题，租界华界皆利害相同，故尽可由通达

事理之人物协力合作，拟定一种互助之计划，使双方有益，而又能保全彼此之体面，从前美国有许多迅速扩展之城市，其情形与目下之上海相同，当时此等城市划界而治，历有年所，但后各觉悟彼此对峙之无益，卒成立共同之了解，使彼此财产利益均得满意，吾人信此项问题，若于现时或于目前之混乱过后，以相当之精神应付之，则'大上海'管理之问题，当可得一解决也。"

他一方面极力说给华商听：闸北华人的利益与外人的利益相同，外人的利益既得保护，为何华人不请租界当局保护呢？他一方面以扩充租界为要挟，如果你们要得着保护就须答应领事团的"大上海"之主张。只知自己利益的闸北华商当然是很听的进的，就冒卖国的不韪或者亦会答应，因为请求维持华界秩序就是他们预备承认"大上海"之先声。这种卖国心理恐不限于这班闸北的商人，北京，天津，广州等处的商人亦都是如此。等将来帝国主义的宣传普遍了的时候中国的这班商人竟会大家联合起来，一致请外人保护起来，把中国完全扩充为租界。其实全国扩充为租界时中国的秩序问题就能立除了吗？中国就不会有战争了吗？恐怕那时中国战争将比现在更形猛烈，损丧生命和财产更多。你们不看见前次的世界大战，欧洲的损失，和他们现在正在那里预备的未来大战，战斗器之可怕的发明毒气弹，飞艇等等。如果中国完全扩充为帝国主义各国的租界之后，恐怕中国就要做世界大战的一片好战场了。那时中国平民的权利当然不用说是完全丧失尽净了，但是主张做洋奴的一班人的利益又何尝能独被保护呢？

中国的平民起来呵！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好政策！反对请求

外人保护的卖国者!

原载《向导》第 88 期
署名:太雷

英国帝国主义对于埃及之压迫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英国保守党在选举得胜利时，我们早就说过英国对殖民地将采更反动的政策；现在埃及事件便是证明给我们看的。英国保守党的殖民地政策是要扫灭殖民地上一切反抗运动而使殖民地人民完全受其侵掠。英国在埃及的行动就是要实施这种政策于埃及。埃及自今年春间国民党首领柴鲁尔在埃及议会里得到大多数而被举为首相后，埃及政府已宣言独立反抗英国，英国那时正值工党执政，虽然工党亦要保留埃及在英国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但是为自己社会主义招牌起见，到底不好意思对埃及用暴力的压迫政策，因此埃及得以维持对抗英国的局面。柴鲁尔首相一月前在英国工党政府摇动时曾跑到英伦去想要求工党政府允许埃及独立，但是被工党政府拒绝了；柴氏知道工党政府将倒，保守党将执政权，将来对于埃及必采武力压迫政策，所以他回到埃及就宣言“埃及只有靠他自己的力量”，那时他已预备与英国有一种冲突。因此可见现在的埃及事件决非一件偶然之事，决非因为英国驻埃沙达司令被刺而发生的结果，英司令的刺死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给英国行施高压政策的借口罢了。如不信，请看英国军队在埃及的行动：他们占据亚立山大里亚税关，

派大批军队驻苏丹，要求撤退驻苏丹之埃及军队等。虽然埃及政府已允道歉惩凶，已交出五十万镑恤款，这决不能说英国政策只是为代沙达司令报复。埃及提交国际联盟的抗议书，书中声明："埃及与苏丹为完全独立国，埃及与苏丹应视为一个整体，不容分裂。今埃及已允道歉惩凶，然英国竟乘机实行其帝国政策，凭借武力，对于一和平国，以图一逞。英国之行为蔑视埃及之宪法，伤害埃及农夫之生活，其所要求者与暗杀案毫无连带关系，实历史中前所未有，国际联盟会应为和平无助之国出场干涉"。

英国这种行动正如我国山东人民杀死德国两教士，而德国就借口占领胶州，同出一辙。英国帝国主义欲对埃及行施其高压政策，何患无词；即使英司令不死，迟早总有一个机会。

英保守党执政，不过一个月，对埃及已经开始下手，将来次第被祸的当然是印度和中国。印度的自治党已经表示恐惧英国保守党政府将取对印严厉政策，已积极预备抵御，前此包尔温首相发表政见中有"对中国将采更大单独行动"之语，中国人民对于此语不要漠不关心，当知现在英国对待埃及举动便是对待中国之先声。全国被压迫的同胞们，准备着罢！

原载《向导》第93期
署名：大雷

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

中国民族运动的第一期是义和团式的原始的排外运动。到了义和团失败后，中国的民族运动的第二期开始了，就是留学外国的中国学生与华侨欲推翻中国的坏政府而建设欧美式政治制度以谋中国的自强；辛亥革命就是这自强运动的总结。迨至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民族运动入了他的第三期。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

五四运动所以称为近代的民族运动，亦因为他是世界大战的结果，与世界革命潮流在中国的波纹。五四运动的动因是：（一）由于大战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放松，因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棉纱，面粉等业）得有相当的发展，亦就发展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他是最先要求外国对于中国帝国主义的经济解放；（二）由于中国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感受的压迫及大战后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荡而发生革命的要求。因为日本的轻工业的出品在中国市场上最与中国的新兴工业相竞争，又因为日本对于中国的暴力威迫最易惹起反感，所以五四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

五四运动是纯粹排日的性质而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

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这是因为那时没有国民革命的党去领导这运动，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发展民族运动，而反被某个帝国主义所利用。

五四运动象一盘散沙样的，不久就消灭了，其原因有二：第一，五四运动的主要成份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学生，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太幼稚与软弱，没有维持这运动的力量，而中国劳动群众在那时参加的又甚少。第二，五四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领袖，一个群众运动没有有主义的政党领袖，他既不能走入正轨，亦更不能继续发展。

但是无论五四运动如何失败，五四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有革命觉悟及了解世界革命意义的青年，要纠正五四运动的错误，逐渐集合在革命党的旗子之下，在劳动阶级中间尽宣传与组织之力，以求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且更进而求世界革命的成功。

原载《中国青年》第77、78期合刊
署名：太雷

广东政府内政上的两大政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已经不自今日始，但是以前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是有名无实的，实际上是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军阀统治着广东：是故难怪国民党的主义不能实行。因为军阀假托在国民党旗子之下无恶不作，所以更难怪广东人民不能信任国民党及其主义。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同志所最痛心疾首者在此，而国民党所以有去年春间之改组亦即在此。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大会上的目的有二：改组党使成为有组织的而深入群众的党；创设革命的与有主义的军队。自改组大会至今日，中间已经过了两年；在此两年之中国民党已能与群众接近并已造成革命的军队。并能用民众的势力与革命军把在广东反革命的军阀渐次肃清。现在东江南路余孽已铲除，广东统一在即。国民党在广东现在确已握得统治之权，此时正是国民党实践其对广东人民的允许之时。

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在过去扑灭反革命的斗争中已能消极的表示其与军阀政府与土匪军队有异：革命政府保障人民各种自由，帮助人民团体的发展，革命军不拉夫不扰害人民并能维持治安。所以在过去的斗争中广东能得五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之帮助，一般工人的拥护，商民并甚称现在之广东政府是民国成立以

来未有之政府。但是现在国民党政府在广东已经过了扑灭反革命的军事时期，到了和平的时期，消极的不扰害人民已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广东的土匪遍地，扰害以劳力谋生者的生活及妨害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虽然已将军事上反动的势力扫除，但是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贪官污吏尚存留在，勾结土豪劣绅，盘据地方行政剥削人民。是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最近决定关于广东内政的两项议决：划分行政区域以清吏治，组织除盗安民之运动以扫除土匪。

广东面积之大几等于法国，广东州县有九十四县之多，加以交通不便，若专恃在广州的民政厅以照顾全省行政，事实必不可能。行政中枢既不能照顾全省行政，各县县长必可自由行动，不执行命令，勾结土豪劣绅压迫人民，加捐重征中饱私囊，做种种扰害人民之事。如此，国民党以前的奋斗及人民的牺牲只为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发财机会。广东一定须财政统一才能减除苛捐杂税，才能有经费谋内政的改革与国民革命运动向全国发展；如各县各自为政，不执行财政厅之命令，广东财政必无整理之可言，人民的负担不减而政府收入不增，以广东人民现在的负担，政府的收入如无官吏的中饱应数倍于今日，除减少人民不正当的负担以外尚余有整理内政与发展革命运动之充分款项。所以为整顿广东吏治与财政起见，不得不有新的行政制度。政治委员会决定以广东划分为六大区域，即广州属，北江属，东江属，西江属，南路，海南。每区置行政委员一人，对于本区行政负完全责任，有任免县长之权。此非恢复以前之分道制而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目的在使各行政委员能在各该区域将行政整顿有头绪时即交还省政府。因为行政区域范围狭小则一人有力兼

顾，并且须赋与全权方能切实整顿各县行政，如须事事请示省城，则因交通的阻梗与机关的周折决不能达整顿的目的。现在此办法已开始试验，东江，南路，西江，广州已委派行政委员以负各该区行政专职。此种办法是否有效尚待事实证明。不过要知道要达某种目的，方法本来不止一种，如此种不能达到目的则不妨另行试验他种方法，总之以达到目的为宗旨，不可拘泥于某种方法与制度。

广东人民的大患与广东省发展的障碍，除掉不法军队及贪官污吏以外即为土匪；土匪更是不法军队的后备队，帝国主义扰乱广东的工具。所以革命政府为使人民知其能担负保护之责而拥护之，为使出兵北伐时广东能无后顾之忧，决然对于土匪问题要得一解决。

土匪问题的解决，决不能全恃武力。对于战后的散兵及大股土匪固然可用兵力剿灭，但是因生计窘迫强迫为匪的遍地都是，时为盗匪，时为平民，剿不胜剿，并且剿无可剿。我们都知土匪发生的原因是经济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根本解决土匪问题须从经济问题着手。因此广东政府对于解决土匪问题分为两层办法，一是军事的——用武力剿灭散兵及大股土匪，一是经济的——发展实业及交通以收容失业，此两层办法决非政府单独所能做到的，必须得着人民的合作。政府方面已有剿灭散兵及大股匪徒的计划，分饬各军办理，此事一两月内，即可做到。惟关于发展实业与交通事项必须有人民的全力赞助。况且我们要解决此种重大问题必须使人民大家参加，使人民更感觉到政府与人民能合作为人民谋利益。因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与广东省党部已联合发起组织除盗安民大会，将各县

人民连络一起以解决土匪问题，将来此大会并将集募大款担任本省经济发展事业，一方面又收容失业，解决土匪问题，一方面可借此实行广东经济独立的计划。

国民党政府如此整顿内政，决非安心于建设广东而忽略全国的革命运动。革命党人应当明白中国对外不独立内政不统一经济不发达，无论何省不能希望有满意的建设。国民党政府现在整顿内政的目的即在使广东革命基础更巩固，使广东人民及全国人民能信任国民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党，使广东能为全国革命运动尽力。总之，革命政府的整理广东非特是为广东人民的福利更是为发展全国的革命运动，以谋全国人民的解放与福利。

原载《政治周报》第3期
署名：春木

孙传芳又杀了一位革命先锋周侃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孙传芳自赶走了奉军，非特占领了江苏地盘，并代替奉张当帝国主义者奴仆之资格。孙传芳公然摧残爱国运动，禁止爱国团体启封，孙传芳对于革命党之残酷尤甚于奉张。领导五卅爱国运动之上海总工会的会长刘华由英捕交孙传芳之上海戒严司令部，即于十二月十七日秘密执行枪毙。刚刚一个月后江阴又发生上海大学教员周侃，因组织佃户自救团而被江阴知事奉孙令枪毙之事。一月二十三日之申报所载关于周侃惨杀之详情如下："江阴县属之顾山镇，与无锡，常熟，两县交界，有现任上海大学教员之周侃，以业主虐待佃户，视同奴隶，深感不平，遂组织佃户自救团，其宗旨在提高农民生计，促进农民智识，要求业主体邮佃户，减轻租税，一时应者甚众，周亦到演说，农民多数入会，三县士绅得此消息，以周所提倡者，实类于赤化，又恐日久影响租税，遂联名具呈省县控告，指为共产党徒，经省署令行江阴县署将周拘案讯究，周供认组织佃户自救会不讳，至于宣传赤化，及过激主义，则坚不承认，该县知事即呈复省署，旋奉批令察核办理，周父仲甫闻此消息，以为可无危险，除具状声明辩白外，并请当地公正士绅及乡董等，公呈县署请求保释，讵该县一部分士

绅及某某二省议员，深恨共产赤化之流毒，复续呈省署，措词尤为激烈，至是省署续令江阴县署严密讯办，经王知事三次提讯，周均侃侃直陈，尽言无隐，王知事遂将审讯情形呈报省署，转报联军总司令部，孙总司令以其迹近宣传过激主义，与治安有关，即令依照军法办理，王知事奉令，遂于十七日将侃从中提出，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斩决，周于临刑时，又慷慨演说，谓系为平民争自由而流血，虽死犹荣云云。”

组织佃户自救团，以提高农民生计及要求业主体邺佃户减轻租税，这本是一件极平常之事，佃户一年工作之六七成被业主剥夺，哀求减少，稍讲良心者必不能不认为正当，不意江阴的地主竟对提倡之者请求孙传芳加以枪毙。军阀是靠地主所得剥削之分润以生存，无疑乎，孙传芳听信地主之请求，即将周侃处以死刑。农民组织起来是国民革命之势力，广东的例已可证明：这与地主与军阀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他们反对的口号是“赤化”“共产”……

原载《人民周刊》第1期
署名：雷

二 七 之 意 义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二七事件大家都知道，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汉路工人因要成立总工会遂被吴佩孚屠杀的事件。因为京汉路当时是吴佩孚的私产，京汉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已经罢过一次工，结果每人每月增加三元工资，这对于吴佩孚的损失每年是一百万元左右，如果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工人的势力又要膨胀，再罢一次工又要他损失百余万元。再京汉路工人已欲然发展成一绝大势力而此势力天然是吴佩孚之敌。这就是使吴佩孚决心摧残京汉路工人运动之发展，遂有二七屠杀工人之事件之发生。

不过，事实不是如此简单。中国人民自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后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剥削之下，直到一九一九年才有学生五四的排日运动，一个偏面的与上面的运动。但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唤醒了中国最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劳动群众。于是有一九二二年初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接着有上海浦东纱厂大罢工，唐山煤矿与洋灰工人大罢工，京汉路工人的大罢工。这几次罢工非特使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如香港英国船公司，投资上海纱厂与唐山煤矿的外国资本家直接发生恐慌，并且使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与经济势力发生摇动。帝国主义现时在殖民地上，掠夺的主要方法是投资，就是剥削殖民地的贱价劳动力。所以

中国工人生活改善的要求可绝端妨害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投资事业。殖民地上面的工人运动天然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工人阶级国民革命中的一个有组织的势力；他是殖民地的封建制度坟墓上生长出来的一株新树。中国工人运动非特危害及帝国主义并危害及其工具军阀。

自从辛亥革命后军阀是站在统治的地位；虽然一直在军阀混战之中，但是总是军阀与军阀间之战争，人民完全屈服于军阀之淫威下而不敢与军阀争斗。就是五四运动仍是避免与军阀争斗而找出几个军阀派爪牙出气。直到一九二二年间当中国工人运动已有相当的发展，遂有间接直接与军阀抗命之上海纱厂，唐山煤矿，京汉铁路等罢工，更有各地及各铁路工会之发展成为反抗军阀统治之潜势力。工人运动因此成为当时摇动军阀统治之唯一势力。

所以二七事件，可以说是一九二〇年来中国工人运动发展之结果。因为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恨毒工人运动，遂演出二七的残暴行为。这种事件何以发生在京汉路工人与吴佩孚之间的原由，就是因为一方面京汉路工人运动当时较之他处特别发展而其势力亦较大，一方面英国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吴佩孚在军阀中是最有势力的。因此两种势力冲突的爆发点遂发生于京汉路。二七事件表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勃兴。人民已起来争其被军阀剥削之权利。二七事件是争集会结社自由之运动。人民必须先争有此种自由才能发展人民自己的势力，然后可与军阀斗争，可保障自己之权利。二七运动虽是由京汉工人所进行的，但是其目标是争人民大家都要争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所以二七运动，是全国国民的运动。

二七运动开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因为二七运动是有经济基础之下层群众运动，与历来少数智识阶级运动不同。他是一个人民自觉的要求权利的运动，与以前建筑在虚浮的民族感情的运动不同。这运动是直接与军阀斗争不妥协的一个运动，与五四运动避免与军阀冲突不同。

二七运动最先表示中国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为争人民的自由，京汉路工人是先锋。在这个运动当中，可看出工人阶级的团结力。他们决定二月四日上午一律罢工，京汉路十二时全路即一律停车，各铁路工人并先后罢工响应。在这运动中可看出工人阶级的组织力。当时已有纠察队的组织，京汉路工人一致服从京汉路总工会命令。江岸分会长林祥谦至死尚喊“非总工会命令不下上工命令。”在这运动中可看出工人阶级的牺牲精神。工人都有至死不屈的精神。自二七以来工人阶级此种牺牲精神特别地表现，辛亥以前智识阶级的牺牲精神已遗传于中国工人阶级了，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已担负了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责任之故。

二七运动更看见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哪些，并且他们是团结一致来摧残中国民众运动的。北京官僚式的总商会，通大商埠的报纸，帝国主义，军阀都联合在一起摧残二七罢工。

二七运动虽被暴力所摧残，京汉路工人虽被残杀，但是工人运动与国民运动是不会被摧残了的。一年后全国铁路工会又成立了，京汉路总工会现在郑州，一天发达一天，北方的工人运动普遍的发达起来了。国民运动随之蒸蒸日上。五卅运动又继二七而起。工人运动与国民运动愈压迫就愈高涨，因为他们是到中国人民解放的河道，愈堵塞就愈泛滥。国内军阀与外国帝国

主义是为中国人民解放所必欲去除的障碍；所以吴佩孚倒了，张作霖又倒了，孙传芳现在还压迫工人运动与国民运动，他的倒的日子亦不远了；英国因吴佩孚之倒，而丧失许多在中国之势力，日本因张作霖之失败又丧失在直鲁等省的势力。中国经过五卅运动以后，革命运动如潮涌一样高涨而帝国主义军阀的势力有形的无形的日益消失。继续二七的精神大家努力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呵！

原载《人民周刊》第 1 期
署名：太雷

北方时局与国民会议运动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当我们广东现在革命政府克复琼州完成其统一广东军事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北方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中。北京政府连以前名义上的存在都没有了；段祺瑞实际上已下台预备交代，不过他不愿交代与许世英内阁，他以为许世英是他自己所任命的，如何倒来拆自己的台。这是段祺瑞表面上的话，实际上是日本担保段祺瑞；国民军在直隶的势力不久就要发生变动，因此使段氏恋栈不去，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亦不愿段去后遂产生一更进步的政府。许阁七零八落，组织不起来。国民军对于北京政府不表示态度，因为其自己的一般政策尚未决定。法统派在天津忙着会议想捧黎菩萨出山。在北方各地的情形是：孙传芳占据着苏皖浙，势力尚未巩固，正聚精会神于收束异己的军队。吴佩孚在湖北驼在萧耀南的背上，萧耀南驼得汗流浃背要紧把他掀出去，吴佩孚即借此要挟萧耀南帮助其实现重镇洛阳的好梦。李景林张宗昌局促于山东。奉军已瓦解，张作霖已失其对部下之威信，公然卖身于日本即足以证明其有一蹶不能复振的情形。在以前，我们在某一时都可以指出某军阀是有统治权的（至少是在名义上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曹锟与吴佩孚都曾在某时做过统治的军阀。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统治军阀了。这是因为中国军阀政治已经瓦解，军阀势力已不能集中起来。

帝国主义因他的工具——军阀失势，对中国也不能象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时，帝国主义国均是联合起来共同帮助一个统治军阀以达其侵略之目的。如五国银行团之与袁世凯。继则各国因利益互相冲突，渐渐分裂，各有独自帮助一个统治军阀的想望，如欧洲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独助段祺瑞以统治中国。各国既因利益互相冲突，各欲在中国得到统治的权利，乃各助一个军阀互相争斗，以冀其所扶持的军阀得到统治的地位，如日本之帮助张作霖，英国之帮助吴佩孚。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国已寻不出可扶持的军阀了，英国帮助吴佩孚，而吴佩孚失败了，日本帮助张作霖，而张作霖失败了，所以帝国主义此时非常踌躇，不知谁可利用？因此他们只好等待。日本则因他的势力不雄厚，不能有一刻的等待，所以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出头来帮助张作霖。列国则在华北驻屯的无论海陆军队，均已联络起来，推值年总司令，以为保侨临时办法。这是表示列国不能依靠军阀而只好自己出头。现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也不敢有甚大的压迫，如目前的省港大罢工，香港帝国主义者也无可如何，如果是从前，那就大不然了。加上排外的罪名，就有干涉的借口了。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本身已经衰弱，因此逐渐在中国丧失他原来的地位。

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增减，与人民势力的增减是成反比例的。我们可以说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衰败，使民众运动高涨，又可以说因为民众运动高涨，促进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衰败。二七运动是民众运动的开始，以后经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五卅运动，直到最近的反段运动，人民的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普遍全国的有群众基础的及有一致目标的运动了。

民众运动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失势，已形成争夺政权之决战形势，北方政局以前是军阀与军阀间争夺政权，现在则成为民众与军阀夺取政权的斗争了。现在奉直军阀与帝国主义联合攻打国民军，即是帝国主义欲恢复其势力向人民进攻之最后一举。国民军在客观上是人民的工具，因为他是站在人民一方面，不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给与人民发展势力的相当自由。如果这次国民军不幸失败，人民的势力当受很大的打击，北方人民将完全在反动势力的高压之下，此种反动势力不久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广东或阻碍其发展。因此在现时北方直奉军阀与帝国主义联合向国民军进攻中，我们人民应站在国民军一面给予帝国主义与军阀以最后的打击。

在这人民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决战的时期中，人民应当集合自己的力量以求获得胜利——国民会议就是集合人民力量的方法。一年前国民会议运动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人民觉悟者尚少，运动的发展尚不普遍与统一，因为当时军阀的衰败亦没有如今日之甚。前次国民会议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唤醒了一般的民众。从过去一年中人民运动之发展看来，及从现时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衰败情形看来，此次国民会议运动一定能集合民众势力向军阀与帝国主义下总攻击，人民一定从他们的手里夺得政权。国民会议并且是人民接受政权的形式。如果此次奉直军阀失败之后，国民会议可以保证政权不再落于军阀之手。现时已有恢复法统等建议，不知道军阀的法统已不能再行恢复，军阀制度已经崩溃，接受政权不能是另一新军阀而须是人民自己了。

原载《人民周刊》第2期
署名：太雷

广东各界援助罢工*周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香港要解决罢工之心十二分的急切，不过他所应用解决罢工的方法十二分的错误，以致罢工解决无望，而香港终于成为荒岛了。香港最初以为罢工可以立刻解决的，只要静待其自行瓦解。但是事实证明：罢工很有组织并能与商人携手。香港以为这是国民党几个领袖的关系，于是香港进行危害国民党领袖及组织推翻国民政府之阴谋。廖先生被杀，罢工的精神反因此提高，谋叛的军人不数日而肃清，反增高了国民政府的地位。香港于是想自己动手了，香港英商开会要求本国政府用武力解决罢工，但是英国因国内国外的冲突不能如香港所请。香港既然不能自己动手，只好再借助于陈炯明魏邦平等军阀。这一次真是大规模的干起来了，四面八方的包围革命军，香港自己做大本营指挥一切。但是军阀不争气又失败了。到此香港真是绝望了。他们只好屈服了。于是有辅政司来省讨论解决罢工之事。当初香港政府遂以为解决罢工是很容易的事，以为辅政司可以不吃一点亏罢工就可解决，后来才知道不是这一回事，因此抹了

* 这里所说的“罢工”，系指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广州、香港工人为支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即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编者

一鼻子的灰回去。香港于是又起了一种幻想，想望所谓稳健派起来代他们解决罢工，香港总督那时的策略是离间广东的势力，把解决罢工停顿的责任放在广东政府身上。但是伍朝枢市长在四商会报告商议的经过，四商会一致拥护政府的政策。港督离间政策失败，他于是又用威吓的政策，他在定例局的演说是何等强硬呵！（不过他一面仍旧派人来私自进行解决罢工）我们都知道他这种把戏了，我们对他的回答是："广东各界从二月九日至十六日一致起来做拥护罢工周的运动"。这给香港一重大的打击。并明白告诉他们：你们一切过去的企图都是幻想，你们前面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老老实实地诚诚意意地预备了代价来解决罢工，不然你们只有看了香港成为荒岛而已。

原载《人民周刊》第3期
署名：雷

抗议粤海关停止验货起卸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据报告云："粤海关税务司英人卑路于星期六（二十日）十一时访交涉使傅秉常陈述：罢工纠察扣留八艇货物，该货物尚未经税关之查验，纠察如是做法，彼实不能执行职务云。"当时傅交涉面允设法解决。但交涉署晚八时又接该税务司送来公文，内称因纠察扣留未经海关查验之八艇货物，妨害其职务之行使，只能于星期一（二十二日）起停止验货起卸。星期日政府照常不办公，政府星期六晚八时接得税务司函未及答覆时，星期一（二十二日）晨税务司即命令海关停止验货起卸。入口船只不经关验不能卸货，即使能卸货，如未得海关发给凭证，该船到其他口岸时，该地海关以其无开行地关单必将该船扣留。广州口岸于是被税务司一纸命令而封锁了。

同胞们！我们对于税务司英人卑路此种伤害我国主权与广东人民利益的举动，应一致起来抗议！

海关照条约虽由外人管理，但是到底是中国的海关；税务司虽是外人担任，但是到底是中国的官吏。粤海关税务司虽是由人家强荐来与我们做守大门的号房，但是他决没有权可以不得主人允许硬把大门关起了来，不许主人出入的道理。税务司此种不从命令的自由封锁广州实侵犯我国主权。退一步说，我们承

认他是与我们敌对的，但是两国开战的爱的美顿书亦必须给对方以相当考虑的时间，税务司星期六晚八时交到通知，星期日政府与海关都不办公，星期一税务司不等待政府回答上午即下令停止验货，此种办法实为完全蔑视政府。广东自肃清反革命军阀后，商业已日盛一日，黄埔与白鹅潭商船密布的景象实为以前所没有的；现在税务司此举意欲使我们广东商业完全停顿，并断绝我们广东人民所需粮食入口。税务司应是我广东三千万人民的公敌，亦是中国全国人民的公敌。如此粤海关税务司此举不抗议，将来各地税务司都可同样效尤，以为害于我国人民。

同胞们！我们应该认清税务司此次举动是香港破坏罢工的把戏，我们应一致起来抗议香港此种卑下的诡计！

香港英人亟欲解决罢工，但是始终没有诚意解决罢工，使用种种不正当之诡计阴谋，此种阴谋已屡次失败。现在广东各界一致援助罢工，工商又设立联合验货处。因此香港税务司赴港密商破坏罢工之计划。税务司返省不久即召此次停验货物之事。又沙面近日领团会议英国方面主张电北京使团干涉工商验货处，因其他各国异议未得结果。因税务司为英人遂单独行动宣布停验货物以达其破坏罢工之目的。税务司借口于纠察在货船未经税关查验前查验货物为妨害税关职务之行使，其实是反对工商查验处之设立及别有目的，因为自罢工开始至今八月，中间在河面查验船只从未分别税关验过与否，如欲计算纠察在未经海关查验所查验之船只定在千百之数，何以税务司以前并未抗议，而独于今日开始抗议，显见别有用心在。工商查验处之设立完全为商人便利起见，货物经过一次查验后即可，免去以前屡次查验的滞碍商业。香港最希望的就是商人与罢工工人的冲突，现在

工商设立查验处格外表示工商间的一致对外，这就是香港所以必须命税务司尽力破坏之缘故。香港总督强硬态度之表示既没能使广东人民与政府发抖，反而成为他们的精神兴奋剂。香港还不死心，又想用封锁广州手段实行示威。但是香港一定又是要失望的：广东人民及全国人民将一致起来抗议，其他列强亦决不能容忍英国税务司禁止他们在广东贸易。打倒香港的阴谋！撤换税务司！

原载《人民周刊》第3期
署名：太雷

海关问题发生后之各方面

（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

粤海关税务司英人卑尔，借口于纠察队将未报关之货物扣留，不听候政府解决，擅自于二十二日停止验货，实行封锁广东；其目的显然系破坏香港屡次三番所想破坏而未被破坏之罢工。

税务司之目的原为挑拨工商间之感情。二十三日税务司曾招集商人开会声明其封关之不得已，因纠察队妨害其行使职务。结果税务司之目的非特未达到，并遭广东商人之攻击。二十四日广州四商会与工界联合通电数税务司三罪，要求北京总税务司将其撤换。广东总商会单独致函税务司责其封关之不当。各界人民并于二十六日开大会示威巡行，到者不下十万人，对税务司此举严重抗议，通电各国，披露英帝国主义之阴谋，要求撤换税务司卑尔并主张收回海关管理权。

税务司之目的又为挑拨政府与罢工工人之感情。税务司在其与政府之呈文中，谓罢工委员会不执行政府之命令，所以彼不得已而取最后手段以帮助政府使罢工工人执行命令。税务司所得到政府方面之回答：即严厉责诘其不应不俟政府解决妄自封关，与财政部通电北京总税务司将其严重处罚。罢工纠察队则将所有扣留货物交还税关以表示完全遵奉政府命令，于是税务司之阴谋又完全失败。

税务司原拟借口于工商验货处之设立而自行封关，后因各国领事不赞成，只可作罢论，于是彼又找出纠察队在未报关前扣留货物之借口而自行封关。因纠察队所扣留之货物系各国商人所有者，是以各国领事对于税务司此举消极地赞成。但是自从纠察队完全将扣留未报关货物发还后，各国领事不能再同情于税务司妨害其本国商人营业之举了。因此税务司英人想拉其他帝国主义与英国帝国主义站在一边以反对广东政府与罢工计划又形失败了。

税务司封关后，香港方面所表示之态度完全证明税务司此举是香港之阴谋。香港帝国主义报纸特别申说："税务司系直接受北京总税务司管辖者，所以此次税务司之举动一定是得总税务司之同意。所以值得申说此事实者，因其可缩小此问题范围而成为广州税务司与广东政府及罢工工人间之问题也。"此正可见香港自行诡辩，其实香港欲借税务司此举以脱离其孤立之地位。

香港同时又竭力宣传珠江河面之海盗及工商验货处将来预备为第二重海关等等，以损害国民政府之信用及号召其他帝国主义国与彼一致干涉广州。

税务司封关事已在英国下议院中讨论及之。保守党议员黑尔勃特声称：税务司封锁广州港口事，"表示当地英国官吏能尽力之所能以保护英国商人之利益"。工党议员魏其吾质问首相饱尔温："封锁广州港口，事前曾否与政府商议？"首相拒绝答复。从此消息可知香港此举未得英国政府之完全允许。香港帝国主义报纸对于黑尔勃特之言词认为不知税关与中国之关系，竭力否认，并再三声明税务司此次封港系中国税关与广东政府

及罢工之问题，要人相信此举与香港无关。

税务司此次破坏罢工之阴谋，因以上种种关系而失败了。且已于二十六日开关了。但是我们不能说此种阴谋即告结束，税务司此次举动完全是尝试政策，如果政府与人民示弱则彼将得步进步，如此于罢工前途及革命基础之稳固有绝大危险。所以政府与人民不能因海关已开遂谓问题已经完结，我们应当继续对全国及世界人民揭破香港帝国主义之阴谋与宣传税务司滥用职权封锁港口之不当，我们更当团结一致进行撤换税务司与收回海关管理权之运动。应使帝国主义者知道税务司此类举动只是弄巧成拙激起中国全国人民要求收回海关管理权之运动，及惹起全世界人民对于此种暴行之反对耳。

原载《人民周刊》第4期
署名：太雷

纪念孙中山先生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伟大的领袖。但是为什么他能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有人说，因为中山先生是最仁慈的。我们知道一个革命领袖都是最仁慈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个个仁慈的就是革命的领袖。孤儿院的院主可以说是最仁慈的，但他决不是革命的领袖。又有人说因为中山先生能继承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道统。如果这样来估量中山先生在革命当中的地位，那么，康有为亦可与中山先生并驾齐驱了。因为康有为是自称孔子的信徒，最得孔子之道的。又有人说：中山的伟大，是因为他创造三民主义。是的，有三民主义才使中山先生成为国民革命的领袖，但是三民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道学，而是中山先生四十年领导国民革命的经验之堆积。中山先生所以能够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因为他一生努力于革命的实际工作，并从他的经验指示我们完成革命的方法。中山先生主义的中心是革命。他常常对他的同志讲，别的东西或者要从你们那里学习，讲起革命来，你们都要跟着我学。所以我们要学习中山先生的是革命，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教我们的革命的方法。本来一个革命的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玄妙的理想，佛教耶稣教回教他们都要求得人类一个幸福的大同世界。就是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时

候，他还说，他这一种办法可以使中国人民住洋房坐火车使中国人民脱离野蛮的境地，到文明的世界。中山先生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不是在最高的目的，而在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他这种方法是他革命的经验所得到与适合于中国国民革命的需要之方法。其方法之重要而可以指出的有三点：

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靠民众的势力。中山先生初从事于革命的时候，就与其他有志改造中国的人们不同。中山先生从小就受太平运动的影响，他见到太平运动中的民众的势力，他知道革命的势力在社会的下层。所以他革命事业的开始，即在下层群众所组织的秘密社会中活动，因为秘密社会在当时是中山先生所找到的一个有组织的民众势力。辛亥革命成功，不是完全靠少数智识分子几个炸弹，与受革命影响的新军的力量，各地秘密社会的响应，是其成功的大原因。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的少数智识分子信徒，为谋自己的权位，而抛弃中山先生，与革命事业，此事愈使中山先生认识智识分子之不可靠，而更努力于土匪运动。有人以此责备中山先生，这正不知中山先生的用心，因为在当时土匪对于中山先生是一种民众的势力，可靠之以进行革命。不过土匪在社会上没有经济的基础，而秘密社会已失掉他在太平运动时的作用。因秘密社会是宗法社会的产物，秘密社会已经跟着宗法社会之瓦解而瓦解。但是中山先生的注重群众这一点是不可磨灭的。及到欧战以后，中国工人运动高涨，工人的力量与革命精神，在一九二二年海员的罢工，一九二三年京汉路工人的罢工，及其他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奋斗中表现出来，中山先生立刻就注意到这一个势力，认为这是帮助他完成革命的一个真正势力。当时中山先生在广东与军阀的斗

争中间，看见农民在革命中间的势力。因此中山先生毅然决定赞助工农的政策，甚至不顾及一般手下人之反对。他积极地帮助工农发展他们的势力，吸收工农分子加入他的党，他要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他的党建筑在民众的上面。在他死后的一年中，国民运动的发展与党的发展都证明他这个政策是对的，是完成革命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二、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在当初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与同盟会的时候，都是依照秘密社会的办法，团体里面行使严密的纪律，领袖有绝对的指挥权。虽然不脱宗法社会的形式，但是铁的纪律是指导革命的机关所必需要的。因为同盟会有这种纪律，才能使他们的会员有多少牺牲的义举。辛亥革命后宋教仁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松懈其组织，中山先生极力反对，力争保全组织严密的同盟会的存在。国民党的瓦解，更使中山先生确信革命党必须有严密的纪律，于是有中华革命党的组织，虽然有打指印及宣誓等宗法社会的办法，然而因为他纪律严密才能够进行革命运动——这一个教训，是我们革命党人，所要时时刻刻记住的。后来从经验上中山先生知道中华革命党虽然能使组织严密，但是对于组织的扩大有很多妨碍。因此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山先生对于党的组织，用民治主义的集中制。一方面使党内部有纪律，一方面向外能发展。中山先生执行党的纪律，有开除冯自由等及处罚张继等之事实。中山先生以为党内只有一个革命的领导，一切违犯这个领导的，都应该排除于党外。如此才能使指挥革命的大本营巩固。在他死后的一年中，他的真正的信徒要维持他这个革命的领导，对于一切危害这个领导的加以严格的处罚，这样使国民

党的组织与势力一天天的发展。因此证明中山先生主张要一个有纪律的党，是成就革命的一个必要的方法。

三、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与世界被压迫民众共同奋斗。中山先生继续太平运动的民族精神要推倒清朝，以为清朝不能做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之工具。但是等到清朝推倒后帝国主义列强阻止中山先生建立一个能与帝国主义奋斗的政府，于是中山先生更觉悟到中国打倒军阀同时须与帝国主义斗争。中山先生因为当时自己势力之薄弱，对于帝国主义的奋斗限于分裂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特别是破坏英日同盟，他以为英国是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在东方是最有势力的国，是最能妨害中国革命运动的势力，所以他要利用日本排除英国。有人以为中山先生的政策是专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是不懂中山先生的主义，对中山先生的主义为反革命的曲解。但是这一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国民运动的发展只有某种程度的效力。当中国革命运动猛进的时候，如前年中山先生北上时的民众运动，各帝国主义国都联合起来一致压迫与摧残！此时中国的民众当然只有一致起来抵御，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的势力太大，因此中山先生要找中国国民革命的友军来帮助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他于是找着以打倒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为职志的苏俄。在苏俄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他已经打电与列宁表示他对苏俄革命的同情与赞助。他更看见世界上凡是反对帝国主义而自谋解放的民族都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友军。他很早就与印度土耳其等国的革命领袖有接触与连络。所以中山先生因为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遂不顾一切狭义的爱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之反对，决定联俄的政策及与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

义的民族与阶级联合的政策。如果帝国主义势力联合而反帝国主义势力不联合只是自取灭亡，因此联俄政策成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策略。

在中山先生最后的一年中，从五卅运动中及广东革命基础发展过程中，更证明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政策是对的，是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方法。

我们认为以上的三种革命方法是中山先生主义的精髓，是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策略。因为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才使国民革命有一个胜任的指导机关。中山先生的工农政策是为国民革命建立一个群众的基础，是使国民革命运动成为有势力的不妥协的运动。与待我以平等的民族共同奋斗之政策是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得到友军。一个革命的领袖之责任就是要能够认识革命势力之所在，能够找得革命的同盟者，能组织指挥革命运动的工具。列宁所以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袖就是因为他能认识工人阶级的势力，他能找得农民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盟，他能建立一个有铁的纪律的党。中山先生的伟大亦在此，中山先生所以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亦在此。

原载《人民周刊》第5期
署名：太雷

巴黎公社纪念日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俄国还不能算做第一次。在五十五年以前，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那一天，在法国京城巴黎的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叫做“巴黎公社”的，就是法国无产阶级所组织的政府的名称。成立的日期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这个纪念日，是必需纪念他。我们现在来看他的发生的原因和其结果，以及他所给我们的教训。

当一八七〇年的时候，普鲁士与法兰西交战，也就是俾世麦克与拿破仑第三的战争。可是拿破仑第三的本领，没有拿破仑第一那样高强，所以被俾世麦克所击败，并且还被擒。拿破仑被擒的时候是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在苏丹地方。巴黎的工人和一班的市民，本来对于拿破仑第三不满意，很痛恨他，到了这个时候，便起来推翻政府，组织共和国家，那时便是当年的九月四日。为抵抗普鲁士军队之进攻，便组织了“国民军”，人数六十万，差不多全体的市民都加入了。

巴黎是欧洲的一个工业区，市民的大半都是工人，在国民军里工人便占大多数。那时的新政府却为资产阶级所占有，虽然政府为无产阶级所建设，但是政权在资产阶级代表手里，他们的领袖叫做台而斯。资产阶级看见劳动者的势力的雄大，六十万

的国民军，差不多完全是工人，是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于是资产阶级因为“贼胆心虚”的缘故，非常之惧怕，比怕德国的军队，在攻打他的那个敌人，还要怕得厉害。和此地广州的资产阶级怕工人纠察队，比怕英国舰队还厉害一样。开始的时候只觉得不安，恐惧。久而久之，资产阶级觉得对他私人的利益，日益悬隔起来了，就想如何去掉这种势力的方法，设法破坏了。这种破坏，不但用他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引用国外的力量，来摧残，压迫工人阶级。当时法政府便想勾结普鲁士军队势力，来打破国民军的势力。便很快的与俾世麦克结订和约，那时是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张和约，已经把法国的权利统统卖尽了，在资产阶级的计划是想在和约结定之后，借口无需乎对抗普鲁士来取消国民军。资产阶级知道自己没有力量解散国民军，想借普鲁士的军队来解散它。当时工人和一班市民所以组织国民军，完全是为争法国民族的生存，并设法想到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那件事，而资产阶级却为怕工人力量之发展，与自己私人利益关系，不惜实行其卖国的行为，与外国势力勾结，可是俾世麦克他另有他的阴谋，他想使法国自己内乱起来，不愿意法国能够和平发展。因此法政府就只能尽他自己的力量来干这件事。在三月十七号设法解散国民军，恰恰与他们的志愿相反，他自己所有的军队表同情国民军，都到国民军一方面来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到这个时候不得不跑了。隔日（三月十八日），政府便归到工人手里来了。

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号巴黎工人开始执政，这便是第一次工人掌握政权。

在资产阶级握有政权的时候，政府便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在

专制政治时代，政府便是君主贵族的工具。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政府便是工人的工具了，如“巴黎公社”。在各种时代的政府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专制制度的政府则有皇帝，宰相，大臣，等等。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里面，便是内阁，议会等等。到工人执政的时代，便自有他另外的形式了，在当时叫做“公社”，俄国叫做苏维埃。是一种普通选举的制度，没有智识，教育程度，财产，地域，性别等等的限制，人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权。共选出九十个代表组织公社。在九十个代表中有二十五个纯粹的工人，其余都是社会主义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分子。并且在这个里面，连国籍的限制也没有了。其中有十七个代表是第一国际的，德，波兰，各国同志都有。现在俄国政府也有别国的人，如前匈牙利苏维埃的领袖裴洛孔也在俄国政府。此外公社有三特点：一个便是有立法权同时也有执行权，与俄国苏维埃一样。还有一个，便是官吏的薪水和工人一样，最高不能过二百元（这个数目，在中国觉得很大，在欧洲工人所得的工资也可有这样的数目）。这有一个很大的意义，使官吏与群众一律不会成为一种特殊阶级。再一个特点，是司法官，也是由工人自己选出，并不成为一种大学毕业生专门判生死为事业的人的职业了。这种政治组织，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俄国革命成功以后的政治组织大致都是模仿巴黎公社的。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给我们一种教训：怎么样去掌握政权。

巴黎公社存在只有七十二天，在七十二天之中，做了许多文化上的事业。如禁止教会干涉国家的教育，开放各大学院，使人民得自由研究各种科学的机会。向来一班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学者先生们，都骂工人没有智识，蠢愚，如若工人执政对于

文化是如何如何危险。可是这里已经证明工人执政比无论什么人都高明。公开大学院,是使工人得研究科学的一种办法,资产阶级以科学为私有财产那种办法，早已望其项背。现在也可以看出,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最注意教育的,是俄国工人，俄国的劳农政府,而不是英美。固然英美也在提倡科学,不过所提倡的不同,他们提倡的是大炮,飞机，兵舰，毒气炮等，用来掠夺市场,镇压弱小民族和本国无产阶级的杀人利器。

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在经济方面也有很多的设施。努力取消私产制度,归为公有。在当时纷乱时间中,有许多工厂关闭了,公社便叫工人自己选举工厂委员管理。禁止夜工,提倡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其他对于工人有利益的事件。在短短的七十二天之中有如许的建设，也就可见工人阶级建设力的伟大。这许多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建设,俱是以促进社会的进化。在俄国也可以见到,他们的工人是如何的努力工作,希望做成社会主义之社会。他们知道这是在自己的社会，不是和在敌人的社会里面(资产阶级的社会)那样,用不着怠工，罢工等事,因为这是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手段。用之资本制度社会里是我们的战术，而用之于自己的社会里面,工人执政的社会里,便是破坏了。资产阶级往往笑我们工人,说一定要有钱才肯做工,这里已经证明这话的不确实。工人能够在他自己执政的社会里，为着建设自己社会的基础,而比在资本主义社会更苦一些做工,如现在俄国的工人一样。

巴黎公社为工人第一次执政,所以难免许多错误。第一点，是没有捕捉,监禁资产阶级的官员,任其逃往凡尔赛并且逃出去了，却又不去追捕他们，又任其自己组织政府。第二点，没有将

重要的军事区域占领。第三点，没有把巴黎银行没收。那时工人政府正需钱用，自己却不去拿，资产阶级却拿了这些钱来制工人政府。第四点，巴黎公社没有注意到交通机关，交通事业，当时法国各地都响应巴黎公社，但是因为交通不便，不能互通声气。巴黎公社没有注意到巴黎地方不过是法国的京城，全国各地都须顾到。资产阶级便设法把巴黎的交通完全断绝，巴黎公社的形势便孤立了。因为与外面不通声息的缘故，法国全国的工人不知道巴黎公社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而资产阶级的反宣传便发生效力了，用许多“共产”、“杀人”、“放火”、“掠夺”等等谣言来欺骗、威吓全国的群众。和现在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各国帝国主义者造俄国的谣言一样的。用尽了诬蔑，欺骗，威吓，恐怖，挑拨，离间等等手段。第五点，没有一个政党去统一的指挥，有马克思派，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派，法浪克派，杂乱无章。革命的事业是和军队一样的，没有统一的指挥是不能作战的。因为有这些错误，和普鲁士的帮助资产阶级以及城内的内应（这可以证明巴黎公社对反革命派一丝也不加以压迫），在五月二十日巴黎乃被陷了。巴黎公社工人的牺牲奋斗的精神很值得我们纪念的，巴黎城虽破，仍旧巷战了一星期之久，从五月二十一起一直到五月二十八日。在这个时期，工人一些接济也没有，而资产阶级却有普鲁士的接济。

资产阶级用了许多残酷方法与手段残杀工人，在巴黎公社成立的时候，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太好了，没有伤了一个。资产阶级明白下令枪毙的共三千人，坐狱的五千人，充军的七千五百人。而实际上此次巴黎公社工人的死亡者有七万人。资产阶级这一种残酷的行为，恰巧适合他们向来拿着诬蔑我们无产阶级

的二个字，“野蛮”。资产阶级的残暴野蛮的行为，不仅是法国，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如此。德国资产阶级暗杀工人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意大利之法西斯蒂团。英美的暗杀工人领袖和革命党。我们无产阶级有些地方太慈悲了，如巴黎公社因此而自己失败。必定要违反革命才杀他。譬如俄国更宽恕，对于反革命派不过囚禁，能够自新、觉悟仍可释放。在广东也可以看见这种事例，反革命派能够忍心下手把数十年的老同志廖仲凯刺死。而革命的国民党，这些反动派如邹鲁，林森，谢持等人，都好好的送他们回去了。这可以看出革命党残忍呢？还是资产阶级残忍呢？我们为革命的缘故，残忍是必要的。巴黎公社那种手段却是自己害了自己。在应该用残忍手段的时候，就应该用这种手段，不然，便是宋襄公之仁。

巴黎公社失败了，一班黄色的社会主义者，主张改良的社会主义者出来了，他们是挂招牌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说：巴黎公社因为工人暴动的缘故，所以失败以后不可暴动，只要求资产阶级改良好了。不革命的人一种失败只给他不革命的教训，有如京汉路事件，不革命的人便说，这次运动是不应该发生的，工人白给军阀杀了。他们不知道京汉路事件在中国工人解放运动有多大的贡献。而革命者得到的是另一种的教训。马克思的主义，因为巴黎公社的失败给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许多丰富材料。无产阶级专政的独裁制，就是从巴黎公社得到的。马克思在那时竭力称赞这个运动，说明工人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能够促进工人的勇气。工人自己本来以为自己很弱的，从此以后便觉悟了，知道自己的力量，有了自信力，这是革命里面的一件重要的条件。列宁对巴黎公社很注意，等于国民党对总理遗嘱一样，读得很

熟，并且他已经实现了这个遗嘱。他得到了许多教训：(一)无产阶级应该专政，(二)以实力，武力，压迫反革命势力，(三)要有统一的党的指挥，(四)无产阶级的政府另有他的方式，就是公社，苏维埃制度。(五)在革命的时候应该没收银行占据交通机关。

中国的无产阶级及一般被压迫的民众在民族运动中，应更多得一些教训：(一)资产阶级是有妥协，卖国的可能，(二)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袖，巴黎公社是特别的证明，(三)要有自信力，明白自己是有力量的，能够掌握政权的，(四)无产阶级是能促进人类社会的最有力的统治阶级。

原载《巴黎公社纪念册》及《人民周刊》第六期
署名：大雷

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呵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

广东已经统一了，反革命的军阀大半已经铲除了，但是广东的危机仍然是存在着呵！一般革命党人醒醒呵！反革命的军阀虽然除去了，但是反革命的基础，民团，土匪，地主，官僚还存在着。国民政府进行财政统一，表面固然一无阻碍，但是事实上处处都是阻碍，贪官污吏遍地都是，这是财政实行统一障碍之一种。靠财政纷乱吃饭的土匪与民团，这是财政统一障碍之又一种。帝国主义者每天在那里勾引反革命分子干反革命的事情，他们造谣离间军队，毁谤政府。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以香港为大本营，专事运动土匪与新编降军。反革命势力混在广东许多团体里面公然做反革命的活动。有些自称革命党人现在因为已经统一了，已经和平了，于是做起“天下升平”梦起来了。以为大功告成，他们可以享福与升官发财了，他们把革命的招牌放下专门去干什么“庆祝升平”的游艺会及“提高妓女人格”的花国选举。革命同志们，广东的危险仍在呵！去年打倒刘杨后大家以为广东大害已去，可以安然了，不知道拿暗幕一揭开，内面不知道一重一重有多少种阴谋与诡计！我们现在又看见这种情形了。同志们，提防着，时时刻刻记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原载《人民周刊》第6期
署名：太雷

段祺瑞惨杀爱国学生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卖国军阀不帮助民众反对帝国主义而反摧残民众以奉迎帝国主义——这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定例。英日帝国主义领导的使团,为帮张吴打倒国民军起见,假称依据辛丑条约对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销大沽口防御。北京民众特别召集国民大会反抗此种通牒,并向执政府严驳使团,乃府卫队反向群众开枪,死者三十四人,重伤四十人之多,内中学生居多数。段祺瑞、章士钊等并预备以煽动群众大会之罪,逮捕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对于这一件事我们广东的民众应该认识:这是北方反动势力向民众势力进攻的开始,段祺瑞这次不过刚刚做了斩首祭旗的刽子手罢了。北方这种反动政局如果平稳地成立后,非特是北方民众运动将受极大压迫,广东亦会很快感受这种反动势力的压迫。所以广东民众应与北方民众联合组织全国的大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张吴造成中国反动局势,打倒段祺瑞的卖国政府,废除辛丑条约,要求撤退外国驻兵,召集国民会议。

这次北京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不比上海五卅的惨杀小,我们民众的反抗运动应更比五卅运动大;五卅运动育成了一个广东国民政府,希望这次要大家努力使这次的大运动的结果至少

要国民政府势力达到长江区域。广东的学生们！这次北京被屠杀的大多数是学生，你们学生应当格外努力参加与促进这运动啊！

原载《人民周刊》第7期
署名：雷

国民政府下民众势力之发展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据二月二十二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广东已经有八十余万农民组织在农民协会之中。工人方面除掉十余万有严密组织的省港罢工工人之外，最近工人运动之发展如下：香港二十余万运输业工人在三月十九日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大会；省港青年工人三月二十四日开了一个全体大会；三月三十日省港女工又开了一个大会；四月一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又要开成立大会，把广东工人运动真正统一起来，使工人有发言的机关并增加广东工人阶级的组织力与政治教育。商民方面有广州商民全体加入国民党的运动，有组织全省商民协会的建议。学生方面正进行学生统一的运动，积极筹备广东学生联合会的成立。这些在一方面是表示人民势力在国民政府之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另一方面是表示人民势力的迅速发展使国民政府的基础格外巩固。

原载《人民周刊》第7期
署名：雷

北方反动政局与英日帝国主义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我们对于这一次北方的战争是非常之乐观的，这并不是完全因为我们革命党人盼望成功之心急的缘故。实在是因为当时双方势力的估计的结果表示国民军有占胜利的可能，奉军因郭松龄之倒戈一蹶不振，东三省民政财政首领王永江之辞职与吴俊陞等旧派军人对张之不满意，使奉军完全丧失战斗力。吴佩孚所恃者只有寇英杰一师有战斗力，而信阳一役寇师几至完全丧失战争力。山东联军屡败之师本不足以言战。国民军方面非但第一军在军队本身上有训练，且乘新胜之后又得一般民众的赞助，长江各省军阀亦表示同情于国民军。但是战事的结果又适得其反，这又是什么原故呢？

国民军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军三军不能统一指挥。二军内部复杂，岳维峻庸弱不能指挥，又不肯听冯玉祥命令，到战争危急时国民军将领表示愿拥戴冯玉祥，但是冯玉祥始终以二三军将领不可靠，不愿出山指挥国民二三军任其溃散。冯玉祥不能看见国民军胜利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而只看见自己领袖的地位，二三军将领既然不能拥护他，那末国民军胜利与否与他个人有何关系呢？因此国民军二三军在四面抵御敌军时完全没有统一的指挥。

国民军失败第二个原因就是国民军没有能得到人民方面很多的帮助。人民的势力没有能组织起来响应国民军。国民会议运动没有能成为一个全国有组织的伟大势力。人民势力所以没有能给国民军很多帮助，国民军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冯玉祥等对于民众势力猛烈发展时存恐惧之心，北京民众图推翻段政府而冯玉祥不加赞助，反主张维持段政府。

国民军失败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国民军没有能得到南方革命势力的实力援助。当然国民政府在当时不能直接出兵援助国民军，但是如果国民政府能多注意于北方时局，可以与邻省联络促成江西湖南四川对湖北之进攻，直捣吴佩孚的后路。方本仁、唐生智及四川将领为自己利益起见都有意倒吴；不过国民政府一方面没有能与江西湖南军阀有密切关系，使减少其对广东假道北伐的怕惧，一方面少鼓励督促他们攻吴的计划的实现。

以上三个原因当然是国民军此次失败的原因。但是其重大原因还不在此；英日帝国主义的积极在中国造成反动局面的努力，实是国民军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几乎因为张作霖的失败而丧失其在中国北方的势力，于是急得直接出兵满洲，又与奉军混合冲入山海关，同时秦皇岛，滦州等处日兵与国民军捣乱，日领常常对国民军抗议不准在京奉路线左近作战；一方面又用全力接济张宗昌李景林恢复其战斗力。英国帝国主义眼见得中国国民运动有长足的发展，国民军势力将直达于长江流域，而与南方革命势力衔接，英国帝国主义在广东已吃了大亏更怕他在长江流域的地盘再被摇动，因此英国帝国主义不得不竭力向中国进步势力进攻。以前字林西报传出英国要派十万大兵到中国来，这当然是吹牛，本刊前两期中夏君已完全证明，

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不认清英国帝国主义，这种的恫吓实为英国向我国进攻的表示。直接派大军当然还用不着，因为在中国还有许多破烂的工具可以为英国帝国主义所利用；据可靠消息英国帝国主义决定用一百五十万镑，收买中国的一般的反革命派代为宣传反苏俄，反共产，反国民政府，反国民军，于是我们看见，正在国民军与奉直决战时反赤化反苏俄，而间接反对国民军的空气闹得非常之浓厚；英国帝国主义还有腐臭的吴秀才等工具可以利用，吴佩孚因为得到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军械等帮助又重整旗鼓成为此次攻打国民军的主要势力。日本帝国主义想维持他在中国北部的势力，所以一定要打倒国民军，英国帝国主义怕国民军与南方革命势力衔接而危害他在中国的势力，所以亦一定要打倒国民军；因此英日帝国主义联合向中国进攻，使直奉联合向国民军进攻。英日帝国主义要重新造成反动的局势才能保障他们的权利。我们要记得日本让直鲁联军军舰悬挂日本旗以图偷进大沽口而不抗议，帝国主义各国因为国民军防守大沽口认为封锁而提出严重抗议。我们要记住这严厉抗议提出的时候正是国民军进攻直鲁联军着着胜利的时候呵！

现在国民军因自己不争气而失败了，对于帝国主义的猛攻让步了，于是遂了英日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心愿，造成了现在北方反动的政局。段祺瑞惨杀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群众，这是北方反动政局的第一幕呵！段氏此举即为迎合反动潮流对于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示好，使他可以继续在北京执政。北方时局虽然暂时告一段落，反动的局面暂时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国民革命势力消衰，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高涨。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中国的势力仍旧继续向衰败的线上下落。国民军虽然

丧失了二三军的实力，又因为在直隶的军事地位不利已经三路退却，但是第一军的实力尚能保存在西北。张吴虽然此次得了胜利，但是双方都无实力，而且张吴两势力在直隶又撞头，双方的冲突又必立刻实现，段祺瑞正进行联络张作霖阎锡山抵制吴佩孚之策略。孙传芳统率江浙皖赣闽五省在北方政局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势力。在北方现在至少有四大势力，孙吴张冯。如果这四派能联合组织政府，这政府亦不过是一个混合性质的政府！时常的冲突，将使此政府绝无权力，各派分隔或可减少冲突，聚合反增加冲突，因此这种结合的破裂可立而待。所以这四派势力始终将各据一方，互相倾轧，在以前有袁世凯段祺瑞做北洋军阀的领袖，做单独的统治军阀，自后即有奉直两派的势力同时存在的情形，至后又有国，奉，直三派势力同时鼎立的形势，到现在又有冯，吴，孙，张四种势力并存的情形。而且奉张部下如李景林张宗昌已分化，吴佩孚部寇英杰与靳云鹏在河南亦有冲突，小军阀如阎锡山等已成一独立势力，这正表示军阀是继续分化，愈失其统治的能力。况且除掉这四大军阀势力之外，倘有南方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在中国比较是最稳固的政府，在军民财政上比较地有组织，有十万以上有战斗力的革命军，国民政府非特现在统一两广；湖南，贵州，四川都有趋向国民政府的倾向。国民政府已显然成为中国政治一个重大的势力，以与分散的军阀势力相对抗。所以此次反动政局如果建立不能即使军阀与帝国主义挽回其日益趋向于衰落之行程。

不过个个革命党人应当知道革命进行的道路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虽然我们知道反革命势力是往下落的，革命的潮流是向上涨的，但是涨与落的线决不是直的，在这落与涨的线上尚有

一起一伏，一扬一抑。我们在近几年来已经过了多少次的抑扬起伏。最近五卅运动后是革命势力高扬，五卅运动后不久民众运动即沉伏。但是一般政局受五卅运动的鼓荡而高扬，五卅后革命潮流的高扬到现在又沉伏低抑一下。在现在北方反动形势之下，民众运动必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如果北方反动局势继续下去必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广东，那时全国反动的势力将完全集中他们的目标于广东。所以我们要努力抵御这反革命的潮流，我们要组织与团结全国民众的势力，要努力雄厚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的势力，要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巩固国民党革命的领导；我们在这个势力中，要确信我们革命势力是向上发展的，我们的敌人的势力是往下衰落的。

原载《人民周刊》第7期

署名：太雷

言论自由与检查党报

（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

在国民政府之下人民应有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这是无疑义的。因为国民政府是以完成国民革命为目的，而国民革命的目的首先要使人民能得到种种自由，人民有了这种种自由才能发展他的势力，才能更进一步以发展与完成国民革命。言论自由对于人民是最重要的一种自由；要“唤起民众”就全靠人民能有言论的自由。然而言论自由是有限制的。国民政府如果允许陈廉伯在香港工商日报上的言论在广州报纸上发表，就等于请人鼓吹推倒自己；这样的言论自由就变成与国民革命的利益完全相反。所以国民政府下的言论自由应是革命的言论自由，反革命派应完全剥夺言论的自由。

四月一日国民新闻在“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末尾注有“按：该稿昨日为检查员何赤抽去，故改在今日发表”字样。于是我们知道广州的报纸是受一种检查的。本来检查是应该有的；不过检查的目的应是防止军事秘密的泄漏与防止危害国民政府的宣传。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内容纯为辟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对共产党所造的谣言说共产党有推倒政府的阴谋，所以共产党郑重声明他是始终赞助国民政府的。如果我们不是要敌人挑拨离间的诡计得逞，共产党这种宣言非特不应禁止登载，并且应登

载在报纸上最注目的地方。如果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走狗或不是一个极糊涂的人，大家总应该已经认识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所以如果说有了共产党三字就不应该登载出来，这亦不是一个正当的理由。况且这禁止共产党宣言赞助国民政府，是绝端违反革命的利益与剥夺国民政府下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

况且国民新闻与民国日报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报，直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该报主笔是中央所选任，只对中央负完全责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任之主笔对于党义与政治观念应较普通检查员为高。据闻检查员何赤是公安局所派，如确，那末，以市政府公安局检查员而干涉中央党报之政治意见，恐于党义与道理上说不过去。公安局检查员如能严格防止如上次奸人假冒四军之离间革命军的传单满城散发，那就不仅是尽职分内，且是革命功高了。

原载《人民周刊》第8期
署名：大

怎样巩固革命基础

（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

现在的广东不应看作是中国二十二省之一，而要看作是中国革命全部的大本营，广东是中国革命的宝贝，有了他可以发展全国的革命运动，所以广东值得我们革命党人及一般群众牺牲一切来拥护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切反革命势力看了广东如眼中之钉，恨不能立刻拔去。帝国主义及与其利益相同而与革命利益相反的中国军阀，贪官污吏，地主劣绅，买办阶级及一切反革命派每天在那里咒骂，阴谋，威吓，危害与破坏广东。自从这次国民军在北方失败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在中国的反革命战线将完全移向广东，广东遂成为反革命进攻的焦点。我们是要保卫我们革命的基础以抵御这种反革命的总攻击。然而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广东这基础是否已经巩固足以抵敌我们敌人的总攻击？广东内部反革命势力是否已经肃清？广东革命政府是否已经有稳固的民众基础？统治广东的国民党与政府的本身是否完全团结而有指挥能力？革命军是否有充分的战斗力扑灭敌军的进攻？

广东反革命势力尚未能肃清。广东反动军阀虽已肃清，但是军阀的基础——土匪，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仍然保有膨大的势力。帝国主义在广东的政治压迫固然已减少，但是香

港在广东的经济势力仍保存着，靠香港吃饭的买办阶级，仍旧是掌握着广东的经济生命。逆军虽已扑灭，但是散布在各处的武装土匪，如果集合起来，是一个可怕的势力。各处的恶地主常常雇养大帮的土匪，违反政府的命令，袭击拥护政府的农民。反对廉洁政府的失意政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常思乘机窃发，作敌人的内应，平时专事破坏工人农人学生运动及国民政府的政策。我们知道广东内部这些反动势力根深蒂固，不能希望一旦铲除，但是要广东无内顾之忧，革命政府对于他们应有相当的镇压，至少要使他们不能妨害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且内部的团结是战胜敌人的首要条件。广东内部固然已经团结，对外固已能一致，但是我们要更形团结以免敌人乘隙而入。

人民势力尚未能充分的发展。三千万人民的广东，二千余万的农民中，（以百分之八十计）只有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工人运动因右派的阻碍未能统一，在革命政府与反革命斗争时，不能希望广东工人全体的赞助。学生一般讲起来，没有能表示积极的参加革命的斗争。广东民众运动最大的缺憾，没有能把小商人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唤起他们革命的兴趣。且民众势力的发展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广东的民众势力现在虽已蒸蒸日上地发展，但是我们还要百倍现在发展的速度，使革命有稳如磐石的基础。

革命的领导机关，尚未能完全强固。国民党因为在比较顺利的环境中发展的，所以有许多党员没有能在革命的工作中受严格的训练。党员对党的关系松懈，党难于运用党员做党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使个个党员成为革命的战士，成为有严格组织

的军队中之一个兵士。党不仅要其本身有严密的组织，还要他有群众的基础。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又是受压迫最厉害的民众，并且在广东的斗争中，已充分表示他们的革命性——农民应是国民党的根本基础，所以我们要努力使国民党的组织在农民中间发展。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领袖的团结，稳定，果断，对于党及一般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绝大的关系。革命的领袖应该深深的明白，他在中国及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及他对于中国民众的责任之重大。我们广东现在已有很好的革命领袖，但是我们还要使这领袖，更团结，更强固，更有指挥能力。

如果我们能内部团结，肃清反革命势力，有巩固的民众基础，与有强固的领导，就是拿我们现在所有的革命军，亦足以抵御中国反动军阀的进攻。如果我们能再努力的增加军队中的政治与军事的训练，革命军必能扫清中国的军阀而与帝国主义者直接冲突。因为有民众基础的及为民众利益奋斗的革命军应该是所向无敌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军队要有战斗力，必定先要军队有团结的精神有统一的指挥；革命的利益要求革命军的团结与统一，为了这个统一与团结就是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与有革命意义的。

原载《人民周刊》第8期
署名：大雷

统一学生运动与广州学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近年来有猛烈的进步；各种革命势力有渐次集中的趋势，因此最近统一学生运动的呼号普遍全国。但是统一学生运动的热烈空气中，并且在全国学生总会号召全国学生组织统一主张统一行动统一之通告方到广州时，不幸广州的学生运动正发生分裂的现象。在同日（四月十一日）有两个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开会，各到二十左右学校的代表，各举执行委员会。并且这分裂现象同时发现于各学校中，如岭南大学有一派学生与学校当局合作将反对方面学生三人开除。

广州学生运动分裂这事实的原因，不能尽把反动派破坏革命势力集中这一个理由来解释的。我们固然可以断定在无论哪一种集中革命势力的企图中反动派总是要从中破坏的，无聊的政客为自己利益起见总想利用一部分学生的势力。但是根本的原因还不在此。我们要知道中国学生是反映着中国的各阶级，学生中有资产阶级的倾向，有无产阶级的倾向，有其他的倾向；学生中因此有信仰上与主张上的不同，信仰上与主张上的不同，于是发生派别并常常惹起种种的纠纷与冲突。这就是这次广州学生运动分裂的原因。学生间信仰上主张上的差别虽然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全体学生有他们共同的要求，如果定出一个根据于全体学生共同要求的革命的纲领，无派别的偏倾，学生一定能

够在这共同要求之下联合起来，全国学联会为统一学生运动告全国同学书中一段说得好："同学们在主义及宗教信仰上，在政治主张上，自然不免分立各种派别；但是在全体学生之共同要求上，'就是在反抗外国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军阀压迫以争得民权'这两点，是应该一致努力的。一切主义的不同，思想的冲突，都应该是超越学生会、学联会的组织工作以外的同学间个人的纠纷。我们决不能因这一类个人的纠纷而影响到整个的学联会对外奋斗之进行"。如果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得到学生群众的拥护，各派的领袖就无法分裂学生运动，反革命派亦减少了挑拨离间的机会。在这一个共同的纲领还没有使学生群众明了而得到他们拥护以前，学生运动中各派领袖之上层联合，是施行此共同纲领所必要的。所以在广州学生运动刚刚开始统一的时候，学生会里面各派分子的参加，是绝对重要的。在以前因为在学生群众做革命工作的人稀少，更无革命派别之可言，所以那时革命分子在学生运动中的包办行为亦可以说是革命的需要。不过当现在代表社会各革命阶级不同利益的派别渐次在学生群众中分化起来，无论那一派有包办把持的企图，必致惹起学生运动的分裂。这一次广州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分裂就是因为一派学生要包办，不愿意接受国民党党团决议之代表各派的执行委员会名单。如果这一种一派包办的企图不打消，各派不能有一个共同的协定，各派不能有一个共同参加的学生会，那末广州学生统一的运动，不免因为几个学生领袖出风头的野心而难于早日实现，使反革命派窃笑，而幸其诡计得逞。

原载《人民周刊》第9期

署名：雷

帝国主义和张吴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吴佩孚与张作霖现在北方的利害冲突是无可否认的。在这个冲突中吴佩孚有拉国民军帮忙以抵制张作霖之必要，因此有国直联合之说。国民军为保存自己起见，亦急须与吴联合，鹿钟麟赶走段祺瑞即急欲逢迎吴佩孚之表示。所以吴佩孚与国民军联合起来与张作霖战争，应该是这次北方政局变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可惜中国的军阀不是能有独立意志的，他们有帝国主义的后台老板指挥他们，帝国主义要他们打就打，要他们不打亦就不敢再打。张吴现在有冲突的绝对可能，但是帝国主义不许他们冲突，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他们目光更远的计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扶植中国各派反动的军阀并使之联合向中国革命势力进攻务使扑灭而后已。英国帝国主义在欧洲主动发起洛加诺会议，要想联合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建立压迫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一方面成立进攻苏俄的同盟。

洛加诺会议，对于英国帝国主义有两种作用：一面防止国内的革命运动，一面维持英帝国主义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英国帝国主义又要把他在欧洲洛加诺的办法应用到中国来。近年来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逐渐丧失他固有的地位，中国革命的潮流一

天高似一天，并且增加了苏俄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这是英帝国主义所最惶恐而想解决的。英帝国主义既已解决了(?)欧洲问题之后，于是用全力解决东方的中国问题，国民军这次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受吴佩孚的打击，吴佩孚这次是完全由英国竭力的扶持而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的地位亟亟可危，不得不与英国携手，于是对英帝国主义的计划凑了一脚，因此有张吴联合进攻国民军共同造成北方的反动局面。现在国民军虽然已经失败了，但是英日帝国主义的计划尚未完全达到目的。要北方反动政局能稳固，必须完全扑灭国民军；虽然吴佩孚为个人势力发展起见是有与国民军联合之必要，但是这种联合必使国民军得以存在，这与英日的计划完全相反。因此国直的联合由酝酿而破裂。英日帝国主义的计划不仅要扑灭国民军并且要进而图谋国民政府的倾覆。英日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引诱吴佩孚在北方对张作霖让步的，必定是帮助吴佩孚向南方的发展。

原载《人民周刊》第10期
署名：雷

五四纪念告广东学生

（一九二六年五月四日）

△打破分裂学生的两条界线

△回复五四运动的团结精神

五四运动——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以学生做中心的。中国学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地位的重要从此闻名于全国及全世界。当时学生所以能领导这伟大的运动就是因为他们能在反帝国主义的目标下一致团结奋斗。中国学生这一种团结自五四后即渐次松懈，松懈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一般革命运动因发展而分化，学生运动亦随之分化，一方面是因为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派在学生群众中的离间与挑拨。特别是在五卅惨案后中国革命运动特别发展而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的阴谋亦愈甚，因此学生运动愈分化愈破裂。这种五四后的学生运动分裂的倾向在广东特别的厉害，这是因为广东革命运动格外高涨。所以运动的分化更厉害，反革命的阴谋亦更集中与凶恶。由国民运动发展而生的自然分化及反革命的离间这是学生运动分裂的客观原因，在反革命势力未打倒以前，始终是要破坏学生运动的。这种障碍的打破是在学生本身能团结，团结是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之最好工具。所以五四以来中国与广东的学生运动的分裂并不是完全由于反革命的阴谋，而是特别

因为学生本身不能团结,因为自己不能团结的原故,使反革命派离间的阴谋得逞，于是学生运动有今天的破裂现象。与五四时学生的团结精神真有天壤之别。但是我们革命的党人及做学生运动的同志都想望改变现在学生运动的破裂现象而把学生运动统一起来。因此学生统一运动的口号呼声非常之高，特别在广东近月来。虽然广东学生统一运动进行非常之猛，然而进行此种统一运动的领袖没有能完全明瞭过去广东学生运动分裂的一切主观原因而设法努力去消除之，其结果虽有心要运动统一而事实适得其反。两月来广州学生统一运动的结果就是成立两个学生联合会,各学校里亦发生两派对立的现象,广州学生间的冲突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厉害。只抱了一片热心去求统一而不去了解求统一之道，非但是不够的并且常常坏事。从过去与现在的事实看来我们要解决广东学生统一运动必须打破广东学生中间的两条界线：

第一条界线就是学生群众中有“革命派”与“反动派”的分别：现在中国学生一般来讲，都是革命的，因为他们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家庭的经济都是日益败落,他们知道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非特使他们家庭经济困难，并且使他们的前途绝望。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学生,因为自己的利益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学生群众是没有反动的,少数的领袖是有反动的。群众中间只有革命觉悟程度的差别而没有革命与反动的分别。某部分学生因为环境的关系或与革命运动隔绝的缘故,常常容易受反革命阴谋的影响及受反动领袖的欺骗，在表面上可以看见他们行为的反动,但是这不是某部学生的本心,他们是被蒙蔽，他们缺少革命的觉悟，有时因为受人的排斥因而伤感情，

逼他们走到反动方面去。如果"革命派"对待这种未有革命觉悟的学生群众能给以革命的宣传，能帮助他们战胜他们的不好环境，如果我们再能免除一些感情上的误会，我们不歧视或排斥不觉悟的分子，——我们不把学生分为"革命派"与"反动派"，我们能把这一条人为的界线打破后，广东学生的统一运动必定容易得多。我们相信现在中国学生中是有极少数的反动分子，但是决没有所谓"革命派"与"反动派"之分，有受反动领袖欺骗而被领导的学生群众而没有甘心做反革命的学生群众。我们对于这部分受反动领袖影响的学生群众不是替他们划分界线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要以诚恳的态度接近他们使他们能有机会接受革命宣传，我们要帮助他们脱离反动的影响，我们要披露反动领袖的罪恶使群众明白，我们要引导他们到革命的道路上去。因为我们做学生运动是要联合学生全体共同进行革命的奋斗，而不是要学生分裂使反革命阴谋得逞。反革命分子亦常常提出反对把学生群众分为反革命派，革命派的口号，不过他们提出这口号的意思完全是挑拨离间要学生分裂，与我们革命党人反对分划界线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是要学生能团结起来，学生不致为反动势力所利用，学生运动能统一起来，及学生能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势力。

第二条界线就是教会学生与非教会学生之分。广东有学生运动以来就有教会学生与非教会学生对峙的形势。就是这一次广州学生运动的分裂，在骨子里仍旧是一方面是非基督教的学生，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学生。因为广东教会学校异常多，教会学生在数量上之多将在广东学生运动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能得教会学生到革命方面来，广东学生运动是不能统一的。如

何能把教会学生与非教会学生联合起来，是广东学生运动目前最紧要的问题。要解决这问题，做学生运动的人们，先要明白反对外国教会与反对教会学生是两件绝对不同的事情：前者是革命的行动，后者是分裂革命势力的行动。外国教会在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厉害的工具，教会蒙蔽中国的青年，其目的要在中国造成一班奴隶，拥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我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起见非反对外国教会不可，反对外国教会应该是我们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运动。但是我们对待教会学生的态度就决不应是消极的反对。外国教会里读书的中国学生，他们是与中国学校里学生同样是中国人，大半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弟，都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应该是我们革命队伍的战士们。他们因为中国学校稀少或设备不周，进了外国帝国主义所设的学校；在这种学校内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宣传及外国教员的利诱与威吓，常常不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但是还并不是说教会学生天生就是反革命的。教会学生四围是反革命空气，处于恶劣的环境之中，因此使他们不容易有革命的觉悟或竟违反他们的本心而干了反动的行动；这应该是有革命觉悟的学生的责任，去帮助教会学生与环境奋斗，去引导他们加入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教会学生虽然一方面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蒙蔽，但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学校与教员压迫学生的行为亦可促起教会学生革命的觉悟，在革命的队伍里不乏从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五四与五卅运动中教会学生是参加的。我们断定教会学生中间虽然有几个人甘心做奴隶以外，绝大多数是可以走进革命的队伍。我们对待教会学生不应是消极反对他们，而应是接近他们，帮助他们，解除他们痛苦与披露教会学校与帝国主义的罪恶。我们

是团结学生，不分其为教会与非教会，要统一学生运动不使革命势力分散。帝国主义者他们是最欢喜我们中间分隔，帝国主义者为维持其在殖民地的统治，常用挑拨宗教与种族间的斗争使殖民地自己内部起冲突。教会学生与非教会学生们！我们不要受他们的挑拨，不要中了他们的奸计呵！

现在中国北方反动势力进攻很厉害，反革命捣乱南方革命基础的阴谋亦更加紧，因此到处我们看见革命势力各方面发生内部的裂痕，此种倾向特别在全国学生与广东学生运动中看得清楚。我们一定要除去以上所说学生中的两条界线，除去分裂学生运动的两个主观的原因，大家一致团结起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对待外部来的分裂阴谋，才能够达到统一运动的目的。广东全体学生们！在五四纪念——在中国学生最光荣的奋斗纪念的这一天应该齐声高呼："回复五四学生团结精神呵"！

原载《人民周刊》第11期
署名：大雷

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广东革命基础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危险的情形。广东这一年来的奋斗中间当然亦经过了几次危险时期，如沙基案后有英国进兵广州之危险，廖案后有梁鸿楷等倾覆政府之阴谋，及陈炯明魏邦平熊克武等之四面环攻，这几次的危险程度不过到底还不及现在广东的危险程度。这话怎讲呢？因为那几次虽然危险而指导的革命党是一致团结的，民众是一致团结的；所以虽然外面敌人压迫甚大而内部的团结力足以摧破之。但是现在广东的情形则不然。广东的群众以前是联合的现在破裂了，以前虽分裂而不大冲突，现在起了重大的冲突。广州学生成立了两个学生会，两派学生动不动就是用武挥拳。广州工人已有趋于联合之势而又骤然分裂，工人间的纠纷如粤汉路工人与兵工厂工人之冲突，广州人力车夫之互相殴打。五一节有两个集会：一在东较场一在西瓜园；五四纪念日又有两个集会：一在东较场一在广东大学操场；五七国耻日仍是两个会：一在东较场一在广大操场。最后一次的运动分裂更发生互相冲突致有打伤人之事。群众中此种现象实为广东以前所未曾有之事。至于国民党则自改组以来从未有今日之不好现象。中央党部之威信不足，一般党员多怀疑而无所适从。怎样会有这样情形的？

这些情形是那个造出来？很显而易见的就是那班已开除与未开除的反动派所造成的。他们趁了全国现时反动势力高涨的时候想把革命基础断送。他们每天在党内青年中间放布谣言以“赤化”恐吓青年们，使青年们发生疑虑，于是他们达到离间的目的。每天暗中在市面上散布共产谣言，唆使商家罢市以达他们破坏财政纷乱金融的阴谋。他们一面告诉香港政府说：“现在广东是左派执政，所以坚持罢工条件，如果右派能执政则罢工可无条件解决。现在右派快要执政了，所以请你们等着罢。”因此有香港停止进行解决罢工之事。反动派要把数十万人民坚持将及一年之罢工卖给香港，罢工被卖即革命基础亦被卖掉。市面上满散拥护西山会议及打倒国民政府之传单即证明反革命分子的踪迹已充斥于广州。他们这种活动使我们内部团结松懈，使最高党部减少威信，使国民政府摇动，使罢工解决无望并使人心不安市面恐慌。我们革命党面前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维持这革命基础？如果我们要这基础，我们要防备挑拨及互相团结起来除掉内患奠定基础。人民同情于我们，所以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原载《人民周刊》第12、13期合刊
署名：大

工农商学之七项要求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中国人民在军阀统治之下，虽然受尽痛苦亦不敢有所表示，因为一有表示，非特无减少痛苦之希望，反而有加罪之可能。惟在为人民谋利益之国民政府之下，人民有要求减少痛苦之权利，故人民向国民政府请愿，颇为寻常屡见之事。五月十一日又有工农商学代表开会通过七项要求请求政府实施之事，此事比较重要，一因此七项要求均为一般人民切身利益所关，一因此为各界人民联合会议所议决。

一，火油专卖之废除。先是外商拒绝纳交火油税，因此政府为维持威信起见不得不实行专卖，禁止拒绝纳税之美孚亚细亚等外国公司在广东销售火油。其后因接济不足及奸商舞弊等情，火油价昂，因此人民感受痛苦不少。政府虽早欲取消专卖，毋奈外商欲保存帝国主义商人在华之特权不肯让步，国民政府既为中国人民之政府决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商人之前，是以不惜稍牺牲人民暂时之利益与之相持。现在人民所受火油价昂痛苦太久，因此要求政府废除专卖，惟一致议决帮助政府实行征收适当之火油税。二，省港罢工之解决。政府屡次预备与香港解决罢工，然而香港则屡次延宕，表示其完全无诚意解决。因此十万罢工工人尚忍苦奋斗，商人亦感受痛苦不少。香港所以延宕解

决罢工者，实因其误会广东革命势力不团结及右派又得势，于是香港可使罢工无条件解决。革命政府产生于省港罢工，决不能对香港牺牲罢工；罢工屈服于香港，不啻革命政府屈服于香港。因此罢工至今未能解决。今工农商学表示一致拥护省港罢工使香港明白此间革命势力之团结，因此不再作何等妄想，并要求政府直接解决。三，剿匪之加紧。自统一广东后，政府即定有剿匪计划及实行剿匪，战后散兵先后消灭，而琵琶山匪窠之攻破尤足表示政府军队剿匪之努力。惟因政府财力及人民帮助之不足，原定肃清土匪计划未能完全实现，除盗安民会虽已成立，然缺少成绩。今各界人民感觉有帮助政府及督促政府积极进行除盗安民事宜，是以工农商学大会有请求政府积极进行之决定。四，劳资仲裁之设立。广东因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发展，所有阶级间之冲突亦更厉害，如劳资间，地主与农民间常有剧烈之斗争。两方冲突时如有公正之仲裁机关以调解之则双方可免无谓之损失。政府能居间仲裁，则反革命派离间商人脱离国民革命之阴谋不易有效，是以各界联席议决请求政府设立仲裁机关，秉公解决两方纠纷。五，吏治之整饬。广东反革命军阀虽除而贪官污吏未能悉去。监察院虽曾侦察几件官员舞弊重案，然澄清吏治则犹未能做到。所以未做到之故，一因养成官吏未能积极做到，一因中国吏治之腐败，根深蒂固，不易一旦澄清。人民既有望于国民政府当然欲求其能早日减除所受贪官污吏之痛苦。六，造谣之禁止。近来因反革命派在市面造谣使人心惶惶，政府与人民所受损失异常巨大。反革命派已为人民所痛恨，是以人民愿与政府共同维持治安严行禁止造谣。七，建设事业及教育事业之注意。广东既得和平，广东人民当然渴望政府能注意于黄埔开埠，建筑

道路，粤汉铁路接轨，普及教育等事。

此七项要求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赞同并已交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亦已慎重考虑，闻不日国民政府即可对人民此七项要求与以完满之答复云。自是，人民与政府之关系将更密切，革命群众将更团结，革命基础将更巩固。

原载《人民周刊》第12、13期合刊
署名：大

革命政府之下盛会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在全国反动势力进攻的时候，革命势力在革命的广州检阅一下自己的力量，以预备新的斗争，这是目前一件最紧要的事。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会检查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卅后势力的增长，据大会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之下已有一百三十万有组织的工人，这是我们在全国的一支有力的革命军，是国民政府和平时与战争中的拥护者。同日又开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以检查自刘杨倒后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据报告农民已有八十万之组织，这是我们革命基础的基础。在湖南湖北，河南山东等处农民运动已开始发展，这是我们北伐前进的最好助力。又全省教育大会亦于是日开会。这次的教育大会有许多重要决议案，而关于工农教育的议决案为更有意义，这是表示混沌的教育界已下了很大的决心，将要培植一班有力的革命势力出来。二十日广州又有广东全省商民协会的大会。商民协会虽然力量尚甚薄弱，但这是极堪注意的一种新现象，正表示广东商人需要自身的真正组织及参加国民革命之觉悟。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亦居然有全省代表大会之召集，这事可特别表示广东革命势力发展的程度。革命妇女的全省会议恐怕无论何省尚未有过。十五日国民党之中央第二次会议统计全国党员已近四十万，经

过了五卅运动的洗礼后已训练了多数革命的战员。

以上所述的集合起来，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政治势力，一月以来已次第在革命基础上会操过一次。革命党人应总括起来观察一下，估量我们的力量足够否，我们应当如何加倍努力以增长我们的势力。

原载《人民周刊》第12、13期合刊
署名：大

英国大罢工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英国这次大罢工是起始于矿工的罢工，矿工的罢工是英国战后煤矿问题不能解决的结果。英国是产煤最富的国家，英国工业的特别发达完全是因为他有多量而贱价的煤。大战后英国产煤量减低，别国的竞争格外加甚，于是煤矿问题遂成为英国的最重要而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政府无法解决这重要的问题，因为第一他不愿煤矿国有；第二他无力津贴矿主使矿主不减少矿工工资；第三他不能强迫矿工接受减少工资的条件。所以这次大罢工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基础摇动。

英国此次大罢工有三百余万工人参加，矿工有一百万，其余二百余万是铁路运输工人等，这些都是英国的基本产业工人，矿工与运输工人罢工可以完全牵制其他工业，换一句话说他们完全掌握英国的经济生命。我们从此可以看见英国革命势力的力量之大，这是英国大罢工的第二个意义。

英国工人运动以前是最保守的，但是近年来非常左倾。去年一方英国政府与苏俄寻仇构衅，一方英国职工会与我国职工会缔结同盟。英国职工运动左倾的发展遂有这次的全国大罢工。这次罢工虽然没有能扩成为大革命，已充分表示英国工人

阶级的革命是很可能之事。不过因为这次英国工人第一次的大举，英国工人运动还没有革命经验并且还有许多弱点，所以这一次只能是自己力量预备革命的演习。这就是英国大罢工的第三个意义。

原载《人民周刊》第12、13期合刊
署名：雷

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甲）五卅运动是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扩大

（一）五卅运动发生之原因：五卅运动发生之直接原因，人人都知道的是五卅惨案。五月卅日之上海帝国主义军警惨杀中国人民，激动中国人民的义愤，因此发生全国的大运动，称之为五卅运动。但是这原因不过是表面上的原因，其真正原因是中国民族运动近年来发展的结果。中国民族运动已发展到某程度，帝国主义为维持其在中国剥削起见，必与之冲突。五卅惨案即是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冲突的爆发点。上海惨案一发生，同时粤，汉，青，浔即相继发生帝国主义的屠杀。帝国主义的枪弹在中国全国飞射，中国人民不分南北东西的到处流血。这正表示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的大冲突。

（二）五卅运动的性质：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五卅运动是中国民众普遍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五卅运动是全中国各地民众及各种的民众都参加的运动，这样的普遍性的运动是中国从来所没有的。太平天国运动，义

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都不能算是民众自觉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卅运动反帝国主义旗帜的显明及民众参加运动目标的明白认识，是以前的运动所没有的。从五卅运动起帝国主义要遇见有组织的全中国民众的抵抗。

（乙）五卅运动给与我们的教训

（三）帝国主义凶恶面目的披露：帝国主义的文明在五卅运动中完全破产了。新式机关枪对于无抵抗的群众任意扫射，是历史上没有的现象。帝国主义者平时所鼓吹的和平，是不许被压迫者反抗的和平，被压迫者反抗时军队军舰大炮都是必须使用的。帝国主义者对于五卅的屠杀，表示完全不负责任，以图赖的办法想把中国人民所流的血迹轻轻擦去。六国委员会三国委员会调查沪案的报告，完全是怀疑外国军警是否放枪，中国人民是否倒毙的滑稽。但是帝国主义此种的野蛮愚蠢已经使中国的人民深深的知道。帝国主义的一切“文明”、“和平”的宣传，完全失其效力。

（四）军阀是帝国主义走狗的铁证：帝国主义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举动，人人共愤，但是不能激动中国卖国军阀的良心。中国军阀非但不能帮助中国民众向帝国主义抗议，反而帮助帝国主义破坏及压迫人民这种抗议。这是证明军阀是帝国主义走狗最显明的例证。

（五）商人的妥协性：五卅运动一方面证明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商人——特别是小商人有参加的可能性，一方面看见商人的妥协性。上海人民一致抗议屠杀的时候，上海商人也有三

星期的罢市的表示，事后因为帝国主义的威吓和利诱，先是大商人继而小商人脱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最后大商人如虞洽卿辈反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破坏此民众运动。但是在广东方面，因为帝国主义的威吓与利诱不能到，加以应付此运动之策略正确，如工商联合政策，因此广州的商人始终能在反帝国主义战线联合之中，虽然不能够积极的或则实际的参加，而至少也能随声附和唱唱革命高调。

（六）学生的革命性：五卅运动开始的时候，全国学生是一致参加的，但是事后因为学生是反映社会各阶级的，五卅运动分化因之学生中先后有退出此运动的，有继续与劳动群众坚持到底的。五卅运动将学生的革命性表现得清清楚楚。第一，学生的群众不能看他是一个整个的，所以对于学生的革命性不能有一律的评定。第二，学生群众是反映各阶级的，所以革命性是参差不齐的。

（丙）五卅运动与工农群众

（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在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由五卅运动完全确定。上海总工会，在上海是五卅运动的总指挥，省港罢工委员会，是广东对抗香港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因为他的组织力及他的彻底的革命性而得来的。上海总工会与省港罢工委员会各领导二十余万工人在第一次的奋斗当中，就有这样好的组织，上海的工人觉到四面八方的压迫，精疲力尽，方才退兵；省港工人，坚持十一个月，犹未停战。不过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

就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战阵当中,工人阶级如不得一个同盟者,必陷于孤军奋斗终于失败的地位。无产阶级不间断要以正确的政策使商人小资产阶级参加联合战线愈久愈好,并且最重要的要得到一个永久的同盟者,才能够完成国民革命。这个永久的同盟者,就是与工人一样穷苦一样受压迫的农民。

(八)一般农民没有参加运动:五卅运动没有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因中国的经济基础及人民的大多数——农民没有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没有不失败的。所以五卅运动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怎样使全国农民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农民所受的痛苦与压迫,使他们有彻底的革命性,能为工人阶级的永久同盟。只有大数量的农民参加,才能使国民革命运动成为一伟大的势力以抵抗强有力的敌人。

(丁)五卅运动的结果

(九)唤醒了全国人民:五卅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也成就的非常之多。五卅运动将中国的人民唤醒起来,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深入穷乡僻壤。从五卅运动才能够产生将来更大的使国民革命成功的运动,这就是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价值。

(十)广东革命基础的建立: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是在五卅运动正热烈的时候。广东省的统一,正在省港罢工与香港帝国主义相持中。在五卅运动使帝国主义惊慌失措的时候,南方革命基础于是建立而健强。广东革命基础是五卅运动的产儿。

(十一)军阀的更形崩坏:五卅运动强迫军阀分化;反动军阀势必完全暴露其真面目于人民之前,如张,吴等军阀,人民已无

不识其卖国面目了；另一方面冯玉祥郭松龄等军阀亦被压迫而表示反帝国主义态度。军阀中有对卖国勾当表示反对的情形，更促其自身的崩溃。五卅运动后国民军势力之膨涨，郭松龄之反奉，中国军阀几至于完全崩溃。

（十二）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在远东从没有受过如五卅运动中国人民所给他们的打击。大英帝国主义的威信完全丧尽。以大英帝国势力之大，不能使中国小小的广东一省屈服。中国五卅运动已使英国帝国主义考虑准许中国关税自主等问题。北京关税会议，虽然是一骗局，但是在帝国主义方面着想是一个大大的让步，这种让步，至少可以鼓励中国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要求真正的让步。省港罢工使香港很难恢复其原有地位。

（十三）给与世界革命之影响：五卅运动实震动了全世界。五卅运动给与欧洲无产阶级及东方被压迫民族决斗的勇气与胜利的希望不少。在五卅运动中各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对中国民众表示同情与实际援助，添了中国民众极大的希望并使他们了解与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携手之必要。五卅运动已实际表示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重要部分。

（戊）今年五卅纪念应如何努力

（十四）五卅运动因为我们未曾有充分的预备，我们的策略没有能够完全的正确，因此而失败了。五卅运动失败后，反革命的势力马上就开始进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想一举而铲除革命势力之萌芽，国民军被迫而退出，现在又趋向南方革命根据地

进攻，全国民众运动因压迫而沉伏。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用挑拨离间的阴谋，使民众内部分裂，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五卅运动的奋斗精神抵御帝国主义之反攻，我们现在要保存五卅运动给我们的革命基础，我们要内部团结起来，才能抵敌敌人进攻的阴谋，并且要预备反攻。在预备反攻之中，我们要改正五卅运动中之差误：第一，要实行联合战线，集合一切革命势力；第二，要多数的农民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打倒张吴固然要武力的讨伐，而得到最后的胜利及继续与帝国主义冲突，全国农民的参加及一切革命势力之团结，是绝对必要的。

（十五）我们的口号是：

（一）继续五卅运动的奋斗！

（二）实行工农商学的大联合！

（三）统一职工运动！

（四）把全国的农民组织起来！

（五）国内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六）打倒敌人离间威吓的阴谋！

（七）联合世界革命势力！

（八）一致抗议帝国主义的野蛮横暴！

（九）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十）反对帝国主义收买反革命派宣传“反赤”！

（十一）打倒造谣离间的反革命派！

（十二）拥护省港罢工！

（十三）拥护国民党！

（十四）废除不平等条约！

（十五）撤销外人驻华海陆军！

(十六)力争关税自主!

(十七)收回海关!

(十八)赞助北伐!

(十九)拥护国民政府!

(二十)拥护国民革命军!

(廿一)打倒张吴!

(廿二)打倒帝国主义!

(廿三)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人民周刊》第12、13期合刊
署名:大雷

到底要不要国民党？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

我们现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来实现国民革命？我提出这个问题希望革命同志不要误会我是毁谤国民党，我所以提出这问题来是因为现在国民党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个个国民党员，个个革命分子，甚至个个人民都应该严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几乎个个革命党员现在都承认：要国民革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政党。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与伟大领袖中山先生都告诉我们非有一个党不行。中山先生自己决定要建设一个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于是有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的改组，因为改组以前的国民党不能算是一个党，除掉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其少数信徒以外大半是靠党或靠卖党以升官发财的人们。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全国革命分子的结合；党要成为一个革命分子的结合方能成为真正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中山先生毅然决定欢迎共产分子加入亦就是本于这个意思。改组后两年半内的成绩证明给我们看，国民党已渐成为一个革命分子结合，因此在全国民众中有很大的势力，确实能领导中国一切国民革命运动。但是中山先生这一种造党的决心自始就被党内反动派所反对，因为这是违反他们私人升官发财的利益，并且违反他们阶级利益，他们啸喊着三民主义，其实他

们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因为帝国主义于他们是有利益，所以是他们所爱护的，他们是反对民权主义的，因为他们是要卖身与军阀，他们是反对民生主义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剥削民众重困民生的。因为他们所要的党是可以升官发财的而不是领导革命的党，所以他们反对国民党的改组反对国民党成为革命分子的结合。但是公开地反对改组是不敢的，是不能动人听闻的，因此他们提出反共产的口号以遮掩他们反对党的改组之阴谋，他们所以反对共产分子是因为共产分子是这革命结合中的一种重要分子而且是最努力于巩固与发展这革命结合的工作。但是智慧的领袖不为所动，事实经验证明给党内明了的分子明白革命的结合是最要紧的。自从国民党改组后发生排斥共产分子的纠纷后，我们看见的事实是：一方面国民党日益发展，日益获得人民的爱戴；一方面排斥共产分子者如北京同志俱乐部的老党员在中山先生生时即卖身段祺瑞，西山会议大半的领袖们在中山先生死后又卖身于反动军阀。事实昭彰，不容欺掩。但是这班反对革命结合的人们仍旧继续不断地躲在反共产党的口号之下进行破坏这革命的结合。他们曾经用陈炯明魏邦平的武力想来驱逐共产分子，他们曾经用香港的力量来危害国民党基础的广东以达到“护党”的目的，他们曾经勾结上海汉口帝国主义的巡捕残害共产分子想威吓共产分子退出国民党，他们曾经用巧妙柔软的方法，如老党员的资格，老朋友的感情，“爱”党的眼泪，仁慈的理论等等来感动与吸引不明了的党员使其对革命结合发生怀疑。诚然他们的功夫做得不差！革命领袖四十年的努力与千万革命党的白骨换来的广东的革命基础几乎因此而丧失呵！于是为维持这可宝贵的基础，革命分子不能不有五月十五日第二

次中央会议的让步。如果不是为国民革命的利益起见，为什么以前为革命分子所极端反对的西山会议提出条件现在要由革命分子占大多数的中央会议来提出而通过？革命分子的苦心不仅是要维持广东政局并且希望革命的结合能长久继续下去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因为如果革命结合不能继续下去，虽然广东能暂时维持，反革命派暂时被迫退出战线，革命的广东是终久要失去的。广东的危险暂时过去了，然而是否五月十五日的整理党务案能解决党内反共产的纠纷而因此维持这革命的结合呢？或者将由此而更进一步驱逐共产分子以破坏这革命的结合呢？这是现在个个革命党人所最忧虑的而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个个国民党党员不要以为国民党内共产分子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以为这是革命前途的大障碍，这一个问题最容易解决没有了，只要国民党大会或中央会议化费五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决定的。从五月十五日的经验，共产分子表示并没有霸占国民党的心，如果国民党要共产分子退出，只要有正式的议决，我个人推想共产分子决没有硬赖着不肯走的道理。共产党不是如有些眼光短小的人们所说，是要靠国民党而生存的。说共产党是一种寄生虫，简单的事实就可证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五年余的存在，在未加入国民党以前已经是存在了的并独立做了许多组织与宣传的工夫，国民党改组后虽然许多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工作，但是共产党本身始终是独立存在着做他的革命工作。所以共产党员的退出国民党与共产党绝无妨害；有认为共产分子非退出国民党的人们，因此不必假慈悲而有怕寄生虫不能独立生存的过虑。

假定共产分子都遵令退出了国民党后，是否国民党内就不

会发生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想如果共产分子被攻击而退出后，国民党内有部分革命分子必将首当其冲受人攻击为“袒护”共产分子或有共产倾向。如果这班革命分子退出后，较有革命认识的党员又不免受其排斥，其结果将重新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前的国民党的情形。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革命的结合而只是一个古董店，或者是一个衙门而已。简单说一句，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了。因为革命的结合是国民党势力之所在，失之则失其势力。所以我们可以说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革命的问题。如果那个革命同志不相信这话，历史事实自能强迫你相信这话。

反动势力一定要等他们完全摧毁，他们是继续地向革命进攻，首先要破坏这国民革命的领导机关——国民党。他们如果不能以武力打击你，他们会用柔软的手段来软化你。五月十五会议的决议虽然一时把反动派的武器夺过来，但是我们不能担保反动派不更将这武器夺回去，就是说更进而鼓吹提出驱逐共产分子的口号。这是国民党本身最大的危险呵！我们是否要国民党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如果我们要，那么，我们要防止反动派更进一步要求的阴谋，如果国民党党员，一切革命分子，及人民不起来防止这种阴谋的实现，我们只能看见革命的结合破坏，国民党的势力衰落。我们一定要有决心，我们决不能一方面看着国民党被人毁坏而一方面仍旧高喊着“国民党万岁”！

原载《人民周刊》第 14 期

署名：大雷

吃人的英国政府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英国帝国主义为他做生意赚钱起见不知道屠杀了多少弱小民族的人民；英国的军队在南非洲，埃及，印度等殖民地常常以排枪屠杀当地人民。外国侵略中国及屠杀中国人民亦是以英国开始。英国八十年前以枪炮屠杀广东人民，强迫中国人民买吸鸦片烟，英国这种吃人的猛兽政策到八十年后尚继续应用，去年又有上海五卅惨杀及广州沙基惨杀。上海及广州英国军警用机关枪扫射徒手的中国人民，这不是英国军警的妄为而是执行英国政府命令。不然为什么负责的开枪军警没有受英国政府的处罚。非特没有受处罚，主使沙面开枪屠杀沙基游行群众之驻粤领事杰姆逊氏，在沙基事发生后之翌日受大英帝国外交总长张伯伦之电贺谓其六月二十三日之功绩可嘉。中国全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及广东人民一年的奋斗抗议英国政府此种吃人政策！但是他并没有能改其政策。沙基惨杀已经是一周年了，当广东人民正筹备哀悼已亡的沙基烈士时，英国伦敦六月十八日透出消息，谓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国扰乱时出力之塔郎杜拉舰下级官长张美氏蒙受英政府之陆军奖章。从此更可看见英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吃人政策。英政府决不会改变此种吃人政策，除掉当英国自身发生革命而建设工农政府，取消侵略政策，或除掉当中国

革命成功把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扫除，使此种吃人政策不能实施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应该大家起来革命以打倒英国政府的吃人政策呵！

原载《人民周刊》第 15 期
署名：雷

广东人民与英俄工人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广东二十万民众在街道上整队游行，一致援助英国矿工大罢工。这事在世界革命及中国国民革命意义上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件呵！中国的革命群众已明白中国的革命要成功必须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起来，我们援助西方无产阶级的运动即是援助我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广东民众在六月七日的行动已表示西方无产阶级运动与东方民族运动联合起来了。六月七日广东人民的援助英国罢工的运动决不能看做是一种形式上的或少数人指使的举动，因为广东人民与英国帝国主义奋斗了一年，而在这一年中从革命的宣传上及从英国工人援助他们反英帝国主义的事实上已经有了这认识，对于英国工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奋斗，因此深表同情。广东三十六人民团体现正着手募捐接济罢工的英国矿工，这更证明中国人民与英国工人间已有切实的联合。

在纪念沙基惨案这一天的群众大会上，又通过了援助英国矿工大罢工及反对英国政府干涉苏俄职工联合会接济英国矿工之议决。这后一议决更清楚的表示世界革命的联合战线。苏俄职工会捐助了英国罢工的矿工三十八万金镑（合中国大洋三百余万元），英国的矿工不顾英国资产阶级及工贼的诟骂接受了这笔款项，英国政府无如之何，因此通牒苏俄政府责备其准许职工

工会接济大批款项为不当，英政府此举一方面想破坏国际革命势力的联合，断绝矿工的援助，一方面要鼓动国内人民反对苏俄以打击接受俄款的矿工罢工。中国人民知道英政府的此种阴谋，所以提出“不干涉苏俄职工会”的口号，以赞助世界革命势力联合的发展。在去年当我们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困斗的时候，俄国工农群众曾组织“不干涉中国”的口号，号召世界无产阶级防阻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摧残中国民众运动之企图。中国民众所以能建立广东革命基础而未受英国兵舰与军队的袭击，恐怕俄国发起的“不干涉中国”的运动，而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积极监督英政府，有极大的助力。现在轮到中国的人民起来鼓吹“不干涉苏俄职工会”以帮助英国的罢工和世界革命势力团结之发展。

原载《人民周刊》第15期
署名：大

广东一年来奋斗胜利之根本原因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经过了一年的奋斗，广东已变为完全不同的一个广东。广东人民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没有能得到象今天一样的国民政府，能统一全省，能保护和平，及能给人民各种自由与自动发展的机会。不仅如此，广东已成为“中国的希望”，现在全国普通的人民都赞美广东，都希望广东能早日扩大及于全国；一方面广东成为中国军阀与反革命的眼中钉，他们不断地想毁坏广东。这小小的广东更已能在世界政治上站一很重要的地位，广东居然与赫赫有名的大英帝国奋斗了一年，丧失大英帝国的威信实属不少，广东能继续反对去年五卅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之大屠杀，中国的尊荣得因此而维持。广东已成世界帝国主义所恐怖的怪物，已成为全世界革命群众所自诩的姣儿。

广东怎样能成为这样的广东？原因何在？有人说：革命党人在广东努力奋斗了一年，牺牲了许多生命，才有现在的结果。这话不错，如果没有革命党人的奋斗与牺牲，广东是不能有现在的成绩的。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革命党人在以前奋斗了数十年牺牲了不知多少生命，还没有得到什么成绩呢？而我们现在一年的奋斗与牺牲倒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呢？这是什么原故？原

故在：以前虽然是奋斗是牺牲，但是那是各个儿的牺牲与奋斗，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党，因此没有党的奋斗，各个儿的奋斗是散漫而没有力量的奋斗，所以没有结果，党的奋斗是许多革命力量集合起来的奋斗，所以是有力量有成效。以前亦有党，但是以前的党是散漫的而不是建筑在各种革命势力的团结上面。中国国民革命的敌人——各帝国主义国，全国的军阀与反革命势力——他们是联合着攻击我们，他们掌握着中国政治财政军事权，所以我们要去打他们必须要将各革命阶级的势力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因此领导这国民革命运动的党亦须是代表各革命阶级势力的一切革命分子之团结与结合。如果这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不是这样一个革命分子的结合，虽然有党的形式也是空的，虽然有党的组织也是死的。以前的国民党就不是建筑在这种革命势力的结合上面，所以有党等于无党，虽然有中山先生那样伟大的领袖，但是因为只有一个空洞的党没有把革命势力集中起来，中山先生奋斗了四十年仍旧没有多少成绩。最后从他四十年革命失败的经验中得到了这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把党建筑在革命势力的结合上，才能使国民革命有强固的领导，才能与反动势力奋斗。于是中山先生不顾一切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毅然将党改组，一方面决定吸收一切革命分子入党，一方面决定与世界上革命势力联合。自改组后，依照了集中革命势力的原则做了一年功夫，于是国民党已渐渐成为一个势力。去年三月伟大的领袖虽已丧失了，但是这革命势力的结合仍旧存在着，因此革命的事业仍旧能继续下去。不仅如此，这一个刚刚成立的革命结合要把他的势力在广东区域内试验一试验。试验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惊动全国与全世界的广东。

造成现在的广东，足足不断地奋斗了一年。在这一年之中我们经历了：赶走陈林军队的第一次东征，打倒刘杨而建立国民政府，廖案后扑灭反革命阴谋，驱逐许崇智，解决勾结陈炯明之军队，及第二次东征与统一广东全省。每一次的斗争都是很厉害的斗争。反革命势力互相勾结着与新兴的革命对峙；反革命势力有的是香港钱，革命势力有很少钱；反革命的军队比革命的军队人数多，军火的接济亦比较容易；反革命势力到处涨漫着，四面包围着，革命势力，不啻陷于敌军重围的形势。然而在这一种相殊悬绝的形势中，革命势力每一次战争都获得胜利，并且保存这胜利以与英国帝国主义相抗。革命势力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革命势力能有强固的团结。在每一次的斗争中农民工人及其他革命阶级都是一致团结以对付敌人。在每次军事行动中乡村农民都能扰乱敌人后方，袭击敌人军队，为革命军作向导或侦探，及帮助革命军运输等，农民自卫军更能镇压反革命派运动土匪之活动。打刘杨时粤汉广九与广三罢工阻碍刘杨军队的进行，自六月十九日省港罢工以来十数万罢工工友继续不断地拥护国民政府并间接或直接帮助其打倒反革命势力，抵御香港帝国主义，统一广东及整理财政。党军所以能冲锋陷阵以少胜多，实靠其中共产分子与非共产分子能一致牺牲与努力。在党内左派分子与共产分子绝对的合作，把反革命在政治上的势力打倒。左派与共产派的结合，不仅能得农工群众的拥戴，并且已渐次能得到商人及智识分子的同情。在这些奋斗中我们更得到国际革命势力的赞助，因为我们有了这一种革命势力的结合，我们才能战胜十百倍势力大于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种结合，那么，我们可以断定我们早就失败了，我们的奋斗一定是象过去几

十年的一样没有得什么结果，广东决计不是现在的广东，一定是陈炯明的林虎的，或香港的广东。

无论那个明白这一年奋斗之经过的，都应该承认：我们在广东的胜利，根本上是在革命势力有强固的结合。既然我们承认我们的胜利在此，那么，如果我们要保全已得的胜利，我们就要保存这个革命结合。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并没有完全消灭，他们只是潜伏着，潜伏在我们中间，潜伏在我们四周，他们正是想乘机而起，如果我们的团结稍为松懈一点，他们立刻就能打倒我们。假使有人以为现在我们已经胜利可以平安无事了，于是对于革命的结合加以疏忽或甚至破裂之，那么，简直是要断送我们从艰难困苦中得来之胜利。我们现在非特要保存这革命结合以保存这革命基础，并且正当我们进行扩大这革命基础的时候，我们应当更扩大与强固这革命的结合。同志们！我们的胜负系于此，我们应当大家注意，大家来努力巩固与扩大这革命结合！

原载《人民周刊》第15期
署名：大雷

援救广宁数十万农民呵!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土匪摧残农会，焚劫乡村，屠杀农民，现在变本加厉，到处都是。最近我们所听见的有河源，郁南，高要，广宁等处，发生土匪焚烧洗劫农民之事，其中以广宁为尤厉害，本月七日报载广宁国民党党部及各人民团体之乞援通电云云“全县岌岌不可终日，非大军援救，敝县四十万生灵，将成焦类矣。”为什么土匪现在如此猖獗？为什么如此摧残农民？

因为自统一广东后，匪军虽被击散，但未被扑灭，故匪军多仍流为土匪，因此土匪数量增多；既不得逞于城市，只好扰乱乡村。农民在革命军剿灭匪军时帮助革命军，所以当匪军散后做土匪时于是怀恨仇杀农民。再反革命派继续勾结土匪破坏国民政府，故唆使土匪扫灭拥护政府之农会。自农会日益发展以来，大地主与劣绅日夜不安，因之不惜贿买土匪联合民团以攻击农会，于是土匪可靠势任意蹂躏农民。蹂躏人民之土匪已被用作专门摧残农会的工具了呵！而一般社会亦被蒙蔽于农会中亦有土匪之谬论，因之对于土匪与农会之争，持不偏袒之态度。此种态度并影响及于军队，如广宁人民通电上有云：“虽有防军在石涧驻扎而股匪毫无顾忌，”因防军取中立态度致股匪可以毫无顾忌。土匪焚掠农村，既然有各方面的赞助，那么，为什么不猖

獗呢？而农民则一无援助，只好受大帮股匪与当地民团及劣绅地主的联合摧残。此种情形愈演愈剧，现在广宁遍地皆匪，祸及全县，此所谓养痈成患。如此种情况不能立行制止，恐将为北伐后顾之忧，全省人民必将受其涂炭。有组织的农民是维持广东和平最好的工具，因为只有靠农民才能完全防止匪患，但是农民须先得政府军队的援助，扑灭大帮股匪，及得政府命令严行禁止地主民团破坏农会，才能发展农会使成为有力量的团体以维持广东的和平。社会一般人民应该赞助农民以与土匪争斗，不可取中立的态度。现在让我们人民大家一致援助广宁的农民，让政府派军队剿灭广宁的土匪呵！

原载《人民周刊》第16期
署名：大

香港预备了解决罢工的代价没有？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六月二十五日英领事的复函已解释清楚：香港方面的两代表，关于香港事件，有全权办理，而英领事自己除通常职权外，英国政府并授以相当自由处置之权，并声明除排英货问题外可讨论任何同类问题（当然指罢工问题）。六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之复函并已通知准备七月十五日在本部开始谈判。由以上的情形看起来，香港方面因为实在支持不住了，所以是十分愿意来解决罢工了，以前屡次昙花一现的罢工谈判，现在似乎能确实实现了。但是我们现在要问一问香港及英国政府，他们的代表是否预备了解决罢工的代价来的？是否已放弃他们以前种种破坏罢工的阴谋，如勾结北方军阀及运动不法军队与土匪企图推倒国民政府，如唆使税务司封锁广州港口，如贿诱不法官吏与政客骗卖罢工工人等等？是否已明白省港罢工是抗议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基等处的屠杀，所以要罢工解决必须有相当的代价？是否已明白如果不让步，此方是决不能无条件解决罢工的？以上的问题是要香港及英国政府切实回答的。不然，罢工解决仍是无望，而因此所受的损失是要香港及英国政府负责的。从最近的几件事实看来，广州税务司想借种种口实封锁广州，英舰在

梧州的横暴行动，英舰在白鹅潭寻衅，港绅接近吴佩孚商议借款扰乱湘粤，陈炯明魏邦平党徒从香港运输枪械往汕头等处预备接济土匪，捣乱广东等等，我们要正式通知香港政府及英政府，这不是诚意解决的表示。有了化钱接济土匪及军阀，为什么不能赔偿因罢工而所受的损失，十万罢工工人要求的经济赔偿不是普通的苦力哀求赏赐几个工钱可比，他们是为抗议英国那种野蛮的屠杀，他们是为民族的尊荣与人类的正义，因此他们所受的损失是应该得到正当的赔偿。我们广东人民及全国人民，应当明白我们所享受罢工工友奋斗结果的太大；我们不能让他们单独吃苦，我们应当一致拥护政府的代表团强迫香港政府及英政府接受罢工工友的条件。只有人民一致的拥护，政府才能在战场上打败敌军，在外交上获得胜利。

原载《人民周刊》第 16 期
署名：雷

请看英国的兵舰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英帝国主义所以能有“太阳不落”的大英帝国，谁亦知道全靠他的海军，他用了兵舰征服澳洲，非洲与印度等处，他的兵舰继续在他的殖民地上镇压与屠杀被压迫民族。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英国的兵舰所首先打破的，鸦片战争中，英舰炮轰广州，这是外国兵舰第一次袭击中国，自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由英国兵舰领导着把我们中国藩篱完全冲破了，于是外国的兵舰依据不平等条约可以自由游弋于中国的内地江河。在中国河内的外国兵舰靠了他们攻打中国的战绩常常在中国人民面前示威，因舰长的酒兴偶然向中国人民一试其枪炮之犀利，或自由封锁港口威吓人民以逞其虎威。此种事实，在在皆有，时时可见，而特别是海上王英国的兵舰及其骄傲凶暴的舰长，更为横暴无礼。

六月二十四、五日间又有英舰司令费慈将梧州港口封锁之事，其原因不过是梧州交涉员未能阿顺其意旨而立刻供给带水工人。以一军舰司令可以自由封锁中国港口，可谓横蛮无比，其目中全无中国人民及主权，可想而见。英舰司令仍保存兵舰政策之观念以为可以自由应用，这不免大错而特错。要知两广已非卖国军阀下之境区可以任其蹂躏，现在的两广是与帝国主义奋斗了一年后的两广，在此地有有组织的人民与独立的政府。国民政

府外交部已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道歉赔偿及惩凶。我们人民应起来赞助政府，务使英国帝国主义者知道中国人民政府的区域内决不允许其兵舰政策之实施。

梧州外交当局因封锁威吓而立即屈服，未免自己忘掉自己为独立政府下之官吏，而仍保留着在懦弱的军阀政府下当官吏之观念，一见洋大人发怒即忍辱屈服。因为中国官吏素来畏惧洋大人，因此外国舰长胆敢无礼取闹，假使梧州外交当局能持正抗议不为屈服，英舰司令亦无可如何，中国人民之义愤与国民政府之力量，必能迫其自行撤去封锁，如是帝国主义者才知道厉害，不敢轻试其兵舰政策。梧州外交当局没有这样的勇气，实在是一件可抱歉的事。希望以后国民政府下之官吏虽然不可向帝国主义者无谓的挑衅但是决不可向帝国主义者轻易屈服，因为官吏的屈服，不是个人的屈服，而是两广千万与帝国主义奋斗的人民之屈服。

原载《人民周刊》第16期
署名：木

粤税务司又欲借端封关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粤税务司卑尔上一次借口纠察队在海关验货前检查船只为妨害其职务，突然下令封关断绝广东交通以图破坏罢工，借乎人民一致反抗，以是阴谋未遂。现在正当进行罢工解决之时，卑尔又想借端封关，欲以此示威，庶可达无条件解决罢工之目的。其所借口之一，即海关工人组织工会。卑尔在六月二十八日向宋部长及孙市委员长声称海关工会工人包围海关强迫工人加入工会，如不禁止此项事情，彼即宣告封关。据实际调查及全国总工会报告，工人并无包围海关之事亦无强迫加入工会之情。只是卑尔想造成此种情形以达其封关之目的。卑尔专心与海关工会寻事，已陆续无故开除加入工会之工友，以图激起工会之愤怒而出于罢工一途。但是工人已早知其阴谋，宁愿忍痛退让不与争执。遂知当二十八日该工会派出宣传员九人在距离海关颇远之街口宣传工人入会，卑尔又诬为包围海关，以为可借端封关。不幸，政府人民调查迅速，立即证明其为妄报，以是卑尔之阴谋又不得达。卑尔既无理以工会问题来行其阴谋，于是又想出第二种借口。三十日卑尔又致函粤海关监督。谓据医生报告本市虎列拉症，日有数起，拟通告各口岸，宣布省城疫埠。一宣布为疫埠，广州口岸即不啻被封锁，因外埠船只将畏疫而不能前来。广州市

卫生局局长闻此，即查复税务司，谓并无其事，并已严密防范，毋庸宣布疫埠。于是卑尔第二种阴谋又归失败。卑尔之阴谋虽已失败，但是英帝国主义者欺侮中国人民之事实不可磨灭。税务司为中国之官吏，只因此职被外人袭取，因是可以操纵一切，任意借小故而行使威权。卑尔上次封关即应撤差惩办，但英政府包庇他，他非但不知道改过自新，他更形无法无天了。此种不平等惯例不改，即不能保证不有卑尔以后的阴谋，更不能保证不有第二个卑尔，犹如外国兵舰如果不撤退中国河道，外国的兵舰是始终要横行霸道的。

原载《人民周刊》第16期

署名：大

此次广东出师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广东人民早一两月中就听到出师北伐的传说，他们那时半信半疑的；他们对于出师北伐没有明了的观念，只知道他们的负担恐怕又要增加了。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发表出师宣言，七月九日总司令就职行出师典礼，同时军队一师一师的向北移动；广东人民现在已确知道出师是一个事实了，但是他们仍旧是不明白出师的意义，总以为这是与他们没有好处的事。一般的北伐宣传，说明这次北伐是为革命，我们要扩大革命基础所以要北伐，吴佩孚对北方人民怎样可恶，所以我们一定要吊民伐罪，等等。但是这些道理只有革命党人懂得，至于一般没有政治头脑的人民，我们又安能希望他们明白呢？我们常常说“军队与人民合作”，又说，“革命军要得到胜利，必须与人民合作”，如果这话是对的，那么，现在北伐这样大事情的意义如何可不给人民知道呢？因为人民如果不能知道出师的意义，军队是不能得到他们的合作的。

广东人民帮助国民政府扫除逆军及统一全省，因为他们希望统一后能免去战祸，并能得政府为人民剿灭土匪，建筑道路，振兴实业等等。现在广东已统一了，但是对于这一切建设的事业国民政府还没有能积极进行，那么，为什么政府现在放掉了这

些事不做而又出师北伐呢！岂非穷兵黩武吗？我们认为这次的出师并不可以与穷兵黩武而论，因为此次出师宁可谓之北伐，不如谓之为防御广东。因为并不是国民政府要侵略邻省，而是吴佩孚受帝国主义嗾使要来扫灭两广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国民政府为保护广东和平起见不得不出师以扑灭那积极进行扰害广东的吴佩孚。吴佩孚在武汉时首先出兵援助叶开鑫想由湘省直捣广东，吴佩孚已下令江西军队向粤边移动，并已着手解决与国民政府有接洽之赖世璜军队，赵恒惕已返长沙自称五省讨粤总司令，吴佩孚命顾维钧与英国进行二千万借款为讨粤经费，吴佩孚现在虽在北京，但是他早就申言“先平西北，再平南粤”。国民政府曾经屡次对广东人民有很多允许，这些允许都是政府所应当做的，但是在这种敌人积极进攻的形势之下，我们不能闷着头整理内政而不顾外患之到来。如果让敌人来了，我们非特一切着手的建设都要毁灭并且就是现在我们所有和平亦不可得，又要恢复以前军阀横行的广东了。所以不能不忍痛丢了我们所希望的建设事业不做，而再从事军事行动，预备金钱的耗费与战场上的牺牲，以图扑灭那危害广东和平与阻碍广东建设事业进行之敌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出师是为保护广东的和平与为扫除广东进步的障碍。所以这次的出师不是侵略的而是保守的，不是进攻的而是防御的。

有人又要问：吴佩孚的兵又没有来，为什么我们要先出师去打他呢？这不是进攻吗？不然，我们现在是趁吴佩孚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先攻破他的巢穴，使他不能再为广东之后患。这在战略上说，即“为防御而进击”。如果我们现在不出兵，让敌人得了湖南之后与江西、福建及云南联合了来进攻我们，我们在战略

上防御非常困难；如果我们坐等着，等我们敌人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大批金钱与军械的帮助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物质上一定敌不过敌人；现在有许多中立军队看见我们的声势浩大，所以来依附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出去等敌人占了上风去，这些中立军队一定又会跑到吴佩孚方面去助之祸粤。所以现在的出师就是以进攻的方法来防御广东，这是最有益于广东人民的。

那么，又有人说，"这次出师完全为保护广东人民的利益，这不是广东主义了吗？"这次出师决不是广东主义。虽然为保卫广东起见只有出师一法，但是出师的意义决不限于广东，而含有全国国民革命的性质。如果在进攻危害广东的吴佩孚势力的时候我们能取得湖南江西湖北，一方面广东人民固然得了更巩固的保障，一方面湖南湖北江西的人民亦能获得广东人民已获得的自由与权利。国民政府决不会说我们这次出师是为保卫广东人民，所以这次出师胜利的结果决不许湖南湖北江西人民所享受，而湖南湖北江西只可做广东的藩篱。救援出师路线所经过地点之人民，及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当然亦是这次出师应有之目的。

如果我们在为防御而进击敌人中，我们能够取得了第二个第三个之基础时，我们革命的基础不是更扩大了吗！我们革命势力不是更雄厚了吗！革命基础扩大了，革命势力膨胀了，我们距离革命成功的日子亦更近了，中国国民革命一定要全国革命后才能成功，然后广东及其他各个省才能免去军阀的祸害，才能解决现时一省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扩大革命基础亦是此次出师之重要目的。

自从英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张吴起来后，北方政局完全在反动空气之下，人民的组织与运动受极大的压迫，革命势力的发

展因之迟缓，而特别是吴佩孚的势力直贯中国并与南方革命根据地接触，而其背后又为最老辣之英国帝国主义，故吴佩孚特别为中国革命之祸害而必须首先打倒之。广东革命军如能直抵武汉，则吴佩孚之基础已破，不难更进而将其打倒。倒吴一方为扫除扰粤的祸魁，一方为打倒压迫全国民众运动的元凶。因吴佩孚为此次出师目的敌，故倒吴为此次出师之必然目的。至于将来国民革命军抵武汉后能与国民军共同行动，完全扑灭张吴势力而实行统一，这亦是此次出师之更进的希望了。

这次出师的意义与目的既然明白了，然则我们对于我们出师的胜利有无把握哩？如果没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劳师丧财，败下来广东还要遭蹂躏，岂不是更糟吗？不！广东这次出师胜利是有十分的把握，因为我们只要把国民革命军与吴佩孚双方的势力一比较就可知道的。吴佩孚现在有湖北河南及直隶的一部，他在直隶所有的田维勤等的军队完全不可靠的，时时有反戈倒吴之可能，他在河南的劲旅寇英杰部，现在奔命于红枪会及樊锺秀等之袭击与顽抗，他在湖北的部队散漫无力，如国民革命军由长岳直捣武汉时，川黔军必进攻其背侧，其余吴佩孚在江西及湖南之友军可说是区区不足道了。国民革命军八军可出十万以上的雄兵作战，指挥统一，主干军队受过政治教育，故常以一当百，这在广东数次战争中为人人所共见者，革命军到处帮助人民，故人民亦帮助革命军，所以革命军有人民之合作十万当以百万计。吴佩孚之财政完全破产，虽然他现在进行大借款，即使能借得款项亦难填部下之欲壑，于其军事上恐无多大补助。一方面国民政府财政统一后月收在八百万以上，加之人民乐输，以是军饷一项毫无顾虑。

吴佩孚军队所过地点必遭当地人民之袭击，而革命军到处都受欢迎，一路的农民工人必能为之向导，为之运输；吴佩孚现在已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广东为中国之希望。两相比较，此次出师必操胜算，夺取武汉，必为意中事。

对于以上所说，我们的结论是：广东此次出师是为保卫广东；革命军因保卫广东而进取武汉，以扑灭祸粤之吴佩孚势力；革命基础因此而巩固并扩大；所以广东与全国的民众应一致赞助广东此次的出师；革命军因为人民的赞助所以是一定胜利的。

原载《人民周刊》第16期
署名：大雷

报纸停业与复工条件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

七月二十四日广州市报纸除民国日报与国民新闻外一律停止出版。其停版原因就是因为现象报因其诋毁工人运动被工人罢工而停版，及因为七十二行商报因驱逐要求增加薪水之工人而被罢工停版。报界公会因持北伐期内不许罢工之口号，联合停业以候官厅解决。一方面因为他们中间不能确信政府会帮助他们，一方面因为他们自己中间有要想出版的，于是联合停业就破裂了，各报又想恢复出版了。但是工人不答应了，你们报纸可以随便停业驱逐工人，置工人生活于不顾，自己团结维持不住又要使唤工人回去工作了，你们非答应几条条件，我们是不上工的。第一，保障工友工作，第二，禁止反动宣传，第三，因报纸最近借印刷工会名义加价但工人工资未加，故应增加工资。前两条件是当然的，第三个条件，亦不过是报界公会擅自停业压迫工人的小小惩戒耳。可是社会上一班站在剥削者的利益上的人们见了报纸停业并不以为不妥，而独独于工人提出复工条件就不胜惊愕，不禁摇头以为工人太不对了。工人失业等生活问题素来未及注意，自己还抱着主人的态度以为工人是可以象仆役一样地随便驱逐，所以对于工人提出保障工作条件当然要认为不对了。广州近来报纸多载反动的宣传，有组织地宣传诋毁工农

运动，造谣破坏财政，及为反革命派张声势，这一种的事实都没有被注意到，一闻工人要求报纸不得有反动的宣传，就以为这是工人干涉言论自由，真是无法无天的了。自己对革命失职还要责备人家，对于工人要求增加一点工资，更以为骇人听闻之事，不想想自己一个月拿多少薪水；自己多拿是认为应当的，因为我有身份，我有地位，我有学问，但是工人他们是天生受苦的，不配增多一点工资供养他的家庭的？一个人不能打消这些错误观点，就不配做一个革命党员，因为革命党是革剥削者的命，不是革被剥削者的命的。

原载《人民周刊》第17期
署名：木

此次出师与人民的自由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

此次广东出师，不论他是站在防御广东，或保卫与扩大革命基础，或讨吴的意义上面，都应是为人民的利益的。为什么要防御广东？因为怕吴佩孚的讨赤军打到广东来，把他在北方现在所赐给北方人民的——奸淫掳掠，强用军用钞票，剥夺人民自由，等等赐给广东的人民，把广东扰得稀糟，使广东人民已得的和平完全丧失。所以此次出师为防御广东就是为保护广东人民的和平与自由。为什么要保卫与扩大革命基础？革命基础与别的地方有什么分别？他的分别就是：在革命基础上，人民是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因为人民有了这种自由，然后能发展自己的组织，使人民自己成为一伟大的势力，以与人民之敌对抗，因此所谓革命基础就是人民势力发展的地盘。所以保卫革命基础，就是保卫人民的自由与其势力的发展，扩大革命基础，就是要扩大人民有自由的地域范围及使中国人民的势力更为雄厚。为什么要讨吴？因为吴佩孚在北方蹂躏人民，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并且他还要来蹂躏、压迫与剥削南方的人民，所以讨吴的目的就是要除去现在扰害北方人民与将来扰害南方人民的仇敌。

革命军与军阀军队一般不同之点及此次出师与其他军阀用

兵特别不同之点，就是为人民的利益。革命军此次出师是为保护广东人民的利益，是为谋全国人民利益。革命军既然为人民利益而出师，那么他一切的行动都要证明给人民看确实是为人民的利益。不然，人民就很容易误会出师的目的，而因此对之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甚至表示不满。革命军到一地即把军阀军队赶走，这在消极方面可以说对人民已经做了一件好事，但是这还不能满足人民目前的要求，目前人民所要求的就是给他们一种担保，可担保军阀政治不再加到他们头上去，这担保是什么呢？这担保就是人民自己势力的发展。农工商学各界人民一定要有自己的组织才能成为一种政治势力，以抵抗及扑灭军阀，以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如果农工商学要把自己组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势力，他们一定要先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等自由。因为有了这些自由权，人民才能宣传组织以集合他们的势力。在历史上各民族为了获得这些自由，曾经流了不知多少血，法国大革命就是争人权自由。所以革命军既以人民利益为前提，在他势力所及的地方一定要让人民有各种的自由权。不然如只驱逐了凶暴的军阀而人民仍旧没有一切自由，那末，这不过是开明军阀的保育政治，而不是发展人民势力的民权主义。革命军能维持秩序和平，开明军阀的军队亦能维持地方秩序与和平，革命军与开明军阀军队的区别就在一能给人民以自由，一不给人民以自由。开明军阀所以成为开明军阀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发展人民的势力，人民势力不发展就不能变军阀政治为人民的政治，所以他是保护军阀制度，因此仍不失其为军阀。革命军所以成为革命军就是因为他是帮助人民发展他们的势力以建立真正人民的政治，所以他是要消灭军阀政治的，因此他是革命的。

广东革命军在过去统一广东的战争中都是能给广东人民以各种自由，因此广东人民的势力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广东人民对于革命军及革命政府完全拥护，并且全国的民众亦以自由的广东认作他们自己的宝贝一样。国民政府此次出师当然亦应继续以前的功业，非特应保存后方人民已得的自由，并且要给前方占有地人民以各种自由。那末，占有地的人民将愈爱戴革命军，而未占有地的人民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了。革命军在武器上讲并不比军阀军队的武器好，而革命军所以能战胜军阀军队者就在有民众势力为其后援。民众所以为革命军之后援是因革命军能给人民以各种自由。

凡是革命者对于这原则是没有异议的，不过他们有加以限制的修正的。许多人，包括最诚实的革命党员在内，相信在此次出师期内，所谓军事时期，革命军所辖地人民的自由应有限制，使不妨害军事行动。他们很看重此次出师，他们下了决心去与军阀决死战，因此他们说："为了北伐胜利起见，我们要牺牲一切，牺牲我们的生命，牺牲我们的自由"。他们实在是最可佩服的革命的战士，他们预备为革命而牺牲一切。但是这一种牺牲的话只能革命党人自己说，或对革命党人说，如果要对人民说，他们是不能懂的，因此在军事时期中人民自由应受限制的话，亦就不能使人民懂得，而且有流弊及不妥之处。今将可以想到的流弊及不妥之事写在下面以供研究。

一、限制自由之例不可开。限制自由之例一开，人民自由就不能有保障，以后不免有借口军事时期而压迫人民之事。况且所谓军事时期无一定的限制，因为我们在革命进行时期中无时不在军事时期中，我们每日每时都须与敌人斗争。此次出师不

过是革命斗争中的一段，不能有特别的划分，从第一次东江战争一直到北伐都是联系着的。因此所谓军事时期之划分，在革命斗争的进行上是说不通的。再者，此次出师虽然我们相信是一定胜利的，但是这不是一短期的斗争。打倒吴佩孚当然要些时候，倒吴后再倒张作霖，进而至于扫除一切军阀统一中国，更将继续与帝国主义奋斗，这是一个很长的战争，如果承认有"军事时期"，那末这军事时期就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如果人民的自由要在"军事时期"中受限制，那末，就是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人民不能有完全的自由，亦就是说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前人民不能有完全的自由。

二、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一般人民的目光是很近的，不能见到北伐胜利后对于他们的利益。因此剥夺他们目前的利益以换得将来不可捉摸的利益，是很难得人民的欢迎。以北伐而限制他们已得的自由，他们只会发生误会，他们一定会说："北伐一开始就要限制我们的自由，北伐成功了不是更要厉害了吗？我们又何必拥护这北伐呢？"他们说这种话，我们是不好责备他们的，因为他们小百姓是不能明白大道理的，他们所见的是他们的利益。不仅是革命军所辖地人民要误会我们，而且全国的人民亦会不原谅我们。

三、反动派借此向民众进攻。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等自由是民众对抗反动势力的必要工具。所以限制人民自由是反动势力所最欢迎的。他们把为北伐而定的限制自由用作他们的利益。反动派现在已利用北伐的高帽子压迫人民了，例如劣绅土豪代政府派公债票与农民协会会员，如贫苦会员不能担任时就以反对北伐论，报告官厅，希图压迫农会。如果限制自由的

办法有了，那末，反动派又可大活动了。他们现在已经说农会是土匪，那时他们一定会借农会有土匪不利于北伐之名而图摧残农会。工人偶一罢工，甚至牙刷工人罢工，这与北伐的关系太远而太微，亦将被告为反对北伐。其他如人民不敢表示自己的意见，不易有集会的活动，如有就很难免反动派的曲解与陷害。限制自由本来的害处尚少，经反动派利用后，人民所受的祸害就大了。

四、失去此次出师之意义。此次出师是为保护广东人民已得的利益及为北方人民获得利益的出师；如果我们首先自己限制人民自由——人民自由是人民利益及其利益之保障，那末，岂非违反我们出师的意义吗？广东的人民一定要说“不北伐，我们倒有自由，北伐起来都没有自由”。在克复地的人民一定要说：“革命军亦是不给我们自由的”。如此，北伐就很难以“为人民利益”的口号来号召；人民亦不能认识我们的出师的目标了。

五、违背革命的原则。国民革命是人民自己的革命，一定要有人民自己的参加，才能成功。自古至今没有人家代庖的革命。俄国工农革命是工农群众自己干的革命，不是列宁与俄国共产党干的革命；只可以说列宁与共产党指导俄国革命，而不可以说是他们代俄国工农干成革命。俄国革命成功是因为俄国共产党能领导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与否，亦在国民革命党能否领导民众参加这革命运动。如果抱了代民众来革命的观念而甚至叫人民不要动，只静等着，这是完全违背革命的原则。如在北伐期间不帮助人民发展大势力而反有限制其活动的办法，那末，就犯了革命可以不用人民参加的毛病。

有人说：限制自由固然有害，但是如果不限制人民的自由

而人民有妨害北伐的行动及反动派趁机活动，岂不是北伐及革命基础极大的危险吗？我以为这层是不必过虑的。

一、人民决计不会有危害北伐的行动。如北伐是为人民利益的出师，那末，人民拥护之不暇又为何会反对呢？如果我们确信人民是赞助我们的，如果我们并不怕人民或怀疑人民，那末，我们不应当对人民采取防备的手段。偶而有工人罢工的事，假使是与北伐有重大关系的，我们尽可以理喻之而能得完美的解决。工人与农民在前几次广东战事中，表示完全是赞助我们的。工人曾经用罢工妨害敌人的行动，为革命军做侦探与输送队。农民曾袭击反革命军队，为革命军做向导及输送队。这都是大家所公认而不能抹煞的事实。既然工农能积极帮助我们当然不会再来破坏我们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过虑的。在去年第二次东征时，敌人四面向广州进攻，当时并没有宣布限制人民的自由，人民非特没有发生反对政府的行动，而且处处卫护政府，尊崇政府。这是过去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毋庸有丝毫的怀疑。

二、有他种方法防止反动势力的捣乱。要防止反动势力的活动是容易的，只要我们有决心。如果我们能用严厉的手段对付反动派使他们有所怕惧，他们的活动一定会减少。我们要承认政府现在对他们是太宽了一点。如果政府能帮助人民的势力格外发展起来，给他们更多的自由，他们一定能到处侦查及报告政府以反动派的活动，因为人民的耳目非常多，反动派一定无法逃出他们的视听。人民与政府合作时，反动派必无所肆其技。限制人民自由如上面所说，非特不能防止反动派的活动，反而能给以活动的机会。

总而言之，限制自由决计不是有利于北伐的办法，是违背北

伐为人民利益的目的。为使北伐有伟大的势力起见，我们一定把人民对于北伐的兴趣提高;保证人民完全自由，就可以提高人民对北伐的兴趣。在北伐期间，在国民革命的进行中，人民应有自由发表意见，自由组织团体，自由活动改善他们生活之机会。然后人民才有势力，革命才有基础。所以革命政府对人民的政策不是限制他们势力的发展，而是要尽量帮助他们发展。因为人民势力的发展是为革命的利益，不是革命的祸害。只要政府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他们一定是拥护这政府的。只要政府能信任人民，人民未有不信任政府的。政府如果怀疑人民，那末，人民亦自然要怀疑政府了。人民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任他们，不要怀疑与怕惧他们。让反革命派去怕惧人民势力的发展而发抖呵!

原载《人民周刊》第17期
署名：大雷

中英谈判的经过与结果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

久已喧传的中英谈判到底实现了。国民政府的代表陈友仁宋子文顾孟余与英港代表白伦纳(驻粤总领事)刚伯(港辅政司)哈立法克斯(港律政司)于七月十五日在广州开会了。从十五日到二十三日其中一共开了五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十五日)完全是一个形式上的会议，除掉陈友仁一篇欢迎辞外别无可记的。

第二次会议(十六日)中国代表提出关于对英杯葛①的意见书。意见书首先指出:“此种对英杯葛,如欲认真解决,则最少当寻求其直接原因之所在,所为疗病当治其本也,对英杯葛之显象,实直接发生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发生之后，尔时中国学生及各界之惨被狙杀,断肢折臂,实为此杯葛之直接原因所在,衡以因果关系,无可疑者,今欲以会商解决之法,断除此种杯葛,不能不先从六月二十三惨案办理。”中国代表提出:要解决对英杯葛必先从沙基惨案着手办理，这不啻给英国代表当头一棒。当英代表到广州来开会时,以为这次谈判是很容易的事,靠着英国素来出名的对弱小民族的外交手段来应付区区广东的

① “杯葛”即 boycott,意为抵制。——编者

代表，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一方面在谈判前及谈判中各方面表示威吓，如白鹅潭英舰追逼纠察队船只，海关以封关为恐吓，英兵追至深圳车站等；一方面腰包裹袋着一千万元的支票，以为东方穷鬼政府，又当北伐之时一定是能引诱得着国民政府的代表的。他们以为这次谈判不过借一千万元钱与国民政府的事情，又那里晓得国民政府的代表有这样的胆量，有这样的魄力，竟敢重提旧案硬要英国低首认罚呢？这一着是英国代表没有梦想到的。英国代表措手不及受了一大挫折。

该意见书继续说明六月二十三日全案之背景为五卅惨案，英警长伊文生下令枪杀民众，以致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况乎广州为中国民族主义最大中心点，无怪其于此案坚持民族主义以相对待，而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间斗争之显著表示也”；“则广州爱国示威，及其他群众运动种种之表示，皆为其当然之结果，盖六月二十三日广州之所以组织此可记之巡行者，皆所以发挥民族主义之精神，而对此惨案致无穷之感慨也”。国民政府代表说这一段话，真不愧为人民的代表。中国政府代表能站在民族主义上与外国交涉要算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了。这篇意见书要在中国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

该意见书继续指出沙基惨案之责任在英国。因英兵在四面夹水而有沙包电网防御之沙面向徒手游行之民众开枪扫射以致死者五十伤者百余；又经英政府拒绝讨论国民政府所提出解决沙基惨案之条件；于是广东人民除用对英杯葛之办法外别无方法可使英国对其野蛮行为有正当之处罚。香港封锁广州断绝其邮电交通及粮食接济，亦为对英杯葛之辅因，并给广东人民实行杯葛之榜样。

英国代表对于中国代表这一打击并未预备，当面当然无从答复，因提议于三日后在下次会议答复，并要求中国代表不可宣布，英国代表方面对此意见书内容厉害之恐慌，可想而见。后因中国代表之坚持，英国代表允在答复后一同公布。中国在外交谈判上占上风，这亦算是第一遭了。

十九日为第三次会议，英代表提出答复，其大意不外图赖而已。英代表说：关于对英杯葛缘由之意见，早经讨论，现在把它再提出讨论并将讨论公布"恐徒为激动舆论之具"。他们不知道革命政府的外交全靠激动本国及交涉国的民众，而帝国主义政府最怕惧的亦就是这种外交手段。

英代表认为五卅被杀之中国人民是该杀的，英警长为维护上海"全埠人民"利益起见，除屠杀外无他道。英代表此种口吻不足一辩，因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上之屠杀都有借口而且总是有道理的。英代表更说各地借口五卅案而发生淆混事实以耸动对英之恶感，以致有九江等处的滋扰。对于沙基惨案，英代表说中国方面先开枪。他们举他们同类的丹麦瑞典领事作证人，并说中国政府任令鼓动妄为，何异厝薪于积火之上，不能辞其咎。他们竟将自己杀人之罪轻轻赖掉。那个不知道帝国主义者的狡滑？但是谁又能相信他们呢？对于香港封锁亦一味图赖。最岂有此理的就是英代表说：此种断绝交易非出于自由，仅以少数强有力者组织团体以武力维持罢工。

第四次会议（二十一日）中国驳复英代表之复文。有一要点就是争外交公开之必要。这是革命政府最硬之点，一切帝国主义者所说公开都是假的。第二点就是肯定沙面首先放枪。第三要点就是驳斥英代表所说对英杯葛只有少数人以武力维持的，

这不啻说中国人民对于残杀行为沙基惨案者尚不起公愤，简直是奴隶成性。

因双方争执不下，中国代表提出具体的提议：第一，为确定（一）关于沙面开枪事，（二）关于香港封锁广州事，（三）关于拒绝国民政府在沙基案发生后所提解决条件事，本会议应委托第三者出而组织一公正的审查委员会，以决定此中争点，双方应遵守此法庭之决定。第二，如欲从速解决对英杯葛，则中英两方须协力分任负担，此项负担有三：（一）英国方面应保障六月二十三日之事件不再发生，具体办法即沙面海陆驻兵及英舰在中国河面应受限制；（二）赔偿沙基惨案死伤家属；（三）为解决香港广东关系破裂所发生之失业大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

英国代表对于第一提议，谓须请示政府。对于第二提议，则完全拒绝。中国代表又提议：在公正考察法庭未成立以前为从速解决对英杯葛之需用起见，应行借债，此项借债由双方分担，如审查委员会判定英国胜诉，国民政府并可偿还香港所担负之部分。国民政府此种让步不能不算极顶了，但英国代表仍旧拒绝了。英国方面答应的就是“以实业借款，贷予中国，以为开辟黄埔港口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条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办法，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如中国不欲经营上项实业，则同样的实业的企业，如建筑铁路于别司湾或汕头，均无不可云云”，对此，中国代表声明，亦须请示政府。

二十三日为中英谈判第五次会议，除中国方面提出关于组织公正考察法庭办法及英国方面提出借款办法外，双方代表议决中英谈判暂时延会，以便双方将各对方提议请示政府。

中英谈判既已延会了，可以说是告了一个段落；我们现在看一看到底得了些什么结果？除掉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正确在本国及世界各国的民众中间发生了很好影响以外，这次谈判更没有其他好的具体结果。英国方面对于中国代表提出的条件，几乎完全拒绝了，只对于设立审查委员会未加拒绝，允请示伦敦政府后再议。因为英国代表对于组织委员会审查沙基惨案是无法拒绝的，因为如对于此事拒绝不啻承认自己有过不敢受审查。亦就是这组织审查委员会的提议尚把此次谈判联系着，未使破裂。英国既不愿接受我国何等条件，就是说他不承认对其屠杀中国人民之行为负责；但是他因为自被杯葛以来所受损失不堪，故愿借一千万元与国民政府建筑黄埔港口。没有比帝国主义最会打算盘了；英国非但想把这一千万元来解决杯葛，还想在这一千万元的借款上希图获得许多利益。英国最怕黄埔能筑成头等港，这样海洋大船就可直抵黄埔，毋庸经过香港，香港就要立刻冷落起来；因此英国想管理黄埔港事，想把一千万元的借款在英国管理之下建筑一极小的四等港（筑一头等港要四千万元），只容得三千吨以下的船只，这样大船只仍须去香港，于是与香港全无妨害。借款的条件尚有二：一、如广九路借款条件一样，黄埔港的总会计与总工程师须用英人。如果有这样条件的借款可以答应，不是我们要赔了夫人又折兵吗？这即是我们一年奋斗全无结果，还要断送黄埔港口与英国做租界。二、同时粤汉广九路要接轨。粤汉广九接轨是香港所多年想望的而是广州商人素来所激烈反对的，因为北来货可直往九龙香港不在广州停留；现在英国想借此借款而达其多年想望未得的目的。如果两路接轨同时黄埔港又是四等小港，货物好一直运九龙而不往黄埔，那时我们为

了黄埔筑港闹了震天响，到底不过得了一个死港。这种借款办法，虽然政府代表允请示政府，想政府决不会答应的，亦不过应付应付而已。这是我们从这次谈判现在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应当怎样办？这谈判还继续着并在延会中，正等候我们的回答，两方代表还要至少有一次的接头。我们的回答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有三条出路：第一条出路，就是我们无条件屈服，对英杯葛无条件取消；第二条出路，就是我们接受英国黄埔借款，我们非特屈服了并且将黄埔送给英国做租界；第三条出路，就是既然我们不愿屈服，使我们白白地奋斗了一年，更不愿断送黄埔予英国，那末，我们只有继续奋斗，不达目的不止。这三条出路之中我们必须要采取一条，现在已经是我们要果断地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无论是政府，党，社团，及人民都应该公开的回答这问题了。如果我们不甘做亡国奴，如果我们认为沙基惨案的仇非报不可，我们决定要奋斗下去，那末，我们就不能象现在一样，有的对省港罢工是漠不关心，有的是有意无意地实行破坏，有的是心上反对而不愿说，有的愿帮助而不积极，这样的状况是不能持久的，这是不生不死的状态，可怜的罢工工人尤其是罢工纠察队单独奋斗，还要受各面的攻击，如何可以希望这支孤军能胜利呢？同志们！同胞们！我们到底决定继续加紧奋斗？还是甘心屈服？如果我们决定加紧奋斗，我们胜利的机会现在更大了。因为吴佩孚的倒已经是定了的，武汉不日克复，国民政府的势力一天推广一天，如果英国顽强，我们可以将对英国的杯葛更加紧并且传播到国民政府所有的疆土去，使英货在中国的市场日益缩小，或者我们还可以赶速自己筹资四千万元，不足时甚至可借他国无条件的借款，来建筑黄埔港口使香港完全成为废物。同

志们！同胞们！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要有决心！我们要继续奋斗下去！

原载《人民周刊》第17期
署名：大雷

独秀的意见是对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

革命党对于自己是要忠实的，有一点对自己欺骗就是自己上当。革命党对于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及对于自己所进行的行动都要有一个真确的认识，如果是自欺欺人，必致于革命利益有绝大损害。假使我们对于这一个前题认识了，那末我们对于向导一百六十一期上独秀同志“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非特不会因误会而责备独秀同志，并应称赞独秀同志能首先提醒革命同志以防止其走入错路。

独秀同志这篇论文中有两点：一，指出对于这次北伐的意义应有真确的认识；二，指出国民政府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

这次北伐是为抵御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之防御战争。这次北伐是这样的意义，我猜想国民政府的领袖都是承认的，只有轻浮之辈看得革命事业太容易，以为这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完成国民革命了。如果这样容易，那末中山先生为什么要奋斗了四十年还没有成功，还要有遗嘱叫我们仍须努力呢？这就证明完成国民革命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倒军阀决不是完全靠武力所能打倒的，一定要有人民的势力起来代军阀执政，然后才能保障军阀不再起来。至于打倒帝国主义就更是一件难事了，更非

全国人民一致合力不可。当这次北伐时，非但是全国人民的势力还没有准备充分，就是国民政府主干军队的力量亦还没有充实，以之倒吴就够，但是以之统一中国就不够。在国民政府进行倒吴时有许多复杂的军队参加倒吴的联合战线，所以倒吴后的胜利结果亦不能纯粹为国民政府所独享了。不过广东革命基础确可免去反动军阀首领吴佩孚之扰害了。这都是些事实，明眼的人都可看见而应承认的。如果有否认这些实情而以为北伐就是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夸大之讥固然不免，而因此种错误的认识而发生之错误政策尤为有害于革命前途。

至于独秀同志所说北伐时间中民众利益必须顾及，尤为个个革命党人所应注意的。北伐的目的在保卫人民利益，所以在北伐期间决计不可疏忽人民利益。东江方面公债票被土豪劣绅用以欺压农民而政府未及注意，以致农民怨及政府；广宁郁南等处农民受土匪之屠戮，虽屡次呈请政府援救，政府方面未能即命军队切实援救；中山县防军有摧残农会之事；各地农会受县长民团土匪地主摧残之事不胜枚举，虽然每天报纸都有登载但是少蒙政府之注意。这些都是事实，不可否认的，政府虽然对于农民的政策未有明令更变，但是实际上农民可以有政府更变政策的感觉。觉得以前国民政府总是帮助农民不准县长地主劣绅民团横行的，现在居然任其摧残农民了；广宁农民以前两次受匪灾都蒙政府立刻派得力军队前往援救，但是现在请求了一两个月还没有见援军；革命军以前总是帮助农会的，现在却不然了。农民对于国民政府有这种怀疑是很不好的。农民可以说是国民政府的基础。独秀同志对政府提出忠告，政府应除去使农民怀疑的原因，政府不可因北伐而忽略人民的利益，这种忠告虽然逆耳，

但是我想个个诚实的革命同志是应当承受这样的忠告的，因为这种忠告是为我们好的，不是为我们坏的。只有陈炯明逆党他们欢迎我们做错事，甚至有意促成这种错事，想在民众中种下怨恨政府的种子使他们有机可逞。革命的同志们！不要听了独秀同志的忠告而动气！非但不应动气，更应反省一下我们的错误而设法更正之。

原载《人民周刊》第 18 期
署名：大

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

蒋介石同志六月二十八日在黄埔军校对学生之训辞中有讲及我在本刊十四期上"要不要国民党"一文，并且介石同志加之以"使两党生起恶感"的罪名。因为介石同志是现在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的话说出来就有影响的，所以对于介石同志对我那篇文章意思的误会处，我如果不辩正，我那篇文章本来没有那种使两党起恶感的影响，现在反要有这种影响了。所以我不得不将我的意见声明如下：

最先我要声明的就是：我做那篇文章的动机决没有要"使两党生起恶感来，"我做那篇文章的动机在那篇文章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决不能看着国民党被人毁坏而一方面仍旧高喊国民党万岁"。我个人感觉到国民党是经过一个危机，我知道国民党内许多纯粹党员，非跨党党员同志亦有同样的感觉，并且我想介石同志格外明了党内的情况。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指出这种危机使革命同志考虑一下并使他们起来真正拥护国民党；不论我是

---

*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尚未充分暴露，故文中对蒋介石还称"同志"。——编者

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或是一个跨党党员,或是一个单纯的共产党党员，我觉得我都有这一个责任。我做这篇文章的动机既然是如此，那末，是否我的文章的内容有使两党生起恶感呢?

介石同志说:"至于说到共产党完全脱离了国民党之后，国民党就不能革命,不能存在! 这些话! 太雷是不能讲的,不应该讲的! 他简直看得国民党没有一个党员了!"我读了介石同志这番话后,把本刊十四期上那篇文章重新读了两遍,我始终找不出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文章是写在纸上的,所以还可以看的。我想我决不会这样蠢，说这样机械式的话。无论那个都承认国民党里面除掉共产分子之外还有真正信仰孙文主义的左派分子，他们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台柱。但是这左派在党内的势力现时还没有完全形成使其能绝对指挥党的一切行动。(左派同志们! 恕我冒昧!)所以共产分子在国民党内与左派的结合，使革命政策能有坚强拥护,使左派势力日益发展,近年来国民党内左派势力之发展不能不说共产分子与有力焉。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我说这话，共产分子为国民党做苦力，只要是为国民革命有利益的,总是应当的,不用夸功,亦不用埋怨;不过这事实是要大家明白的，因为这与国民革命是有重大关系的。同志们如果承认这事实，承认共产分子在国民党是帮助左派使其发展使其领导国民党,那末,我们就可知道攻击共产分子的问题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是减少国民党内左派势力的问题,是国民党革命政策的问题。我们固然知道国民党内有许多革命分子他们亦有对党内的共产分子怀疑，但是这种怀疑都是可以用理解或办法，最极顶有五月十五日的党务整理案总可使之消灭。个个明

眼的人都应承认现在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在党中确有一派人自始至终是反对共产分子，无论那种解释，甚至中山先生亲自对他们解释都无用，无论那种办法，甚至五月十五的议决都不能满足他们，他们一定要共产分子出党。他们并不是真正与共产分子有什么仇雠，不过他们是要减弱党内左派的势力。所以他们在共产分子离党以后还要进行攻击左派分子——继续总理掌持革命政策的分子——直到这左派分子倒后，革命政策放弃后，他们自己在党内当权后，然后他们才停止他们的攻击。因此攻击共产分子对于他们不过是他们这种毁党的企图之第一步。虽然介石同志等具有很多的苦衷，想种种方法防止他们的企图，他们仍旧是进行他们的把戏。只有采坚决的政策，永远断绝他们这种企图的办法，才能救济这个危机呵！我在"要不要国民党"一文上所说的就是这一番意思，我决没有说过：共产分子离了国民党，国民党就不能革命，这样糊涂的话。共产分子问题是政策问题，不是组织问题，不是一个党员人数的问题而是左派或右派在党内掌权的问题。这是我做那篇文章的观点。对于我这观点批评对与不对是可以的，如果介石同志加我以轻侮国民党的罪名我是绝对不敢承受的。

介石同志又说："并且太雷那篇'要不要国民党'的中间，说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那末我前星期所讲的话——虽然不是完全要求本校C.P.同志脱离共产党，却是要C.P.同志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如同太雷这样说，岂不变了我这番话，这是排斥C.P.同志吗？"就是：如果我真是说了"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我自己亦要骂"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非但我没有这样说，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国民党党员

对共产分子的态度，各以其所代表阶级利益的不同而差别。自从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内即有一部分反对的，一部分赞成的，又一部分取折衷的意见。笼统地说国民党排斥共产分子，不但是不该而且是昧于事实。至于介石同志把认为是我说的话牵连到他在黄埔劝学生脱离共产党的演说，那格外使我承当不起破坏介石同志团结黄埔计划的大罪名。我做文章时实在没有知道介石同志有要C.P.退出共产党的建议，因为我的文章做在先，本刊十四期出版在先。即使介石同志的提议是在我文章之先，我那篇文章亦决没有涉及这提议。介石同志不是排斥C.P.的，大家都是知道的。如介石同志公开声明“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一个例证。介石同志对已退出国民党的共产分子，仍旧信任他们做他的学生，这又是一个例证。

最后应当附带声明的，人民周刊完全是少数共产党员所创办的刊物，此刊物的职志已在本刊第一期上发刊辞中已说得明明白白，他是为国民革命利益的报纸。人民周刊从第一期至这期止，没有不是为民众说话，为革命说话，及对于与革命利益或民众利益有妨害的加以批评。在革命范围以内的批评与讨论，实在是革命成功的要素，因为革命的成功是过去革命运动错误中得来之教训之累积，而只有批评是能使我们知道错误，并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如果我们不能知道革命运动的错误而改正，我们就只会失败了重来过，又失败了又重来过，革命的进行变了“打转转”而其成功仍是遥遥无期。批评不是说一定是对的，但是有了批评就不妨使我们重新审查一下，我们过去与现在的行为与政策，这与革命前途是有益而无害的事。如果一说话就加

以挑拨感情之罪，那末只有大家不说话才是对的。吾恐此非正当之道也！

原载《人民周刊》第18期
署名：大雷

廖仲恺——国民党的左派模范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国民党左派，这几个字都是听熟了的了，左派的存在亦是许多人所承认了的，更有很多青年党员都自愿为左派；但是到底什么是左派？单是说我是孙文主义的信徒，我是最革命的，这还不够。要知道什么是左派，最好是看一看廖仲恺先生是怎样的。因为廖先生确实可以被推为中山先生信徒中第一位模范的左派。他应该是国民党一切左派的模范。在今天纪念模范的左派——廖先生的日子，特别自愿为左派的同志们应该继续审定一下，使自己知道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正左派，怎么才可以发展真正左派的势力。这些问题都是当今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问题。

中山先生给国民党以革命的主义与策略；廖先生更把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加以真确的解释，使右派无从曲解及阉割革命策略之精神。廖先生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要算孙文主义的必要补充，此文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有极大的关系，应为左派经典之一。有革命的主义而无革命的策略以实现这主义，那末这主义就会变成空洞的理想；所以革命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而一切曲解亦就从革命策略上开始了。如中山先生说：“要完成国民革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于是右派就会解释成：“除掉

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外一切人民都可联合起来担任国民革命，并且认有主张分别革命派的为有意捣乱”，这种曲解就完全违背革命的利益。右派不承认人民有阶级之分，更不承认各阶级因利益的不同，因此对革命的态度各异。他们认为地主，买办阶级，及代表地主买办利益的官僚政客都是革命分子，他们更进而反对工农，因为工农反对地主与资本家，他们认为这是破裂全民革命。右派这种主张的结果就是要革命势力认贼作父，在革命的营垒里面混杂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奸细，在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军阀斗争中，反革命势力做内应。廖先生有见于此，所以做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在这篇文章中就肯定“国内的反动势力与国外的压迫与侵略的力量，因利害的一致，常常互相勾结，所以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党中必然发生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又说：“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廖先生既然确定了我们国内有反革命势力的存在与有打倒之必要，又指示我们哪一种人是反革命派，“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仰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廖先生更警告我们：“我们要十分明了，才不陷入他们的圈套；现在反革命派已经互相勾结，我们若果真正想民族革命成功，我们革命派要赶快团结起来了！”

廖先生这样理论并不是单单由脑筋中想出来，实在是从他几十年革命的经验中得到的必然结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革命党”一部分人卖身与袁世凯。辛亥革命后在革命党继续与军阀斗争之中多少先在革命党方面的人们跑到了军阀方面去了。当中山先生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陈炯明反叛了，于是与军阀

的战争又失败了。商团勾结香港与陈林叛变，更证明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刘杨叛变又有反革命的党员帮助他们。尚有多少事实证明给廖先生知道，我们内部有反革命势力的存在而且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个个国民党都要问为什么我们过去都失败了，白牺牲了，白奋斗了？廖先生回答道：就是因为我们不认清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我们认贼作父以致我们被反革命派卖了。所以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分别革命与反革命，认清友与敌，然后团结革命派，以廓清内部反革命派，这样方可使革命的大本营巩固，方可与帝国主义与军阀决战。

廖先生不仅是给我们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分别的认识，他并且实际做团结革命派与打倒反革命派的工夫。那一个都知道国民党的改组，廖先生是最出力的。他竭力赞助中山先生主张要共产分子及其他青年分子加入国民党，增添些新血轮使之有重新生活的可能。既然吸收增长生机的新血轮，当然就要排泄无用而有害的旧血轮。所以汪精卫先生说：改组的动机是要团结真正革命党员来扫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党员。廖先生自改组后在每一次反革命党员与革命党员冲突时，他总是站在革命党员方面以反对反革命党员。他骂反革命的老党员道："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占我国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似的效力"。廖先生与青年革命分子及共产分子很亲爱的关系，为他对于有革命勇气的青年分子极端的信任，凡与廖先生接近过的青年分子都感受他的革命的热忱，都诚心接受他的指示。因为廖先生的领导与爱护，国民党的左派才开始有一萌芽，如果没有廖先生，恐怕这左

派的萌芽早就被狂风暴雨所摧折了。廖先生为了要保护这萌芽的生长，他决心以全力与党内右派奋斗，他后来成了右派众矢之的，他至终因此被右派所伤害。不过因廖先生的栽培而生长的左派已略成形，所以在廖先生死后仍努力增长而有现在党与广东的状况。所以个个左派应当拥护与廖先生所扶植的革命分子的团结，竭力防止对这革命团结的破坏。这样左派才能发展，才能指挥国民党与领导中国国民运动。

我们有了革命派的团结了，这革命团结的基础在那里呢？右派先生说革命运动的基础是在有金钱的，有武器的，有智识的身上。但是廖先生说：这不对，有金钱的，有武器的，有智识的，有些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有些是不愿意革命的，革命的基础应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身上，因为非特占人口之大多数并且是最被压迫的，他们只有革命才有出路。这不是廖先生的瘾想，亦是廖先生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朝代的推翻都是农民起来干的，近百年中太平天国的运动与义和团的运动所以能这样浩大就是因为这两次运动都是农民运动。从世界各国过去的革命历史上亦看得出：如果农民不起来革命，一切的革命运动都是上层的而没有成效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如果农民得不到解放，中国不能建造一个近代的国家，就是说：中国不能够发展工业。因为要发展工业，必须先有市场能销售工业出产品，中国新兴的工业生产品决不能到外国市场去竞争，所以中国的工业要靠国内市场。如果象现在中国人口大多数之农民一样的贫苦，不论是佃农还是自耕农都要被剥削至少有百分之五十，试问哪里还有钱来买东西呢？如果能使农民得到了解放，使他现所被剥削之百分之五

十归还他自己，那时他才能拿这百分之五十来购备家具，衣服，农具等等，这样中国的工业就可得到很大的市场销售其货品，亦就是说可以得到绝大的发展机会。革命后的政治一定有一种新的社会基础，这基础应是近代的产业关系，而不能是现在中国的封建的土地关系，就是这基础要建筑在自由的农民身上，所以为要国民革命成功就要解放农民，而农民的解放要农民自己起来的，如国民党能以解放农民为号召，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就会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如农民不了解与不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廖先生不但认农民是国民革命中之重要份子，并认工人阶级为国民革命运动中之急先锋。这亦是因为近一二十年来工人在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运动中的急进地位使廖先生得此结论，廖先生亲身经历过一九二二年海员大罢工，五卅运动后的省港大罢工。廖先生是第一个最拥护国民党第一次大会的工农政策的人，说到国民党工农政策，就使人联想到廖先生。所以个个左派应当认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份子是农工，中国国民革命要成功一定是一个农民革命，认识了这个，左派才有正确的基础，左派才能有正确的策略，国民革命才能上正轨。

廖先生非但认识农工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他并且自己实际领导广东的农工运动，并鼓吹青年要做工农运动。廖先生身兼工农部长这事实最可表示他的志愿是在做工农运动。他做部长不是每日上衙门的做法或不出大门研究式的做法，他亲身到工农群众中去，替他们讲替他们说。廖先生与做工农运动的青年党员有密切的关系，一切事情都要问他，他都能够想方法帮助

工农。廖先生不是象有一班党员一样，嘴里喊工农运动喊得响，但是一到亲自经历工农运动时立刻就起反感，有的竟毁谤起工农运动来。他们看见工人罢工农民抗租等就不禁摇头，连声说：这算什么？这简直是无知识的蠢动。不是说：工农运动中有土匪、就是说受人利用，他们非但不敢去站在工农运动的前面去领导工农运动，其中就是有错误的时候，他们亦不改正，反而站在工农运动以外任意批评而给反革命派以攻击农工运动的口实。左派模范的廖先生是不是这样？决不是这样，确确相反。他非但不怕工人罢工，他并且帮助他们罢工，甚而至于在打商团的时间武装工人组织工团军。因为他相信工人是我们革命的朋友，工人势力的发展没有使我们可怕惧的，他更知道你要工人参加革命听你的指挥，你一定要帮助工人经济改善的斗争，他决不作要工人饿了肚子革命的妄想。廖先生对于农民斗争更是竭力帮忙。在杨刘反动时代，更在陈林反攻的时间，廖先生想尽了方法去帮助广宁农民与地主武装斗争，廖先生派了大元帅卫士队去帮助广宁农民。对于中山等处的农民亦是一样的帮助。他当然知道很清楚农民运动中有多少错误，但是这些与农民运动的根本问题有什么妨害呢？小孩刚学走路的时候，不免要东歪西斜但是慢慢学学他就会走得正行得快的。我们又何必因为小孩不会走路就把他打死呢？农民到处帮助革命政府的，这是不可否认，那末我们又何必怕农民运动呢？廖先生并不是只帮助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他确实有指挥工农运动，工人农民很感受廖先生的诚意与帮助，他们愿意接受他的指示。左派的同志们！你要工农听你的话，你一定要先得到工农对你的信仰。廖先生死后广东各县农民开广大群众的追悼会，宣誓要代廖先生报仇，第

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替廖先生树碑以作永远之纪念——这都证明廖先生是如何被工农群众爱戴呵！所以个个左派应当实际参加或帮助工农运动，并要积极领导这运动而不要消极批评这运动，这样才能使左派积极参加群众工作，才能使左派得到群众的信仰而领导群众。

廖先生确实是左派的模范！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左派，你一定依照廖先生的言行，除掉你信仰孙文主义及主张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外，你必定要分辨反革命与革命派，一定要确实团结革命派以打倒反革命派，一定把这革命派的团结建筑于群众而特别是工农群众之上，一定要实际参加与帮助工农及一般群众运动。

左派的同志们！左派的理论与革命策略的大纲都已经有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第一次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实际革命策略的详细说明可以看廖先生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及汪先生的“廖仲恺先生的功业和思想”。用不着再造什么左派理论。革命不是可以在研究室里干的，一定要到群众中做实际的工作；左派既然有了理论与策略，就应把他们应用到实际的群众工作上去。左派要学廖先生少道理想的理论，多做群众的工作！

原载《人民周刊》第19期
署名：大雷

我们怎样对花县农民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农民协会现在已成为众矢之的了；因为农民协会妨碍贪官污吏刮地皮，摇动土豪劣绅在乡村间的权势，反对民团征收税捐，真心剿灭土匪，一意要消灭逆党。现在这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向农会进攻了，所以广东到处都发生了攻打农会的事。花县最近又发生了民团土匪联合攻打农会之事。八月二十七日起，花县民团团长江侠庵等，率领民团土匪六百余人，连日攻陷十余乡，屠杀焚烧，奸淫掳掠，县党部及县农民协会职员全数失踪，生死未卜。花县难民已来省请求政府派军前往花县救援。南海番禺农民自卫军因政府未能即派军队，故愿奋勇向前，但未蒙总司令部照准，总部并声明政府须审慎从事，惟允派军队赴花县弹压。江侠庵在陈炯明时为花县县长，陈逆去后退而为地方绅士兼民团局长，专事与农会寻衅，其反动逆迹早已彰然，不用丝毫怀疑。况此次江等有意寻衅，趁反动势力到处向农会进攻时，希图一击扫灭花县农会，并祸及国民党党部，罪恶昭著，不容诡辩。政府如认农民有保护之必要，农会有成立之权利，则决不可站在第三者地位，将土匪与良民同样看待；况土匪民团现取攻势农民已受创甚重，政府如不即刻惩办江侠庵等，任其涂毒农民，不知何以对花县农民？

原载《人民周刊》第20、21期合刊
署名：大

武汉攻下以后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武汉屡传已由北伐军占领，这个消息传来后没有一个人不是兴高彩烈欢呼动天，非但革命党人是欢喜，并且反动派是格外欢喜。

革命党人为什么欢喜？所欢喜的是什么？是因为自清朝倒后统治中国之袁世凯一系军阀——北洋军阀将因此一蹶不振，吴佩孚将为卖国北洋军阀最末了的领袖，从此将无继之而起统治中国之北洋军阀领袖。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坚强之堡垒已随武汉打破而打破了。革命党人还有更欢喜的，就是反动军阀势力倒后，在各省党的工作及民众运动有猛烈发展的机会。例如在湖南，党部一方面自身发展，一方面工作的范围扩大，而农民运动及其他一切民众运动简直是一日千里的发展。因此武汉克复革命党人不得不鼓掌欢呼。

但是反动派又为什么高兴呢？他们高兴的是什么？因为做官发财的机会又来了。辛亥革命后不是有多少人升了官发了财么？以前在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那里跑不通的，或在广东插足不进的，现在因武汉既下，南方政府需人孔急，湖北湖南等省旧官既去，正待新官接印，党势浩大，办党亦不算是一碗清闲饭，这一班官僚政客不由得弹冠相庆，高呼革命万岁！国民党万岁！

反动派见武汉克复这样高兴以为有机可逞，这是革命党人应该注意的一件最要紧的事。现在反动派做的高兴的梦是否会实现，全靠领导国民党的领袖之正确政策及党员对革命政策之拥护与努力。目前有几种危险或问题需要立即征服与解决的。

一，革命主义与政策的危险。以前唾骂与恐惧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人们，现在都是三句话不离“信奉三民主义”与“服从党义。”据说赵恒惕孙传芳的桌上还放着三民主义一书，孙传芳并对人说要用三民主义在军队里做课本呢，孙赵已经是穿西洋景了，至于现时正投效国民政府的刘湘袁祖铭等的电文都是满纸主义与党，更有那班善于投机的政客们还用说么，他们把主义与党说得天花乱地，真是肉麻到使人作三日呕。但是一看他们所做的事，件件都是恰恰与国民党主义与党相违反的。自北伐军节节朝北发展时，党外反革命分子如潮的涌入党内，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竭力引同类入党以扩充势力，这不是党内增多了不良份子的数量问题而是国民党革命的主义与政策发生危险的问题。小瓶墨水受多量水的冲化，深蓝一定要变为极淡的颜色。如果国民党要能维持他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主义与拥护民众的政策，国民党的领袖一定要百折不屈服的精神来反对反革命势力的软化政策以保存革命主义与政策，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虽然有许多右派劝他改变主义，决未被他们软化，仍坚持他的革命主义，这就是中山先生之所以为中山先生也，并且国民党的左派群众应起来与右派努力奋斗及拥护革命主义与政策。对于土地及地位都可让步，但是对于革命主义与政策是一毫丝不能让步的。不然北伐就等于替人出力了。

二，国民党的危险。辛亥革命以前的同盟会是一个秘密而

极严格的革命团体，只有预备牺牲的人们才能参加，所以他成为一有力量而革命的团体。但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一部分会员受权利的引诱与党外政客的投机，同盟会就改组成了国民党，由深蓝的墨水就变成了全无颜色的一大桶清水了。这是我们前车之鉴呵。国民党在广东以外各省的党部以前都是在北洋军阀高压之下的，因此只有愿牺牲的才去做党的活动，右派虽然亦有受当地军阀特别优待而能做反对左派的活动的，但是这到底于右派没有积极方面的利益，因此各省党部总算能保存其革命性。现在如果国民党不稍严格接收党员，就恐怕国民党要遭民国元二年革命党所遭的命运，这是何等危险的事！以前党内被开除的，或失势的右派分子现在很高兴的要进来参预党务了，这不是他们已经悔悟而屈服于党，确是有意的来屈服党的。如果当他们是老朋友来欢迎，那就不知道党要闹成一个什么样子。虽然他是我个人的老友但是他已成为革命的老仇敌了，要爱惜革命，就不能爱惜老友，两者绝对不能并存。这是国民党的领袖与左派党员群众所应注意的又一事。

三，与民众关系的危险。本来明白民众重要的军人与党员就很少，何况现在大军已克复武汉更有进而统一中国之势，于是一般党员与军人轻视民众之倾向不免因此更甚。工农运动几乎成为眼中之钉，恨不能立即拔去，以前不敢说反对的，现在已有公然仇视工农运动之表示。民众运动在这班军人与党员的眼中之价值本来不过是开欢迎会捧场，电文里可用一用“箪食壶浆”字样而已。至于民众真正的运动他们非特不帮助并且还要加以嫉视。“第一步要做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人民之武力，”这句话在他们看起来不是“先使武力与人民互相帮助，再使

武力完全受人民的指挥”，而是“人民必须帮助武力然后武力才能完成革命，再使人民屈服于武力然后武力能保育民众使之进于极乐之乡”。以前尚须要民众的帮助，所以对民众运动还不会有厌恶的感觉，到如今政权军力日益膨胀，非但不觉得有民众帮助的需要，并且民众运动已成为一种窒碍而对民众厌恶之心生。这就是现在国民政府与民众关系危险之所在。革命丢开民众，是不能成功的；国民党的领袖们要打消军人与党员“打仗就是革命”的观念，必要使他们明白：民众运动是革命运动的本身，武力不过是民众运动的一小部分，如果武力不建筑在民众的基础上，这不是革命的武力。那么，这武力打仗的结果决不会是民众的与革命的结果。如果革命军人与党员明白了这个而能注意民众运动，那么，与民众的关系将一天深似一天，克复武汉的胜利将才是民众的胜利。民众虽然一般讲起来是无智识的，但是他们的感觉非常之灵敏的，不管你嘴里说得如何好，只要你心里存了厌恶民众之意他们就立刻感觉到的，有时甚至你自己还没有知道你心存什么意念，民众已经了解你的心了——这亦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这是一件可喜的神秘的事！如果那位不相信，请细致注意一下，你就可以发现这神秘的。执政者不能不时刻惊心吊胆呵！“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应当铭诸座右！反革命派正在竭力分隔政府与民众，国民党的领袖与党员群众应严防此种阴谋，要防止此种阴谋，最好政府能处罚几个这样的官吏与军人，党部能开除几个反动党员，这样非特反革命派有所顾忌而人民对政府与党的信心将增厚。武汉既下，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更广，人民对于政府的要求当然亦随之更形增加，以前所允许人民的尚没有都做到，武汉克复后政府将给什么与人民？有否实现民众要求的

政纲？粤桂湘鄂及全国人民正仰望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怎样回答他们？

四，革命基础的危险。国民政府虽然现在已有湘桂鄂各省，但是广东还是其唯一基础，在军事民众运动及财政等等关系上都还要以广东做基础。但是这基础自从北伐军开动以来，危险更为厉害。反革命派如陈炯明魏邦平等以为广东防军薄弱有机可逞，于是积极进行以香港为大本营，召集广东匪首会议，向内地私运军械。广东地方官吏本可得农民的帮助以扑灭土匪的蠢动，但是他们舍此不图，反与土豪劣绅勾结，纠合土匪及土豪劣绅，党领导之民团向农民进攻，于是匪势更炽。土豪劣绅与陈炯明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仇恨国民政府，因为国民政府扶植农民运动及企图建设廉洁政府，他们恨农民协会，因为农民协会反抗他们的压迫与剥削。地方官吏又那个不是要靠土豪劣绅刮地皮的？地方官吏现在正组织地方军队名为剿匪实则剿农。于是地方官吏，土豪劣绅，民团，逆党，土匪就结成了攻打革命基础的联合战线。因为这线的一端是系在英港帝国主义兵舰与孙传芳在闽边的两三万军队，而他一端直串入我们心腑，因此这联合战线对于广东实是目前的最大的危险。对于这反革命的联合进攻不是怕与退让可以免去的，这严重的时局要求当局者注意反动派的活动，拿稳革命的政策，赶紧站在民众方面结立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民众及其他一切革命势力之联合战线，以打破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当局者如果坐观成败，对农民与土匪劣绅之斗争取第三者之地位，非但农民因抵敌这反革命联合进攻而受损失，并且反革命势力将无阻碍的发展以酿成破坏革命基础之大举。农民在现在的斗争中是革命的先锋。农民运动虽

然有些不合胃口但是到底是革命的势力；贪官污吏土豪民团土匪等虽然可以一时代出一口鸟气，但是到底他们是反革命势力。现在到底还是怕反革命势力呢？还是怕革命势力呢？如果一方面既要保存革命基础，他方面又要让反革命势力在革命基础上猖獗，三岁小孩都能一见而知其不可，但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对于此问题非常踌躇！同志们！不是踌躇的时候了，严重的时局要求有一个果断的决定：要维持革命基础就要站在人民方面，现在就要帮助农民与反革命势力斗争。

以上所述之四个大问题，需要得到一个为革命利益的正确的解决。只有以坚定的革命政策才能得到这样的解决。这是现在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的责任。民众自己的责任呢？民众应该利用反动军阀崩溃的时机，尽量组织自己的势力以保证将来不再受以前所受的压迫与痛苦。广东的民众不管有无帮助是要集合势力以与反革命的进攻相周旋，因为所谓革命基础，民众的基础不是那个人的，所以民众对于革命基础是格外要宝贵些，如广东失陷于反革命派，广东民众又要受两三年前军阀盘踞广东时之痛苦，所以民众只有奋斗的一条路！民众势力团结起来与反革命势力奋斗呵！

武汉攻下后革命党人的责任更大，工作更难，所以快乐之下还要深思远虑，分外坚定，加倍奋斗，不若投机的反动派可以洋洋得意，气盖一世！

原载《人民周刊》第20、21期合刊
署名：大雷

要求实行兑现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

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农民已有两次宣言，允许农民种种权利与利益。惜此等允许犹多未能实现。今国民政府又发表第三次宣言，明白表示，政府自始至终实行已往之宣言，尽力保护农民之利益，协助其组织之发展。中央党部对去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请愿书后，又议决以下各条：

（一）由国民政府发表布告，剀切说明本党及政府提倡农民运动，奖励农民协会之旨；（二）撤换违反政府扶助农民宗旨之县知事数人，应由国民政府令省政府分别办理；（三）军队于地方不相宜者，可更调，如有奸淫抢掠等事，应查办，由总司令部办理；（四）土豪劣绅，指名查缉，由省党部调查，交省政府执行；（五）各县农民协会，应由中央党部派得力党员，前往指导；（六）军队在地方剿匪，应据党部农民协会，及地方官确实报告，由总司令部严定军令办理；（七）解决民团与农团冲突问题，由总司令部，团务委员会，中央农民部，省农会，民政厅，农工厅，及各军政治部，组织委员会，筹商解决办法，由政治会议决定之；（八）中央党部，承认农民运动，因进行时间尚短，有多少缺点，故训令中央农民部，竭力改正此等缺点，但此等缺点，既为初期运动所不免者，则不能利用之以攻击农民运动之本身。

有这样的宣言，有这样的议决，总要算十分满意了，试问对于现在的国民政府还要希望什么？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实行这宣言与决议。一张不能兑现的银票不是等于一张花纸吗？尽管你有好的决议与宣言，如果不实行，对农民有什么用处呢，不是墨字白纸吗？广东农民现在所要求于政府的，就是对于这宣言与决议，实行兑现！

原载《人民周刊》第22期
署名：大

军队进剿花县土匪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

经花县难民，省农会，农民部的坚决请求后，总司令部已派第二十师第二营前往花县排解。所以不云剿办而云排解，是因为总司令部恐听了省农协会及党农民部一面之辞，致误剿良民的缘故。第二营二日即抵田螺湖，闻天和墟商民被民团抢掠即开赴天和墟，团匪将商民抢掠一空，当时捕团匪三人，人民见革命军到，燃炮欢迎，高呼革命军万岁。该营官兵见匪未散，即欲痛剿，为总司令部伍某制止，伍某并一面通函团匪暂避别处，以免被军队缴械。三日第二营欲开往平山墟，中途被团匪开枪迎击，重伤李班长及一兵士，并大呼“打倒革命军！”“孙文复生也要打”！军队已怒不可遏，但念此来是排解，故再请县长前去劝谕，该团匪更发枪射击，不准其入村，至此军队方下决心痛剿。经七八时战争始将洛场团匪千余人击退。四日伍某先到平山墟通知团匪暂避开，军队抵平山墟召集各团体会议决定将民团缴械，但总司令部代表伍某持异议。翌日伍某转到民团之答覆，只允缴械半数。同时伍某派其随员魏尧励（魏邦平之弟）与民团接洽，被民团轰击毙命。于是与民团妥协之希望断绝，然伍某更用总司令蒋中正命令限制军队剿匪，故战事尚在进行中，因匪事猖獗，已请添派军队前往痛剿。现在大家都可明白了省农会及党

农民部之报告决非一面之词，民团是与土匪有勾结，其目的不仅在残害农民，而观其对革命军之口吻与顽抗，可知其有捣乱后方及扑灭革命势力之用心。故愿当局不可听少数代表地主利益者一面之词，因此将团匪进攻农民之事以两姓械斗视之，政府取排解地位，盖现时地主劣绅民团土匪之旧势力较新起之乡村革命势力为大，再以逆党等外部之援助，如政府不加以援助则新起之农会必受摧残，如政府取第三者地位即无异于坐视反革命势力扑灭革命势力，革命政府当不能如是也。

原载《人民周刊》第22期
署名：大

打倒英国兵舰政策啊!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

英帝国主义九月四日之行动，正是“狗急跳墙”的表示呵！英帝国主义以为用这样武力的蛮干，可以威吓我们，岂不知正是自己示弱，自己丢脸而已。中国国民运动一天一天高涨，反英帝国主义的空气一天浓厚一天，于是英国在华的势力一天减弱一天。广东封锁香港排斥英货几一年半，英国只有望着香港荒凉，英货不能销售于南方中国。英国老练的政治家与外交家，纷纷争论，抑用兵舰政策，抑用柔软政策，可使广东屈服，其结果始终未有一定之政策。有几次英国当局，至少是香港当局，想用以前的老法子——兵舰政策，实行强迫广东政府与人民屈服。但是中国已非鸦片战争时的中国，英国亦非鸦片战争时的英国了，兵舰政策非特不能令国民革命的中国屈服，反更增加了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热度。英帝国主义应已得着了教训，但是帝国主义已是行将就木的东西，老昏聩了，不能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的聪明；于是又有九月四日英兵舰强占长堤码头之事。北伐军既已平定了湖南，又将克服湖北全省，革命政府的范围愈形扩大，英帝国主义那里能看了不发抖呢？他怕广东的排英运动又将扩大至长江流域，于是南部中国将不能再为其势力范围。武汉攻下即表示英帝国主义几年所豢养的走狗吴佩孚要寿终了。英帝国主义眼见得自己的走狗要死，自己要丧失在华的势力，心里一

急，不免铤而走险。长堤省港澳轮船码头固然占据了，但是英国的目的并没有能达到。本来是想兵舰近岸时，罢工纠察队因义愤必将有报复行动，当时掷一石即可使英兵舰有发枪之机会，重演沙基惨案，或将引起中英战事以达其干涉广东之野心。但是纠察队是有纪律有训练的战士，不受挑拨，况英国此种挑衅阴谋，早就知道，纠察队训练有素，故决不会上英国的当。现在占领了两个码头，下文为何呢？做不下去了！英国此次计划亦将照例的失败。警告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兵舰政策对于中国现在已不适用了。就是杨森——他是英国走狗吴佩孚的人，在最近英兵舰击沉其兵士船只，居然敢向英国兵舰开枪，毙英水兵七人，舰长一人，伤十三人。

但是我们对此凶暴无礼的九月四日的行为，又如何办呢？我们决不能任英兵舰如此猖獗。政府已向英国提出严重抗议。我们人民的态度如何呢？当然不用说要反对英帝国主义此种兵舰政策要严重抗议。这还不够，我们一定要给英国以更严重的处罚，对英杯葛应扩大到革命军所到的地方，广东对英杯葛应更严密加紧。英国帝国主义者以为解除对英杯葛，只需破坏纠察队，阻止其行使职权，他们认为中国人都是奴隶成性，对于沙基惨杀及五卅惨杀决无仇恨英帝国主义者之心。我们的同胞，应该表现你们不是奴隶，排英事决非少数纠察队之事。如果有自愿甘心做奴隶并愿赞助英国兵舰政策，压迫我民众，侮辱我国体者，我民众必将有以惩罚之。务使民众全体一致对英，打倒英国兵舰政策呵！

原载《人民周刊》第22期

署名：太雷

戴了千里镜的西永先生!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

自从独秀同志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发表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但是反对者除掉愤怒漫骂以外并没有能说出理由，或指出事实来反驳过。西永先生在黄埔潮第六期上的一篇大作仍旧是两句感情的偏见："如果上面（独秀）所讲的问题，都没有的，都不是事实；那末，我们尽可以拿我们的事实给陈独秀先生看，给民众看"。但是西永先生始终没有指出一件事给民众看，倒反轻轻接着就是一个武断的结论，他说："那末，独秀的理论失了事实的根据；即是失了民众的信仰；民众一定不相信独秀，而骂独秀：'坐在上海那里知道千里外之广东，又没有戴千里镜，不过是胡说罢了'"。独秀同志虽然在千里之外没有戴千里镜，他倒是看得广东件件事是清楚的，可惜西永先生对于手边的事实，大家知道的事实，竟完全没有看见，恐怕是戴了军用千里镜看远不看近罢!

原载《人民周刊》第22期
署名：木

英兵舰屠杀二千同胞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

外国公司的轮船在中国内河驶行，常恃强撞沉或挤破小船并不负赔偿之责，因此小船见外国商船驶近，无不以为大祸将临，呼号忙乱，惟恐逃避不及；此种情形在任何通商大埠沿河各大城市都能见及。太古公司之万同万县两轮近又在四川万县撞沉杨森满载兵士小船，因此被杨森扣留，但是英人恃强不愿受罚，于九月五日并派炮舰欲将该两船夺回，杨森军队亦是硬汉，居然开枪抵拒，当时击毙英司令一人少将一人及其余五人伤十三人。于是英炮舰两艘以六吋径之大炮，向无防御之万县城轰击一小时之久，全城焚烧，万县为四川首屈一指之县份，此次财产损失之大及人民死伤之多，可想而知，据英方自称：华人死伤者至少亦有二千人，以之比较英方之损失，大多矣。英国帝国主义对于此被屠杀之二千人轻轻说过，认此为万县人民应受之处罚。不仅此也，英国方面更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谓对外人之生命不能保护。英国反动报纸更以万县事为干涉中国之借口，谓中国扰乱万分，外人在华有生命危险之虞。中国同胞们！我们要记住：**这就叫做英国的炮舰政策呵！毁了你的城，杀了你几千人，还要叫你向他赔礼，还要借此实行加重你的压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暂时虽然没有武力能打倒英国的炮舰政策，

但是我们有经济绝交的武器，可叫英国的炮舰政策不敢再行施于中国。万县人民所受的痛苦就是我们所受的痛苦，九月四日广州英炮舰的行动，如果我们不早为之备，恐怕广州人民所受之屠杀将更甚于万县，所以对于英炮舰屠杀万县人民之事，广东及全国人民应提出严重抗议并实行排英。广东至今的排英运动是饥饿的罢工工人单独做的，各界人士只在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后一时参加，自后即抱消极的态度。同胞们！你消极，但是你们的敌人却在积极的待你呢！你不积极进行与他经济绝交，他倒要把大炮开足射击你呢！如果我们不想法与英国帝国主义奋斗，我们总有一日要与被害的万县人民一同做枉死城里的怨鬼的。

原载《人民周刊》第23期

署名：大

广东民政应根本改良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

广东革命政府成立了一年多，虽然在其他方面是有长足之进步，但是在民政方面，除掉二次东征后东江方面的行政及平定南路后南路的行政有一时的进步外，可说现在一无进步。其根本错误就是依照中国的旧行政制度，一点不改。旧行政制度的腐败的根基就在县长之腐败，而县长又是以地方上之绅士为基础。绅士是专以剥削农民及包办乡村政治；绅士就是一县的王公贵族，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农民市民的专制魔王，而县长之权力即建筑在绅士身上，县长要刮地皮一定要请教绅士，要维持他的县长位置一定要拍绅士的马屁，所以我们常见新县长一到任，第一件要事就是要去拜绅士。绅士剥削了农民市民再分润些与县长，或帮县长剥削人民，县长荷包袋满了再贡献一部分赃物与上司——这就是过去及现在建筑在绅士身上之旧行政制度。如果此种制度不打破，甚么训政，自治廉洁政府都说不上。而现在革命政府的民政机关可以说是完全代表绅士的利益。因此之故，政府一方面帮助地方革命势力发展，一方面县长与绅士勾结摧残革命势力，以致在广东有一种互相矛盾的现象。这种矛盾现象在广东都可以发现的。县长与党部的冲突即是这种矛盾现象的最好表示。除掉少数例外，党部与县长冲突原因，大概是党

部代表民众反对绅士的专横，而县长则帮助绅士，因此骂党部为干涉行政，或党部帮助民众力争生活改善而县长帮助绅士反对。现在县长与党部之争即旧势力与新势力之争，党部代表新势力而旧势力却是在党政府治下的民政厅卵翼之下，民政现在变为压迫革命的工具了。民政如根本不改造革命永无希望。县长一定要根本脱离绅士的影响而建筑在民众身上然后才能有廉洁的政府，才能实行训政与促进自治，才能使民众的势力发展起来。这就是广东民政上根本要改造之点。至于九月十五日民国日报载政治会议，有见于民政厅更调县长太多，自今年正月至现在更调有二百余县长之多，故议决通饬省政府审慎更换县长，使县长可安心从事于该县行政之发展与改良；这不过是治标之一端而非解决民政之根本政策。

原载《人民周刊》第 23 期
署名：春

党代表制复活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

党代表制曾经使党军所以成为党军；但是党代表制自从三月二十日后已早死亡，不过近日从报上看来党代表制又有复活之征兆。九月十五日国民新闻登载党代表任免条例草案，预备提中央党部审查。党代表制非特在俄国施行收效，即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已表示很显著之效果。如果要武力成为国民之武力，党代表制确是可以尽很大的力量。党代表可以使军队成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军队。但是要使党代表制能发生这样的效力，必须党自身确有权力，因此他所派往军队之党代表确能有党的力量赞助他，使他能行使职权。不然，党代表只是一种装饰品，党代表制不过可以多养几个人而已，党代表制已经死过一次了，如果真正要他复活，必须还给他灵魂，不然，就不能叫做复活，只是替他建立铜像，做公园的装饰，做后人的纪念而已。

原载《人民周刊》第 23 期
署名：雷

准备大规模之杯葛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九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陈友仁部长致函驻粤英总领事，函云："余昨日对君之言，今特致函覆实：广州政府已经设法俾于十月十日以前（料九月尾亦可办到）终止杯葛。中国正式当局将抽特别附加税，平常入口货抽百分之二·五，奢侈品则抽百分之五，另设一出口货特税。新加之附税，拟照现在税关所定之表计算，并设法使税关当局必须货主呈有缴交新税之单据，方将报关单等签发。再者上言之办法，已经与罢工委员会商妥云云。"

这封信就表示国民政府已决定自动解决杯葛了。我们对于这决定完全赞成，其理由如下：

（一）当广东单独与英国帝国主义奋斗时，省港罢工确是最好而唯一的武器；但是现在国民政府势力已推广到中国中部，并将及于全国。对英的斗争于是扩大了，因此对英斗争的形式亦须更变了。广东单独是不能把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的；要集合全国的力量，以省港罢工之精神，对英杯葛，方能达到此目的。要做到这样全国广大的对英杯葛运动，尚需相当时期的准备；故在这准备时期中，广东现时这种形式的杯葛运动应变更为广大的反英宣传运动，以待全国或国民政府下之各省准备好时，再重

新一致举行大规模对英杯葛运动。简单说，就是暂时停止广东单独对英战斗，而准备全国或至少国民政府下各省对英之战斗。

（二）省港罢工工人奋斗了十五个月，已给了英帝国主义一大打击，代五卅及沙基烈士复了仇，为中华民族争回了独立光荣，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肃清了广东的反动军阀，统一了广东，建立了革命政府，并使革命政府能进行北伐。我们还要希望罢工工人什么？他们已经对革命贡献了不少了，可以说已经尽了他们历史上的使命与责任了。他们及他们的家族已受尽了饥寒。经过了这样长期的孤军奋斗的军队，应该调回来休养一下，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有衣有食，等将来大举进攻时，他们仍可是一支有经验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对英杯葛运动，以前一直是由穷苦的罢工工人所担当的，现在这副担子应该由中国一般社会来担负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由省港罢工工人单独的奋斗，转变到全社会民众共同的奋斗。

（三）革命的势力现在已渐发展到全国，英帝国主义非常恐慌，于是决定以兵舰政策预备实行干涉，其主要目的就在破坏我们革命基础之广东，而其唯一借口就是纠察队之"不法"行为。英政府要杯葛解决但同时又不愿杯葛解决，因为他要留了这罢工可由他自己以兵舰来解决，如此可实现其破坏革命基础及扑灭全国国民革命势力发展之阴谋。国民政府骤然决定自动解决杯葛，使英政府措手不及受了一打击。九月二十四日香港政府报 Hong Kong daily Press 社论说："我们要承认：我们（英）是失败于他们（广东）手里了"，这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们的政策受了我们的打击了，因为英国可用以干涉广东的唯一口实已去，他们的政策就完全无效了。暂时避免英国的进攻，使我们有机会

更行巩固广东革命基础及有可能树植我们在已占领各省的权力，这亦应是自动解决现在形式之杯葛的一个重大原因。

国民政府现在的办法，如果照上面的理由，决不是退让，因为这是依照了发展革命势力的计划做去的；我们要爬到一座山的顶上去，途中有时似乎是斜向所经由的道路，有时是斜向下的凹曲处，但是如果那条路确实是达到山顶的路，那末我们走到那凹曲的地方不能说是我们下山走了。这亦不可说是卖罢工，因为政府没有与英政府有何协定，政府得一点小便宜，就答应英政府的要求解决罢工；这是政府单方自动的行动，不受何种拘束的，要再行杯葛立即可以实行的。亦没有卖罢工工友，因为政府决定征收特种税以帮助工友找得工作，政府担当安插工友之责。不是对英帝国主义妥协，因为我们仍继续对英杯葛运动（不过不是纠察队的直接行动）及更进行大规模的反英宣传运动。不过，如果我们要确实担保这次自动解决杯葛，不是退让，不是卖罢工，不是欺骗罢工工友，不是对英帝国主义屈服，国民政府一定要坚持反英帝国主义的政策，一定要确实开始建筑港口，粤汉路及其他事业以安插罢工工友，一定要竭力帮助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及其发展！人民方面一定要仍旧继续并且加紧对英杯葛的运动，一定要进行大规模的反英宣传运动，及一定要以全力拥护政府反英帝国主义的政策，与赞助其建设的计划。

原载《人民周刊》第24期
署名：大

人人应注意之联席会议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决定十月一日开中央与各省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这会议虽然不是正式大会，但是实际上其效力当不比大会差什么，因为各省党部之代表无异各省赴大会之代表。由所发表之会议日程，即知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历史上的重要。这次大会第一，要决定对于时局发展而生之种种重要问题，如国民政府省政府地方政府的组织，外交政策，对孙张的政策等等；第二，要决定目前对人民的政纲，人民在北伐胜利后一定要知道他们能得到什么利益；第三，要决定强固革命基础的办法，现在已到专心建立省的基础与发展民众势力的时期；第四，要决定树立党的权力，及发展党的计划。这四种问题都是于中国国民革命前途极大关系及与广东及全国民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所以一切民众及革命的党员都应集中注意于这次国民党中央与省执行委员会联席大会，对于以上所说的问题，应加以详细的讨论，把自己的意见贡献于这大会，务使这大会能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得到完满的议定，特别是能有一个合于现在人民需要之完美政纲。现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组织了一个预备大会议案委员会，这委员会已把对于各问题所讨论的结果发表了一点，民众及党员应该对此等结果加以讨论，并在报

纸上发表。报纸上应特别辟一栏以发表人民及党员对大会之意见。

原载《人民周刊》第24期
署名：大

省政府的改组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广东以前完全忙于肃清内部反动军阀及防御外面敌人进攻之工作，而没有能注意到整顿内政的工作，现在当广东内部已肃清，武汉既下，最大的祸害已除，这正是广东修内政的时机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已于十八日决定改组省政府；更换了民政厅长古应芬及农工厅长刘纪文，加增了李济琛为军事厅长，何香凝为公益厅长，陈树人为民政厅长，甘乃光为省政府不管部委员。

我们希望这次改组不止于换人及增添机关而已，而应更注重于改变省政府以前政策。以前的省政府至少是民政厅及农工厅是站在地主，绅士及官僚的利益上的，如民政厅包庇腐败及摧残农民的县长，农工厅听信少数曲江田主取消民众要求之减租办法等都是例子，这是根本违反国民党的政策的，希望以后的省政府能站在民众方面以反对残酷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前各厅有各厅的政策，以致互相倾轧与冲突，妨害工作的进行；以后省政府应有一致的革命政策，各厅应在这政策之下一致行动。以前省政府缺乏建设的政策，当然亦因为刚刚统一，无暇及此；现在应立即定出省政府建设的计划，例如，建筑公路，筑港开埠，振兴工商业，改良教育，训练行政人材，改良县治，实行乡

村自治，准备人民执政，设立农民银行，改良水利，改善工农生活及待遇等等事。政府如果不做一点积极的事，只是高喊革命，决难得人民的拥戴。但是广东要开始做建设的工作，必先肃清土匪，土匪不肃清，农工商学同受其害，一切建设事业无从着手。著名的发售发冷丸的梁培基居然在省河被土匪掳去，岂非笑话，省城尚匪案累积，各地更被土匪闹得不堪。省政府所以非有一果断的积极的剿匪计划不可。如果省政府能这样做去，广东的各界民众都应起来积极帮助与参加；如果省政府不能做去，那末，广东人民就应当起来要求与督促政府这样去做。因为广东各界人民对革命所负担的已不少了，革命现在应当给他们一点好处了。

原载《人民周刊》第24期
署名：大

武汉攻下后之国内外形势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自武汉攻下后，中国历史上又开始了新的一章。中国政局上一个重要原子——吴佩孚的势力，已完全消灭了，因此不仅是中国国内势力的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动，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的平衡亦跟着起了变化，因为武汉之下与吴佩孚之倒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强固堡垒的崩坏。武汉攻下在中国政局上更有一种重大的意义，就是，一变中国以前军阀与军阀间之武装斗争形势而为反帝国主义武力与帝国主义雇用的武力间之武装斗争形势。因为以前中国主要的战争都是两大军阀间之战争，如直皖，直奉战争，或多数小军阀联合以对抗大军阀之战争，如西南对抗段祺瑞武力统一之战争；虽然南方反帝国主义的武力的存在已经有好久，不断地与北方军阀斗争，但直到武汉攻下以前，在事实上反帝国主义武力并没有能与军阀武力排列阵势，两相对垒，那时，反帝国主义武力只在偏安一隅力争自存而已。到现在，这形势完全变更了：反帝国主义的武力已直达长江流域，伸入中国中部，非特西南各小军旅来归，国民政府奄有西南各省，并且西北国民军将从陕晋直贯豫省而与武汉北伐军相衔接，如是，反帝国主义武力已将完成其自西北至西南之阵线，以与东部沿海岸一带之帝国主义雇用的武力——张作霖、孙传芳的武

力相抗衡。中国的武装斗争，非特在战略上由南北对抗而改为东西相抗，并且在性质上亦完全变更为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现在时局这种重大变化之中，中国国内各派势力都须重定自己的政策及对外的关系，有的得着了发展机会，有的发生了空前的恐慌；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亦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有的想乘机尽量发展，有的正拚命防止其在华势力之衰落。革命党人及民众一定要知道中国各重要武力之倾向与主要帝国主义国之对华政策，然后才能有应付的可能。革命势力虽然总没有象今天这样好的发展的机会，但是亦总没有象今天这样危险的形势；因此知道我们敌人对付我们的策略及自己势力发展的程度，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张孙军阀之计划

先说孙传芳。在武汉未攻下以前，孙传芳已决定帮助吴佩孚打广东，一方面以苏浙皖两三万军队入江西，由江西西北之修水铜鼓方面攻湖南之平江，浏阳，更进取岳州与吴佩孚军队夹击北伐军，一方面以一二万闽军攻潮汕，以捣乱北伐军之后方。孙传芳，照他自己的利益打算，本应不加入战涡才是，因为如孙军与粤方冲突，正给张宗昌乘虚南下复仇之机会，但是为甚么孙又要加入战争呢？大概孙传芳受了下列的影响。第一，英国帝国主义因要孙传芳救吴佩孚，所以威逼及利诱孙传芳攻粤湘，英国一方面对孙担保奉军不攻苏，一方面允供给饷械。第二，北洋派军阀想维持其系统，明知吴不能再起，故欲扶孙以继吴，传说吴

曾电孙，如孙出兵愿以北洋领袖资格让孙，这话恐有几分真实。第三，国民党已被开除或失意之右派党员，都集中在孙传芳处，代为画策，告之以广东内部空虚情形，自愿并担任内应，反动派此种献媚，不免使孙传芳动心。第四，一般反赤宣传，当然对孙亦有多少之影响。有以上种种原因，于是孙传芳便定下动员令对湘粤取攻势，并同时封闭江浙赣党部与逮捕国民党革命党员以示决心。如果孙传芳截断北伐军后路及摇动广东基础之计划能早日实现，对于国民政府未始不是一种极大的危险，但是孙传芳的军队的动作太慢了一点，或者可说北伐军进行太快了一点。当广州传闻北伐军占领武汉表示庆祝时，香港英报警告我们道：据十二分可靠消息，北伐军将有受两面夹攻之危险，北伐军决无归来之日矣。英帝国主义确与吴孙预定下这毒辣阴谋，但是不知北伐军亦有李逵之神勇并有神行太保戴宗的甲马绑在脚上，其结果吴佩孚号称十五万大军经不得北伐军的几斧头，就退出汉口汉阳，而孙传芳急忙调兵遣将，终赶不上神行的北伐军。北伐军进取武汉之迅速，给英国与孙吴所定之计划以根本打击，令孙传芳大惊失色。夹攻他人的圈套，现在倒要落在自己头上了；因一方面已派去江西之军队要单独担当乘胜东向的北伐军，一方面江苏防军减少有被张宗昌袭击之可能。现在孙传芳陷于极困难的地位：既然有这危险的感觉而且在江西前敌不利，于是有向国民政府表示愿和的意思；但是奉天方面竭力怂恿孙传芳攻粤，并声明决不攻苏，帝国主义则继续压迫张孙联合以共同对付国民政府。

再讲到张作霖的计划。奉军自从国民军退出张家口后，已无被攻击之虑，自吴佩孚南下后，直隶已成为奉军独有地盘。张

作霖对北伐军攻武汉取坐视态度，吴佩孚失败可以消灭其目前的竞争者，北伐军败亦可少一个将来的强敌。所以虽有英帝国主义竭力设法使张作霖出兵援助吴佩孚，张作霖仍是采取中立态度。但是自从武汉下后，吴佩孚大势已去，北伐军势力将伸入河南与国民军衔接，此时奉军中就很自然地发生援吴的问题。但是亦有主张取得江浙富饶区域以救目前财政及报前次战败之仇者。现在奉方的政策似是催促孙传芳与国民政府大战，然后自己收渔翁之利。孙传芳阻碍奉军的发展，所以不论表面上奉方对孙取何态度，奉方必须取得苏皖；奉票价低将成废纸，奉军人数总在六十万以上，不得江苏上海，奉方不能解决其财政困难。如北伐军至湖北边疆而止，暂时不入河南，奉军亦不愿在现时与国民政府冲突白卖气力来救援将亡的吴佩孚，奉军中不乏智者，恐不会如此做法罢。

国民政府以前对孙的政策是取和平，因在武汉未下前攻孙，恐增厚吴佩孚势力而分散自己的实力。所以一直对江西取守势，直至吴佩孚军队已失其抵抗能力时，才对江西下总攻击令。就是对江西攻击，然对孙仍取和平政策，因江西无论如何非取不可，不然北伐军自鄂至粤数千里的战线窄而且长，时有被截断之危险，如孙愿让出江西，国民政府现时并无攻孙之必要。所以与孙言和尚有可能。国民政府对奉以前及现在均依远交近攻原则取联络政策，与奉联络政策在目前为尤要。因英国帝国主义及反动政客确在进行联合孙张向国民政府进攻之工夫。如果他们的奸计成功，对于国民政府未始不是一大患。因此打破张孙的联合，实应为国民政府目前应付北方军阀策略之基点。

二、英美的态度

英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最显明没有的了。英国伦敦政府报，上海香港等处的英国报，都告诉我们说：英国将用兵舰实行其干涉政策。

英兵舰在广州汕头之横行及在万县之屠杀，更使个个人感觉到英帝国主义现在是采实行干涉的政策。为甚么英国要采直接行动呢？自从五卅运动以来，特别在广东，英帝国主义受中国民族运动的重大的打击，而他所雇用的工具在广东是完全失败了，广东一年半的排英运动，把英国在南中国的商业完全停顿，把英国在远东的商业中心香港弄成荒岛，英国在广东丧失其一切政治上经济上之特权。现在他多年豢养的吴佩孚，他在中国中部的工具，被打倒了，英国在中国中部之商业中心又落到了排英的国民政府手里去了——如此，英帝国那有不慌张呢？间接的工具既然不可靠，而自已在华的利益发生了极大危险，英帝国主义于是采取了这最后的办法——兵舰的直接行动。英国的反动政府竭力鼓吹干涉中国，乘英国议会停会期间中，无所钳制，想实行其传统的兵舰政策于中国，现已添派兵舰启程赴华。目前英帝国主义正找机会以图达到目的。在万县虽然有了机会，但除了屠杀许多人民外，不能破坏国民运动之奸计，反徒增加中国国民运动之热度及暴露其兵舰政策之野蛮而无效。在国民革命基础及有多年革命经验之广东，英帝国主义实难找得合意之良好机会。以坚定的避免冲突的政策对待英帝国主义之兵舰政策，同时利用英国兵舰政策实施的事实，做广大的反英宣

传，以扩大与增厉全国的反英运动——如此，不难打倒英国之炮舰政策。

为甚么英国政府现在才决定采用直接干涉中国的政策？不是英国受厄于广东已有一年半了吗？这是因为英国以前没有得到其他列强特别是日美的同意，所以他不能单独行动。日美对于广东排英货非常之欢迎，以前广东很少日本美国的货品，现在日美货品已畅销于两广了，日美的船只已停满了广州港口。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素以孤立英国为目的，对于日美特别给以经商的便利。这并不是说民众应该对日美亲善，因此不能做反日反美的宣传，因同是帝国主义有何可分别优劣，不过，因为在广东方面反帝国主义战线以英国为主要目的物，为抵抗此目的敌起见，应利用敌军内部之利益冲突。因为孤立英国之外交政策，英国忍耐了一年又半。英国在此时间中努力向日美疏通，请他们共同行动，其结果英国并未能得日美对华共同行动之许可，惟对英之单独行动或可不干涉耳，这亦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因日本外务大臣最近曾有“对华取中立”之声明，美国驻华公使亦有同样之声明。日美虽有此种取中立之表示，但是如果日美见国民政府此次之发展，对他们有利无害，他们还是不愿英国干涉中国而恢复其势力。于日本朝日新闻九月十日之社论，可见一斑：“如长江一带尽归北伐军势力范围，英国之痛苦更不堪问。英国政府与报纸常唱干涉中国论调，惟今日唱言干涉，事实上不能办到，时局必待中国自身之解决。而武汉陷落，第一为吴佩孚之致命伤，第二为英国之痛心史。若香港罢工不能解决，恐杯葛主义又实现于武汉矣。”

又当英国驻华公使赴奉时，美国公使启程南下，不日抵粤。

美公使来粤之目的，不外欲知悉国民政府此次胜利后，采取何种外交政策，对美投资商业及教会取何态度。所以如果国民政府能继续以前拉开日美而孤立英国之外交政策，并更进一层而实行以前维持和平保护商业之对外宣言，那就不怕日美不接近国民政府，而英国即欲单独行动干涉中国，亦无所施其技矣。坚持反帝国主义的主张而绝对不向帝国主义屈服，更灵妙运用政策以帝国主义各国间之利害冲突，而为民族革命之利益——这应是革命的外交之南针。

三、反帝国主义武力之联合战线

武汉攻下，在中国的历史上表示，袁世凯以来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坏溃，将让位于新式的武力——反帝国主义武力的统治。反帝国主义势力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反帝国主义武力的武力，目前已及于广东，湖南，广西，贵州，湖北，甘肃，陕西与绥远，并将及于江西与山西，并在河南与四川亦有一部分势力。试翻开地图一看，反帝国主义势力之版图已将占全国之半；这各省的反帝国主义势力现在都联合在一个国民政府之下。这国民政府将率领这些反帝国主义武力以与帝国主义雇用之武力相抗衡。这一条战线自从西北之绥远甘肃一直至西南之两广。国民军既放弃了张家口，现已改变战略，分两路进攻山西陕西，闻已占领西安府并正攻打太原府，以后如能占得河南，则此长条战线完全成立，待实力已预备充分，再向东面海岸进逼。太平运动之失败即因他没有集合充分的势力即向上海方面与帝国主义发生直

接冲突。国民军前次退出京津，亦即因为自己势力不足与帝国主义直接抵抗，如不退即有全军没灭之危险。所以现在虽然在中国反帝国主义势力的时期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到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时期，如果现在立刻即向京津宁沪进攻，则势必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帝国主义必拚命直接帮助张孙，李鸿章用洋兵打败洪杨之事不免又要重演一次。在现今这时期中(江西下后)，应该积聚反帝国主义势力的实力，巩固占领各省的基础，发展全国的民众运动及其组织；待实力已准备充足，各省已确有巩固基础，军队已不是孤零的军队，而是有民众实力做后盾的先锋，进可攻，退可守，无一蹶不振之危险，那时不仅是占有地的民众一致行动，更是全民族与帝国主义实行总攻击。这斗争的结果，军阀将被完全扫灭，某帝国主义比较乖巧或因为我方外交策略的结果，未加入战涡，并愿承认中国的独立(因为中国独立对他反有投资通商更多的机会)，更有某帝国主义与中国全国势力战争而失败，暂时与中国断绝邦交，那时中国将设立统一的政府，苏俄及各国革命势力将大规模的援助中国的运动及承认中国的政府——这样讲下去，未免讲得太远了，不过，上面所说，的确表示中国国民革命现在与将来的战略上的形势与步骤。

但是要达到这个准备实力，强固基础，组织民众的时期之终结，及向帝国主义势力实行总攻击之开始，这并不是一个极短促的时间内，轻易所可做到的。在这时期中间，尚需要更大与更多的努力与牺牲。

革命党人及民众在这反帝国主义势力统治的时期中，有一件事须特别注意的，就是认清这反帝国主义武力的性质。自从

五卅运动后，中国民众的势力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式的武力，这种势力的特性是反对帝国主义，有纪律，知道要依靠民众势力。自五卅以来，有一班进步的军阀，一方面见帝国主义的残暴，一方面见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他们知道旧军阀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非特受唾骂，并且是靠不住的，他们更看见，民众力量可以帮助他们势力发展。如果他们站在民众方面来反对帝国主义，他们非特可增加自己的势力，并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欢迎与革命的荣誉。因此他决定加入以反帝国主义旗子号召的与代表人民的国民政府。他们立志要做革命的军人，所以他们的军队一定要有纪律，他们一定要注重党务，让他们治下的民众组织起来。但是到底他们还没有能了解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根本意义，他们还没有懂得民众运动的意义，所以有时他们见了自己统治下之民众运动的高潮不觉恐惧起来了，特别责骂工农运动。他们固然知道民众有势力，但是不知道去领导或帮助其发展，而想御用民众，想民众运动能依了他们自己的意思发展，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最重要的危险就在这一点，因为他们并不愿民众真正成为统治他们的势力，而愿民众成为被他们所统治的百姓。现在当北伐胜利，此等武力的势力已有长足的发展，自己势力愈大则愈易轻视民众，因此民众运动愈有受抑制的可能，如广西梧州军队最近无辜枪毙工人三名，即是一例。总之在这一时期中民众不可无条件的信任这班新式的武力，但是同时又要认清，他们是反帝国主义的，他们是要依赖民众势力的，如果民众势力能够超过他们的势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现时亦占重要的地位，他们亦有屈服于民众而成为民众武力之可能。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及民众的责任就是怎样猛烈地发展民众力量然后

可以防止这武力重新恢复到军阀的地位，及使他们成为真正民众的武力。

原载《人民周刊》第 24 期

署名：大雷

青年运动的使命

（一九二六年十月四日）

一个使命包含着三种要素：一，是胎胚的思想；二，是中间的努力；三，是成熟的结果。

这三种元素之中若是缺了一种或两种，便是使命的缺点，也便使这个使命整个的失败。虽说缺乏一两件元素的时候，也许有些破碎的价值，但已经是使命的夭折，完全失去他的意义了。所谓一贯的精神，便是做任何运动所不可缺的东西，就是指着这三种元素说的。中国国民党在同盟会时代的入会誓词，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矢信矢忠，有始有卒”，也就是这个意思。

用这三种元素，来测量中国的青年运动，来时时提醒，鼓励我们的青年，正如我们行路一般，起头是要明白自己的目的地，中间要继续的向目的地进行，最后还要到了目的地，方才罢休。行路的速率也许有缓有急，路程也许有直有曲，但终久是以到了目的地，才算定事，才算完成一个使命。

中国的青年运动不是一种狭义的，乃是广义的。狭义的青年运动乃是指着一种青年人民的集合，为某一种目的的运动。但中国的青年运动乃是一种范围很广使命很大的运动。他的范围在以前的时候，虽多半限于学生与智识界内，但以后是应当纠正这个重心，而应包括全国各种的青年。他的使命，不仅是以谋青

年的福利为中心的目的,乃是以谋全国的福利,当作他任重道远的事业。简括言之,他的使命就是革命的事业。

自然革命的事业,不是单独放在青年人身上的。而从事革命的人,年龄原不一样。但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而年龄的大小亦只是个比较的数目字,并非是绝断的东西。但就事实上讲起来,革命的重担子,是大部份放在年青的人的身上。八十年以前意大利复兴的时候,有一位革命家马志尼,创了一个社会,名叫"少年意大利",这是意大利复兴的一个基础。先总理当日在东京与欧美鼓吹革命的时候,也是以青年为他的根本,他说"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皆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论,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言论思想,集中于革命问题。……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又曰:"乙巳(一九〇五)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一会于北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六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阙之也"。这便是同盟会的起源,其中的份子大半是留东西洋的青年学生。所以中国的革命事业,起首便是由青年担任,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也就是靠这个青年组织的同盟会。所以中国的青年从最初的时候,便把这个革命的重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这会中国青年对于使命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自同盟会成立以至于现在,国内有大

意义的举动，无一不是与青年有关，由青年居于领袖与先锋的地位。如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有价值的事，而发动主持的人是青年，五四以后的各种爱国运动，无一不是中国的青年做的。这些爱国运动里面的意义，便是国民革命，中国今日之各种新的气象，所以能蓬蓬勃勃风起云涌，都是青年运动的潮流的鼓荡。外国人对于中国不敢再轻视，就是为的青年运动。这一层他们看得最明白，亦最惧怕。因为在他们的国内，青年人伏处不动，而中国的青年，却迫于时势的要求，国家的危亡，起来担负了这个革命的重任。照这样看起来，中国的青年运动，从革命发动的初期，直到现在，是一个一脉相承，继续不断的东西。用篇首所提出的三种元素来测量中国的青年运动，可以说是三种元素之中，已经完全具备了第一种，便是胎胚的思想，而于第二种中间的努力，也算是做了相当的工夫。因为自从认识了革命的责任以后，中国的青年已经抱定了一个思想，一个目标与使命，所以第一种元素是完全具备了。至于第二种元素，努力虽不算少，然比起要做的事来，却还差得多。民国十五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失败，已经证明了反动的势力太大，青年的努力还不够。我们的青年，鉴于既往的失败，对于将来当抱一个比从前更坚决更彻底的态度，来继续的努力，时时刻刻将革命的目标悬在眼前。从前有勉励青年人的几句话，叫做“迢迢望南山，路远莫之致，行行重行行，千里亦云易”，革命事业，便是我们青年眼睛仰望着步履趋向着的“南山”。老实说，在继续努力的时间中最大的危险，有两种，一种是半途而废，一种是失其目标。意志不坚定的人，因为革命的路程太远，行走得太疲乏，也就不免于望洋兴叹，中途废止了。至于失其目标的事，也是历史上大运动曾经见过的事，甚至于一个

团体，后来的目标，完全与起初的目标相反，这真是痛心的事。这两种危险发生的原因很多，但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来，就是由于未曾确切估计路程的远近，工作的难易，与反抗势力的大小，所以才发生这两种失望情形。中国的青年运动，离出发点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但离目的地还远。现正在中途，正在中间努力的时期之中。将来能否达到最后的目的地，完全要看现在的努力如何。

具体的讲起来，中国国民党的主义与党纲，定了许久，但要使这主义与党纲完全实现，这个责任，都在中国的青年身上。现在党纲只实现了一部份，还有很大的部份要实行起来，所必遇的阻力与所必经的路程，正不知是如何的大而且远。必待这个主义完全实现以后，中国的青年运动才算完成了他的使命，这样大的胜利，正所谓中国国民党的程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这个战胜的时候，中国青年，应当向前看，思想那些目前因此而起的问题，是如何的繁多，如何的困难，如克复区域的政治的财政的党务的建设等问题。即使这些问题都得了满意的解决，也只是一部份的事，还要思念着如何继续向前努力，达到最后的目的，就是三民主义完全的实现。在这种努力奋斗之下，中国青年当预备十二分的力量，才能希望有十分的成功。俗语说“行一百里半九十”，就是说走了九十里才能算是一半，最后的一段，却是最困难的。以前失败的原因，可以说是对于困难，看得太轻，对于反抗的力量，未有准确的估计。以后的进行，应当纠正这样的弊病。这并不是畏难苟安，乃是要本着明晳的计算，才能预备充分的力量，去胜过困难。

总之，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青年运动最紧要的关键。因为

已经过了第一期胎胚时代，而进入第二期的努力时代。已经负了革命的责任，而尚未完成这个大使命。第三期成熟的结果如何，是完全看这第二期的努力如何而定。我们深信以中国青年的沉毅勇敢，必能胜过万难，以完成这个大使命。

原载《革命青年》第1卷第5期
署名：之椿

农军民团冲突解决办法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九月二十五日国民新闻载政府议决之解决农军民团冲突解决办法十条，甚为妥善。其妥善之点，就在化民团为农民自卫团体。

现在农军与民团间的冲突，决非误会，亦非械斗，确是乡村间的一种武装的阶级斗争。民团的团丁虽然是农民出身或失业的农民，但是指挥这民团的是劣绅及残酷的地主，民团的任务就是替劣绅与残酷的地主与贪官污吏出力刮地皮，压迫农民出纳苛捐杂税重租，现在更加以破坏农会的工作。农民因受压迫不过，于是组织农会及农军以自卫，农民没有武装的抗拒是不能抵敌地主绅士及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农民与绅士地主间之武装冲突，自古就有的，在中国历代的历史上，就是在中国旧小说上，你都可以找到这一种的事情，这不是新发明，革命党的宣传与工作，当然促进了农民的觉悟与感觉到武装的必要，但是广东国民革命运动高涨确是广东农民自觉的真正原因。民团与农军中间的冲突，实是要保存或加厉农民剥削的劣绅土豪及贪婪县长与已有觉悟而反对现实的残酷剥削之穷苦农民——这两大势力间的武装斗争。如果对于此事没有一个根本解决，或帮助劣绅土豪及贪官污吏把农民完全压迫下去，解散农会，解除农民武装，或

帮助农民解除劣绅土豪贪官污吏的武装，那是不能免去乡村间这种斗争的，不管你赞成或反对。有人说：可以把双方解散，那就天下太平了；这种人的主张无异于说：政府可以不要基础的，即不要农民，又不要地主绅士，这种政府，是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所找不着的——你不站在农民方面，就站在绅士方面，你不能悬挂在空中的。至于你说：民团里有土匪，农会里也有土匪，这与根本问题——农民与地主绅士之争，无甚关系。犹如，国民革命军队里有以前当过土匪或现在仍是土匪的兵士，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军队亦有土匪兵士，这与国民革命运动与反动军阀斗争的根本问题，绝无关系。农军剿匪最力，要求剿匪最切，这是不可驳的事实，就是混几个土匪进去与农会之为革命团体有何相干。国民党里有樊钟秀，大家还当他宝贝呢，但是樊钟秀是一个土匪头儿。有人说：樊钟秀现在已不做土匪了，已信奉三民主义了。他现在有时老脾气发作，做不做土匪的勾当，我不知道，不过他现在信奉三民主义，是要算一个国民党员，我是绝对承认的——是呀！土匪愿帮助农民加入农会，这个土匪亦可以算是一个会员。如果有人说，国民党有了樊老二就骂他做匪党，这人非打嘴不可；同样，如果有人说：农会有土匪就是匪会，亦非……，民团与农军冲突的性质既明，革命政府应当依照什么原则去解决这冲突亦就很明白了。现在政府的解决办法就是依照了帮助农民抑制绅士的原则的。第三第四条规定：县长（现在是绅士的代表）不得批准民团成立及委任团长等，民团的筹备人及团长都需由乡民大会通过。这就是要把绅士的民团变成农民的民团。这实在是一个好办法。办法固然好，但是实行又是一件事：一方面实行并非容易事，因绅士方面必起重大的反抗——

软的反抗与硬的反抗，一方面实行的人是否有决心去实行？议决虽好，实行更要紧！

原载《人民周刊》第25期
署名：大

英国又想用飞机政策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美国联合通讯社九月十七日伦敦通信，披露了英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计划。这通信说：英国航空代表团预备不久赴日，将对日政府提出一协同发展中国商业航空事业之计划。英政府预备与日政府订定协定，借名发展中国商业航空事业，实行采取飞机政策以补其现在炮舰政策之不足。所谓日英商投资开发中国商业航空事业，将由英日政府津贴，而所用商用飞机，一点钟有一百十至一百二十英里之速度，可随时改为军用飞机，装载两个一千磅重之炸弹。吃人的英帝国主义以为他的炮舰六吋径的快炮，象最近在万县那样几小时把万县烧了，把几千人民化为炮灰，还不满足，因为还不足以屠杀中国人民至如此程度，至使中国人民不敢再行反抗大英帝国。英帝国主义现在造谣，说："日美两国在这一世纪中决不会有战争的。苏俄及屈服于苏俄的中国才真是日本大祸呢！"英帝国主义者要日帝国主义与他联合起来维持英国在中国的利益。现正计划英日联合用飞机政策来镇压国民革命的中国呵！中国人民要注意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对英日经营中国航空事业！中国航空事业是要振兴的，因为非特为商用交通起见，并且为将来抵御帝国主义的炮舰袭击，中国在短期间中，因钱与时间问题，不能希望有新式舰队抵

敌帝国主义的强大舰队，但是造飞机是便宜并且迅速。因此，这航空事业应在中国自己管理之下，飞机尽可在不愿用武力侵略之国家购买，技师亦可在此等国家聘用。打倒英国的炮舰政策！防止英国的飞机政策！

原载《人民周刊》第25期
署名：大

广州基督徒反对英炮舰政策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广东中华基督教会协会干事招观海，谭沃心，广州培正学校监督黄启明，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代总干事李应林，广州培英中学校长关恩佐，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罗有节，广州培道女子中学校长唐炳荣，广州岭南大学监督钟荣光，广州夏葛医校教务长关相和等中国教徒最近发表了宣言一篇反对英国炮舰政策，对英舰九月四日强占长堤码头及九月五日炮毁万县事件抗议。并已“致书于英国国会及英国在华各传教士，请其主持正义人道，制止彼国人在华暴乱之行为。”对于这一件很重要的事，不能不代中国国民革命庆幸：帝国主义的残暴与中国人民的反抗，已使中国人民中最与帝国主义势力接近，因此最受其熏陶的一部分——基督教徒开始觉悟了！不管发表宣言的基督教徒是真有反帝国主义的觉悟与否，不是我们的问题，至少这事实可证明两件事：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压迫太残酷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了。

这几位签名发表宣言的教徒先生们，都是美国教会与学校里的，反对英国的炮舰政策，固然非常之好，但是对于美国的炮舰政策及杀人不见血的软化政策，又如何呢？新到广州的美

国公使，在上海曾发表一段言论关于领事裁判权的，他说：领事裁判权是很坏的，但是现时是必要的。广州美国教会或学校里的中国教徒们！对于美国公使这句话，有没有质问他：什么叫“必要的”？为什么中国在美国没有领事裁判权的必要？美国教会的中国教徒们，应质问美国公使：为什么不立即承认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一定要象英国一样的是承认北京政府而不承认国民政府？

美国教会里中国教徒们！不要希望英国在华的教徒会阻止英国的炮舰政策，他们是卫护英帝国主义的。请你们多努力唤起中国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你们有很好接近民众的机会，所以你们的宣传是赞成，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绝对重要的！中国国民革命是双臂张开，等候你们，欢迎你们！来罢！来罢！

原载《人民周刊》第25期
署名：大

万县事件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九月五日有商船载武装英国海军一队，于二兵舰卫护之下，驶赴四川之万县，其目的在由被杨森扣留之二英国商轮中，取出英国籍之船员。船员被取出后，英兵轮二只以六英寸之大炮向万县城中射击，历一小时以上之久。结果华人死伤无算，损失不赀。本月十四日，香港日报称华人方面死亡之数，依最小之估计，当在二千左右，则当日死亡之确数独不止此，可断言也，而财产之损失则为无从计算。

依英人片面之报告，则华人方面先行开枪，但此不能仅凭一面之辞，亦不难经正式之调查而决定之。但根据英人自承之片面报告，即可决定至少英国当负两种责任：

（一）英国当负武装挑衅之责任，

（二）英国当负毁灭和平城市之责任，

其他责任则须待我方详细调查之后始能决定，今仅就上述二点明白言之。

（一）二商轮何以入于杨森之手，此点至今尚未明了，但亦不难经调查而决定之。但二商轮之英国船员，初非有性命之危险，使英海军之官吏初非意存挑衅，则以数日之交涉，亦不难获得释放。即使与杨森交涉不得结果，尚有最后由英国驻北京之

公使与英国所承认之北京政府交涉之余地与步骤，此种步骤为外交习惯国际公法所认为国际交涉破裂以先所必经之过程，而英国则悍然置之于不顾。即就英国不遵此种惯例不经此种过程而论，英国于此事当负全责亦已明了，不容置辩。但英国之海军兵士挟全副之武装以临愤怒之中国军队，复护之以军舰，此其用武之决心，固早已定于未出发之先；激成此种必战之场合，以求避免此次之惨案，不可得矣。

（二）万县非武装之城市，其人民非战斗之人员，向非战斗人员之和平人民作战，为国际法与惯例所不许；即以人道而论，万县人民对于英国之居民与军舰初非有任何之敌视与任何之妨害行为；而英国之军舰乃与大炮射击至一小时以上之久，使城庄为墟，死亡枕藉，财产之损失不可计数，揆之公法、惯例与人道，英国之暴行之罪，刻不容诛。

就此次惨案之事实与法律而论，英国当负上述之两种责任，毫无疑意；但此次事件之意义犹不止于此也。英国之军舰何以能炮毁深在内地之万县，则以其能自由航行于中国之领海与水道，而于此种自由权则概由于不平等之条约为之护符。故此次事件之发生则由于不平等之条约为之厉阶，欲避免将来同样事件之发生，则除取消此等条约则无良法。此为此次事件之教训与此次事件之基本的意义也。且此次事件不过为无穷的惨案之一，前乎此者，尚未了结，继此而起者，尚未有止境，鉴既往测将来，吾人努力于根本之救济，则当于最短之时期，谋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实现。故吾人以为此次事件，不当仅以惩凶、道歉、赔偿损失了结之，而当更进一步，根据此次之重大事件，向英国交涉废除中英间之不平等条约，欲求取消各国人民在我国之特殊地

位与特殊利益，以现在之局势观之，当先自英国始，欲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应当现在便从英国着手！

原载《革命青年》第1卷第4期
署名：椿

英国外交又失败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一年以来英国对华外交的主要目的，在于脱离所处的孤立地位，其朝野上下所努力者，即在求以种种方法，达到此种目的。明乎此方可以谈今日对英之外交策略。

去年五卅事起，法美等国以租界向例各国有共同联络保护之义务，受英国之牵掣；而义和团一役，联军又大获共同行动之大利，以为中国诚可以联合之呼声压倒之。不料结果适得其反，香港之罢工坚持至一年以上，至向日之歌舞市场鞠为茂草，英国远东经济营垒，危如累卵，此则远出世界意料之外，自令英人慄慄不安者也。故自香港罢工成效昭著以来，他国之人，对于中英之“暗战”，即已避之若恐不及，恐有波及池鱼之殃，而英国遂陷于孤立之地位矣，此一年以来之情形也。

自执迷不悟之英国观之，脱离此种孤立无援之绝境，首先破坏中国与他国之感情。如不能，则造成种种场合挟制他国，恐吓他国，欺骗他国，使之不得不与我国丧失感情，因以造成各国对华之共同政策，则英国之计得售，而脱离陷阱矣。执此以为标准，方可以洞烛近来所发生之种种英舰横行举动，最大者如万县事件，次之如汕头与广州事件，而窥其隐衷，其目的在挑衅，在造成扰乱之局势，而因以恐吓他国，务使他国或觉利害共同辅车相

依之局势。果然，万县事件发生以后，英国政府与商人之机关报，异口同声，借各国在华共同利益之危害，鼓吹共管之积极政策，其处虑之深，措辞之巧，可谓两极其能事矣。岂知事与愿违，法国首持异议，东亚向为与国之日本，复从而附和法国之说，英国舆论尤力持不可。如法政府机关之巴黎时报，沉重针砭英国，劝其顾虑中国民众之独立精神与内部之反抗并谓中国现时政府之弱，正是人民之强。日本政府宣言中立，美国舆论更劝英国勿庸人自扰造成较今日尤为险恶之局势。忠言逆耳，此数国者诚不愧为英国之诤友矣。而英国不以忠实之道待友国，不以诚意悔悟之态度待我国，遂使其地位日益陷于孤立，不可复振。此之谓咎由自取，弄巧成拙。

吾人正告英国曰，为贤由己，欲脱离现在之孤立地位，首在恢复中国国民之感情。欲恢复中国国民之感情，自实际上言之，首在罢免新近选派尚未到任之驻华公使兰普生氏，与以诚意的方法，悔过的态度，与中国协同解决香港之罢工，次在即时停止"炮舰政策"的挑衅行为，再进而自动的废除中英国之不平等条约。百言不如一行，在英国自己好自为之耳。

同时吾人劝告民众，当忍辱负重，勿逞意气致堕英人挑衅之计；避免一切危害他国人之行为，免失他国之感情；总之，当以"使英国永远孤立"为吾国对英之外交策略。

原载《革命青年》第1卷第4期

署名：椿

段祺瑞重当傀儡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此次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可以说是张作霖的暂时的恩人，因为一个暗与为敌的吴佩孚，与一个明与为敌的国民军，都因为北伐的关系，与他告别走了。吴佩孚之星夜南下，大家都知道是完全由于国民革命军直捣为其巢穴的武汉所致，独自恨其不早耳。国民军因为与国民革命军策应之故，变更战略，南下取陕西以出河南。于是一隐患与一劲敌，俱暂时与张作霖长揖以去。此种发展对于奉系不啻"调虎离山"。

试一展阅中国地图，则奉系今日因侥幸而获得之区域不为不多。除原有之东三省外，直省则因吴佩孚之南下，拱手而得保大，加以热河，察哈尔二特区，与山东全省。北京在其卵翼之下，中央政权完全在握。以如此之地盘，如此之地位，则吾人心中自然而起之一问题，即张作霖现时意欲何为？

以军阀之简单头脑测之，此问题本非难答，如武力统一中国之梦想与为大总统，或竟至为大皇帝，皆此问题之合理的答案。但此种答案虽为武人心中应有之幻想，究非现时切题之文章。今日问题为：奉系将以如何之手腕，在北方造成如何之局势，以达到如何之目的？

谓奉系今日将拥张以登总统之位，不免为过早之论。此等

举动之中，奉系所不能不顾虑者有三，一为敌人之势力，二为内部之问题，三为人民之积怨。北伐军排山倒海之势，收复武汉，前锋已突破武胜关，会将直捣幽燕，吴佩孚已一蹶不起，孙传芳更退让不遑，奉系虽欲借直系为缓冲而不可得；此不能不顾虑者一。内部之问题，在今日之奉系，实为惊弓之鸟，大有谈虎色变之势；今日反革命之军界中，内部最无团结者，要以奉系为最，此不能不顾虑者二。况近年以来奉系之武力政策，杀人盈野，城市为墟，民怨载道，众叛亲离，此人民之积怨已深不能不顾虑者三。于此等环境之中，奉系为应付北方之时局，必求一可以和缓敌人与内部与欺罔民众之公式，而自己则握实权以收其利。

环顾国中可以应此种条件者则莫如段祺瑞，此所以近日段系死灰复燃之讯，又复满城风雨也。奉系之利用段祺瑞可以有三种利益，一可以避免敌人攻击之目标；革命军对于奉系，终不免于讨伐，但目下尚未正式向奉系兴师问罪，故奉系自以为对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阎锡山，皆冀以段祺瑞之掩蔽，为避免目标之方法；而阎锡山之对段更属溯源甚深；至国民军则既已开衅，亦只得付之无可奈何，二可以欺罔人民；自奉系看段系之假国民会议，在今日旧事重提，较有所本，比之另起炉灶更难易不可同日而语，而段系今日之再起，势必假口于此假国民会议可断言也。三可以达奉系握实权之目的，而在此种目的中，尤以财政为最要。段祺瑞果再执政，必能予取予求，以应其欲，此在段祺瑞上次之执政，固已证其确能忠于奉系，甘为忠犬，成效大著者也。故今日段祺瑞之再起，实非无因之谈，而不无多少可注意之价值。奉系既以此种手腕，造成此种时局以后，则第一步之目的在于“远交近攻，扩充地盘”；首当其冲者必为孙传芳。奉系江南之

败，至今固引为大辱，雪耻之心一日不忘，而段祺瑞再起之议，前奉系江苏督理杨宇霆实为主谋，段祺瑞执政实现，江南战祸则必随之以起。假使地盘得以扩充则不但对奉系可以增加势力，且得安插许多心怀怨望之将领，故奉系之必攻江南早已心有成算。同时奉系对于国民革命军必取一种虚与委蛇之政策，以谋暂时之和缓。负有统一全国之责任的国民革命军对于时局此种的新发展，在现在情况之下应取如何之策略，吾人所急当研究之问题也。

原载《革命青年》第一卷第四期
署名：椿

自动停止直接武装杯葛之意义及办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将宣告取消对英武装杯葛了！在这一天的十二点钟，各口岸的武装纠察队全体一致停止职务，省港罢工工人十五个月的武装封锁香港及对英杯葛，从这一刻起宣告完全停止了！并没有受那个的压迫，省港罢工工人与政府共同商定，在这一天某一时刻撤退武装纠察，停止对英直接杯葛。省港罢工工人这个有纪律的，有牺牲精神的，及有革命勇气的行动，是依照了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策略及广东自己的需要的，犹如省港罢工的开始，是依照了那时中国革命运动的策略及广东自己的需要。省港罢工的开始，是由于省港工人对于英帝国主义五卅，沙基屠杀中国的同胞，要求报复，并且更是为争中国独立自由，因为中国现时之不独立不自由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状况才产生了五卅，沙基惨案；省港罢工长期的支持，是为了断绝广东内部反革命势力与香港之关系以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省港罢工的结束亦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独立自由运动及为了巩固国民革命基础。

省港罢工工人在过去的十五个月之中，牺牲了自己及家族的利益，忍饥耐寒的，有纪律的，百折不挠的，与世界上最老辣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直接斗争——这是古今中外反帝国主义历史

从未有的一个长期的伟大的斗争。就是这个斗争，他表示中国的工人阶级确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先锋，这个真理已为任何人所不能否认了。就是这个斗争，他保证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是一定能成功的，中国的独立与自由是有确实的希望的。亦就是这个斗争，他与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共同建立了现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基础；没有省港罢工是不会有这次北伐的。这十数万参加这伟大斗争的罢工工人，虽然他们衣衫褴褛，智识浅薄，是值得个个同胞——下自小百姓上至大人先生——的敬礼，因为他们是能牺牲而曾经牺牲了的革命的战士。他们争回了其他同胞所没有能争回之中国独立的光荣；他们给予最强大的大英帝国以他人所不能而未曾给予的大打击；他们帮助建立了中国革命同志多年奋斗而未能建立的国民革命基础。这班省港罢工工人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功绩是我们永远应当记得的。他们的服从精神，牺牲精神，奋斗精神，将是我们及我们子孙的永远的模范。

为什么我们要停止直接对英杯葛政策？我们已经奋斗了十五个月，在这十五个月之中，我们表示了我们的勇气，我们并不怕什么英国帝国主义，英国屡次恐吓我们，我们没有因此屈服，难道这次英国的恐吓就可以叫我们屈服了吗？这简直是笑话！如果我们要对英屈服，那末我们非但不能算革命者，并且要丧失过去十五个月所得到的胜利。宁可背城一战，决不作城下之盟——这不是匹夫之勇，这是中国革命所必须有的勇敢。不战而为城下之盟将扑灭中国的革命运动，延长中国人的被压迫期间；流血而失败尚可激起全国的革命潮流，或可因此早日获得中国的解放。如果敌人硬要以武力来强迫中国革命势力屈服，中国革命势力亦只有抵抗之一法。所以怕惧英国的炮舰一层是完

全没有的事。但是我们不仅是要有勇气，能够拚命就完了，我们并且是革命的指挥官，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然后才能战胜敌人，不应妄动而致使革命利益受损失；假使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尚未准备充足，当然今后我们不可有意与敌人挑衅，就是敌人来挑衅，假使还未到不屈服即须抵抗的时候，我们宁可设法避免，同时巩固自己的战线以预备将来对敌人的攻击。为革命利益而退让（不是屈服），是将来进攻而获得胜利的准备，这是革命运动上尤为军事行动上，常用的战略。

当北伐胜利后，革命势力已从广东而推到各省，并将奄及全国，这时广东旧有反帝国主义的策略有重新审查的必要，因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已不象以前一样是广东单独的斗争，而已进入全国斗争之道路。反帝国主义者的战线将成为全国的战线。武汉攻下之后，国内外的舆论，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及中国革命者注意于：是否广东对英武装杯葛将扩大到国民革命军的驻地这一问题。一切革命者都仔细考虑这问题，虽然主张扩大自动的对英杯葛运动，但是对于用武装纠察直接对英杯葛则以为尚需时日。为什么呢？因为要实行武装直接杯葛，必需得当地政府及人民的强固赞助，但是现在刚占领的各省，不是因为军事行动尚未完结，即是因为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与人民势力因久处压迫之下尚未有极大力量，至于尚未占领及在军阀统治之下的地域尚占大部分；所以全国的直接对英杯葛之时期未至，而即国民政府下各省直接对英杯葛之时期亦未至。尚需要一相当的准备时间，进行广大的反帝宣传运动以团结一切民众于反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及努力肃清全国的军阀及反革命势力，然后直接与英帝国主义之斗争方成为可能，而其胜利亦可得到保证。

我们现在是在一准备全国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斗争之时期中。那末，为什么在这个期间中，广东不能单独进行直接对英杯葛呢？过去既然得到了这样多的胜利，为什么不好为广东再多得一点胜利呢？我们的回答是现在广东不宜单独进行直接与帝国主义冲突的斗争，现在的武装对英杯葛已不能再为广东获得更多的胜利，或正相反，假使停止了武装对英杯葛反可使广东革命基础更为巩固。

一，广东现时不能单独前进。每个军事学者，而且就是个个普通的人们，都承认：在作战的时候，假使一路军队前进太远，而其他部队尚未能跟了前进，那末，这一路前进太远的军队有被敌军截击而被围困的危险。这是人所共晓的真理了。在革命运动中，这同一原则是完全适用的。广东现在正在这种孤军前进而后援不继的情况中。广东我们可以当做现在反英帝国主义战线中之中路，中国各省是右翼，英国国内革命势力为左翼；中路广东现在前进得太远了，右翼因广东以外各省民众势力的薄弱及政府权不在革命手中而落后，左翼因英国工人刚刚在大罢工失败后亦不能有实力帮助广东反英帝国主义斗争，而跟不上中路的前进。假使广东现时不稍退后，以巩固反英阵线，以待左右翼前进，广东这支孤军恐与英帝国主义发生武装冲突而被其截击与消灭之危险。一个革命的指挥官，决不能使我们现在还是唯一的革命基础冒这种危险。自从这自动取消对英武装杯葛之谈起，革命者经考虑后一致赞成，反革命者有意反对，这就是这退后政策正确之一个铁证。

二，广东现时需要取消这对英直接杯葛。一种策略，不是一服常用的百灵散；一种策略如果适于当时当地的情形并且是有

益于革命的，才是一革命的与适用的策略，假使这策略已与当时当地的情形不合而与革命有害时，虽然以前是应用非常有益的而对革命有利的，这策略就有立刻改变的必要。直接对英杯葛与武装封锁香港，曾经帮助建立了广东国民革命基础，假使没有这次省港罢工与这种直接杯葛政策，恐怕广东还不是革命的基础。武装纠察把香港吮吸广东的血液腺管及香港与广东内部反动派的联络，完全割断，使刚起的革命势力不受束缚并能够关着大门捉家贼——这是广东刚发芽的柔嫩的革命花蕊能够有今天这样怒放的重要原因。所以武装对英杯葛实为建立广东国民革命基础总政策之必要，而重要的部分。但是现在广东的情形又有不同了。广东现在已经过了初期争生存的斗争时期了，已从肃清省内军阀及统一广东的斗争中奋斗出来了，并最近已将省外的危险除去，湖南江西已成广东的藩屏而不是广东的祸害，因此广东革命势力已能独立，不怕省内外有军阀进攻的危险，与香港交通并无如以前那种的危险了。广东现在已到了巩固其下层基础的时期，广东需要良好的省及地方政府的，建筑在民众强固的组织上面。在广东现时一切的势力应当怎样集中于改革地方行政使之成为革命的堡垒及怎样发展人民的团体使之成为此种革命政府的基础。如果能做到这一地步，广东才能算做真正的革命基础，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将不能危害于广东而广东将成为发展全国民革命运动之中心。然而广东要达到这目的，必须在此次北伐结束后，有和平发展的机会，可专心于肃清土匪，整理内政，积极建设，及培养民众基础之工作；假使仍旧维持现时之武装杯葛办法，一方面固然与积极建设上有妨害，而一方面要使我们分心于对英交涉而时时顾虑与英发生武装冲突，在此种紧

张空气之下，对于内政的整理实难安心并发生妨害，苟不幸而即与英发生战争，广东革命基础即可发生破坏的危险。由此可知，广东一方面现在既然不怕与英国及香港发生关系，因为自己已有充分的基础与力量，一方面可专心于强固广东的革命基础以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真正的中心，于是对英武装杯葛政策已有改变之必要。

取消武装杯葛，非特是对于广东有益，即对于全国国民革命运动亦同样有益。现在是以广东为根据地发展已占领地域的民众运动及推广此种运动到全国其余各省去之时候，如能够避免使革命基础卷入与英国武装冲突的漩涡中去，因而不致使中国国民运动的全部受一大打击，这是很必要做的事情。这时武装杯葛的取消及罢工的结束，是完全出于自动的，不受对方何种条件上的拘束，以致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受牵制。我们并没有替香港解决香港罢工与武装杯葛，我们仍旧保留对香港的罢工要求，对英国的五卅与沙基要求，如果我们必要时，我们可以重新实行封锁，或其他必要的手段。所以这不是屈服或失败，这是革命策略的改变，因此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影响，只是好而不会坏。

抛弃直接武装杯葛后怎样办法呢？对于省港罢工工人的经济的救济，就是由政府征收特种出入口货消费税，普通品百分之二·五，奢侈品百分之五，专为津贴，维持，及给工作与省港罢工工人之用。每个罢工工人津贴百元，以作找工作的本钱，一方面罢工工人的伙食仍继续维持至六个月之期，假如在这六个月时期中找不着工作，政府仍继续供给罢工工人又六个月的伙食。政府为给工作与罢工工人起见，须立即着手进行筑黄浦港修粤汉

路及振兴其他公用事业。当省港交通恢复后，香港又有许多工作可做，罢工工人可回港找工作，这不是向香港屈服，这班罢工工人经过了十五月后之奋斗，受了许多政治的训练，浸透了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将来是从香港内部破坏香港帝国主义的健将。在罢工工人尚未找着工作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其他香港工会机关，继续在广州存在，以指挥罢工及香港的工人运动，纠察队——香港罢工的先锋，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前驱，仍继续保留，预备将来大举进攻时的先锋向导。

一切援助省港罢工的经济与努力，现在都要集中到广东内部建设及扩大反帝国主义到全国去的工作上面去。

原载《人民周刊》第26期
署名：大雷

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双十节是年年纪念的，但是从没有象今年这样有纪念的意义。因为我们今年纪念双十节的时候，武汉已下，国民政府的势力已向全国发展，与辛亥武昌起义后全国风从的情形，完全相同。在这相同情况之下，细察辛亥革命失败之原因，以做我们目前的车鉴，这是何等重要的事。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国民革命运动之开始，它的使命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可惜，辛亥革命只做了这运动的开始而没有完成这运动，它的未完使命尚遗留到现时。我们现在的运动正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为什么辛亥革命没有成功？为什么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在建立近代的民主国家，而其结果反产生了军阀的专制？个个革命党人及一般民众一定要明白辛亥革命失败原因，而且从没有今天这样我们感觉到这样的需要，及容易从目前事实上得这些原因的。试将其重要原因列举如下：

（一）党没有基础与领导能力。军队作战是要有指挥能力的司令，何况一个革命运动，当然是需要一个有领导能力的党，不然革命势力就如散沙一般，无从作战。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那时没有一个有领导势力的党。当时的党没有

命令自己军队进攻与退守的权力，党的命令不能行之于全党，党员大半是自由行动，以致于党的政策不能一致，革命运动的内部完全在纷乱状态中。清朝政府虽然因早已腐烂而推倒了，但是新起的军阀——袁世凯，以有组织的军队对付内部纷乱的革命运动，当然前者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后者完全摧毁了。为什么当时的党没有指挥革命的能力？因为党在当时没有党军可以强逼执行党的命令之原因，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部不团结及党没有民众的基础。党内部不团结由于是党内没有一致的对外对内政策；例如中山先生主张解决土地问题，而有一般党员以为推倒清朝政府就够了；中山先生主张趁革命势力方兴与袁世凯立刻决战，而有一般党员决定进行与袁妥协。党没有民众的基础，亦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对外对内政策。党没有一个正确党纲，拥护民众的利益而能使民众起来拥护的政纲，因此党的行动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

是否现在领导运动的国民党，内部已团结？是否已有民众的基础？当然现在的国民党比较以前是要内部团结一点。现在大半的国民党党员对于第一次大会的党纲是一致赞成的，所以在这一个党纲之下有许多党员已团结起来了。但是虽然如此，党员对于这党纲之具体实行方面，还没有很多党员能有一致的意见。因为对于抽象的政纲是容易同意的，但是在实际执行方面就发生意见的分歧。如何能使党员大家同意于一个具体的目前的政纲，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党员对工农商学目前的要求及工农运动与一般民众运动，一定要有一致的意见。苟嘴里大家赞成工农政策，但在实际运动上就发生对于工农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能算党员已有一致的团结的。国民党现在已有他在

民众中间的基础，这是大家所看见的，所以能有这点基础，就是因为第一次大会决定了一个拥护民众利益的政纲，这政纲经过了两年的宣传，已经得到一部分人民的拥护，于是国民党可说是在民众有了一部分的基础。但是这部分的基础是不够的，况且这部分的基础尚未稳固，因为这政纲并未能实现，因此民众对于这政纲的信念尚未坚定。如何能使国民党在民众中扩大基础，是现在国民党能否确实领导革命的问题。要扩大民众基础，必须规定一具体而能实现的最小限度的政纲，以为号召民众拥护国民党及参加革命之中心。只是一个抽象的与不兑现的政纲是不能号召民众的了。

（二）没有正确的对外政策。辛亥革命的失败不仅在没有一个能领导的党，并且还在错误的对外政策。辛亥革命一开始，就宣言承认列强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虽然清朝推倒了，但是仍旧接受了帝国主义剥削的权力，这样错误的对外政策，使革命丧失了真正的意义，使人民对革命的目的不能认清。中国的革命如果不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剥削的，便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这运动亦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的。帝国主义的剥削，一切不平等条约，是有他们很久的历史，是帝国主义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获得的，当然不是很简单的很容易的就可以除去的，我们一定要估量一下自己革命的势力与国际形势，然后再决定进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步骤。但是我们对于这帝国主义的剥削，是决计不容承认的。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中国人民所受这种重大的剥削，是国民革命到成功一天之永久目的；那时你放弃这目的，不啻那时就放弃革命。当辛亥革命的政府宣言承认各国条约时，辛亥革命就宣告破产了。

当现在革命军发展到有统一全国的可能时，各帝国主义国最注意的事就是要使这新起的政府能承认他们从中国已得的条约权利，为达此目的，他们会用种种方法，威胁，利诱，欺骗等。英国现在一方面用炮舰在广州，汕头，万县示威，一方面又对国民政府讲交谊；美国公使并亲自来广州与政府当面接头，日本方面亦是殷勤来往。国民政府如要继续为革命的政府，得人民的拥护，必须坚持其反帝国主义的政策。当然反帝国主义政策有种种不同形式，随机应变，而且最重要的是利用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以为革命之利益。虽然现在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弥漫中国，但是有打倒帝国主义的确信的，还是极少数，因为缺少自信力，反帝国主义的勇气就少而易于屈服。现在有一种很大的危险，就是联日或联美反英的主张，如果实行，就要蹈辛亥同样的复辙。屈服于一个帝国主义与屈服在各帝国主义之下，有何分别？这班人常利用对付多数帝国主义的策略来遮掩他亲日亲美的主张。不知所谓对付多数帝国主义的策略，只是利用他们中间的冲突而为革命的利益，并不是对任何国讲亲善，结同盟，或停止民众反对其为帝国主义的宣传。策略是为实现主义，决不是为反对主义。如果轻举妄动，不待省察敌己之势力，然后决定一定之计划，以巧妙的策略，达到反帝国主义的目的，那末，非特对革命没有利，反而有害。例如，如果现在没收美国医院，占据美国教会，就不啻逼美与英携手而促成英国干涉中国之政策。所以我们现在要避免辛亥革命的错误，能坚持反帝国主义的政策，不让任何形式的欺骗而改变这政策。

（三）没有正确的对内政策。辛亥革命没有解决或提出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革命不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不是真正革命。

辛亥革命唯一的口号就是排满，至于中山先生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完全被藏匿而未提出。如果人民生活问题没有得到一点解决，排了满对于人民有什么利益呢？人民在清朝之下受压迫，如果在清朝去掉后仍旧受压迫，那末，对这革命于人民有何关系呢？又如何能得人民的拥护呢？革命不得人民的拥护是不能成功和持久的。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人民生活的政纲，因此人民对于这革命不能起兴趣，于是辛亥革命就以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失败了。

在中国现在的人民生活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中国主要的生产者是农民，而中国的农民，不论他是自耕农，或佃农，每年由他劳力所生产的物品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以下是自己享受的，其余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被地主，绅士，县长，官僚，军阀，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了去。对农民这种残酷的剥削还是封建制度的基础，这不能做近代工业国家的基础，因为工业要发达必定要有市场，假使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是十分贫苦，没有钱买衣鞋或买农具，虽然极少数人有钱但只能多买一点奢侈品，工业的发展是靠必需品而不是靠奢侈品的，中国工业是不能发展的，工业不发展就不能有民主国家的建立的，只要看欧美个个民主国家都是以工业为基础的便可知道。辛亥革命想在这封建制度上建筑一近代的民主共和，当然牛头不对马面。辛亥革命所以没有能产生一真正的共和而产生了一个军阀的专制。如果现在中国的土地问题不解决，就是说如果农民不得到解放，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农民如果已免去现在这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剥削，他们就可以拿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入购买新衣新鞋，新的农具及其他必需品，这样一来就给中国工业一个极大的市场，其结

果中国的工业可以尽量发展。工业发达，工业家自然可以扩大；工业发展，商业当然随之发达，商人又可以发财；工厂多开，工人现在的失业械斗问题可以解决，而工人运动，易于统一起来；智识份子，那时非特可以被吸收于工商业中，并且可以在因农村富饶及工商业之需要而设立之各学校内当教职员。所以农民问题的解决决非农民一阶级问题，而是全中国社会问题，国民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对于这一个问题，非特是中国一般人民没有一个明白的认识，就是国民党许多党员尚不免发生怀疑，只要看他们对于农民运动的态度就可以看见了。这是国民革命的一大难关。对于这个问题不认识，非特是要对于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推动力——农民运动加以忽略或仇视，并且永远找不出完成国民革命的正确政策，国民革命运动可以屡起屡蹶，而始终找不出为什么不能完成的道理。现在中国国民革命已有相当的发展，这样一个农民政纲是不容缓的了。有了这样一个政纲，然后联合为革命阶级，工业家，商人，农民，工人，教员，自由职业者，学生起来，共同努力实现这政纲。

（四）没有真正革命军队。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完全乌合之众，都是些随声附和的土匪及旧式军队。这样军队，非特不能以之完成革命，就是与袁世凯的军队相抵敌亦还差的远。党在那时没有中心的革命军对外可以抵御敌军，对内可以强制执行党的命令。革命一“成功”，各革命军的领袖于是各据一方，各顾各的利益，那里还有党在！党没有可靠的军队，亦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原因。

现在国民革命军善战的风头已经出足，崩坏的军阀军队简

直是落叶不经大风一扫。但是因之而自傲，以为现在的军队就可以完成国民革命，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第一，我们不能否认国民革命军的主力太少，多数是归服过来的，所以就是在战斗力上讲还差得远。第二，所谓真正国民革命军中亦很少够得上说真是党的军队或人民的军队，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军队，能够完全听党的命令或人民的意志？国民革命军现在已经能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命令与人民的意志，已经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但是尚须努力改良，增进政治工作，使现在的国民革命军成为真正的党的与人民的军队。军队要真正能绝对听党的命令服从人民的议决，才能担负他帮助完成国民革命的责任，单是有纪律并且能打几个胜仗，还不能担负这重大责任，拿破伦以同一横行全欧的军队不免一旦败于滑铁卢。我们要记住：要使军队能听党的命令，党一定要有权力，要使军队服从人民的议决，人民一定要有伟大的有组织的努力。

（五）没有省及地方的基础。辛亥革命是上层的军事行动，用武力完成的政变，并没有掀动乡村与各县的基础，在无论那一省革命党没有一点基础；这革命完全不是从下而上的。当时革命党只在上面或表面上在中国南部握得了政权，但是事实上乡村间的统治者仍旧；一方面仍旧是一班保皇党的绅士地痞当权，一方面农民一样受剥削，各县的统治者仍旧，虽然县长已没有满洲人，但汉人的县长代表同样的官僚绅士的利益及充满了皇帝专制的思想；革命党在各省除掉几支乌合军队外，一切行政与财政等都仍旧在反革命的手里，而且占据各省的革命党员大半亦自己争权夺利，离开了革命营盘走进了反革命的堡垒，南京的革命政府只剩了一个空壳子，绝无指挥各省的能力。当各省都愿

意与袁世凯妥协，以图保全自己的禄位，试问南京政府能违反各省的意见而不去与袁世凯妥协吗？虽有中山先生伟大的人格与威信，亦不能有回天之力以挽狂澜。革命不是把上面统治者推倒就完了，而是要把自下而上的一切统治者推倒；辛亥革命只把宣统皇帝及各省督抚赶走就算了事，而各县各村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保留未动，宜乎革命势力一起就被反革命势力压倒。假使辛亥革命在乡村及省县有一点基础，一定可以保存固有地盘，或至少不致失败的如此快法，太平运动亦能支持十五年之久而辛亥革命一年就完了！

现在我们又已到武汉了，国民政府的范围已不小于南京政府，我们应当回想辛亥革命因没有省县及乡村的基础而失败的教训，来提起我们对于省县及乡村问题的注意。在省县及乡村间的旧势力——封建制度一定要把他铲除，因为这样，你才能把反革命的堡垒打破，不然你是永远在常常可被推倒的危险中，因为你这革命的建筑物是建筑在反革命的沙土上面，不论你建筑物自身怎样强固，你是势必有一天要在这反革命的沙土面上倒塌下来的。目前革命党的注意不应完全在国民政府的衙门或总司令部或中央党部，而要更多注意于省政府，县政府，乡村行政，省党部，县党部，区分部。现在应该开始一个大规模的向下运动。现在革命党人的工作应该不容缓的朝实际方面去了。让大家把革命的墙脚弄稳固起来。我们以前高呼的巩固革命基础不过是一句空话，一直没有实现的，现在是实现的时候了！

我们从今天纪念双十节起，应该努力实行下列口号：

（一）到乡间去把农民组织起来！

（二）把各县各省的农工商学联合会组织起来，做国民会议

之准备!

（三）打倒劣绅土豪贪官污吏以铲除反革命的根基!

（四）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以建立革命的民众基础!

（五）建立省县乡村的廉洁政府!

（六）确实开始肃清土匪,积极建设以巩固广东基础!

（七）一切革命分子在行动上团结起来以树立国民党的权威!

（八）建立真能绝对服从党及人民命令的革命军!

（九）规定民众目前最低限度的具体政纲并开始努力实现之!

（十）扩大与增厉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以求不平等条约早日废除!

原载《人民周刊》第26期
署名：大雷

革命一贯的策略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近来国民政府决定撤消省港罢工的消息，已传遍了。我们对于此事应认明的有两件事：

（一）此次撤消对香港罢工，是完全出于自动。

（二）此次罢工的结果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政治上的行动与军事上的行动是一样的，往往因为要顾全全局的计划，于必要时，撤退其一方面的势力。兵要能进，亦要能退，历史上有许多名将是以退兵著名的；因为有一时的退，才能有最后的胜利。国民政府此次自动的撤消香港罢工，并非由于英国有甚么威吓，乃是由于实行一贯的全局计划，认定现时有撤消省港罢工之必要，所以决然实行。这一件事是我们要认清楚的。

与撤消省港罢工同时并行的，有征收进出口特别税的计划。这种计划是于海关协定税额之外，对于进出口之普通货物，加征百分之二·五，侈奢货物加征百分之五，由政府自设机关征收，不假手于海关，这是自行宣告海关不平等条约无效而为收回关税权之第一声。虽说所加征的税率不大，然而毕竟是创了个先例，定了个原则，就是中国海关现在就要着手收回，不问外国允准与否。北京政府积数月之时间，费几十万的经费，请了外国的

官吏在北京过了几个月的安乐生活，开了所谓关税会议，仰承外人鼻息，结果还是未能增加分文，外国还要摆起架子，停止会议，这是何等羞辱的事！而国民政府，只要发一个命令，这事马上就实行了。这是甚么原因呢？这完全是省港罢工的效果。

这个加税消息传到伦敦以后，英政府机关报伦敦时报，便著论大肆攻击说中国违背国际条约；但一看香港报纸呢，却不但无此种论调，而字句之间隐露惟恐征税不早日实现，罢工不早些解决之意。这个香港政府与伦敦政府意见不同之点，是由于伦敦政府事实上处于隔岸观火之地位，未曾如香港政府身受灼肤之痛，就尝省港罢工之困苦与纠察队的味道！纠察队的确是香港所最怕的东西，所以香港政府觉得加税固然不免承认取消了关税协定的原则，但至少加税之后，英国货物是与他国受同一的待遇。"两害相形则取其轻"，这便是香港政府的态度了。自然，省港罢工的目的，不是在于征收这个特别税。但假如没有这次罢工，香港政府对于这事是不会屈服的。所以此次收复这个关税自由的原则，可以说是省港罢工一个附带的效果。

所以我们虽暂时自动的取消省港罢工，却不要忘了罢工的精神，与罢工的利器。英帝国主义尚未打倒，我们不能一日忘记我们的努力与责任。我们将来也许用不着罢工的利器，而另有别的更厉害的方法，然而我们不要忘了罢工的精神。同时我们对于此次罢工工友之热忱与牺牲表十二分的敬礼。

原载《革命青年》第1卷第5期
署名：椿

北伐形成的新局势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这几年来我们常听到一个名词，就是南北问题，北方的军队南下，南方的军队北伐，这都是报纸上面见惯了的。这种“南北对峙”的局势，恐怕在最近的将来便要消灭，而由一种“东西相持”的局面来代替他。造成这种局面，便是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北伐军队由策源地的广东出发不及两月，便收复了湖南湖北的地土，毁灭了吴军阀的根据地，这种成绩，实在由于民众与将士的一心一德。更由京汉路尾追穷寇，以冀肃清河南境内的吴军余众。这个时候，北伐军已入河南境内。同时西北国民军也进了陕西，预备由陕西入河南，从此南北夹攻，吴军余众，欲逃无路了。因国民革命军与西北国民军同时的进展，遂造成北起绥远南迄广东南岸连合十省的大疆土，一齐隶于国民党旗帜之下。

这样的局势，从军事上讲是一个联络的战线。西北国民军在未加入国民党以前，虽与国民党党纲是很表同情的，但在战事上，终是自己作战，与革命军无联络。这种的联络，在战术上是必要的。欧战时候，东战场的俄国军队，人数很多，但因与西战场的欧洲各国相距太远不能联络，所以终归失败。西北国民军这次毅然决然放弃南口，取道陕西以图与国民革命军打成一气，这是一个无上的策略。因为这样的联络，无形中增加两军的战

斗力，实在是不可以计算。

从形势上讲，利益亦是很大的。我们的军队得了联络，便同时断绝敌人的联络；我们的好处，正是敌人的害处。我们的形势，现在是横亘中部的一带区域，完全遮断东边与西边的联络。现在我们区域的西方；只有四川一省，已成中立，不能为患，将来收拾四川，必非难事。并且负隅的云南，现在已完全孤立，束手待毙。所以我们这个联络战线的策略，间接上对于四川与云南两省，未遣一兵，先就收了很大的效果，正如下围棋的办法一样。

再谈到我们的势力，单就面积讲，已比我们现在任何的敌人为大，本部十八行省，便占了十省。一年半以前的国民党，连广东一省都未完全在握，一年以前的时候，只有广东一省是完全属于国民党的。不上一年的光景便收复了这样大的疆域，这是何等的成绩！即此一端，已足增加国民党的威望，不可限量。我们应当继续的努力，将来的成功，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原载《革命青年》第1卷第5期
署名：椿

这次国民党联席大会的中心问题——怎样巩固下层基础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

国民党自从民国十三年正月改组以来，在这二年零十个月中的奋斗，是树立自己基础的奋斗。在这时期之中，党的本身问题是怎样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党：在中央要有一指挥机关，在各省要发展党的组织，能在民众的心目中有一国民党的存在。在政治上的问题，就是怎样使国民政府能够挂起招牌来，怎样使国民党的政权在广东有一基础。这两年多的奋斗，确已达到了这目的——国民党已确实树立起来了，除掉两三省外都有了省党部，他的政权非但在广东已有基础，并以渐次及于他省，国民党已被中外人士承认是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原素了。国民党现在已经是有根、干、枝、叶的一株树了，以后的问题就是怎样使他的根能深入地土，广为蔓延，使这株树能根深蒂固不为狂风大雨所摧伤，使这株树能多吸滋养料以发展其躯干枝叶，以至开花结实。国民党现在已经到了强固其下层基础的时期了。

在过去的时期中，党的全力是用于力求生存的奋斗。党内外的敌人要在党初生的时候，把他摧折，使他夭死。党在政治上的广东基础，是几次险遭推翻，党的十分之八九的人力与财力都

用于与敌人战争去了。在这两年的期间中经过了商团叛变，陈林反攻，刘杨叛变，英帝国主义的进攻，陈林魏熊四面围攻，吴贼大举南犯。刚刚产生的党的全付精神与全身的力量，都用于反抗敌人的进攻以谋自己的存在之奋斗中去了。那时党没有时间去巩固他的基础，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必然了。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新的时期，这新的时期要求我们转变方向，改定方针。这新的时期就是积聚实力以图大举的时期。革命的势力现在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而前进，反有已得者复失的危险。在军阀方面讲，革命军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把他完全摧毁，还须准备自己的军队实力及促进敌军的腐化。在帝国主义方面讲，我们还没有能预备与英国一国帝国主义发生武装冲突，我们还须准备全国民众及军力。在民众方面讲，已组织的民众还是少数中之少数，我们还须在民众中加紧宣传，努力组织。在国民党本身的组织讲，还没有一点基础，县党部与区分部完全没有强大的组织，在民众中更没有多少基础。在国民政府方面讲，也只有广东省的基础，但是广东九十四县中可有几县可以真正算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基础？除非他是一个疯子，没有一个人在现在主张继续大军前进，统一中国。我们现在应该停战休养准备实力。我们目前的要务就是怎样巩固党的下层基础——巩固省党部与县党部；怎样巩固国民政府的基础——巩固省政府与县政府；怎样发展民众的力量——以民众最低限度的政纲集合民众及组织农工商学兵的县联合会与省联合会。当我们专心巩固内部的时候，军阀与帝国主义亦不能来扰乱我们；因为他们现在已是精疲力尽亦企图休养；假使我们应付的策略正确，他们决不会来妨害我们巩固内部的工作。广东已宣告自动停止武装封锁，英

国武装干涉的企图已完全打消；假使北伐军不进江苏，奉军已表示愿与国民政府言和。巩固下层基础，确是中国革命运动现时所必须而定要经过的阶段了。

因此，这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省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他须决定这新时期中工作的方针，不仅决定党本身工作的方针，并且要决定对时局的方针。联席会议必须注重这新时期的特性——整顿内部准备实力。各种问题的决议都须依照巩固下层基础的原则而决定之。不论是国民政府地点的小问题，不论是国民会议的大问题，都须依照这个原则去决定之。

国民政府的地点，一定是要在最合宜于巩固下层基础的地方，这当然是要在广东了，因为广东较他省都有根基故容易巩固下层基础，强固省政府县政府及发展民众的势力。

国民政府与省政府的关系，这亦应当采取注重各省政府各依其特别情形巩固自己基础之原则，而不宜采取集中一切势力于国民政府之原则。

建立革命的省政府，必须注重于县自治及乡村自治，使省政府有强固的根基，并须注重于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及农工商学兵各团体的组织，而特别是农民协会与各省联合会。

省政府与省党部的关系，亦须依各省的特别情形而以最能促进巩固下层基础工作之原则而定之。

目前的政纲，须注意包涵最多方面最大民众之目前切身要求，而特别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的要求。假使能有这样的政纲而开始实行之，那么，国民党一定能得到大多数民众之拥护，所谓巩固下层基础之工作已经做了十成之八九了。

国民会议问题，亦须从下层工夫下手。假使国民会议没有民众团体的实力拥护，即使开了亦是无用的，因为他的议决是不能强制执行的。故现在应组织省民联合会与县民联合会使国民会议真正召集时有确实强固的基础。

恢复党权与强固党权，当然是这次会议最重要问题之一。但是恢复党权与强固党权，不只是党有一强固中央机关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有强固的省党部与县党部。强固的有民众基础的省党部与县党部不是那个武力所能推翻的，中央党部要有权力能指挥而不被摇动，亦必须依靠有各省党部与县党部的拥护，这种拥护不应是纸上的拥护而要是确有实力的拥护；纸上的拥护，早就有了，不过要使人不敢违背中央的议决，省党部与县党部必须能以民众的实力与在军队中同志的实力来强迫执行之。

所以，巩固下层基础，应是这次大会的口号！做下层实际工作，应是个个国民党同志的口号！

原载《人民周刊》第 27 期
署名：大雷

今年的改约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

废除中国与外国间近尚存在的条约，与修改条约问题是两件事。我国身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于今已有几十年了。这些条约，使外国人在中国的本地，于经济上，政治上，乃至社会上，变成了中国的主人与专制魔王，为主人翁的中国人民，反而变成了他们的仆役，替他们执洒扫。这种“反客为主”的局面只有在愚昧的晚清时代，才可以继续，到了现在，是不能任其存在的。我国人民近年来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主张，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废约的意思，是说将未到期的条约之中凡属违反国际平等原则与违害中国之权的条约，撕碎毁除，另定新约。废约的事，并不是很希奇的。凡不到期的条约，以及字面上无期限规定而似属于天长地久的条约，都有废止的方法。依照国际法，凡法律失其时效，初订约时之情形已不存在时，该项法律即可废除，这是一种极平常的知识。何况——何况明有约文规定有一定期限，而今年又值到期的条约，如中比条约，安有任其再行继续的道理呢？所以关于喧传甚久的中比条约，还谈不上废约，只是照法定手续的改约罢了。

中比条约，成立于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计四十九款，另有附款九条。该约规定每十年一次为改订时期。

依此规定，本年又适值改订之期，中国驻比公使已遵章于六个月以前通知比国政府，准备届时修改。比国借该约的护符享受特别权利，于今已六十年，其不愿取消此约，另订新约，自然是意中事，惟比政府可持以反对之口实，则为该约第四十六条之规定：

“日后比国若于现议章程条款内有欲行变通之处，应俟自章程互换之日起至满十年为止，先期六个月备文知照中国如何酌量更改，方可再行筹议；若未曾先期声明，则章程仍照此次议定办理，复俟十年再行更改。”

比国政府的意见，以为依此条约之规定，只有比国有修改此条约之权利，中国政府是没有的。假如中国政府有异议时，将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公判。这是比政府的主张。在中国方面，当初订约的人的昏聩，原不止这一条，本已无可讳言。但契约的根本性质，是双方的。凡单方的契约，就是说权利完全属于第一方面，义务完全属于第二方面的契约，虽经签字，亦不能成立。所以这一条是违背了契约根本的原则，不能成立。但我方关于此等问题，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废，绝不能容纳比政府的意见，提交海牙法庭，因为海牙法庭的权力，只及于解释法律问题，中比条约绝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人主张提交国际联盟，但这一层亦要详加考虑，因为国际联盟，虽在原则上尊重国际平等，然而在实际上是大国把持的一个机关。假若我们提出国际联盟，大国中有那几国可以帮助我们呢？愿意帮助我们的俄国，不在联盟之列。德国虽为与我国有平等条约的国家，然我们至多只能希望他在国际联盟守中立，因为德国现在在商约方面，是无不平等条约之名，而享有不平等条约之实惠，中国不愿意使德国商人在中国市场立于不利之地位，允许德国货物不纳较高于

他国之税。这种便宜，关税自主早一日实现，便要早一日取消，因为那时德国货物必与他国货物受同一较高的税率。至于英法日的态度，我们不问而知是反对我国的。因为比国现在算是他们的先锋，比国的例一开，他们就倒得更快。比国与他们是立于“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地位。自然中国与英法日意美等国间的不平等条约，迟早总是要取消的。但各国为苟延其特殊地位之寿命起见，自然希望取消的越迟越好。假若比国的先例一开，则将来处置他们在中国优越地位的命运，更见其容易了。我们关于将中比条约提交国际联盟的问题，更有不能不注意的一点，就是英比两国的关系。英比两国的关系在现世史上，一向就异常亲密。这个亲密的关系，不是由于感情上或道德上来的，乃是完全由于地理上来的。欧洲大陆，除法国的海口以外，离英国最近而最方便的就是比国的海口。比国西方的阿斯旦海口，距英国仅四五点钟的海行。比国实在是英国在大陆的门户，比国的情形，决定英国的安危，实大而且深。百年以前，拿破仑说，谢尔特河 The Scheldx，就是刺英国的心的一把剑，这个谢尔特就是比国的一条大河。就是说，凡占据比国的国家，可以制英国的死命。欧战初起时，英国原守中立，他的态度是看德国是否有意侵犯英国，完全以侵犯比国与否为凭，后来德国的兵进了比国，英国就马上向德宣战，名义上是为保障比国永久的中立，实际上等于兵临城下，不得不动了。所以比国以弹丸之地，在欧洲有举足轻重的势力，就是由于在地理上他与英国有存亡关系的原因。英国利于一个强的，独立的，而受英国影响的比利时，而不利于一个弱的，受他国影响的比利时，这是英国外交部锦囊妙计中关于欧洲大陆的外交的一个方式，历次外相，相传不变的！所以自欧

战告终以来，英国处处替比国帮忙，扶植他，使他早早恢复。而比国的外交部，简直可以说是英国外交部的支部。我们若要将中比条约提交国际联盟，就要特别注意这个英比关系。

据国外的报纸所载，特别是美国的报纸，此次比国对于中国要求修改中比条约的事，所以敢持这样不讲理的强硬态度的原因，完全由于英国从中作梗，在里面捣鬼。英国就是比国的后台老板，鼓励比国政府与中国为难。比国政府有了英国外交上的援助，自然更觉得势力雄厚，不肯就范了。所以这一次对比的交涉，又变成了中国对英的交涉，更使我们明了国民党对外政策，首先注重反对英国的道理，实在是一点不错。英国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影响，实在是比任何国都要大而且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将中比条约提交国际联盟，能操胜算吗？国际联盟，差不多是英国的东西，由英国一手造成，由英国一手掌握。美国的总统威尔逊上了当，所以美国人民不许美国加入。现在欧洲的两大势力，不是一边是俄国，一边是英国吗？所以这个英国人的机关——国际联盟，始终不许俄国加入，反要强拉俄国的朋友德国加入，以孤俄国的势，这不是敌友之分，显然明了的痕迹吗？所以要将中比条约修改问题，提交国际联盟，无异有理的官司，打成无理，白白的断送了能操胜算的一个案件！

我们应当怎样办呢？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现成的办法——经济绝交，"杯葛"，这些都是我们对于商业最大势力最强的英国行之，使他屈服早有成绩的办法。老实说，对香港罢工，虽现在自动的解决，然对于英国人早已杯弓蛇影，闻之色变，罢工纠察队的影子是英国人心里最可怕的厉鬼。我们有这样能操胜算的方法，何以不用，而去冒国际联盟的危险——而去蒙国际联盟的耻

辱呢？因为中国一手提着中比条约，不去叩国际联盟的门则已，假如去了一定是受一番申斥，掩泣而归的。这不但是“聚九洲之铁，铸成大错”，而是照一句欧洲外交上的成话，“比大错还要坏”。我们现在用这样的方法，已经是声名大著，极有成效，世界上有那一国不知道？我们现在对于比国，不待实行我们的经济绝交，只须将这工具举起来给比国看看，就可以屈服他，演一个“死诸葛骇倒活司马”的故事。比国现在所怕的，也正是在此，所以他要求在这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中国可以与比国商量一个暂行条件，以“不歧视比国货物为原则”，这是比国心虚胆怯的明证。我们可以在相当的期间，允许行这样暂时条件，一方着手与比国改约。若比国不改态度，则重征比货之税，使之不能与他国竞争以报复之。比国决不敢轻于用武，因现在各国舆论莫不认我国之态度为正当，我国之要求为合理。若不幸须经过此一番的纠葛，比国政府，亦可以算是敷衍了英国的面子也就软化了，必不能坐视他国的货物源源入口，而自己独后也。因为比国就范，从比国自身看，现时不但无害，并且有利，可以享德国已得的待遇，暂时受不平等商约的实惠，而无施行不平等商约之恶名。比国现在之所为，对于英国是“代人作嫁”，必非甘心，亦不能持久。外交是一种“拔河”的游戏，持之最久者得胜，望我国民一体坚持到底。

总而言之，中比条约改订的事件，不仅仅是中比两国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是中国对英国的问题，更进一步，是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的先决与根本问题！

原载《革命青年》第1卷第6期
署名：之椿

一年以来政局的回顾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近几年来国家总算是多事之秋了，但求其变动的快与发展的奇特，莫过于过去这一年。这一年所经过的事情，不仅是些简单的孤立的事实，乃是一些事实经过了长久的滋长，表示成熟的现象了。自民国成立以来以至现在，所发现的政治上的事实，我们不能当作孤立的不相联属的东西。若是这样看便大错而特错了。严格讲起来世界上本没有不属于因果与系统而独立的事实，何况政治上的事实，更是人类最大活动的表现，那有孤立的呢？在这些纷纭错杂的现象里面，现出个头绪来，便知道有些线索可寻，并且这些线索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政治世界内，都有几种相冲突的势力，这一年来国内的政治上有几大势力呢？这几大势力的基础与发展，在这一年来呈甚么状态呢？再进而言之，这些势力的消长，究竟有甚么意义呢？这些问题是时常起伏于我们心中的。每年双十节重临，大家无论是悲观或乐观，总免不了要回头看看过去的历史，而在今年的国庆纪念，这过去一年的事实，诚有特别值得我们回思的价值。

从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十月，中国的疆土上没有一个月没有战事。以前的战事，没有绵延到这样久的。这也可以见得过

去一年的特别了。去年十月的时候，正值段祺瑞为执政的时候，国奉两军正在北京暗斗，使受奉系卵翼的段祺瑞，觉着两大之间难为妇的味道。这个时候，正是各方面暗中酝酿反奉的时期。我们可以将过去一年的战事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反奉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反国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这三个时期，虽在交界的期间，不免互相错杂，而大致是可以分开的。如由反奉变成反国究竟是在那一天，颇难指定，而在反国军事尚未停止的时候，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经开始了；但大概我们可以说，从去年十月初到十二月尾郭松龄之败为反奉时期，由郭松龄之败到今年的六月底与七月初是反国时期，由七月初到现在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综观中国的全局，一年来各种势力之消长，都是集中在这几个战事里面。至于北京的政局的变幻，都是侧面的文章，本身无甚重要，亦不过因关系势力的消长，随之而变更罢了。

一，反奉之战　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奉系势力，大为扩张，除先后夺得直隶山东外，更伸其力量于长江，这是奉系势力从来未有的最大限度的扩张，姜登选既得了安徽，奉系又派杨宇霆督苏，其势焰之逼人，不能不引起各反对方面的侧目。各反对方面为自存计，不得不发难，所以反奉运动在这个时候，真是急于星火。这个反奉的战局里面，又可分为三个战场，一在长江下游，二在豫鲁，三在北方。在长江下游的，是始于苏浙战事，浙江孙传芳鉴于奉天势力已及卧榻之侧，乃联络安徽，江西，湖北先后发难。奉军以战线延长，四面皆敌，而在河南之国民二军又在在足以危险前方与后方的联络，所以战事一开，即迅速撤兵北归，由沪而宁，由宁而徐，节节退让，中间在蚌埠徐州等地，曾经

大败，而在南京之一师因退走不及被孙军缴械，综计损失颇为不赀。这一役的结果，孙传芳的势力大为扩张，从此中国局面上又新添了一个军阀，真所谓“竖子成名”了。同时还有一个结果，就是直系的复活。孙传芳初起兵的时候，很利用鄂赣皖共同讨奉为之声援，所以蛰居岳州的吴佩孚遂于十月二十二日在汉口受职为讨贼总司令。所谓贼即指奉军而言，但当时吴军与奉军并无任何地理上的连接，实无冲突之可言，吴佩孚不过利用这个机会，图谋再起，恢复势力而已。因吴佩孚之再起，遂又形成去年年底鄂豫之冲突，这个冲突，应当归入第二期的反国战事之内。长江下游的战场，因孙传芳军队已到徐州，可以算是告一段落，可以谈到豫鲁的战事了。当孙传芳初起兵时，豫之岳维峻领袖国民二军，意存观望，及至奉军节节退败，岳维峻看见有机可乘，方才动兵攻打山东，这不是替孙传芳帮忙，而是谋得山东的地盘，因为国民二军之想得山东已非一日了。所以豫省的军队不于十月中旬苏浙动兵之初出兵截断奉军归路，而直到十一月初旬才与孙兵夹攻徐州。此后豫鲁战事入于混沌之状态中者多日，亦为国民二军瓦解之初步发动。奉军在南方既失利，同时在北方之反对派谋奉益亟，是为反奉战争在北方之战场。郭松龄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兵反奉，向奉天进攻，连战皆捷，至十二月之末大败被杀，为期不过一月，是为反奉中之最显著者，而亦为奉系生命从来未有的危险，这一役的末期奉张已预备离奉，若非日本的帮助，张作霖本身之势力，早已倒了。在这个郭松龄倒戈的时期中，有可以注意的，就是国民一军的势力，成为北方最大的，处处与奉军以压迫，段祺瑞屡请冯玉祥指导政局，是为国民一军势力最盛的时代，也就种下了第二个时期的反国运动。

这一期的战争，仍然是军阀自己混闹一场，是继续一种的循环战争，除了造成孙传芳的势力与使直系复活，并使奉系大受挫折外，没有别的结果可言。

二，反国之战　这个战争可分为两个区域，一是在中部的，一是在北方的。在中部的为直国之战，起于十一月中旬鄂军之攻河南。当十一月初豫军进攻山东的时候，原希望鄂不来犯，才免后顾之忧。但吴佩孚既再起汉口，志在力谋恢复失地，可以在豫军东去防务空虚的时候，知道时机到了，就出兵攻河南，以致国民二军前后受敌，其势不支，所以国民二军去年年底就完全瓦解了。国民二军的命运，真所谓"螳螂捕蝉，不知黄雀之在其后"，结果之惨总算自己失策。而吴佩孚由反奉的招牌不转瞬间变成联奉反国，军阀之无耻，从没有比这一次再明显的。国民二军既散，国民一军在北京之势力又孤，所以对于北方反国的战场上，弄成直奉联军联合压迫国军之形势。在天津一带混战一场之后，国民一军退守北京，后复由北京退往南口，本年三月与四月上旬为国民一军最困难时期，四月中旬遂全数退南口。遂成奉直联军挂起"讨赤"的招牌以攻国民军之战事。南口虽为天险，后以奉军在后方获胜，南口与张家口之联络大受危险，遂并南口亦不能守，此为八月中旬的事。后来又由张家口退往西北，此时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已经拔动一月有余，本年国内战事已入于第三期了。

反国战争之结果，使国民一军受创不浅，中间复经山西之阎锡山加入，形成山西与国民军局部之战。综计国民一军之损失不下两三万人，而奉直山西方面之死伤更多。至于各系经济上与内部所受之影响，亦深而且巨。但就中国革命前途上讲，反国

之战，却有一个好的影响，就是促成国民一军之觉悟与加入国民党，此在中国政治上，是有重大关系的。

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这一段的事情比较的近，大家都还记得清楚，不用细说。北伐军的出发虽在七月初，但在七月以前湖南已经发动。因这一次的北伐，形成国内一个新的局面。革命军于短小的时间内，打进湖南湖北直捣武汉，更进而规复河南与江西，使新复活的直系，完全溃败，席尚未暖的孙传芳一蹶不振。北伐的工作的初步，就推倒了两个军阀。并且新加入国民党的国民第一军又出陕西到河南，与革命军联合战线，所以中国的局面，在北伐以后，只剩下两个不能两立的势力，一个是军阀中势力最厚的奉系，暂时掌握北京的政局，一个是代表国民革命事业的势力。这两个势力中，前者是完全靠武力的组织，后者的武力不过是他的势力的一部分。现在这两个势力，接触日近，奉系的张宗昌已经分兵南下，第一步的目的，为恢复一年以前失去的地盘。其与国民革命军的接触，是在何时何地，都不关重要，但这两势力之必出于冲突，与必不能立于两存之地位，是一定的事情。这就是国内黑暗势力传统思想，与进步的光明的思想，两种势力的大冲突。

这一年来中国政局上的主要文章，就是这几个战争，其余的事，都是枝叶。甚么颜阁杜阁，甚么关税会议，都是没有任何成绩，没有任何意义的。惟有这几场战事都是国民革命事业所必经的过程。在这一年之内，我们在消灭军阀上有了相当的工作，总算是一个成绩。我们将这一年的事情综合起来，可得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我们看得出来，这一年的战争，明显的指出来国家新

旧思想是不能融洽而必出于冲突的。国民于这一点，要看得清楚，然后可以决定各人自己的地位。一国思想的影响，不仅是在思想本身界内，乃是在日常生活，经济上，社会上，种种的生活上，有具体的表现。一个时代一部分的人的思想假若是与另一部人的思想有根本冲突时，这两派人到了激烈的时候，必出于战争，许多国内国外大战争，都可以说是思想的冲突。一年来的战争，军阀是旧思想的代表，是腐败政治，腐败人生观的明显的代表。凡是站在新思想新时代的人，都不应与他们妥协，因为思想冲突，是无妥协之余地的。结果新思想总是起来代替了旧思想，这是世界上进化很明显的公例。固然，战争是很残忍的，是极不经济的，但我们必须忍得暂时的痛苦，才能得到永久的幸福。年来每次大战初起或正在进行之时，必有甚么名流，呼吁和平，这至少极无聊的事。因为假若是军阀自相残杀，那是循着最野蛮的互相消灭的办法，亦是逃不了的。假若是进步的势力与反动的势力冲突，我们不但不应该说甚么和平的话，兼且应当参加到进步的势力方面去努力，因为在这一种国家前途民族生命的战争上，一国的人民，是不应当守中立的！

第二，我们特别的在过去的这一年中，看清军阀的末路到了。军阀犹如一种暂时的制度，只能在一种相当的环境中生活。环境换了，时代变了，这样的制度，必出于消灭的一途。军阀可以从两方面消灭，一是内部的，一是外来的。军阀的本身含有天然原有的弱点，在军阀最强盛的时候，败亡的征兆就出现了。可以说，军阀势力越强，败亡的势力也就相当的越大，正如物理上物体上升越高，其下堕的力量也越强一样。这种势力是无法可以避免的。又如一派的社会主义学者所说，资本家越发达，资本制

度颠覆得越快一样。军阀的基本势力是完全简单依赖武力，此外没有高于武力的一个主义去维系在军阀旗帜下的人，使他们不生离戴之心，去年郭松龄之倒戈，残杀同类是一个明证，这是近几年少有的事。而至去年乃大暴露的一个现象。军阀未强盛之前，大家有所为而不愿发难，及至大功告成，一翻手就可以变易朝代的姓名，这件事谁有力量，谁就要动手了。但即便可以暂时免去倒戈之事，而祸患之来，还有一个方面，比这个更烈，更无从逃避，就是军阀手下财政的破产。这又是各军阀这几年以来的公同病象。奉系今年因国军之败入据北京，可以算是奉系这几年未有的局面。但同时我们听见奉垣的富商因操纵金融被张作霖枪决多人，则因奉天不换纸币价落，致张出此愚笨之下策。奉天纸币，若依每次战争增加的倍数计算起来，奉国开战之后的数目，当离十万万元不远，所以今日奉票毫无价格可言。历来战争凡不能维持其金融者必无幸免，所以最后的胜负不是决于战场，而是决于市场。这种经济情形亦是奉系从来未曾经历过的经验。即此一端我们可以决定国内势力最大的奉系的末路，也不远了。虽说军阀本身，因着自然固有的弱点，必不出于倒之一途，但我们决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坐视国家的前途受军阀的蹂躏；因为在未消灭以前，军阀可以卖国，可以借用外力以图苟延残喘，可以做出种种的恶事，所以不能不用第二种方法来消灭他。第二种方法，就是外来的革命的武力。

第三，从种种方面可以看出来因着过去一年政局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的使命益加显著，并且这种种方面的事情都指示我们说，国民党在中国政治上负责任的日子到了，就是在目前！这不仅因为国民革命军恢复了这许多的地方，推倒了这许多敌人，

而是由于全国国民与世界人民对于国民党从来没有今年欢迎这样的热，希望这样的大。他们所欢迎的，是只有国民党能做革命的事业，所希望的，是国民党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负担他们的付托，能做建设全国的事业。外国方面现在别的问题都放在一边了，他们心中已经发生了是否应当继续承认北京政府的问题。今年有几国正当与中国改订条约之期，就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北京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自然是否应当与之交涉改约，抑与国民政府交涉，在他们中间已经成了问题了，这亦是往年所未有的事。自然承认国民政府尚非一日之事，但至少可以指示我们一件事，就是外国对于国民党与其治下的国民政府，已有了新的了解了。在这种情形下的从事革命的人，对于自己的责任，自然是特别的重大，因为中国的命运与国民革命事业的前途，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

原载《革命青年》第1卷第7期
署名：之椿

司法改革与中山大学改组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有许多智识高深的先生们，他们的革命的要求亦并不十分大，但是他们很责备国民政府以前不能对于教育与司法整顿及改良，甚而至于说国民政府这种忽视教育与司法简直与北京政府一样无异。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一定是比这班先生多且大，但是我们并没有责备国民政府过去对于司法与教育没有能注意，我们倒反觉得这班先生对于国民政府这种苛责，于革命运动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他们的目的，不论其主观上如何，客观上是要证明国民政府与北京军阀政府一样，混乱人民的观听，故意抬高北京政府身份而减少人民对国民政府拥护。我们不是说：教育与司法是应当被疏忽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是主张彻底改革的，国民政府是应当极端注意的。不过，假使当一个青年自早至晚工作才求得一碗饭吃的时候，你责备他懒不求学，这样你是要避去如何改革社会使这青年能求学的问题，而以不求学的责任加诸青年自己。国民政府在过去的一两年中犹如这青年一样是正在争生存的时期中，一切的财力与精力都用于与敌人的斗争中去了，假使那时对于这战争分散了一点注意力就会至于失败的，教育及司法这两项事在那时当然还不是国民政府

生命所绝端需要的，假使那时一定要国民政府整顿教育及司法，这不啻叫那青年饿了肚子去读书，非但读不成书还要马上饿死呢。所以当时非但没有力量实行改革教育及司法事，就是一般经济的建设事宜亦做不到。

但是现时国民政府争生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除掉他维持及发展自己生命所需之外，尚有余力可以顾及教育与司法等事。革命不是单求打倒敌人而已，而且是要给福利与人民。革命是人民的事，所以革命一定要人民一致参加才能成功，要人民能来参加革命，一定使革命表示能与人民以幸福。代人民而革命及革命成功再给与人民以幸福这种观点，是绝端错误的。在革命的行程中，革命党非特要宣传自己与人民一致预备的政纲，而且必须尽可能的范围内（即以不妨害与敌人战斗的限度中）给与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教育上积极的权利。人民得到了这种权利后，更能增加对敌人的战斗力。所以一个革命党除掉他的党纲——根本主张之外还有所谓目前的政纲——是目前可以实现的人民的要求。国民政府现在既然可以注意到人民的教育司法改良的时候，应当立刻实行。我们固然知道国民政府经济的建设计划的实现更是重要，但是开始注意与着手进行教育与司法改良事宜已是目前很重要的事了。

徐季龙先生发起的司法改革的运动及中山大学决心的改组，不能不算是国民政府下司法与教育改良的先声。对于这两种运动是应该得到一切革命分子及民众的赞助的。我们赞助这两种运动的目的，不仅是要国民政府确切表现他努力企图为人民谋幸福之志愿，并且要攻破广东各反革命堡垒中之两个堡垒——法庭与广东大学。法庭与广东大学过去做了不少危害革

命的事业，现在为巩固广东革命基础起见，这两个反革命的大本营要攻破。不过，我们要知道司法或教育的根本改革，从反革命的司法与教育变成完全革命的教育与司法，不但要求革命党与革命政府极大的果断与勇气，更须在国民革命完成之后，因为司法或教育的革命是中国整个革命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希望于这种运动过多，希望过多是要失败与失望的。

原载《人民周刊》第29期
署名：大雷

《广东各界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大会特刊》发刊词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

本党自去年五月间，出师援助湘省反吴战争，七月正式誓师北伐讨吴。计自粤出发之师有六军之众，加以桂中一军，湘中一军，共得八军，约在十万人之谱。以此有主义有训练之革命军，下长岳，收武汉，克南浔，服川黔，复闽浙苏皖，前后不过半载，竟将全国巨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数十万之众，击败如摧枯拉朽。试问此系伊谁之力？自然，这是由北伐阵亡诸将士，笃信三民主义，热诚替全国被压迫群众解除痛苦而牺牲的鲜血与头颅换来的代价无疑了！我们对此以鲜血头颅换来现在两粤的安宁巩固，湘，鄂，川，黔，赣，闽，浙，苏，皖，豫等省的欢乐与自由；及由先烈之血，沃出民族自由之花，先烈之身躯头颅，筑高了中华独立国际间之地位的北伐阵亡诸将士的伟大精神与伟大功绩，我们不但羡慕赞叹，我们更当时时记念，继续先烈这种革命牺牲的精神，完成先烈未竟的志愿。我们知道，吴孙虽倒，而张作霖尚存；本国军阀虽败，而国际间帝国主义尚逞凶横行，我们在记念——追悼——北伐阵亡诸将士之时，当觉后死者责任之艰巨而加以努力，将借北伐诸先烈之精神，熔铸成打倒军阀，打倒帝

国主义之国魂，此广东各界追悼北伐阵亡诸将士大会所由举行也。

惟是此次北伐，以八个革命基本军队作战，牺牲已在数千人以外，若再加上新附之众与及前线上之农民，工人，学生等同志之为作战而牺牲者，其数更不知若干，我们在打倒军阀工作中，农，工，学生之血，与我们革命军之血同流，农，工，学生之头颅与我们革命军人之头颅同掷于军阀刀斧下；我们在追悼北伐阵亡将士中，对于各方被牺牲之革命同志，亦加以同样的悼念。可惜我们远在岭南后方，在各军之先烈，已不能尽举其姓名与事迹，其他各方牺牲之先烈，更难一一叙述。但我们为使后方认识北伐诸先烈精神起见，试一读第四军作战经过，便足以见我北伐诸将士壮烈牺牲矣。现虽搜求得极微少之姓名事迹，亦尽先刊印成册，以遗纪念，其余全部烈士姓名事迹，俟广为搜求，再加刊布，此则本刊急事出版之微意也。

我们现在北伐，正当继续进行，我们后死的革命同志，将随湘，鄂，赣，闽，浙，苏，皖各地牺牲之先烈血迹而前，其数尚不知若干，我们追悼上举各地牺牲之先烈，不过表示我们之心愿，表示我们之志向，使死事先烈，得以瞑目于地下。其实我北伐追悼会的真意，非达到全国统一，扫除军阀之后，不能完了，换言之，我们北伐追悼会，不但追悼过去死事之先烈，正要追悼现在前方火线上之军人；不但追悼现在前方火线上之军人，正要追悼后方一切开会的革命民众，因为真要完全达到北伐之任务，非要我们全体民众决心誓死不可也。所以在此薄薄纪念册上，我们绝不以作平常纪念册看待，我们尤其不作仅仅纪念册上的数十先烈看待，望我们后死的同志，速速准备我们的工作，加紧努力去增

厚此纪念册，此是发刊此册子的一点意思。

原载《广东各界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大会特刊》
署名：雷

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帝国主义困迫武汉抑系工农运动？是要巩固革命不是要放纵反革命。

帝国主义真厉害！先是几十条兵舰几千大兵，帝国主义要用武力压迫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汉，后来因为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及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结果未能实行；但是是否帝国主义破坏武汉革命根据地的阴谋和缓了呢？没有，非特没有，更外加厉了呵！帝国主义采用了更厉害的策略——经济封锁武汉的策略。他不仅是把他们在武汉的银行关闭，不接受中央银行钞票，不与武汉做买卖，并且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停止沪汉的汇兑，断绝长江的交通，串通武汉奸商破坏金融，停闭工厂商店，蒋介石组织土匪，勾结军队，造谣恐吓——闹得武汉社会鸡犬不宁，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财政困难；湖南有许克祥之变，湖北有夏斗寅杨森于学忠张联升及鄂东土匪的蜂起。尤可怕者，革命的内部发生了摇动。我所以说：帝国主义真厉害！

但是一般革命者不是完全明了我们现在两湖的厄运是帝国主义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所给予我们的；有很多革命同志虽

然很反对反革命，但是不自觉地很听信他们的话，说：现在两湖的厄运，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我们革命基本势力——工农运动所造成的。以前我们听见反革命说我们的工农运动是地痞流氓运动，我们反驳他攻击他，但是我们现在自己亦承认目前两湖的厄运是因为地痞流氓运动！蒋介石脱离革命，据说是因为工农运动的幼稚病及革命运动的进展太快了；现在我们自己亦是口口声声骂工农的幼稚与过火，把现在武汉政府一切困难却推在工农运动身上。几乎大家认为：假使没有工农运动，许克祥与夏斗寅是不会反的，政府的财政是不会困难的，甚至以为国民革命就可安安稳稳成功的。这话当然说得似乎"过火"一点，但是试问现在是不是有这一种的空气。敌人向我们的进攻，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最怕的是：我们把应对着敌人的枪口来对着我们自己的基本势力示威。这是在目前敌人压迫我们的时候最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件事。

假使我们能了解：现在我们的厄运是反革命给我们的；现在是反革命四面八方来压迫及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局面；因为敌人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进攻我们，而我们自己是无组织的抵抗，因此我们现在落在很困难的地位。那末，我们现在应付的方针，就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

工农群众一旦感觉到帝国主义军阀及封建势力的压迫一松，他们马上就如怒潮汹涌地谋自己的解放，他们在这种初期解放运动中因客观的情形，不免是一种缺乏组织的状态，苟能有大批的干部人材及上面的正确领导，亦能有很多的补助，但是事实

上，这两种主观的条件是缺乏了的。群众这种初期的猛烈谋解放的一种欠缺组织的运动之阶段，在无论那一个革命中所不可免的，自法国大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如此，就是中国以前各朝代更换的时候，所谓真命天子出世，亦不免有一个时期的混乱，何况是一个革命——一件砖头瓦片大翻身的事件呢？

这种欠缺组织的初期状态，当然不应永久让他继续下去，为什么不能让他继续下去呢？因为初期的解放运动把反革命打了一下，反革命因为没有准备而暂时溃退，但是反革命不是那样容易扑灭的，他受了一次挫折后，必然是卷土重来，这时的反革命不是以前那样无组织的无准备的，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反攻，革命势力为应付此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敌人，非自己亦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抵抗不可，不然革命是要失败的。所以跟着这初期的欠缺组织的解放运动的时期，即应该使民众运动更有组织更有纪律及更有计划。

这次在反革命有组织进攻时，我们很不能制胜，因此要稍退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没有及早以政府力量巩固革命的胜利，没有使民众运动更进一步而有组织，庶几反革命来反攻时能有充分的抵抗力，或者使反革命虽欲反攻而不能。所以现时我们在反革命有准备的进攻而我们没有准备的抵抗时，我们要退却一步以便整顿我们队伍使有纪律有组织以谋最后的胜利。同时国民政府赞助民众而镇压反动之职任，格外严重了。假使我们现时看见反革命势力浩大及革命势力无组织，我们就忘记了抵抗反革命，或竟转而撤散自己队伍，长反动派之气焰，在客观上便是满足敌人的欲望，这便是革命的危机。

因此，本着以上的理由，我们对于湖北省现时应做的事件列

举如下：

一、革命纪律是巩固民众运动，而不应是压制民众的。省总工会好久以前就颁布了工人革命的纪律，最近又有工商联席会议的议决，苟能切实执行，非特是工人运动更有组织，即城市中等阶级亦不能表示不满。不应不履行自己同意于前的劳资契约。否则社会上之纠纷，是不能由工人负责的。农民方面因为人数之多与散居地域之广，更需要实行革命纪律，使省农协会能依照一般革命的需要指导农民群众。但是此种革命纪律对民众的实施决不是几道机械式的命令所可做到的，应该有一个广泛的宣传运动及积极的指示。对革命的民众固然要有革命的纪律，但对反革命尤其要有严格的镇压反革命的纪律，如对奸商操纵金融粮食，贪官污吏勒索行贿，及劣绅土豪的屠杀良民，必加以更严重之处罚，至于许克祥等类之叛变，更须以革命的军律处治。

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地位之提高并巩固其下级党部。党部一定要能依照党的政策与领导民众，而不应与民众团体站对立的地位，党的领导地位决非以命令式的办法所能做到的，第一，要使党不是少数机关上人的党而能群众化，第二，要党有正确的政策去影响民众。下级党部因在和平时代发展的多投机分子，所以应改组的要无所顾忌地改组之，并使下级党部要绝对听省党部之指挥，如此省党部的威权自可树立，省党部权力既已树立，再加上中央党部时常有正确的指导给予省党部，那时一切本省政务党务必多能上正轨。仅仅嫌恶之而不加以指导与改正，此非求党改善之道也。

三、给农民政治上经济上正当的出路。现在乡村中有些地方

还是开始或正在与劣绅土豪斗争，除非我们改变不革命，不然我们一定要帮助农民来铲除此种封建势力。所以继续进行打倒劣绅土豪的运动，是必需的。如果省农民协会及党部能实际领导，那末有少许流弊当然可免去。有些地方劣绅土豪势力已大致消灭，农民已确实把有乡村的政权，此地乡村自治就应当立刻实现，给农民政权以法律上的保障。苟一方面农民已握乡村政权而一方面政府又不以实力赞助农民铲除土豪劣绅之政治势力，而切实实行乡村自治，使农民能依导施行，因此而发生法律上的纠纷，其咎当不能归之于农民。农村经济因劣绅土豪之封锁经济，贫者无处借贷，金融停滞；当然我们不能采取压迫农民再使当铺老板或高利盘剥者回复吸血式的放债政策，所以我们一定想一种新的乡村金融方法，农民银行的设立及合作社之推行，是目前绝对必要的。现在鄂西鄂北是在反动军阀蹂躏之下，鄂东鄂南土匪如毛，罗田，黄安，麻城，崇阳，通山，蕲水等处不是遭了屠杀的，就是马上要受屠杀的，我们不能单单注意到几个土豪劣绅被农民枪杀的事实，而痛骂农民该杀，我们更应打听一打听农民被屠杀之事实，全省农民被反革命所屠杀者总有数千，这总不能说他们是该杀的罢！所以在此种乡村反革命势力进攻中政府应派军队剿匪并帮助农民武装起来以自卫。对农民运动单单是消极的禁止，或下令解散是不够的，是应该有积极的领导与给农民以正当的出路。

湖北问题整个儿的解决，当然不能只在求本省的整顿就可解决的，还要靠北伐的成功，与长江下游蒋介石势力的打倒，及湖南问题的解决——这样湖北的财政与经济因交通的舒展，而能得到解决，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封锁政策才能打破，

革命的战线才能巩固，革命的后方才能稳定，湖北的革命基础才能深入与强固，以推动全国革命运动之进展。

原载《向导》第197期
署名：太雷

广州工人十月十四日的大示威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

叶贺军队失败两个星期之后，以海员为中坚的广州市工人，居然在反动的中心，四月十五日后屠杀工人囚押工人各以千数的广州，举行二万人的大示威运动。两万革命的工人打着镰刀斧头的红色旗子，向反动的政府示威。

他们对反动的军阀与资产阶级说：我们的军队虽然一时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基本队伍还是日益增长地存在着，并且存在在你们的心窝里；我们军队的枪把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击破你们的脑袋，但是我们工人的锤头将在你们的心胸中捣烂脏腑。当叶贺军队失败时反动派无不额手相庆，以为从此“赤祸”将绝迹于中国了，他们可以放心地去互相厮杀屠戮工农兵士以争夺帝国主义所剩下的唾余。但是十月十四日广州工人的示威运动代表中国的无产阶级警告军阀及资产阶级说：你们且慢定心厮杀，且慢任意屠戮，我们将起来消灭你们这班吃人的互斗的野兽。

十月十四日的示威运动并且警告一班革命投机的人们：你们看见站在工农方面的叶贺军队已经失败了，便以为中国的革命已无希望，于是毅然投降到反革命方面去依附反动军队，我们工农很感谢你们脱离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不受妨害地自动地干起

来。请你们看着：我们现在赤手空拳与反动势力抗争，我们将以群众力量夺取敌人的武装瓦解敌人的军队，建立工农的武力以铲除崩溃无能的封建资产阶级，并连先生们一起在内铲除净尽。

全国的工农及其同盟军将因广州市工人的大示威运动而更坚强其信念及更确信其自己的力量。军队是工农的一种工具，可以今日消失了，明天再有一更完善的军队，工农本身的力量则永远是不灭的，而且是日益增长，一直到夺取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这封建资产阶级表现脆弱无能及军阀混战愈入黑暗的政局之下，工农将以群众的力量自动地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解放唯一的希望，这是十四日广州市工人示威运动告诉我们的。

十四日的示威运动是因为新海宁及海宁船的革命海员被黄色工会勾结资本家更换反动海员之事而起；从这小事就扩大到省港汕澳海员团结起来反对李济琛政府所委派的海员工会改组委员会。以工贼组织的改组委员会当然不止海员，其他职业也都有这种工贼会，他们是广州市革命工人的公敌，各工会都受他们的摧残与压迫，他们是反动政府的侦探，工人所爱戴的千百领袖都被他们所捕杀，他们是资本家的走狗，他们帮助了资本家取消以前的契约，——工人从历年苦斗所争得之条件。所以一般广州市的工人都起来参加运动，于是从海员反对改组委员会运动而变成广州市全体革命工人反对改组委员会反对工贼的运动。最后更从间接反对封建资产阶级政府的运动扩大到直接反对反动政府，及要求建立广东工农政权的运动。这运动完全是群众的自动的革命的行动。更换反动海员则以老拳将其打跑；群众自己把海员工会占领；群众自动地把黄色工会职员用石头当场

击毙二人重伤二人；十四日以后各工会革命的工人自动地陆续占领反动派霸占的工会，各工会的群众脱离了反动领袖，要求加入革命的工人代表会；工人代表会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原来革命的代表，开代表大会决议夺取工代会及罢委的会所，驱逐反动工贼，并决定二十四日停工一天开广州市工人群众大会，通过土地革命的政纲，提出打倒李济琛张发奎政府建立工农的广东之口号。中国国民党经过反动领袖几次的出卖是已经死了，广州市的工人早已知道了，他们趁这个机会提出改换革命的旗子。有一位工人代表在工人代表大会上发言更换旗子的意见说：青天白日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子，我们还要他吗？我们从此要打倒这白色恐怖的旗子，而应该用我们工农的镰刀斧头红色旗。工代会那天有三百多代表，听了这番议论，鼓掌如雷一致通过。于是中国革命的旗子已由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十七日大会正式通告改换了红色旗。这是广州这次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最重大之意义。汪精卫式的假惺惺的张发奎拘捕了占领海员工会办公的二十七位海员，他提出释放的条件有二：一、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二、抚恤死伤反动的工贼。但是革命海员群众议决：宁可使我们的亲爱朋友在狱受苦，我们不愿意投降张发奎，事情是我工人群众干的，共产党是为我们利益的，无声明之必要；工贼死了两三个就要抚恤，我们工人死的囚的数千又谁来抚恤，工人穷苦到极顶那里有钱去抚恤工贼。所以张发奎提出的条件虽巧妙，而革命性阶级性明确的工人决不受其欺骗。张发奎固然表面上对工人是很“要好”，但是工人知道他是欺骗工人，其破坏的方法更比李济琛来得巧妙，李济琛使工人认识他是他们的死敌，张发奎还要工人认贼作父。广州市工人对付张发奎此种欺骗政

策，毅然以“打倒”的口号答复之。广州市工人教训我们：对于这班代表资产阶级的汪精卫张发奎等不可存一点幻想，对于资产阶级不可存一点妥协心理。我们以为从这次广州市工人大运动后，把一切的幻想一切的妥协心理及一切机会主义都送到坟墓里去！永远不再影响我们革命的政策！有这种幻想，妥协心理及机会主义的人们都脱离革命的队伍！

最后，我们还重述一句广州革命工人的话：

“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我们的革命旗帜是工农的镰刀斧头红色旗！”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2期
署名：大雷

附　录

张太雷年谱

（一八九八年——一九二七年）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诞生

6月17日　生于江苏省常州市西门外西仓街石皮场外祖父薛锦元家。原名曾让，字泰来，谱名孝曾，学名张复，又名春木，春之。参加革命后始名太雷。此外，还用过大雷、大、太、椿、椿年、之椿等笔名。

祖父名锷，原名锟，字开基，号翔云，世居常州府武进县西下塘，是个读书人，在清季为五品衔后选府经历。

父张光斗，原名惠畴，又名汝舟，字子义，号亮采，生于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二月二十日，为武进县邑庠生。

父张亮采因家境清寒，年长后招赘于同邑薛家。张太雷的母亲薛氏生于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九月三十日，死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薛氏生有一男一女。张太雷的姐姐名太玲，又名泰临，嫁同邑蒋惟城。

外祖父薛锦元曾在武进西门外开一皮行，字号薛天兴。

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三岁

父张亮采经本家族亲张绍曾举荐，赴江西萍乡县安源煤矿洗煤台任文牍，全家迁居萍乡。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八岁

年初　父患急症，到湖南醴陵就医，不幸去世。太雷姐弟二人随母亲扶柩回籍。母亲在常州市青果巷贞和堂族亲张绍曾家帮做家务。张太雷和姐姐曾一度在南郊张家坟堂屋中栖身。

回籍以后，张太雷先就读于贞和堂张家私塾，后进入常州西门外石龙嘴西郊初等小学。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十三岁

春　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校址在常州玉梅桥畔、前江南有名的护国寺。校长屠宽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积极倡导反对清朝卖国统治。还有几个教员是日本留学生和同盟会员。在他们的熏陶下，张太雷和瞿秋白等进步学生，在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经常阅读宣传新思想的书刊，议论国家大事。

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张太雷、瞿秋白等带头剪掉了辫子，并上街进行革命宣传。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十四岁

春　升入常州府中学堂本科。同年七月，该学堂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十七岁

1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5月9日　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

太雷积极参加了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怒潮和抵制日货运动。

7月　临近暑假，因参加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的学潮，被开除学籍。

不久后，考取北京大学法科预科（一说短期进入苏州东吴大学学习）。

冬　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临时预备班。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十八岁

秋　升入北洋大学法政科本科。

在北洋大学期间，课余在《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任翻译。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戊午）二十岁

5月　留日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陆军和海军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到日本政府镇压，纷纷罢课回国。

五月中旬，归国学生李达等到北京奔走酝酿。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学生发动了向反动当局示威请愿的运动，天津也有学生代表参加。京、津两地都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张太雷作为北洋大学的学生代表，与郭隆真、马骏以及北京大学"学生救国会"代表许德珩等人建立了联系。

夏　与同邑陆静华结婚。婚后生有二女一子。长女细苹（西屏）、次女细妹（西嫩、西蕾），子一阳（友阳）。

秋　与俄人鲍立维（即柏烈伟，C.A. Полевой）建立了联系，开始翻译社会主义文献。这一期间，张太雷受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立志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以救中国。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己未）二十一岁

2月　在天津发起组织进步团体"社会建设会"。

5月4日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张太雷在天津积极参加了北洋大学学生会、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以及天津各界联合会的爱国活动，英勇地站在斗争第一线，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骨干之一。

6月1日　参加北洋大学讲演第二团赴塘沽、大沽等处讲演，受到听众的欢迎。

8月　济南镇守使马良指挥军队枪杀领导示威游行的青年学生和市民，激起各地青年学生的义愤。

8月23日　北京、天津、山东各界联合会代表三十余人，齐集北京新华门

请愿，要求解除山东戒严，严惩马良。大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且把全体代表逮捕起来。天津各界联合会再次组织代表团，于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进京，与北京学生二千多人连日向总统府、国务院请愿。张太雷是天津的请愿学生代表之一。

通过五四时期的许多革命活动，张太雷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并与周恩来、马骏、郭隆真、于方舟等有了进一步的联系。

12月10日 天津男、女学校学生合组的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天津北马路总商会开成立大会。张太雷和邓颖超同为演讲委员会筹备委员。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庚申）二十二岁

3月 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Г. Войтинский）一行来北京，会见李大钊等，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张太雷与维金斯基经常接触，并在会见中担任英语翻译。

经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一行约在五月间从北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建议由陈独秀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

6月 于北洋大学法科毕业。与俞秀松等七名向往十月革命的青年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期间，张太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

10月 参加了李大钊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的早期组织，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0月16日 晚，在天津与将赴苏俄访问的北京《晨报》记者、原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同学瞿秋白亲切长谈。在场的还有五中同学吴炳文等。

11月 在天津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书记。主要成员有吴南如、谌小岑、胡维宪等七人，其中，谌小岑、胡维宪是“觉悟社”成员。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活动，发行了《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并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发行。

他们还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团小组建立以后，公开出版了《劳报》。《劳报》是以工人为主要对象

的日刊，报道全国工运消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后，送至唐山、南口、长辛店等地工人手中。但《劳报》只出了二十几天，即被禁止发行。于是又改出《来报》(取英文Labour一词的译音)，并移到天津法租界出版。团小组还派人专门到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中开展工作。

12月19日 张太雷受李大钊委派与邓中夏等四人到长辛店筹备建立劳动补习学校。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辛酉)二十三岁

1月1日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张太雷经常从天津携带各种革命宣传品到长辛店工人中进行宣传活动。

1月中旬 天津法租界巡捕房查封《来报》，没收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并将发行人逮捕。张太雷团小组的成员把报社迁出租界，在马千里帮助下，改名《津报》，继续坚持斗争。

春 赴伊尔库茨克，三月到达，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中国科书记，并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身份从事共产国际组织局委派的工作。

6－7月 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参照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起草了一份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方面的提纲。

七月十二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党对远东的革命运动给予更多的注意和支援。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参加了东方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起草了要求亚洲各国党和民族革命组织选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出席会议的呼吁书。

在莫斯科期间，还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7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8月 从苏联回到上海，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Maring,

原名 Hendricus. Sneevliet)的助手和翻译,并负责联络与组织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选派代表去苏联参加远东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事宜。在此期间,曾作为共产国际密使,前往日本,找到了施存统,并与德田球一、近藤荣藏、堺利彦等取得了联系,成功地完成了使命。

10月4日—26日 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五人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张太雷与马林四出奔走,营救他们出狱。

为召开东方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张太雷陪同马林积极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系,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国民党方面指派张秋白为出席东方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邀请马林访问孙中山。

11月 根据少共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局的指示,负责恢复和整顿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整顿中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12月10日 陪同马林离开上海,乘岳阳号轮船去汉口,其后,又从粤汉铁路南下,途经湖南,前往广西访问孙中山。

在经过长沙时,访问了文化书社,会见了毛泽东。还出席了当地青年团体的集会,马林用一个晚上给他们讲了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等问题。与此同时,还同湖南省省长及其顾问们进行了接触。在这些活动中,均由张太雷担任翻译。

12月23日 同马林于薄暮抵达桂林,下榻于广西银行。孙中山在桂林独秀峰山麓旧桂王府设立的北伐吴佩孚之大本营与马林、张太雷多次会见。会见中,讨论了国民党与苏联建立联盟的可能性问题。在此期间,孙中山和张太雷还长时间地讨论了青年运动的问题。

马林和张太雷在桂林共停留九天。这期间,他们还出席了当地青年的集会。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二十四岁

1月初 陪同马林到达广州。当时正值香港海员罢工,他们出席了广

州和海陆丰青年们的集会，并与陈炯明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此后，马林继续在中国南方旅行，张太雷则启程赴苏联。

2月 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即东方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了大会宣言《告远东各民族书》的起草工作，并把大会情况的报道寄给北京的《工人周刊》。

在莫斯科期间，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

春 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С.А.Далин.）抵达上海，负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这期间，张太雷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与达林一起赴北京参加领导北京的非基督教联盟的活动。

从北京返回上海以后，陪同达林与陈独秀会面，商讨了与孙中山谈判事宜。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决定张太雷参加与孙中山会谈的工作。

在上海的一座公园里，达林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处的成员会面，就组织代表大会的基本问题作了磋商，并商定一同到广州去。当时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由大会筹备处成员张太雷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等组成的委员会拟定。

4月下旬

4月27日—6月15日 与达林等在汕头共同起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然后分别乘同一轮船取道香港到达广东。张太雷与达林等一起，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在此期间，支持了达林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斗争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和国民党结成联盟，以及关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等主张。

5月1—5日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张太雷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大会致了贺词。

5月5日—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张太雷担任会议主席，在五日的开幕式上致了开幕词。这一天，在大会上还纪念了卡尔·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少

共国际代表达林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并作出了加入少共国际的决定。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

7月 列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大”后，奉中央局派遣，赴广州处理陈公博等人支持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错误。

8月17日—18日 在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全会，积极支持了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会议原则上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

8月底或9月初 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共产党人一起，在上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第一批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9月4日 孙中山约集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士五十三人座谈改进党务的意见。陈独秀、张太雷和马林均应邀参加会议。

9月6日 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起草委员会，负责草拟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11月—12月 参加以陈独秀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二十五岁

1月 孙中山发表国民党本部各项重要干部的任命。张太雷被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

5月—6月上旬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6月12—20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会上，张太雷积极赞成关于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

夏 在上海大学兼任社会学教授。

5月—8月　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了《外国统治下的商人政府》、《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等十七篇文章，并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了《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性》等三篇文章。文章揭露了国际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买办势力对中国加紧侵略掠夺的罪行，批评了国民党脱离群众的错误，分析了中国民族资本家为了与外货竞争而加紧压榨中国工人的问题，号召工人阶级"快快自己奋斗"，并向实业家们指出："只有团结全国人民来争取了中国的独立才有你们的发展机会"。

8月　在南京，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并修改了团章。在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后，团中央创办了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张太雷是该刊的创办人和主编之一。

8月16日　参加了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商有关苏联援助问题。

10月　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的讨论发言中，张太雷在谈到共青团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性时，强调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保存共青团独立组织的重要意义。在大会的闭幕式上，他当选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后，又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在留驻苏联期间，他还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曾就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活动问题单独向孙中山提出一份报告。

在苏联期间，还与片山潜、胡志明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二十六岁

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月20日　在莫斯科，与达林共同完成并签署了《亚非国家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现状与任务的简报》。

1月21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

张太雷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瞻仰了列宁遗容，参加了列宁的葬仪，并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了用毛笔和汉字写下的《列宁与中国青年》一文，表达了中国青年对列宁的悼念。

1月23日 在莫斯科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写了《列宁底死》，论述了列宁的不朽功绩，介绍了苏联人民对列宁的爱戴和沉痛悼念。

春 在莫斯科《农民国际》第二期上发表了《中国的农民及其革命运动》一文，介绍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情况。

4月14日 在《中国青年》第二十六期上发表译文《美国十一岁小共产党人的供词》。

5月1日 为莫斯科《工人日报》题词。题词中说："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觉悟。"

在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发了言，并向苏联少年先锋队致词。

在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与苏联《青年建设者》杂志和莫斯科《工人日报》青年记者马克西莫夫会见，并合影。

8月—年底 从苏联回国，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任负责工作，并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笔和社论委员。

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多篇。

与王一知结婚。婚后生一子，名知春(后又名芝明)。

9月11日 在《团刊》上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世界政治经济之观察及其现在之策略》和《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两篇文章。

11月26日—29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马克思政治学》为题连续发表了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一章中译文。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二十七岁

1月 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同月 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大会决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书记（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但从到广州以后，团中央的负责工作实际上由任弼时代理）。

春 到广州担任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М.Бородин）的助手和翻译，从此，在两年时间里，以主要精力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以及党的宣传工作。

5月17日 与鲍罗廷等出席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

5月30日 五卅运动爆发。

6月至次年10月 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参加了大罢工的领导工作，起草了罢工委员会的许多文件和决议，发表了《香港预备了解决罢工的代价没有?》、《请看英国的兵舰政策》、《中英谈判的经过与结果》等文章多篇。

秋 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任职期间，曾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以及政治讲习所等处作专题讲演多次。

12月 在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上发表了《广东政府内政上的两大政策》一文。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二十八岁

1月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

2月 兼任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主编，并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从《人民周刊》创刊至一九二六年十月出版的第二十七期中，以太雷、大雷、大、雷、春、木等署名，先后发表了各种题材的文章七十余篇。

2月7日 发表《二七之意义》一文，指出：“二七运动最先表示中国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3月12日 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为题的文章中，论述了“中山先生主义的中心是革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靠民众的努

力”，“要有一个有纪律的党”，“要与世界被压迫民众共同奋斗”。

3月18日 在广东各界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并发表了《巴黎公社纪念日》一文，介绍了巴黎公社事略，论述了巴黎公社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同日 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

3月19日 发表《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啊》。文章指出：“广东已经统一了”，“但是反革命的基础，民团，土匪，地主，官僚还存在着”，人们要“提防着”敌人的阴谋。

3月20日 蒋介石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3月30日 就“中山舰事件”发表《三月二十日的戒严》一文。文章说：“三月二十日事件证明本刊上一期所提出‘广东革命危机存在’的警告是正确的。此事件告诉我们，反革命势力仍是时刻预备乘隙而入。”“所以我们要严密我们的团结，我们的领袖要稳定而一致，才能防备敌人阴谋。”

同日 就“三·一八”惨案发表《段祺瑞惨杀爱国学生》一文，简述了“三·一八”惨案的经过；号召“广东民众应与北方民众联合组织全国的大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张吴造成中国反动局势，打倒段祺瑞的卖国政府，废除辛丑条约，要求撤退外国驻兵，召集国民会议”。

5月4日 发表《五四纪念告广东学生》。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分裂广东学生运动的阴谋，提出了“回复五四运动的团结精神”的口号，论述了加强广东和各地学生运动团结的意义。

5月15日 蒋介石加紧反共活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

6月10日 就“整理党务案”在《人民周刊》第十四期发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该文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共阴谋活动作了揭露和批判。

7月8日 发表《此次广东出师的意义》，分析了北伐的原因、意义和必胜的根据。

7月15日— 国民政府代表陈友仁、宋子文、顾孟余与英港代表白伦纳（驻

23日　粤总领事)、刚伯(港辅政司)哈立法克斯(港律政司)在广州就沙基惨案、省港罢工以来对英杯葛(boycott,“抵制”之意)问题进行了五次谈判,然后休会。

8月1日　张太雷以《中英谈判的经过与结果》为题,对中英谈判进行了记述与评论。

同日　就国民党右派与土豪劣绅以北伐为幌子,限制人民自由的言行,发表长篇论文《此次出师与人民的自由》。论文指出:“此次广东出师,不论他是站在防御广东,或保卫与扩大革命基础,或讨吴的意义上面,都应是为人民的利益的”。那种借口军事时期限制人民自由,压制工农运动,随意对贫苦农民勒索军需、派销公债的作法,是违背北伐目的,也是违背人民利益的。文章强调说:“人民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任他们,不要怀疑与惧怕他们”。

8月12日　就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发表《陈独秀的意见是对的》,表示了对陈独秀关于北伐的意义及北伐与民众利益关系的见解的支持。

同日　针对蒋介石六月二十八日在黄埔军校讲话中对张太雷的《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一文所作的攻击,以《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为题发表声明。声明批驳了蒋介石的攻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共产份子问题是政策问题,不是组织问题,不是一个党员人数的问题而是左派或右派在党内掌权的问题。”

8月20日　在廖仲恺先生被刺逝世一周年之际,发表长篇论文《廖仲恺——国民党的左派模范》。文章指出:“发展真正左派的势力”是“当今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问题”。而“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分别革命与反革命,认清友与敌”;其次是要承认“革命的基础应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身上”。文章还强调说:“个个左派应当拥护与廖先生所扶植的革命分子的团结,竭力防止对这革命团结的破坏。这样左派才能发展,才能指挥国民党与领导中国国民运动。”

8月27日　花县反动民团土匪联合攻打农会,屠杀焚烧、奸淫掳掠。对

此，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却声明“政府须审慎从事”，不即刻惩办，任其涂毒农民。

9月8日 张太雷以《我们怎样对花县农民》为题发表评论。评论强调了农民协会在反封建斗争中的重大作用，揭露了花县民团、土匪联合攻打农会的罪恶行径，谴责了北伐军总司令部表面站在第三者地位实际纵容民团土匪涂毒农民的行为。

同日 发表《援助罢工与英国进攻》的短评，就英国乘北伐军远离广东北上的时机于九月四日出动兵舰至西濠口工商验货处逐走货船事件，揭露了英国将以直接行动自动解决省港罢工的企图。申明：“英国现在专门寻衅，我们当然要尽量避免冲突；但是我们决不屈服。”

同日 发表《武汉攻下以后》一文。指出：“自北伐军节节朝北发展时，党外反革命分子如潮的涌入党内”，“地方官吏，土豪劣绅，民团，逆党，土匪”，“结合了攻打革命基础的联合战线”，“工农运动几乎成为眼中之钉，恨不能立即拔去”。“这是革命党人应该注意的一件最要紧的事”。

9月14日 就国民政府对农民发表第三次宣言，表示尽力保护农民利益问题，写了《要求实行兑现》一文。文章中说：“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农民已有两次宣言，允许农民种种权力与利益。惜此等允许犹多未能实现”。“广东农民现在所要求于政府的，就是对于宣言与决议，实行兑现！”

同日 在《军队进剿花县土匪》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派第二十师第二营前往花县“不云剿办而云排解”，总司令部代表伍某“更用总司令蒋中正命令限制军队剿匪”，这“无异于坐视反革命势力扑灭革命势力”。

同日 发表《武汉攻下后之国内外形势》，指出：“反革命派正在竭力分隔政府与民众，国民党的领袖与党员群众应严防此种阴谋”。“民众应该利用反动军阀崩溃时机，尽量组织自己的势力以保证将来不再受以前所受的压迫与痛苦。”

10月4日—26日 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革命青年》第一卷第四——七期

上发表《万县事件》、《英国外交又失败了》、《青年运动的使命》、《革命一贯的策略》、《一年以来政局的回顾》等文章多篇。

11月16日 同鲍罗廷、宋庆龄等从广州途经南昌北上。

12月7日 在北上途中，同鲍罗廷一起去庐山与蒋介石商讨国民政府迁都等问题。

12月10日 陪同鲍罗廷自九江乘轮船到武汉，住汉口旧德国租界。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丁卯）二十九岁

春 调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3月 鲍罗廷在一次国民党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的讲话中，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背叛人民革命、镇压群众的罪行。张太雷在场翻译过程中，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当说到蒋介石在惠江、广西屠杀农民工人与迫害共产党人时，声泪俱下，深深感染了在场的听众，打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

4月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

4月27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坚决支持了瞿秋白、毛泽东等提出的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等主张，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5月16日 代表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在汉口德国球场举行的李大钊追悼会上报告李大钊殉难经过。

6月8日 在《向导》上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问题》，批驳了所谓工农运动造成蒋介石叛变和武汉政府困难的谬论，指出：“两湖的厄运是帝国主义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所给予我们的”，不是“工农运动所造成的”，“不能口口声声骂工农的幼稚与过火”。文章强调应支持农民“继续进行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帮助农民武装起来以自卫”，并坚决主张完成北伐，打倒蒋介石势力，以打破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对武汉的经济封锁政策，发展革命运动。

7月上旬 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汉转入秘密状态，党中央领导机关实行改

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的五人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从此，陈独秀不再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五人中央常委决定了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的计划，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7月13日 五人中央常委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7月15日 在庐山邀集几位中央委员听取了汇报，了解了南昌起义的准备情况。

7月下旬 与瞿秋白等从庐山回到武汉，同在武汉的中央常委李维汉以及共产国际新来的代表罗明纳兹(B. Lominadse)一起进行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

8月3日 中央常委召开会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会上，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了与国际代表谈话的结果，会议讨论了改组中央的问题。

8月7日 出席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9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选出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还讨论了主要的地方组织，决定派张太雷去广东，任粤省委书记(八月十日常委第一次会议又决定周恩来负责南方局领导工作)。

8月11日 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以张国焘为书记。南方局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并决定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两广、闽南区域内的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

8月22日 中共中央写信给南方局转广东省委，指示南昌起义队伍迅速占领东江，东江立即开始大规模暴动，西江、北江和南路也要有军事行动和农民暴动。

张太雷写信给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汇报广州起义的准

备情况。信中分析广州的形势，指出：只要广州附近铁路线上的工农和广州市内罢工工人、工代会工人同时动作，起义定可成功。信中还附有广东省委接受“八七”会议的决议、省委名单、暴动计划、口号、暴动前军事的编制与工作方法，暴动时及暴动后的工作大纲等。

9月 赴广东，在香港设立广东省委办事机构。

主持出版《广东省委通讯》，指导广东省各级党组织准备武装起义等工作。

9月中旬 赴汕头、潮州一带，组织群众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南进的斗争；并向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同他们研究了下一步行动的策略。

9月21日 广东省委发出《通告第九号——目前应注意之十件事》，决定在各地设立革命委员会，指挥起义。广州市暴委改为广州市革命委员会。

10月 张发奎军队开入广州。

10月12日 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指示要根据张发奎到广州后实行对工人的欺骗政策的情况，领导广州工人进行大示威运动，进行经济斗争，并提出政治斗争的口号，以揭破张发奎的假面具。

同月 中共中央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指示广泛发动农民暴动，占领县城，成立工农贫民代表会议，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广州城内，即需准备暴动，取得广州后，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工人团体代表开会，选出临时革命政府，实行苏维埃。

10月15日 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成立，张太雷主持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作了题为《“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南昌起义和潮汕人民起义失利的经验教训，揭发批判了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分竭力反对南昌起义的错误。会上，张太雷还主持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纲领指出：“广东革命运动仍是高涨”，“应当注意农工群众自动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扩大，要坚决勇敢地树起工农革命的大旗，集合一切武装势力以与土劣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决死奋斗，建

立工农政权。"会后，再赴汕头处理起义失败的善后工作。

同月 中共中央撤销南方局，张太雷仍任广东省委书记。

在《布尔塞维克》第二期发表《广州工人十月十四日的大示威》，颂扬广州工人的示威行动，声讨反动派屠杀人民的罪行，表示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11月17日 中共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对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组织暴动，"以取得广州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11月18日 在上海与瞿秋白共同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11月20日 遵照中共中央决定，赴广州组织武装起义。

11月23日 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已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海丰也已成立苏维埃政府，彭湃同志根据中央决议，已在海丰进行土地革命。信中还要求周恩来寄一些文件给广东省委。

11月25日 广东省委发出通告第二十五号，指示各地利用张发奎、李济琛两派军队互相厮杀的机会，扩大工农暴动，成为全省的大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

11月26日 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以及起义的总计划。会上成立了起义的总指挥部——行动委员会，张太雷任总指挥。

11月28日 主持发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

在珠江白鹅潭江面的一艘邮船上，主持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负责人会议，传达、部署了起义有关问题。

11月29日 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准备广州暴动的报告，报告广东省委决定立即暴动。准备的办法是：筹备总同盟罢工，组织赤卫队，加紧对张发奎部队的工作，组织市郊农民暴动。

12月1日 广东省委发布《紧急通告第二号——号召立即准备暴动，实行夺取政权》。

12月4日 召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党员大会和积极分子会议，动员起义，并检查了各级干部的分组训练情况。

12月5日 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赞成广州暴动计划，指示省委注意广州市郊工农群众的发动；召开工代会，成为暴动发动的机关；暴动

后，农民和士兵代表加入工代会成为工农兵代表会。

12月7日 主持召开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通过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名单，决定十二月十三日举行起义。接着，又主持省委会议，讨论了苏维埃的政纲、宣言以及行动部署。张太雷当选为人民海陆军委员，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

12月9日 主持行动委员会紧急会议。鉴于敌人获悉起义消息，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凌晨。

12月10日 广东省委给中央报告，认为广州暴动时机已到，在工人群众中已召集过各种代表大会，组织总同盟罢工，作夺取政权的暴动。武装方面，已有三千工人赤卫队，教导团差不多全数可以指挥，警卫团可指挥二百余人，并已派得力干部去市郊组织农民暴动。报告还汇报了准备在暴动中提出的口号和政纲。

主持召开各级党组织和工会干部出席的武装起义动员会，作了重要讲话，并宣读了起义的政纲、口号等。

晚上，先后主持召集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的骨干分子会议，提出起义的行动要求。

12月11日 凌晨一时许，主持教导团誓师动员大会，并作了动员讲话。

三时半，广州起义爆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伪公安局和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公安局设立了红军总指挥部。晨六时，主持召开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宣读了起义的政纲。会议选举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领导人，张太雷代理主席并兼人民海陆军委员。

12月12日 中午，广州工农兵群众一万多人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举行大会，热烈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会上，张太雷作了重要讲话。

下午二时许，乘车返回总指挥部，适逢敌人从观音山攻至总指挥部附近，张太雷立即上车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在途经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时，遭敌人伏击，身中三弹，壮烈牺牲。

（丁则勤　王树棣）

编 后 记

张太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烈士。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和学习张太雷同志的卓越思想，我们选编了这部《张太雷文集》。

这部文集选收张太雷同志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牺牲前的大部分著作，共一百零二篇。全书以年代为序编排，编者仅作了必要的技术整理工作，对于原著的内容一律不作删改。

这部文集是由北京大学的王树棣、丁则勤同志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梁大为、袁钟秀同志负责编选的。在编选过程中，还得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和张太雷同志的亲属王一知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〇年七月

书名题字：邓小平

张太雷文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38,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800

书号 17001·78　　定价 1.60元